

苏联共产党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人民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 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1990年7月21—13日)

苏群编译

人民出版社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1990年7月2日—13日)

SULIAN GONGCHANDANG DI-ERSHIBA CI  
DAIBIAODAHUI ZHUYAO WENJIAN ZILIAO HUIBIAN

苏 群 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318,000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600

ISBN 7-01-000887-6/D·289 定价 6.80元

(内部发行)

## 出版说明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1990 年 7 月 2 日至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

这次大会是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改革和更新苏联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批准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这次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近年来，苏联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组织和政党。苏共内部也出现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并提出了各自的纲领。

在代表大会上，就苏联国内局势，对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的评价，苏共的性质、地位、奋斗目标、指导思想，以及今后党的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各派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论。大会虽通过了苏共纲领性声明，批准了新党章，避免了一次大的分裂（只是叶利钦和民主纲领派少数代表在大会上宣布退出苏共），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为使我国读者和研究者对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及苏

联当前的状况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将大会的报告、决议、纲领性声明、党章等重要文件，以及大会一部分重要发言，包括不同派别代表的发言，根据苏联《真理报》翻译出版。如公开引用，请注明原出处。

# 目 录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

(1990年7月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 1 )

一、关于当前形势……………( 2 )

二、改革政策, 经验和前景……………( 8 )

三、党与改革……………( 32 )

## 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讨论结果的发言

(1990年7月10日)……………( 50 )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1990年7月10日通过)……………( 69 )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1990年7月3日)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尤·阿·马纳延科夫( 76 )

##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

(1990年7月3日)

……………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主席阿·阿·尼佐夫采娃(80)

**关于苏联共产党预算和财产的报告**

(1990年7月3日)

……………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9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预算和  
财产的决议**

(1990年7月10日通过) ……………(10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现阶段党的  
军事政策基本方针的决议**

(1990年7月9日通过) ……………(10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维护民主权  
利、反对迫害共产党员的决议**

(1990年7月9日通过) ……………(112)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

(1990年7月11日通过) ……………(113)

一、社会的危机和党的战略目标……………(113)

二、苏共的行动纲领……………(117)

三、党的革新……………(128)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第二十八次代  
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的决议**

(1990年7月11日通过) ……………(13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状况和  
实现苏共农业政策的决议**

(1990年7月11日通过) ……………(134)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审议苏共章程草案时作的说明

(1990年7月12日) ..... (138)

苏联共产党章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

13日批准) ..... (146)

一、党员、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 (146)

二、党内民主 ..... (148)

三、党的组织结构 ..... (151)

四、苏维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中的共产

党员 ..... (158)

五、苏共的资金和财产 ..... (15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在教育、  
科学和文化领域政策的决议

(1990年7月12日通过) ..... (16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进行经济  
改革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政策决议

(1990年7月12日通过) ..... (16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舆论工  
具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 (16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青年政  
策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 (17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事故和消除事故后果工作情况的政治评  
价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	(176)
<b>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民族政策是通向自愿联盟、各族人民之间和睦与和谐的途径的决议</b>	
(1990年7月13日通过) .....	(179)
<b>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提出委托的决定</b>	
(1990年7月13日通过) .....	(184)
<b>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起草新的苏共纲领的决定</b>	
(1990年7月13日通过) .....	(186)
<b>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b>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13日批准) .....	(187)
<b>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b>	
(1990年7月13日) .....	(190)
<b>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书记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汇报</b>	
<b>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的汇报(1990年7月2日) .....</b>	<b>(195)</b>
<b>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的汇报(1990年7月2日) .....</b>	<b>(204)</b>
<b>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的汇报(1990年7月2日) .....</b>	<b>(211)</b>
<b>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的汇报(1990年7月3日) .....</b>	<b>(219)</b>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叶·库·利加乔夫  
的汇报(1990年7月3日)……………(227)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尼·扎伊科夫  
的汇报(1990年7月3日)……………(234)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伊·沃罗特尼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239)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尤·德·马斯柳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245)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亚·克留奇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253)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国防部长德·季·  
亚佐夫的汇报(1990年7月3日)……………(261)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格·彼·  
拉祖莫夫斯基的汇报  
(1990年7月4日)……………(268)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阿·伊·卢基扬诺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274)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  
会主席鲍·卡·普戈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283)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亚·帕·比留科娃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290)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亚·弗·弗拉索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296)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总统委员会成员叶·

马·普里马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7日)·····(303)

苏共中央书记奥·德·巴克拉诺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309)

苏共中央书记古·伊·乌斯曼诺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316)

苏共中央书记尤·阿·马纳延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321)

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325)

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总编辑伊·季·弗罗

洛夫的汇报

(1990年7月6日)·····(333)

## 党政各部门负责人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 答与会者问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

日科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342)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

杰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349)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

列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362)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叶·库·利加乔夫

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372)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388)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9日)……………(397)
-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主席阿·阿·尼佐夫采娃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9日)……………(408)
-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9日)……………(414)

### 各专题小组的代表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党委书记И·И·梅利尼科夫代表“党的革新”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427)
- 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总编辑伊·季·弗罗洛夫代表“意识形态工作”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431)
-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伊·古达科代表“社会经济政策”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434)
- 图拉州列宁集体农庄育种场场长、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А·斯塔罗杜布采夫代表“苏共农业政策”小组的发言(1990年7月7日)……………(439)
- 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工作部部长瓦·亚·库普佐夫代表“党、苏维埃、社会政治组织与运动”

小组的发言(1990年7月7日)·····	(443)
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代表“苏共民族政策”	
小组的发言(1990年7月7日)·····	(448)
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代表“苏共国际	
活动”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	(452)
苏共各派代表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的发言	
(1990年7月6日)·····	(457)
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维·H·绍斯塔科夫斯基的	
发言(1990年7月6日)·····	(461)
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亚·弗·布兹加林的	
发言(1990年7月6日)·····	(465)
什维尔尼克高等工会运动学校教研室主任阿·A·	
谢尔盖耶夫的发言(1990年7月6日)·····	(47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1990年7月2日至13日)·····	(478)

## 附    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新闻公报	
(1990年7月13日至14日)·····	(493)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 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

(1990年7月2日)

同志们!五年来,我们在所有生活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这就使我们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今天的问题是:要么苏联社会沿着已经开始的深刻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我坚信,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就会迎来美好的未来;要么反改革势力占上风,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那时国家和人民就将面临黑暗时代。

因此,要开诚布公地展开讨论。不能再保留自己的评价和结论了,要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把现阶段改革的所有根本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这些根本问题也是大会前讨论的焦点。

1985年4月开始的转折是正确的吗?今天我们赋予“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什么样的涵义?在内外政策方面我们打算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如何克服影响到人民生活并引起正当不满的危机现象?我们祖国的命运如何,我们将如何建设主权国家联盟?在新的条件下党的地位应是什么样的,党本身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又应当是什么样的,为了使受到人民信任的、劳动者的革命组织——苏联共产党复兴,我们应当作些

什么？

## 一、关于当前形势

当前我们社会所处的形势，是引起尖锐争论、使人们心绪不宁以及作出相互排斥的结论的对象。也可以说，当前形势是各种不安和关注的根源。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我们今后将怎样生活——问题的答案也在这里。只有考虑到五年来社会所发生的变革的规模和全部多样性，我们才可能正确理解当前形势的特点。国内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我们应当看到改革的全貌。

自由人的公民社会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根本改造，包括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权在内的真正民主正在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正在复兴。造成劳动者同所有制，同其劳动成果分离的生产关系正在解体，社会主义生产者自由竞赛的条件正在形成。把超集中制的国家改造成以各族人民自决和自愿统一为基础的真正的联盟国家的工作已经开始。自由思考和公开性以及开放社会信息取代了意识形态专制的气氛。

新政治思维帮助我们以另一种态度观察和现实地评价周围世界，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了对抗态度。苏联成了对世界与合作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引起的不是恐惧，而是尊敬和支持。1985年4月以后，我们向人们讲了真实情况，摒弃了毫无根据的狂妄自大态度，并承认未能真正保证人们过上像样的生活。坚决谴责了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的罪行。为千百万遭到非法迫害的人恢复了名誉。

这一切都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转变。生活变得



更充实、更富有内容、更有意义。但是，生活既没有变得更单纯，也没有变得更轻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流派，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各种居民群体和阶层的利益都调动起来了，并发生了冲突。改革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自尊心，但也提高了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产生了对迅速好转的巨大期望。今天，苏联人已不甘心于过去俯首帖耳地忍受一切的状况。苏联人怀着可以理解的不安和不满心情来看待消极现象。这种沉渣泛起的消极现象与生气勃勃的和从根本上是健康的改革进程同时出现。由此便产生了思想混乱、神经过敏、热衷于开大会或搞公开讨论、没完没了地进行指责和提出要求。近来这种现象已经够多了，其中包括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大会上。

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触及形势所固有的实质性矛盾，我们就无法进一步分析形势。一方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使我国社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将决定着社会在今后几年和几十年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使人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艰难的一大堆问题。

重要的是要理解这方面具有的辩证关系。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已经顺利开始的、从历史观点来看已经使社会得到许多实惠的改革进程，为什么没有能够消除社会的许多弊端呢？在一定意义上说，形势甚至恶化了。这首先涉及到消费市场，也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秩序、族际关系。

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和有根有据的回答，对于作出今后应当如何办的结论来说是重要的。作出这样的回答对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也是必要的。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说法：那里搞了些什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看法：说什么目前我们的种种不幸都是改革的过错。这简直是

胡说八道。请原谅我说了句粗话。只有不愿意或者不会睁眼看人，人人能看得清楚的事实的人才会这样说。也许这样说是怀有某种目的。

我们接受了极其沉重的遗产。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和议论一下吧。农村、农业和加工工业杂乱无章，这种现象难道是昨天发生的，是1985年之后发生的吗？要知道，这决定着今天的食品状况和农村农民的状况以及他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森林和河流的凄惨状况，由于以前的能源政策，数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被淹没，这难道是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吗？严重的生态局势，100多座城市处在灾区，1000多家企业因此而停工，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和亚速海的悲剧，切尔诺贝利和其他灾难，铁路和天然气管道的重大事故，这一切难道不是最近几十年来所推行的政策的后果吗？！

总共只有1/7的工业生产基金用于生产消费品，这样的经济结构难道不是早在30年代就已形成并且自那时起就一直保留着吗？还有库兹巴斯、顿巴斯、秋明、沃尔库塔的问题。要知道，这里的社会领域所处的状况是几十年形成的。

而族际关系中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的根源不是来自过去吗？至于吞掉了大量的，而且是最好的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经济军事化、阿富汗战争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人员伤亡等，就更不用说了。

让我们做个客观的和有原则性的人吧。在重大政策中不能受某种情绪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当有人说“不能光追究过去”并把所有的困难都推到改革身上的时候，就不能表示同意。是的，我们大家的任务是改正工作，使一切朝着好的方向转变，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不能硬说什么我们今天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改革的后果。评价错了，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在

实际工作中也就可能出错。

同志们，在谈到所有这一切时，我丝毫不想粉饰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在各共和国和地方的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的评价和结论。有许多事情我们是能够预见到的，是能够阻止一些进程的发展的，首先能够阻止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族际关系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进程的发展。政治局对这些失误并不推卸责任。在报告过程中阐述具体问题时，我将更详尽地谈到这一点。我们在议事日程上规定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的书记要作工作汇报。因此，代表们将会得到关于党的领导机关工作的必要情况。

但我认为，召开代表大会不是为了作出匆忙的裁判。当我们面临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革命性改造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分析原因和正确评价我国所处的形势，因为苏联越来越快地变成二等国家。80年代初就已经清楚了，虚假的富足安康是依靠野蛮地和浪费地使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支撑的。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曾面临很快将陷入后果不堪设想的灾难境地。

对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五年间的工作成果，我们也应作出彻底的分析。为了正确理解当前形势，首先不应忽略改革本身尚未完成这一情况。我们处在旧体制尚未完全废除和新体制更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就是说，需要更加坚决地行动起来，因为迟缓将使我国的形势更加紧张。

为什么许多事情我们做起来是那样地费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阶层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力量对变革的反抗。我们当然清楚，改革必然会触犯那些手中握

有实权和以人民的名义支配社会财富的人的利益。

一部分领导干部信守老一套，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改革进程溶为一体，而且在政治上以及心理上都不接受改革进程，他们目前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如果不克服这些工作人员的立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在管理机构的各个层次都存在——改革进程就会尖锐化。

苏联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具有原则性意义。当然，我们不能作出简单的评价和结论，更不用说压制干部了。也有一些为国家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有经验的专家，他们现在还在为改革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许多人在这些年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这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几千人。然而我说的是顽固地抓住旧的东西不放，阻挠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变革，而且试图在为人民的利益，为意识形态原则的纯洁性而斗争的幌子下坚持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的那些人。

企图利用社会能量达到自己的自私目的和面对混乱的局势仍然不罢手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各种破坏势力猖獗活动，会使实现改革的任务严重复杂化。这就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冲突的原因之所在。

也不应当忽视那些要促使我们实行资产阶级制度，把摆脱目前复杂的状况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在社会上的表现。

现在，当我们进入生活各个领域变革的关键阶段的时候，还应当注意最极端的派别，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极端主义的势力相互勾结这样一种特殊现象。它们甚至联合起来企图使人民迷途，使我们迷失改革的主要方向。

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明白的，因为在进入决定性的改造阶段的时候，党就要抓住改革的战略主动权，并且再一次作为

社会团结力量发表意见，提出有利于人民的重大决策。

同志们，总之，当我们对当前形势作出评价，试图搞清楚危机现象的原因的时候，就应该看到，在这里，过去和现在、过渡时期的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政治考虑以及主客观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

我想强调指出，无论党内还是社会上都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联合一切健康力量，尽快摆脱这个困难的发展阶段。我认为，如果有人得以分裂坚定地站在改革立场上的民主力量，我们的改革就会遭到失败。我们需要的是实行在经济改革范围内相互关联的一整套实际措施和有效措施。需要稳定国内政治和社会形势，加强法律和法制的迫切措施。应立即着手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它将成为我们多民族国家深刻改革的基础。应特别优先解决食品问题和优先改善对居民的工业品供应。所有党组织的努力都应集中在实现这些迫切任务上。

应该尽一切努力，使改革作为一种和平革命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使国家转入没有动荡的新质状态，因为各种动荡的主要受害者永远是人民。应该创造一切民主条件，让那些忠于改革、代表时代精神和群众情绪、有能力做实事的真正有才能的人掌权。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社会的高度和睦。现在不是发最后通牒、闹冲突和采取轻率行动的时候，这样做会使人们不团结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社会上希望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情绪在不断加强。因此，我想在这个讲台上呼吁矿工集体支持这一情绪，同时我也认为，有关解决他们公正提出的问题的的工作应该进行到底。

同志们，这些就是对我国当前形势最扼要的描述。

## 二、改革政策:经验和前景

同志们,改变经济的社会方向、使经济转向人的论点,是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首先修改了结构政策。这使本五年计划中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如果使用我们惯用的术语,那就是乙类与甲类相比第一次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资本开始向与人直接有关的领域,向为人工作的各部门转移。对于我们的巨大经济来说,这种趋势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不仅使之得到加强,而且使之更快发展。

在执行五年计划过程中已经采取了补充措施,以便克服向社会领域拨款的剩余原则。四年来,在五年计划任务之外,为非生产性建设拨款 340 亿卢布。总的来说,用于这些目的的资金超过 2460 亿卢布,而非生产性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差不多增长一倍,即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 4.7% 增长到本五年计划的 8.8%。

这是相当重大的一项措施。这能够在五年内比上个五年计划多建 1 亿平方米住房,我们是第一次达到这么大的住房建设规模。交付使用的其他社会文化设施也有增加。这些年来,同上个五年计划相比,全国建成的学校按座位计算每年平均增加 38%,儿童保育机构增加 10%,医院增加 15%,门诊部增加 38%,文化俱乐部和文化之家增加 51%,商业企业增加 7%。

我想特别谈谈对居民的商品供应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是极为严重的。我可以同意就这一问题所说的一切意见。而且,

看来这几天还要讲很多。我赞同最尖锐的批评。但是，如果只是加剧情绪，商品是不会因此而增加的。需要清醒的估计、周密思考的结论、实际的步骤。据我理解，苏联人对我们的期望正是这些。

这方面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看统计数字，即使不按照价值指标而是按照实物指标比较，也能看出许多食品和消费品方面的某种积极的发展变化。例如，同上个五年计划相比，平均每年多收谷物2660万吨。这是非常大的增长。肉类生产也有增加，屠宰量增加250万吨，牛奶、糖用甜菜、向日葵的生产也有增加，而这方面原定指标则低得多。布匹、针织品、彩电、磁带录音机、电冰箱、洗衣机、其他家用设备以实物计算的生产也增加了。国防部门转产初见成效，今年1月至5月，这些部门的企业生产的民用商品增加22%。

过去每年的平均贸易额增长为100—120亿卢布，而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则达到200亿卢布，去年还达到380亿卢布。人均消费量增加了。这些全都是对的。然而，消费市场的形势不仅没有变得简单一些，而在许多情况下变得尖锐了，并且具有简直令人不能容忍的性质。我甚至想说，这是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临界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货币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的增长。原因何在呢？

第一，在扩大企业的经营权和自主权时，取消了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的增长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的严格控制。在许多企业中工资大大超过产品生产的增长。第二，在开展合作社运动时远非一切都考虑周到。合作社过去和现在都做了有益的事情，但同时也给划拨的资金转为现金开辟了渠道，而且是数十亿卢布。第三，在扭转基本建设的形势和整顿秩

序方面作出的决议没有得到彻底执行。继续存在长期不能完工的工程，这就造成了物资积压，而不应把物资投放到市场上去。再加上给未完工工程建设者发工资的费用，是数十亿卢布。

有关提高教师、医生及其他类别劳动者的工资，以及提高退休金和助学金等各项决议的落实，自然也对货币收入的增长产生了影响。这一切的结果是，仅去年一年，居民的货币收入增长额就达到 640 亿卢布——过去通常为 120—150 亿卢布。今年的状况仍然如此。

当然，有人会问：是否本可以避免工作中的失误，防止经济中出现消极趋势？坦率地说，如果政府能够综合进行经济改革，抵制那些竭力维护自己的立场、维护行政命令式工作方法的部门和旧的管理结构的压力，那就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这些不良后果。在这方面，政治局恰恰需要帮助政府，向它提出更高的要求并给予支持。应当说，这些信号已经从社会，从经济部门，特别是从中央经济部方面发出。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尽管多次进行过辩论，但应该做到的并未做到。因此，我们要对消费市场的更加紧张负直接责任。消费市场的紧张恶化了全国的局势。

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由此也恰恰得出一个结论：迫切需要加快经济改革并使之彻底化。不能再与排斥科技进步和新技术、信奉消耗原则、造成浪费和损失的经济体制共同生活下去了。

国内单位产品的物质资源消耗仍旧比发达国家高出 1—1.5 倍，燃料和能源的消耗高出 50%。大量企业亏损运转，国家补贴达 230 亿卢布！粮食、水泥、金属、石油、矿肥、木材及其他许多资源的大量损失更是自不待言。在这种经营体制下，



国家不会富强，人民不会富裕。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为了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近期就能确保人民的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必须改变体制。

可见，改革的逻辑本身、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尖锐化，就促使我们认真对待经济体制根本改革的必要性。这里指的是建立新的经济模式：有多种成分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以及现代化市场基础结构的经济。这样便会为人们发挥经营积极性和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天地，为富有成果的劳动，为提高经济效率创造新的强大动力。

这一任务我们早在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提了出来。但是只是现在，当积累了一定的运用新的经营形式的经验，在政治改革领域实施了重大步骤，通过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法律，首先是所有制法、租赁法、土地法等等的时候，我们才能实际着手实施向市场过渡的任务。

当然，为此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类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在消费市场正常化方面、在控制过大的货币量和使国家预算正常化方面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及许多其他措施。

我们面临的一项具体任务是要卓有成效地结束本经济年度。劳动集体应该表现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尽一切努力，使今年的经济成果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当人们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途径时，令他们不安的是：这是否会导致生活水平的降低、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公正和对人的社会保障能否得到保证？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使所有的人——在职的和退休的，男人和妇女，老年人和青年人——都焦虑不安。其原因是在制订政府规划时，没有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因而这项规划遭到了批评。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首先谈谈市场本身。市场经历了从商品自发交换到有高度组织的机制的七千年的演变。我们不应采取唯意志论的态度，而要学会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过程，从而为提高经营积极性创造新的强有力的促进因素。

在市场条件下有可能实际摸清需求情况，找到有效地满足这些需求的途径，使供需平衡，为发展生产创造正常的自然环境。总之，我们认为，市场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提高经济效益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手段。它应有助于迅速解决一个课题，即使我们的经济具有更大的社会方向性，转向为人们的利益服务。

当前所理解的市场否定了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垄断，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与政治平等。

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的集体所有制，不管是农场主的和手工业者的还是家庭的劳动所有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加强社会的民主基础。既然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他们自己就会关心进行有效的工作并产生巨大的最终成果。这里没有剥削的基础，这就是说，向市场经济过渡，我们并不是向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而是要更充分地利用社会潜力。这就是改革构想的意图。

当然，不能使实施重大的长期的科技规划、发展基础科学和文化、全国性的社会和生态规划听任市场支配，但是，也不能靠粗暴的行政压制手段，而是要通过税收、利率、优惠与制裁以及关税来保障。为了使国家的经济政策行之有效，必须掌握一整套经济管理手段。

解决实行市场关系的问题时应该极其审慎。要有保护人的劳动权利和选择工作的现实可能性的法律文件。国家应当从物质上支持那些愿意劳动但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的

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上财富的差别问题。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如果这种差别是同人的劳动贡献的性质和数量，同他的才能、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联系起来的话，那是可以的。然而我们坚决反对以非劳动收入或非法的特权为基础的阶层分化。

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价格问题。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后，政府目前正在根据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修改自己的建议，首先是关于改革价格形成的建议。可以期望最终能找到最佳方案。

我想强调一下，如果没有考虑周密和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就不可能开始修改零售价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提高价格着手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样做是荒谬的。

我认为，无论是社会上的批评，还是最高苏维埃中的批评——我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它尖锐地存在于社会中——都表明，在走向市场的道路上，还缺乏考虑周全的逻辑、策略、顺序、连贯的步骤。结果，关于价格的问题几乎成了主要的问题，也几乎成了向市场过渡的唯一的开头措施。

在有关向市场过渡的一整套措施中，这是一个中心点。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使人相信，在向新的经营形式、向新的经济生活形式过渡的这个困难阶段，人民将受到特殊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利益将有保证。

在向市场过渡时，需要订出一些首要的措施。任何人都不会阻碍今天就开始搞国营企业股份化，创造现实的经营自由，将小企业和商店出租，把住房、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及一部分生产资料纳入买卖的领域。

必须加速形成商品和证券交易所，改革银行体系，实行提成政策，为相互竞争的生产单位和联合公司，中、小企业——

特别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中——的出现创造条件。

至于说到管理结构，那就必须使它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战略上讲，我们应当走取消专业部的道路，而且最近已经缩减了这些部的数目。必须最大限度地使企业的经营活动摆脱行政管理和机关的发号施令。

要使共和国和地方自治机构的主权具有现实的经济内容。这一点对于形成新的社会经济模式有特殊意义。

最近，由于危机现象不断发展，经济隔绝的趋向日趋严重，过去那种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正在瓦解，这种联系正趋向于实物化。

这些消极的过程，由于有人搞分立而不断加剧并为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

我们主张在新的联盟条约中，明确规定各共和国经济权利的范围，以及它们在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中相互关系的原则。同时，不应当限制企业的经济自由。不能够允许以共和国机关的发号施令来代替全联盟机构的发号施令。然而，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各个自主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企业和劳动集体本身认为必须建立的那种联合，应当成为经营的基础。

我们经济的统一和完整性，是形成完全合格的全联盟市场的必备条件。加强这种市场和摆脱垄断化是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各共和国和地区在整体中的经济利益，是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未来是属于它的。谁反对这样做，谁就会大错特错。

我想谈谈生态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很糟糕，有的地方简直是出现了危机。遗憾的是，迄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多大效果，未能制止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应当以新的态度对待这

个问题。首先必须提高企业本身的责任，使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职权能充分起作用，应对自然保护法的遵守情况建立最严格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大自然，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一点也应当在联盟条约中反映出来。另一项任务是，应把各种智力和物质资源，包括国际范围的资源结合起来，以拯救地球的生态。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正在制定中的国家生态纲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经济的健康化，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状况。应当说，这方面的积极性是很大的，而企业、地区和共和国得到的自由越大（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这种积极性和新的主张也就越多。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即兴的做法已经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必须做很多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经济现代化、掌握新的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生产出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可是，最主要的也许是要使卢布可以兑换。到现在为止，谈论这一点，就像是谈论一件遥远未来的事情一样。不过，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了。需要有力地刺激出口，制止无效的进口和外债的增加。应当为吸引外资创造互利的条件。

由于过渡到市场和加入世界经济而提出的任务，向我们的对外经济活动提出了高度的要求。应当说，我们最近对这些问题研究得很多了，制定了有关的政策方针。政府方面对这个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变革。然而，在那些被授权的对外经济机构、企业和联合公司的的工作中，最近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疏忽。

当然，原料商品，首先是石油的世界价格的大大降低，对总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可兑换外汇的收入几乎缩减了一半。在这种条件下，既要在出口方面，也要

在进口方面采取重大的措施。可是，这不会不带来后果，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后果。至于说到机械制造业的现代化，则我们不得不取消购买许多种设备的合同。这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影响。因为，在过去，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可兑换的外汇是用来购买商品充实自己的市场的。

现在政府正在草拟有关对外经济活动的全部问题的建议。比如，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在经互会范围内过渡到用外汇结算的世界价格。这也关系到我们要重新考虑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并作一定的修改。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形势将会发生变化。然而要走向世界市场，要使苏联参与世界经济，我们下部的思维以及态度都得作根本改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广阔的视野，要善于以新的方式办事。而目前我们却把一切归结为一件事：给我们3%—5%或10%的外汇资金吧，以便我们能够把它抛向市场，购买我们想买的东西。乍一看，一切都很简单和自然，在初始阶段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事。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对外经济活动改革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那我们就是根本什么都不明白。需要重新培训干部，改变他们的思维，需要善于按新的方式办事。对于这一点，我们目前显然不够重视，这阻碍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改革。我已经说过，在许多场合下已经造成了直接的损失。

还有，如果我们的企业像以前一样来利用所有为了经济现代化而进口的东西，如果花那么大的气力用外汇买来的东西年复一年地躺在那里，让它损坏和老化，而不是为市场而工作，那就很难指望有所好转，也很难获得国际经济领域合作应该带来的好处。

总的来说，这方面既需要迅速坚定的措施，也需要考虑周

到、慎重斟酌的负责态度。

同志们，在向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央三月全会提出的总结报告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提出了农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农村的整个命运和农民的命运，也是解决食品问题的关键。

任何技术方面和工艺方面的个别措施，本身并不能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现在已经是明显的事实了。党采取崭新的立场，是由于对农民问题和农业关系从集体化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进行了不妥协的分析。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农业方面直接发生的变化，而且指的是对农民和整个农村的态度的变化，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我们重温了对农业问题的根本的、列宁主义的认识，并因此对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采取了新的立场，重新认识了各个主要经济部门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性，对农村所有制关系本身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性。

同志们，目前，如果客观地评价一下形势，那就应当承认：在这些原则性决议作出以后，并没有紧接着在政府一级以及在共和国机关和地方机关一级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我明白，为什么农业经济以及整个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今天采取了如此强烈的批评态度。农村确实需要在社会设施方面和加强物质技术基础方面采取重大措施。在代表大会上应当就这一点表明立场。我们应当承认，农民在各种会议和场合提出的关于必须给农村以及整个农业部门以重大的财政支持和物质支持的问题是合乎情理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习惯的做法是：来吧，把资金从预算中划拨出来，分配下去就万事大吉了！这种行政分配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应当用经济方法解决农村复兴的问

题,也就是要建立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要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确定有利于农村以及整个农工综合体的优先解决的问题;取消生产农业机械设备的工业部门的垄断权,研制符合各种农业经营方式需要的机械系统。

应当通过必要的立法文件和政府决定,而实现这些立法文件和决定将能保障把大量资金用于农村的发展。我建议以立法动议的形式把这个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全社会应当帮助农村。我认为,我们应当以全党的名义向全国明确表明我们的立场。然而,我还想强调指出,国民经济的任何一个部门大概都不会像我们的农村和农业部门如此强烈地需要经济自由和真正的市场环境。要做到使农业享有这种自由。

中央三月全会把从根本上改革农村生产关系作为一项关键性任务提了出来,不改变生产关系,农村就不可能享有经济上的自由。今天应当重申,如果不改变经济关系,不对农民的劳动实行新的刺激措施,不改变农民的地位本身,如果农民不成为土地的真正的主人,那么,任何投资都将无济于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重申,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中央三月全会的方针。

因此,我要谈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在进行争论,而且我认为已经是在搞货真价实的投机了。这就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态度问题。有人甚至断言,好像新的农业政策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存在本身都成了问题。但是,新的农业政策的含义在于,要为各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活动建立平等的机会,让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和效果,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性立场。因此,我们当然反对“全面非集体化”的要求。

我坚信,那些善于经营、在社会福利方面搞得好、能为农



民保障应有的生活条件和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众多产品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应当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的。当然，它们仍然是正在进行改革的苏联农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几十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靠补贴过日子，而且它们的管理机构还阻碍改革所有制关系，阻碍掌握新的经营形式，对于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当加以根本改造。

还有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土地改革。坦率地说，土地法目前尚未发挥作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不仅在于现有的管理结构、行政经营机构的立场，还在于旧的心理状态以及由于农民分化、工作人员与土地和生产资料脱离而形成的僵化模式，没有使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取决于最终成果。

迫切需要采取坚决措施。当然，谁也不会按照“全盘集体化”样式提出“全盘租赁化”。我希望，谁也没有想过提出建立租赁集体的任务。这样做将是特大蠢事的重演，这种蠢事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灾难我们至今还未能克服。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实施土地法的机制。顺便提一下，农业工作者，首先是承租者和那些想成为承租者的人，以及许多领导人和专家都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应当为所有希望自由地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消除一切障碍。土地法应当严格执行，在这方面，苏维埃首先应当运用新的权力。这是它们的直接职责。

我想告诉大家，有关土地改革进程的问题，准备提交总统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讨论。

同志们，在报告总结时期，特别是在最近时期，族际关系已经激化。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没有及时看到这个问题所包藏的危险性。你们大概记得，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我们现在正在总结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

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认为,这些问题似乎早已解决,总的来讲,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如常言所说,生活给了我们一个严酷的教训。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没有准备,在虚假的太平盛世掩盖下长期积累下来的极其严重问题终于爆发和暴露出来了。

族际问题错综复杂,因此,我也不能把事情简化。改革和公开性为恢复民族自我意识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积极的进程,只能表示欢迎。同时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是由于在生产力布局和民族文化政策方面的错误造成的,其中涉及到民族语言的发展,国内一些地区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些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人口和生态变化。这里还有自身的历史、宗教原因。而且,如今当然还不得不为当时对某些民族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应当坦率地承认,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构,起初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态度不一,对这些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形形色色的破坏势力——分立主义分子、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分子、贪污受贿分子利用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民族问题和族际关系变得尖锐化。由于民族分歧而发生了流血冲突,大量人员伤亡。出现了难民,成千上万人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生活异常困苦。这一切都是不能容忍的,它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安。

人们向各级政权提出合理要求,要求它们采取措施,在我们多民族国家里恢复和平与和睦。遗憾的是,应当承认,在这种条件下,并非人人都经受住了族际主义的考验。不少共产党员屈服于压力,未能向自己的人民,向劳动者提出论据,使人确信顺应分立主义分子和挑起民族纠纷的人的要求是危险的。而这种论据是绰绰有余的。因此我认为,党的机关因政

治工作中的失误和在族际关系激化条件下领导这项工作不力而遭受批评是正当的。我们在这方面损失很大。

由此作出过必要的结论，制定了党的民族政策纲领，经全民讨论后，去年由九月全会通过。纲领的主要意义是，承认必须将民族复兴进程引向建设性轨道，以造福于每个民族及全国。不继续和深化改革，民族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同样，如果不解决国内民族间关系和谐问题，改革本身也不能指望会取得成功。

我认为，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理解列宁对联盟的性质和面貌的看法的实质，即联盟是由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历史本身联系在一起各民族的志愿联合体。我们最近经历和思索的一切，使我们懂得，改革联盟不能只限于扩大共和国和自治地区的权利，即使是大幅度扩大。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联盟。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建立一种我国的民族国家体制。这种体制将会解开矛盾的症结，把各民族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增强整个联盟的政治实力和经济、精神潜力，有利于加入伟大国家联盟的全体成员。这样就会可靠地保证国家安全，提高国家的国际威望。

与此同时，仍然需要把人权置于任何民族主权和民族自治的利益之上。这一要求应当载入联盟和每一个共和国的宪法中。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也遵循这一原则，不能偏离寸步。

联邦委员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已经着手制定新的联盟条约。新条约包括了有关我们多民族国家根本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既然我们实际上是在朝着需要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发生根本的好转，那么就应当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呼吁全国各族人民认识到进一步加剧族际关系狂热的危害性，阻止并打击挑拨者，不论他们披上什么样的保护人格和

尊严的外衣。我认为，人民期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一立场。

如今，当我们进入我们多民族国家深刻变化的时期，各族人民都需要安宁、和平和合作。我希望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代表大会的这种呼吁。

同志们，我们在政治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在开展改革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经济改革受阻并且与过去的政治体制发生矛盾时，便已意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央对此持十分认真的态度，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在此，我想谈谈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的重大意义。全会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的职能、党和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作了认真的分析。正是在那时，我们直言不讳地谈论了贯彻列宁人民政权思想的必要性。

但是应该承认，一月全会的思想在党内和社会上远没有被一致接受下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和深化。而最主要的是，在此之后没有采取实际措施。现在清楚了，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种样子。问题在于，这可能是第一次把干部的责任问题提得这样尖锐。搞得一部分干部精神紧张，影响到干部对待全会决议的态度。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局在行动上并不总是一贯的和有原则的。但是生活迫使我们重新研究这一系列问题，而且已经是在国内日益扩大的民主化的压力下进行研究。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想法。党代表会议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全面开展政治改革问题。

根据党代表会议制订的原则，我们现在从上到下有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新的权力机关。可以说，这是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在社会革新的道路上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未必能进入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新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党的机关、国家机关、苏维埃机关，以及社会团体的作用和职能正在改变。

坦率地说，进行这一切都是充满痛苦的。因为这触及到居民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触及到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以及千百万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同志们，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想强调一点，如果我们不走这条道路，那就不能排除社会日益加剧的政治化可能造成混乱，这种混乱包藏着爆炸性的社会后果。在当前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代表大会能表现出责任心，能制定出使党和社会团结起来的近期目标和任务以及行动纲领，我们的代表大会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现在不是掀起内讧的时候，而是为推动改革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

现在，当政治改革的第二阶段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认为党的任务是帮助形成重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机构。现在，各共和国权力机关的活动中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前由中央解决的相当大一部分问题正转由共和国权力机关处理。这就给它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也增加了它们对事业进展情况，对解决涉及到人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责任。

根据地方苏维埃和自治法，地方苏维埃的地位也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大量的物质财富将由它们支配，这些财富应当合理地加以利用，以利于地区和城市的发展。此外，苏维埃的工作是在新的立法基础上和以新的组织形式进行的，苏维埃机关的结构和地位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考虑到这些，那就可以说这方面的确有很多十分重大的任务了。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的是使建立新的权力机关的过程尽量快些，而各级党委应当大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并帮助苏

维埃掌握新的权力。

同志们，加强法律和法制的任务现在提到了首位。在各种集会上人们向党、向重新选出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提出了坚决的要求——制止犯罪和反社会表现的蔓延，坚决加强法制。在代表大会上不能仅仅局限于指出法律应该在各地都有效。这我们已经说过，并且不止一次；但是情况迟迟不见好转。因此，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当前的不寻常形势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我想首先提请你们注意下列情况。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法律秩序和法制的状况同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程度有直接关系。既然如此，重新成立的权力机关的活动就应该首先放在加强这种关系上。而不应该等待这方面的某种新指示和法律，只要下决心使局势好转，现在就有足够的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应该做的就是采取行动，而且是坚决的行动。许多苏维埃明白这一点并且已经着手实际解决问题，这很好，但还有一些苏维埃尚处在空发议论的阶段。

第二，我想，许多情况都是由于检察机关、内务部，甚至法院的工作人员缺乏信心而造成的。他们在集会、游行、各种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表现失常，或者甚至是在选举产生的机关的影响下表现失常，这些机关以种种借口阻挠检察机关、民警局和法院执法，这样的事现在很多。

同志们，不能容忍这种现象。我们确实搞得太过分了。因此党组织应该向我们的公众发表声明，我们反对向护法机关施加任何压力。我相信，全国公众也持这种看法。

第三，我们主张进一步加强护法机关，给它们装备一切必要的东西，改善工作人员的物质状况。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最初的几步，苏联人民也支持这种做法。许多苏

维埃甚至决定在自己的区域内筹措资金，以便实际加强民警机关和法制机关。但是，在做这一切时，我们的人民同时希望行政机关在加强法制、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方面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

同志们，还有一点，在全国应该创造一种对违法现象不能容忍的气氛。舆论工具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做很多事情。

同志们，我们在着手改革时，就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头脑中的革命，没有最广义的精神复兴和思想革新，就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我想，大家都记得，改革前社会处于多么严重的意识形态困境，群众意识多么严重地受到教条和陈腐认识的束缚。因此，应该从一开始就给思想以自由，解除头脑中的羁绊。这是改革战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党的倡议下，不断撤销精神生活中的荒谬禁令，解除了斯大林一日丹诺夫方针的束缚。中央不止一次同科学界和文艺界知识分子协商，举行了许多有益的和内容丰富的会晤和讨论。早在1985年6月就已经举行了一次有关科技进步问题的重要会议。已经采取步骤来克服几十年形成的各级党组织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脱节现象。党的机关不再包办代替，不再为创作活动定框框。恢复了许多不公道地被排挤，有时简直被搞得声名狼藉的大科学家和著名文化活动家的名誉。把许多优秀的精神创作作品还给了苏联人民。

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不仅是改革的成果之一，而且是改革继续推进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贡献，我们就不能在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社会革新前景方面达到新的高度。

舆论工具发挥的新作用证明了我国在改革的几年中精神

上的飞跃。舆论工具使社会革命化，帮助千百万劳动者重新投入社会生活。这就是舆论工具对改革的重大贡献，尽管目前还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

我们有权指望，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所有新闻工作者现在，在我们已进入深刻变革阶段的时候，将以更大的责任心，为了团结社会上一切健康力量去解决新的规模巨大的任务而劳动。

同志们，为了正确地确定我国发展的前景，还应当搞清楚自己的历史。这可能是最困难的、敏感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健康化进程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也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方面，有关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文件已成为转折点。

重新审理斯大林镇压时期非法行为的所有受害者案件的工作已成为人民了解历史真相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使千百万名共产党员、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死后恢复了党员和公民的名誉。中央委员会对造成全国悲剧性后果的强制集体化和农村的农民分化政策作出了自己的原则性评价。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结束这项工作，这项工作还应该继续进行。

同改革时期其他许多文件和讲话一样，在给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草案中充分地谈到，我们过去坚决放弃的是什么，我们不愿意带着什么走向未来。但是我们反对不加区分地否定我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以后所做的一切，并且给受到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每一代苏联人以应有的赞扬。他们希望国家变得富强、文明、繁荣，为此毫不怜惜自己的力量和健康。他们在最可怕的战争中捍卫了祖国。他们的良心在历史面前是清白的。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苏共简史》编写组目前正在工



作。我希望该书能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用科学的诚实和客观态度恢复党的生活与斗争的真实情况。

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出了一项任务，即克服对整个文化领域，特别是对科学和教育实行剩余原则<sup>①</sup>的做法。曾作了改革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尝试。通过了发展基础研究和刺激科技进步的一些决议。但应当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还很小，其原因在于没有执行就这些重要问题通过的决议。很显然，同志们，我们远没有彻底意识到：不把科学和教育摆在优先地位，改革就不会获得应有的活力，并将经常遇到知识潜力缺乏的困难。

顺便说一句，我国最近数十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最新的工艺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科学和教育落后。而与此同时，就在最近若干年，一些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突飞猛进的国家，就是从根本改变对教育和科学的态度开始这种跃进的。我说这番话，并非希望我们对这些问题又是仅限于作自我批评。需要把做出的结论变成范围广泛的国家政策。而代表大会，据我看，应该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

再谈几句对社会科学的態度。党是坚决支持社会科学自由发展的。我们迫切需要科学的客观论证和结论，应当充分相信学者们的探讨和建议，把他们的劳动成果用于政策中，为人民造福。同志们，还有一点，一个英明的国家，始终是珍视自己的智力财富和艺术财富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清除智力和人才外流的原因。

---

<sup>①</sup> 指苏联政府在分配国家预算开支时，优先满足国家认为重要的部门，如军工、重工业等部门的需要后，再把所剩的有限资金分配给文教和社会福利部门，即剩多少给多少的原则。——译者

代表大会应当反映党的立场：党主张在世界和本国的全部财富的基础上自由发展文化和文学艺术。在文化领域里实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是可行的。但是，不能够要求它彻底商品化，不能把艺术投向市场。否则，艺术家将受到更大的束缚和处于更严重的依附地位，而社会则会遭到精神损失。党承认创作自由，同时表示我们反对毁灭人和贬低人的艺术。在艺术中，不应当有检查制度，但艺术家应对人民承担道义责任。

苏联文化艺术工作者在昨天发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件中，呼吁党利用其全部影响和全部道义的和物质的潜力来树立一种新态度，以解决所有这些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神圣义务是：响应这一呼吁，因为它渗透着对人民精神世界的担忧和关心。我深信，全体代表将会赞成：文化和艺术，也可以说是灵魂的生态，是我们的首要纲领性目标之一。

同志们，在制定改革纲领的时候，我们理解到，如果国家生活的外部条件不根本改变的话，这个纲领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并向世界提出新的国际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工艺的、科学的、生态的、人口的变化。到70年代中期，这些变化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改变了人类生存基础本身。新的文明正在诞生，它是在诞生，但如果对付不了巨大的全球性威胁的话，这种文明就会死亡，为了生存就得制定出一些完全不同的共同生活准则，崭新的世界政策。

根据对现代国际形势的分析，我们采取了裁军的方针并在执行新的对外政策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我们坚信

国际活动的三个关键性前提是正确的：

第一，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能自以为你更加了解别的人民和国家应如何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承认每个国家人民的选择自由是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前提。第二，不能单独地、在把自己社会发展的道路同别人的道路对立起来的情况下走向繁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时代的要求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和合作。第三，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不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而且是为了同其他人民一道为历史上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和平时期创造物质基础，是为了解决人类全球性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军工生产转产方面的合作是我们一体化的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方向。已经开始同美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某些其他国家的人进行接触。这个方面可以成为一体化联系领域中的某种“先锋”，因为我们拥有我们的伙伴感兴趣的高水平的工艺和先进的科研成果，当然这是在互利的基础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使我们科技方面最现代化的生产部门在短期内参加创造民用产品的一个有效渠道。而从国际政策的观点来看，最能造成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一个因素的削弱，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个因素会加剧军备竞赛。

我不想深谈这个重大问题的所有细节，因为正在起草国家转产计划，我只说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的国家意义的事情。它要求采取考虑周到的解决办法。应当聪明地支配科研潜力、干部潜力和生产潜力。我们在这方面应当好好地工作，以避免最初阶段犯过的错误。

在新态度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和在新思维范围内提出的各种倡议已经使国际局势大大健康化了，并且推迟了世界大战

的威胁。我们有了削减军费开支的可能性，以及如同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把资金转向和平目的的可能性。

由于改革和新思维，苏美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对抗和军备竞赛转向相互理解，而在一些问题上甚至转向了伙伴关系。这使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好转，奠定了走向人类生活中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的基础。

同中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对于两国伟大的人民和整个世界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欧洲是最激烈的“冷战”和武装对抗的场所，在这里第一次开始了实际裁军进程，其中包括核裁军进程。在我国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欧洲大多数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和友善的关系。全欧进程开始创造数十个不同的国家和人民的国与国之间接触的形式，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里，有关创造广阔天地来进行经济、文化、生态和信息合作的问题首次摆到了议事日程上。由于我们新的国际政策和合作，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东欧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垮台”，我们则反问，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所抛弃的、实质上是斯大林专横官僚体制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吗？有人甚至责怪我们，说“我们不战而退”。这是在出主意让我们采用以前我们采用过的和我们已经坚决与之决裂并且坚决予以谴责的办法。

是的，存在着这些国家在自己社会经济发展中朝何处去的问题。但是，这是这些国家人民自己作出选择的问题。而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严格遵循自由选择原则，这一原则是进步的必备条件和整个现代文明自我保全的条件。

我们今天和明天怎样建立自己同东欧国家的关系？要像

对待友好邻邦那样对待它们，我们成为邻邦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而且还有其历史原因。在历史上，特别是战后，确实有过许多友好和宝贵的东西。苏联在把这些国家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后来多次真诚地帮助这些国家，都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之中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不可能不对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此外，而且这是主要的，有互相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些利益使我们在朝着和平欧洲、“共同大厦”前进的过程中互相接近。这些利益同改造华沙条约的意向是吻合的，关于这一点一个月之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达成了协议。最牢固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自愿、对等、尊重和合作基础上的关系。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新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文件中，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别决定中得到赞同和确认。我们的新观点和实际步骤引起了巨大共鸣并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们也坚决驳斥损害党和苏联政府制定和奉行的外交方针的声誉的企图。

我想，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将对这些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明显成果作出应有的评价，并将在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重申建立在新思维基础上的外交方针的不可动摇性。

这一方针的有效性首先就在于，它反映了人类普遍感到的忧虑和抱有的希望。与此同时，我们政策的有效性是由强大的国力来保证的，武装力量是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大国提出的新主张和建设性倡议具有巨大的意义。何况这个大国不仅声明，而且在实践中证明忠于自己的新主张。

我们的防御理论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正根据这种理论进行重大的军队改革。我希望这种改革的原则将写进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任何人都不必怀疑，军队今后仍将得到党的支持。还应特别关怀那些在武装力量中为祖国服务的人。军队是由几百万人组成的，他们完成责任重大的，而在许多情况下又是危险的国家工作。

同志们，这就是对过去的工作所作的最简要的基本结论。

为了我国人民的幸福和未来，我们确实已经投身于宏伟的、史无前例的事业。曾经有过疏漏、错误、拖延——我已讲过这些问题，大概，你们对这个问题也会有所补充。

是的，在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时候，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公开性和民主化，千百万人走上历史创造舞台，这一切赋予社会发展以自己的客观逻辑，这种逻辑又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既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如果没有经验和这几年积累的知识，其中包括关于我国社会的知识，我们现在就不可能走到改革的决定性阶段。

### 三、党 与 改 革

代表同志们，我已经说过，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特点是，我们是在转折阶段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我国正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改革和发生根本变化。使大家感到不安的问题是：革命性改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改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增强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许多观点是很自然的。在起草你们所拿到的纲领性声明草案时，对种种观点都考虑到了。在这份草案中，党从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出发，提出了近期纲领

和政策。

在代表大会前的讨论过程中，党的理论工作成了受人密切关注的目标。甚至有人发表了一种见解，说什么党的领导在没有进行理论研究和改革构想的情况下，就把国家拖入了一场“全面试验”，而且反反复复地讲这种看法，结果形成了一种反对改革的陈词滥调。

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应当重复一下我已经多次谈过的一点。改革的构想并不是某一批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起，在党内和社会上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遗憾的是，这种探索没有得到支持，在大多数场合下被压制下去了。在停滞年代，有人试图恢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只起到为官方政策辩护的作用。

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我们的改革历尽坎坷。而作为改革基础的构想，吸收了社会上、党内、科学中和文化中早就成熟了的一切好的东西。1985年的四月全会给了理论探索以巨大的动力。为自由讨论社会生活中迫切的难题提供了可能。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是：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领导了这项对国家极其重要的创造性工作，并为它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在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我们就理解到了社会需要根本革新。这就产生了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社会深刻民主化和人道化，使其成为自由的社会，为人们创造应有的生活条件。在实现这个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进行根本经济改革，根本改造政治体制和联邦以及建立法制国家的思想。奠定了新政治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价值优先。不考虑世界在走向20世纪末时所发生的种种巨大变化，就不可能有改革的理论。

我们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革命变革的目的和方法的认

识。用列宁的话说，这实质上是要求修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我们终于认识到，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奠基的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我绝不认为，改革的理论已完美无缺，已是某种完备的体系和终极真理。我们不能再自命不凡地怀着这种奢望了。经验教导我们，要准备作出自我批评的估价，要对理论和政策都作出必要的修正。这些修正应该对国内和世界上的实际进程作出反应。

因此，当有人对我们说，请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新理论时，我们的回答是：只有生活，只有自由劳动、人民的自治和福利才能给“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增添新的内容。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概念仅仅是在那些搞范畴模式化的作者的报告和社论中摆弄来摆弄去，社会主义思想就会大大贬值。首先请你们说说你们打算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人民做些什么，那时就会清楚你们实际上希望什么，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我们说：社会主义是现实的运动，是群众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我确信，苏共已正确确定了这个运动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已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草案中得到了确切的表述。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对我们党来说，这是个具有原则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创立的社会理论的内容是在分析 19 世纪的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列宁的社会理论内容又是在分析 20 世纪头几十年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从那时起，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影响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在国际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而我们几十年来却试图在经典作家



的引语中寻找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答案，忘记了他们（经典作家）本身是要求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的，他们嘲笑那些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圣经的人。生活本身使我们想起了这一点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意义作出真正的评价。首先，要求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为政策提出论据。

我再重复一遍，改革的构想也在不断变化，也在自我发展，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这一构想也应当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结论加以丰富。苏共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死记硬背，主张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采取始终不渝的创造性态度，主张领会20世纪的历史经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革命和进步思想界泰斗的遗产。

完善我们的改革构想的工作正在继续。所以很显然，通过纲领性声明，承认现行的苏共纲领已失去效力并继续向新党纲前进，这将是正确的。为此，在代表大会上要成立相应的委员会。

同志们，共产党员和全社会都期待着代表大会对党本身的最关键问题作出回答。现在，党正经历对自身在社会中的作用，对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建党原则和活动方法进行重新认识的自然的、同时也是困难的过程。对过去对苏共的认识需要作出批判性的评价和重大改变。

最近，党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公正的，也有不公正的。我们自己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必怜惜我们。这里我想谈谈下述问题。

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这导致了党内关系的严重变形、挑选干部方面的严重变形、在作决定时实际上把千百万党员排除在外，这实际上在党的组织内部造

成了一种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和消极的气氛。

正因为如此，当国内所发生的变形遭到批评的时候，这绝对不是说千百万共产党员都有过错（党的领导当然应当对此负责）。未必有谁能够否定共产党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苏联人民的战斗功勋中所起的真正的英雄作用。就是我国整个的劳动历史也记载着共产党员先锋作用的范例。

我们大家都熟知这一点。但是这绝对不能使我們不去经常地和以批判态度去思考我们的活动，以便对未来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

代表大会前的讨论在涉及现代条件下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原则时引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但也存在着意见一致之处，即一致认为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没有权利推卸对改革命运应的责任、不去起自己的作用、躲到社会进程的路旁。

革新后的苏共将是什么样子呢？

——是以社会主义为选择和以共产主义为前景的党，是在自己的政策中体现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利益的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联盟。

——是献身于全人类的和人道主义的理想，珍视民族传统和民族夙愿，同时对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动思想和黑暗势力的任何表现毫不调和的党。

——是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污垢中解放出来的、力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中起倡导作用的党，它采用说服和宣传自己政策的方法，发展同国内所有进步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话、讨论、合作和伙伴的关系。

——是把自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党内同志关系、尊重每个成员的意见、承认少数人保留个人立场的权利、对多数人通过的所有决议有讨论的完全自由和义务的基础上

的党。

——是确立内部生活自治原则、党组织行动自由、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在统一的纲领目标和章程条款下联合而又独立自主的党。

——是实行与不同国家和不同方向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与现代政治和科学思想的许多其他派别的代表接触和相互协作的党。

代表大会前的讨论暴露出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既然这些问题是认识苏共改革的关键问题，就应当对这些问题有个明确的态度。

是先锋党还是议会党。党支持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决定不再取代国家机关，不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在各种文件中，包括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草案中，都谈到必须恢复列宁主义对党是社会先锋力量的认识。

但我们会不会（有人提出了这类问题）又想取得某种特殊地位，只把“领导作用”一词改成“先锋作用”呢？这里需要明确说明。我们认为，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只有通过为劳动人民利益积极斗争，通过实际行动和以自己的整个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才能争取到先锋作用。苏共将实行自己的政策，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

对党来说，现在最困难的任务是，要使它的影响与新的政治条件和组织条件相适应。出发点应当是，党不干涉苏维埃机关的职能。这意味着，它对未同它协商而作出的决定不承担责任，并保留公开批评这些决定的权利。

基层党组织不再认为可以监督，而且实际上已经无权监

督企业和团体的行政机关的活动，以及各部和主管部门及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但是党组织不能成为劳动集体或地方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旁观者。它们应当学会通过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人采用新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方法对解决各种各样任务发挥作用。党组织的新作用是，在会议、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上集体确定对社会生活重大问题采取的立场，把它通报给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在公开讨论中阐明这些立场，指导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这些立场。苏共影响的范围将首先取决于党所宣布的思想的力量以及这些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

谈谈同其他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我想我们党代表大会一定会同意与所有进步的党和进步的运动进行广泛合作，同意为了改革的利益，为了人民利益而团结起来。在这种合作的范围内可以讨论任何使公众感到不安的问题，寻找通向协调一致和共同行动的道路。我相信，民主力量以及所有真诚关心在政治稳定、公民和族际和睦条件下进行深刻社会改革的人在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里的联合，能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谈谈对待群众性社会团体的态度问题。对于我们党来说，同工会的关系一向有巨大意义。因为这实质上是党的社会基础问题，是与千百万职工的正向和反向联系问题，而最近几年由于在农村建立了工会组织，所以也是与农民联系的问题。

劳动人民的组织的使命首先是捍卫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权利，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反对“政府至上”。这些组织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大家知道，它们过去主要履行辅助性的职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符合工会是“杠杆”、“传送带”等等的传统形象。显然，这种态度以某种方式

歪曲了工会本身的作用。在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

说实在的，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已在改变。它们曾顺从地执行党的首长们的指示，在许多企业里成为行政的某种附属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工会改革开始得较晚。现在它正在加快步伐。但由于落后以及在联系会员群众方面仍然采用老一套方法，因而在许多情况下造成工人不相信工会委员会有能力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于是，在社会问题尖锐化的时候产生了平行组织——罢工委员会，而且也是由于当局和工会的软弱无力，它们扩大了自己的职能。

事实上我们的工人运动正在苏联重新兴起。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必须认真地分析研究。

行政命令体制统治几十年，导致工人阶级对所有制和政权的疏远。因而工人们怀疑仍然是想操纵他们，只不过改变了战术和打交道的方式而已。因此，党本身改革的一项任务是要把清除同工人阶级相互关系的旧的命令式体系的工作进行到底，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苏共准备在各级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合理要求，在议会斗争中，在全苏和地方上的政治活动中支持直接来自工人阶级的代表。

党能否做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不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将是检验党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能力的试金石。

这既需要同群众保持经常性的积极联系，又要内行和掌握政治艺术，这样才能够捍卫劳动人民这个阶层、这支队伍的利益时，不给进步，不给改革的进程造成危害。

党同工会，同其他工人组织的关系将建立在伙伴和同志

的基础上。党委会丝毫也不应当干涉工会的内部事务，而是应当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来支持工会提出的有理由的要求和倡议。

在其他群众性社会团体中间，应当特别谈一谈共青团。共青团是一个同党关系最亲近的组织，也可以说是一个在政治思想方面同党相类似的组织。共青团的同志们正经历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在不久前举行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过热烈的讨论解决了要不要共青团的问题，如果说还要的话，那么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它能否彻底革新，同时保留自己传统中的美好东西。

同党一样，共青团实际上也应当走同一条自我净化和同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良现象决裂的道路。不知道共青团员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我有一个印象：共青团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共青团的改造和改革工作已经开始。一个主要的问题共青团自己已经解决了，这就是：共青团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仍然同苏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党来说，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应当放弃那种认为共青团是所有青年人的全权代表的习惯看法。显然，各种青年组织也将像一些新的党派一样建立起来，将进行争取青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自然，我们应当给共青团组织以大力支持，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它们的独立自主。照老一套办事，将意味着完全失去青年一代。

正在进行自身革新的苏共同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问题使我们面临一个更广泛的题目——关于党目前的社会基础问题。从代表大会前的争论中可以听到一种说法：让苏共自己决定它应当是一个属于谁的党。说什么希望表达社会各个阶

层利益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利益远远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论据。的确，过去我们简单地否定了社会利益的差别和分化。社会要在道德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口号差不多就等于是否定有必要看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实际多样性。今天，我们不仅承认了这个事实，而且正在建立一个政治体系，在这种体系范围内各种利益可以协调一致起来。

同时也很显然，除了职业、民族、年龄和其他特殊需要以外，苏联人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的利益把亿万人联合成苏联人民。我们认为改革的深刻涵义在于，通过民主化揭示整个国家的巨大潜力，并在此基础上满足人民的利益，使之达到当代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的党是个改革的党，因而今天的苏共是一个全民的政治组织。我要强调指出，这决不是打着新口号复活不适用的、过时的垄断野心。苏共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同时它作为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的党，今后仍将依靠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

党对待妇女的态度需要根本改变。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妇女问题是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尽管过去提出的种种口号够多的了，但如果说到“改革时代”，那么，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起，妇女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仍需要给予极大的关心和从根本上予以改善。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参加政治生活的妇女屈指可数，这种状况特别不能容忍。我想，当我们看到现在许多国家的妇女积极参与重大政治生活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实在感到惭愧。让我们瞧一瞧这个会场，这里有多少女代表？等我们听了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后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了。政府里又有几位妇女呢？我们大大地忽略了这

个问题,最近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许会采取一些实际步骤,把妇女选进中央委员会,选进政治局和书记处吧?随着党本身职能的改变,可以考虑在中央委员会里增设妇女工作部。我想,妇女一定会表示“赞成”,她们鼓掌了。

加强妇女组织无疑是由于社会民主化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我们应该尽力欢迎并支持这个过程。竭尽全力改善妇女的地位,这是男人光荣的事业。请看把男人荣誉的问题提得多么高啊!如果善于组织起来,她们自己也能做成许多事情。

现在还要谈一下党的另一个重要社会支柱:老战士和老工人。在这部分群众中苏共有着牢固的基础。我们应该珍视这些老同志的支持,让他们积极参与党的生活,乃至整个政治生活。他们这些人在最困难的时刻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精神,通常具有坚定的舍身为国的立场。

谈谈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我想,代表们都同意,这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已不只涉及组织方面,因为它关系到作为国际主义组织的我们这个党本身的性质。列宁是根据这种性质建党的。党也是根据这种性质在几十年中发挥作用,团结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各种力量。保持党的这种性质十分重要,否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共和国,以及我们的党本身就要遭受极大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对解决问题采取原则性立场大概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异议。我们认为,苏共的完整性与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共产党最大的独立性是完全相结合的,丝毫不会限制他们考虑自己的民族特点、历史特点、地方特点和其他方面的特点,也不会限制它们自行解决干部和财政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同我们联盟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所以在



这方面就存在各种倾向，包括使苏共联邦化和从苏共分裂出去的倾向。你们都知道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形势。尽管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切措施，我们还是不能阻止分裂成几个党，拥护苏共纲领的党和退出苏共的党。结果，这些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急剧削弱，其他政治力量在那里执掌政权。

如果我们现在各自为政，分裂，涣散，那就必将使共产主义失败，削弱共产主义运动，为其他政治力量加强阵地创造可能性。我们大家应该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努力寻求新的办法来加强党的族际整体性，我也不排除加强这些共和国共产党的族际整体性。在章程草案中已经规定建立使共和国共产党利益与整个党的利益协调一致的一系列机制。还应考虑通过原则性政治决议时应有的相应程序。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党之上，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

我们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曾有机会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会议，另一些代表则曾看到，宣布自己是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的这次代表会议是如何工作的。代表会议工作的中心是，共产党员对国家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困难问题的忧虑，希望利用新成立的共和国党的能力来帮助复兴俄罗斯及其众多的各族人民，加强我们多民族国家。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的定稿文件中表达俄罗斯共产党员要促进加强苏共这个统一的全联盟党，以及同其他共和国共产党平等合作的意志。我想，我们会欢迎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这种原则性立场。

至于苏共各个组成部分的协作，我相信，如果我们记住主要一点，我们就能解决一切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就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如果他们各奔东西，自立民族门户，他们就会失去这种力量。

是地区原则，还是生产原则。生产中要不要党的组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要。我们党有史以来就在工人集体中进行活动，这里是它扎根和发源的地方。苏共的生产结构原则符合业已形成的牢固传统，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个传统。此外，共产党员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组织形式。其他党的党员当然也完全如此。

在主张保留苏共结构的生产原则的同时，应当改进居住地点党组织的工作。应当承认，党运用地区原则很差。人民代表的选举特别表明了这点，具体说就是，在这种重大的政治活动过程中，政治工作的中心才转移到地区上来。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这就是国家管理机关、法院、检察院、其他护法机关以及军队的非政治化问题。我们对此的立场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即成立组织的权利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政治自由。谁也不能禁止党员在企业、机关等等单位建立自己的支部。

很难设想有非政治化的国家机关，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一支没有维持士气和教育官兵的机关的军队。在这方面，我们也不想搞特殊化，这是我国将要依法登记的所有政党的自然权利。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谈谈民主集中制。在以往年代里，列宁的这一原则实际上被官僚集中制所取代。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党进行改革，就是要创造条件来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实行自治，使共产党员在自愿和通情达理地遵守自觉的纪律的情况下监督领导机关的活动。

现在党内主张从党章中取消这项原则的情绪很强烈，因为先前的全部实践败坏了这项原则的声誉。但是，许多人赞成保留这项原则，认为放弃这项原则就有把党变成争论不休

的俱乐部的危险。我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同志们是要把与我们从前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术语抛掉。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中没有人要把我们的党变成总是埋头争论的无定形组织，这样的组织是无法解决作为政党所面临的宏伟任务的。

总之，代表大会当前需要作出抉择。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研究问题的实质。无论是纲领性声明中，还是党章草案中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党章中应该载明一些原则来保障民主和党的行为能力，使全体党员必须执行多数通过的决议。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派别问题。目前在发扬民主和党内公开性、开放性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谴责了压制不同政见的种种企图。但是有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党就会受到削弱。这指的是建立具有特殊的内部纪律的派别。我要进一步说明，在说不允许建立这种派别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一些党员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于多数党员立场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些观点。让我们表明，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认识。

谈谈普通党员的权力。党的改革的实质是实际保障普通党员的权力，保障共产党员对党的政策产生实际影响。为此必须根本上改变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

在苏共新党章草案中实际上对代表大会前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的一切都已经考虑到。既然作出了规定，那么所有基层组织在安排其内部生活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它们作出的决议，如果与苏共党章的纲领目标和准则不相抵触的话，上级组织不得撤销，有关个人事件的决议则除外。对基层党组织活动作出种种规定的做法将消除。吸收苏共党员的工作划归它

们管辖。它们有权对已登记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的活动作出最终的评价。

财务保证问题是用崭新的方式解决的。党的基层组织可以自行决定活动的结构、计划和形式。应当更经常地把党在重要问题上的决议草案交给党员讨论，经常开展辩论。必须刻不容缓地拟定出在苏共范围内以及在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党员投票的办法，以便迅速表达党员的意志。

必须加强党内选举制度的民主原则。我们已具有直接选举代表参加苏共党代表大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在这次代表大会前的时期内已经普及了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直接选举党的书记的做法。差额原则已成为准则。所有这些经验都需要仔细地研究。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下面这种情况视而不见是不对的，即在选举中的放任自流对工人、农民、妇女和青年党员是绝无好处的。显然，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考虑关于在上级党的机关中实行基层党组织和其他党组织的直接代表制的建议。我们来讨论讨论吧。

党中央机关的结构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在纲领性声明和党章草案中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并没有遭到多数反对意见，尽管也有反对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有关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党的建设方面的新因素考虑不够，中央主席团不大像一个干练的机构。在代表大会前夕，代表团代表委员会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现在我受他们的委托转达他们的意见，同志们认为，多数党员仍然不同意建立主席团以及设立党的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而是赞成保留政治局和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职务，赞成选举中央委员

会副总书记作为党的领导中的第二号人物。

我认为，我已准确地报告了代表团代表委员会的意见。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解决这些对党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中央处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苏共中央现在的全体成员在解决改革任务时的处境是：事件进程迫使他们经常寻求新观点和重新评价看来好像已经懂得和清楚的东西。当你今天阅读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时，你就会看到，现实生活远远超过了那时我和你们能够提出来的最大胆的主张。中央在过去工作时期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举行了21次全会，比党章规定在五年期间召开的全会多了一倍，而且我们还没有开完。实际上每次全会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我甚至要说，具有划阶段的意义。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几年中，不仅全会上的气氛，而且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的选题，讨论的内容，都根本改变了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性质。在最近举行的所有全会上，进行了真诚的、直率的、经常是不偏不倚的讨论。

既然在这方面存在不同评价，我想强调指出，尽管看法多种多样，有立场上的冲突，甚至有分歧，但对一切原则问题的决定在全会上还是一致通过的，因此我们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前进了。这正好说明，尽管中央委员会受到种种批评，但它还是为推动改革政策和革命改造进程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社会处于极其复杂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解决的问题内容新、规模大，事件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考虑到这些，我们可以完全负责地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本届中央委员会总的来讲基本上完成了交给它的任务。

同志们，这是否排除了在报告过程中所说的情况，即这届

中央委员会有过失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响应了生活的要求并及时找到回答我们活跃的时代提出的问题的正确答案呢？当然没有排除！这指的是党的领导的工作缺点，以及许多中央委员的工作缺点，因为他们在地方上的工作也成了共产党员尖锐批评的对象。

代表团可以对整个中央的工作，对个别中央委员在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中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我已经说过，你们将有可能在听取发言以后形成自己对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的意见。我只想强调指出，应当根据改革的规模和对革命性变革的贡献来评价中央和苏共领导成员的政治活动结果。中央表现出有能力提出改革的政策并开展了进行改革的大规模工作。我重复一遍，这并不排除一种情况，即它本来可以做得多得多，并以此使社会避免许多造成社会紧张和现在迫使我们寻找出路的消极现象。

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大概在代表大会上还将提出一些意见。要知道，在批评中也出现了反映党和社会状况的辩论、观点交锋。只有生活才能最后对这次或那次辩论给予彻底澄清。

我们还要继续在党的各个环节中维护健康气氛，支持辩论精神，关心辩论的成效，尤为重要的是要关心我们这些年缺乏的那些方面——党的同志情谊、党的道德。

要有政治修养，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期望讨论问题时具有建设性并制定出必要的共同决议。总之，希望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尤其是这种级别的代表大会上，不要用尖锐的言词来掩盖和取代论据或分析材料的不足。

报告就作到这里。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党认为只有在前

面,只有在进一步民主化和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才能解决问题、摆脱危机局势。

(译自 1990 年 7 月 3 日苏联《真理报》)

# 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讨论结果的发言

(1990年7月10日)

讨论刚刚展开,许多事情还在后面。在这里,在这座大厅里,以及在各小组会上和委员会里都进行了讨论。大会代表们积极参加了各小组和委员会的工作。如果再加上我们会见工人和农民代表、各级党组织书记、党的区委和市委书记以及农业问题专家时进行的讨论,那么可以说,代表大会把许多事情都摆出来了。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对我国正在发生的进程是了解的。但是,代表大会又补充了许多内容——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某种倾向,在对这种倾向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的估计上,代表大会提出了许多新看法。

我不想现在就作全面的总结——大概要由新选出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和各级党委会在代表大会之后来做这件事。立即把一切都归纳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有何感觉,有何感受,有何评价,我就怎么说。

总的来说讨论反映了社会思想状况,经济、社会领域、政治生活的形势,以及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紧张局面。讨论中,由于过于着急,有的完全是出于气愤或不善于进行争论说了不少气话,说了一些偶然的和意外的话。这也没有关系,



我们大家都要学习。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我想强调指出最主要的一点，这一点成了讨论的中心，引起了最热烈的争论，因此而提出的问题也最多。今天，从讨论中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从我国发生的种种事件中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我想，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

应当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除少数人外，没有人怀疑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改革和更新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个政治方针是生活提出来的，并成为从经济到精神领域各个方面的政策，这个政治方针已经在社会中引起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影响我们的整个发展。我的立场（你们对此应当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是：尽管有错误、失算、迟误，代表们在这里正确地谈到了这一切并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这一切给社会和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尽管国内当前的形势变幻无常，我认为，已经进行的变革所取得的总成绩是很大的，而且在不断扩大。

在改革取得了什么成绩这个问题上，代表大会出现了意见冲突。有人企图借助算术四则，用药店的天平来评价改革。同志们，这是不严肃的。对待改革和社会革命改造这样的现象，应当用新标准，用历史标准来评价。

真正理解到改革是必要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不是什么简单粉饰一下门面的人都明白，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尽管批评十分尖锐，我接受对改革发起者们的批评，尽管对总结报告也有批评，但我绝不放弃总结报告中谈的任何一点，因为总结报告中所谈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掂量过的。

已经取得的主要成绩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把人民的

能量释放出来了，解放了在教条和旧模式中受压制的思想，消除了对国家命运和社会主义命运焦虑不安的心情，把千百万人吸引到政治中来，并开始了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的改造。倘若没有自由，也就不会有这次代表大会，也就不会有代表大会举行过程的这种气氛。

在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那种令人窒息和迫害人的气氛中积累下来的、现在暴露出来的各种现象，不都是令人愉快的和建设性的。但必须正视这些东西，这就需要开展一场革命，革命的首要职能历来都是让人民得到自由。具有民主化和公开性内容的改革已经完成了这一首要任务。

社会就像需要氧气一样需要精神上的复兴。现在这种复兴正出现在我们眼前，尽管这个进程付出了种种代价，但它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们也变了样。同志们，另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党，还是整个国家，无论是原有的组织和运动，还是新成立的组织和运动，以及我们的新政权和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获得的自由。

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和更好地学会这一点。

在政治改革中我们已走得很远，在人民以民主形式表达意志的基础上从上到下地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这些机构还在不断完善，但是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给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国家的概念充实了具体内容。在它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关于这一点这些天说了不止一次，还未取得经验，还未理顺程序和机制，有时缺乏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缺乏专门的知识。各级苏维埃干部队伍的建立过程还没有完成。尽管如此，新的苏维埃已经开始工作，人民代表的责任心，想尽快研究居民的具体问题和需要的愿望在不断增强。

苏维埃的真正权力因此而不断得到恢复，这是一个可喜

的事实，是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过去和现在参加改革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在一些地方，苏维埃和党之间仍然有些距离，我要说仍然有些冷淡。在这方面共产党员应当非常注意，首先要检查自己。应当永远从自己做起。我们总是不能放弃行政命令体制留下来的同苏维埃打交道的旧方法，苏维埃与党的疏远难道与此无关吗？新的权力机关对这种旧方法感到很愉快。

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现在想再重复一遍，加强法制、建立秩序、形成一种能使各项决定和决议得到贯彻的机制，现在直接关系到各级苏维埃能否尽快得到全部权力和其他各项权利的问题。党、党组织和党委会以及在苏维埃和生产集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就是帮助实现这一点。但是，我同时还要呼吁苏维埃代表建设性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起来。我首先是作为总统向他们发出这一呼吁的。坦率地说，一部分代表表现出对立的立场，这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如果共产党员今天仍不了解什么是经过改革的苏维埃，不知道共产党员自己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对局势正常化作出贡献的话，那就太糟了。如果苏维埃也不懂得必须同党组织相互协作，那也是不好的。

在谈到讨论中的第二个教训时，我想特别谈一下某些代表作出的评价。他们支持改革方针，但对改革方针有时贯彻不力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许多重要的决议和法律本来应当对社会进程起指导作用和防止不良现象的发生，但却未能贯彻执行。应当思考这一切，并从中作出结论供今后借鉴。

结果是，尽管我们努力对生活提出的要求尽快作出反应，制订出必要的法律和决定，但对这些法律和决定的贯彻执行

却重视不够，实质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机制。由此可见，需要总统的权力，需要更快地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各种新的委员会，没有这些，所有法律都将是一纸空文。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由中央负责任。但我也想谈一谈在共和国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应负的责任。我们既不当从中央向地方推，也不应当从地方向中央推，需要共同努力搞好合作，采取行动，不要站在一旁寻找罪人。

有许多事情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共和国和地方的一些同志以及中央的一些同志完全不知所措了，处于休克状态。这里旧病复发了——缺乏首创精神，没有独立见解，不善于在民主条件下和在特殊形势下灵活地采取行动。

我想谈谈这一点的原因是，不能把改革的一切困难以及新机构缓慢而困难地开始工作和进步缓慢，都说成是不接受改革的人的抵制造成的。不接受改革的人当然是有的，我在报告中，在同工人、党组织书记的会见中都谈过他们。但是许多人实在是还应当了解当前的这种形势。

现在我们常说党有危机。但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不善于，而在许多情况下则是不愿意彻底弄明白，我们已经是在空前政治化了的新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了，是在广泛的和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以及全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的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了。许多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继续按过去遗留下来的、现在仍抓住我们不放的习惯方法办事。如果代表中有人（根据发言判断，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是希望把党拉回到原来发号施令的条件中去，那么我要说，他们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应当把每个小时都用来向前推动改革，促使我们的工作适应新的条件。

只有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新作用，并在最短时期内在民

主化道路上完成自身的改革，尽快学会用新方法在群众中工作，它才能成为社会的先锋队，才能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长期存在的脱离人民的现象必须克服。首先要通过革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更新干部和提高干部威信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方面有一种不理解情绪。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过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并且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加强党的阵地，就不可能为社会提出有效的政策，从而也就不可能为改革增加新的推动力。在代表大会的气氛中，在许多发言中，在一些代表进行辩论的手法中，我都听到，如常言所说是切实地感觉到，远非所有的人都明白党已经在另一种社会中生活和工作了，因此需要另一种样子的经过革新的党以及另一种工作作风。我们不改变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选择，我们忠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但是请相信，党是否能取得成功，这要看它是否明白我们已经是工作和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了。否则其他势力就将排挤它，我们就将失掉阵地。现在我们拥有巨大的潜力，一切在于要意识到主要的一点——不革新、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密切联系、不在群众中积极进行工作，我们就不能大步前进。

这几天，我同一些同志交谈过，应该说，我从这些被习惯称之为普通党员的同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那里，以及从基层党组织书记那里感觉到，他们对党所面临的形势的不寻常性和新颖性理解得更深刻。总的说来，普通党员这个词是过去时代的老词，也许我不该用它。

顿涅茨克的盖沃龙斯基同志在这里发了言，他正确地提醒说，最主要的是，党应尽快扩大同工人阶级的最广泛最深入的联系。同工人代表和特邀代表会晤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包

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的过错在于，在重大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它们没能认真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长时间考虑自己对待新形式工人运动应持的立场。因此我们失掉了许多东西，工人阶级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我们在改革的主要方面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由于经济形势、市场状况、居民商品供应情况，党和国家的领导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方面的关键任务是解决食品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摆在首位，消除它的尖锐性，也就会使社会领域的紧张状况消除70—80%，此外，还有向可调节的市场过渡问题和住房问题。

在这方面，我并不讳言，当代表大会以3/4票数决定改变经济改革委员会的名称，把其中的“市场”一词删掉的时候，我感到不安。这就是说，人们仍然不理解向社会提出的根本改变国民经济状况的大转折措施。

同志们，难道我们的整个历史没有表明对行政命令体制修修补补是不能使国家和公民摆脱困境的吗？由于几十年来顽固地抓住这种体制不放，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现在如果仍要继续抓住它，就会妨碍改革，妨碍在国内采取新的经济生活形式。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走下去，我要坦率地讲，我们将把国家搞垮。我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明，问题现在只在于，在市场条件下能否保证可靠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劳动者制度的特点。答案是：不仅能，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增加社会财富，最终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当然，我们手中掌握着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能够通过法律和作出决议，为向市场关系过渡的进程“确定一个限度”。

当然，在市场的优越性完全表现出来之前，要经过一个市场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最复杂的任务是，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专门的社会保护措施，特别是对贫穷公民的社会保护措施。在报告中已经讲过了，宣布向市场经济过渡使人民大为恐慌。在人民看来，市场的形象就是商店货架空空，价格昂贵。我说过，从价格开始不是我们要走的路。但是，在开始改革时，应该看到，没有价格形成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向市场过渡。总之，我们应该改正这一印象，而主要的是，在9月前要向最高苏维埃和社会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提案，供它们讨论并作出选择。

我已经有机会广泛地回答了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代表大会对农业政策问题提得很尖锐，同时我觉得这些问题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在农业政策领域应该怎样办？在同农业专家会见时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总的来说已经深刻多了，并且已经开始采取具体措施。昨天尼·伊·雷日科夫签署了注销农村债务的决定。（掌声）

我表明过自己的态度：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对农民、对农村，而不仅仅是对食品问题，要采取政治态度。食品问题是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农村繁荣强大，我国农民生活得好，生活得有信心，有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机会，才意味着食品问题也将更快地得到解决。（掌声）

我觉得，大家对农业问题的理解仍然不太透彻。对待农村发展甚至有两种基本的对立态度。我指的是，一种态度主张在所有制法、土地法、租赁法基础上改造生产关系，另一种态度主张帮助农村兴建社会项目、修建道路、生产农业技术设备等等。有人在蓄意挑动以消极态度对待党的三月全会制定的政策，企图以真真假假的事实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领导人不

愿意帮助农村。还有，我听见大厅里有人说：“让戈尔巴乔夫领导农业委员会，因为他不喜欢农业”。已经找到了不喜欢农业的人！

你们知道，我不喜欢使用激烈的措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这类说法要么是出于考虑不周，要么是居心不良。我在这个讲台上再次向代表大会，向党，向全国重述一遍，我们的立场是，第一，应当在完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给农村各种经营形式以充分的自由。第二，确立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合理交换，这种交换将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促进农村振兴。第三，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促进解决农村的迫切问题，首先是为我国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只有这三点能使农村获得复兴并使国家的食品得到保证。也不能从这三点当中抽出任何一点，因为那样的话，整个系统都将遭到破坏。（掌声）

我们应当对涉及到农业、整个农村和农民状况的问题作出重大的决定，可以说，这就是我对连日来在这里进行的讨论的小结。

在这里还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是不轻松的，因为它们涉及到人们的生活并且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生态问题，这是今天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们不能再拖延这个问题的解决了。我们已经动手晚了，同志们，但是许多事情还是可以补救的。外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大约30年前，美国也有几十个城市处于生态灾难之中，河流濒临灭亡，大湖垂危，然而巨额投资和实行专项计划明显改变了这种状况。布满工业和化工企业的欧洲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不管我们现在多么艰难，都应当为保护自然界拨出更多的资金，把它看作是同确保人们食品和住房这样的迫切任务绝



对同等重要的问题。同志们，要知道，人对干净空气和水的需要，并不亚于对面包的需要。当然，我认为，还需要制定整个生态方面和重大生态问题方面的国家计划。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沉痛。我请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布良辛的同志们理解，我们与他们一起分担这一不幸。

我们遇到的形势向我们提出了各种新问题。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认真考虑。请看，一个反应堆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如果突然爆发核战争，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哪怕不是核战争，而是一些核反应堆在常规战争中遭到破坏，其后果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后果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无法很快消除这种严重后果。已经花了几十亿卢布，而且还将花下去，各种各样的新需要不断出现。我希望白俄罗斯、乌克兰、布良辛能听到我讲的这些话，能知道全国都同他们在一起，理解他们的苦难，将给予帮助。在代表大会上还谈到咸海问题。那里的人们应当知道，我们也将去帮助他们。

代表们对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和科教领域的状况感到不安是理所当然的。我收到知识分子集体写来的几十封信，看来问题不仅在于物质基础落后，尽管这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的。我希望代表大会能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我们必须支持我们的文化、科学、教育、艺术和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我完全同意在这里发言的教师们的忧虑：我国教育的真正复兴是国家前途的决定性条件。这里有个直接的制约关系：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事业提到应有的高度，不提高教师的作用，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繁荣的经济，不可能使自己的科学技术达到世界水平，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同酗酒、吸毒和道德败

坏行为作斗争。

显然，党在新条件下生活和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可归结到意识形态上。党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受到的批评可能是最猛烈的。坦率地说，有些批评是很粗暴的，但是我们大家目前还没见到什么论据和建设性的建议。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我不想否认在某些领域，比如精神生产领域中出现的严重状况。我对目前正在扩散的、与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水火不相容的那些风气尤其感到不安。这不仅是过去的遗害，而且，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长期处在憋气闭塞状态的社会突然获得自由后的“爆发性”结果。许多情况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这一切要求党、知识界、学校和我们整个文教系统予以密切注意。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在对意识形态状况的批评中，我也感到有强烈的老一套手法的气息。在报告中我曾试图以新的理解来阐述意识形态问题，要知道，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和其他文件中写明我们仍然忠于老方法，那么一切就都会各就其位。就什么位呢？我们是不是要回到60多年以前去，那种状况的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部教科书，一切都分章，分节，按条条和原则写得清清楚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同社会主义本身一道形成。随着我们把国家建成一个丰衣足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度文明、精神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随着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不再把它当作什么阶级异己的东西，而是看作正常人的正常东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全人类价值是几百年、几千年创造出

来的，忽视这些价值使我们尝到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在国家共同参与发展文明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新思维能为其形成开辟广阔的天地，全世界现在已经把新思维看作是我们新的国际主义，它能把世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世界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

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了高级的思想方法、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也将以这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为依据。但是我们不允许将经典作家创立的一切变成又一种简明教程。从某些人的言论来看，有人显然对此感到遗憾。不能变成简明教程，这样做对改革，对社会都将是一种致命的灾难。（掌声）

我注意到，凡是试图从哲学角度提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并且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全部工作的发言者一出现在这个讲坛上，大厅里就有一种反感，不时传来砰砰之声。然而，我们是多么习惯于一种简单明确的公式啊：“干还是不干”，“打倒还是不打倒”。（掌声）让我们想一想吧，我们是一个想成为社会的先锋队的政党啊。

在讨论中还有一个教训。代表们是怀着对社会不稳定十分不安的心情来参加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在同工人会晤时，有一个工人憋不住了，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请回答两个问题：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有秩序？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投机倒把分子？”（掌声）问题好像很简单，因此需要作出简单的答复，可是简单的答复是根本不存在的。我这样认为，我们越是尽快地使市场丰富起来，经济越是更快地和更有效地运转起来，我们就会更快地铲除投机倒把分子和影子经济。

党的一位区委书记说：“您能做安德罗波夫曾经做过的事

吗？”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可以在代表大会上重复一遍：同投机倒把作斗争，80%是个经济问题！（掌声）只要经济不发达，投机倒把分子就会猖獗下去！所有这些影子生意人和贪污分子都是靠短缺泛滥起来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应什么事也不做了呢？当然不是！你们要求我们加强秩序，这种要求是正确的，我也要求你们，让我们一起使我们费了整整一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整个苏维埃体制发挥作用吧，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投机分子和犯罪分子却在继续干着自己的勾当。现在苏维埃体制已经建立起来，让我们集中力量真正开始干起来吧！（掌声）现在社会的稳定进程恰恰取决于这些努力，取决于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党组织的工作。

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有一个教训，这就是我们忽视了族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错过了时机，而一旦发现了问题，行动起来又很迟缓。现在我不会为自己辩解，我最不喜欢为自己辩解。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虽然政治局开过许多次会，同第一书记以及在各种委员会里进行过许多次会晤，作过许多次视察。但是看来这些是不够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及时看出危险性，我们——诚实地承认吧！——一直认为，我们这儿一切都顺顺当当，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都在举杯为各族人民的友谊干杯。这就是我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工作。现在突然发现暴露出许多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没有立即作出正确的估计。只是后来才制定了一个方针，我们根据这个方针开始了工作。现在应当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我们有政治评价，有党的纲领，有最高苏维埃作出的许多决定。还有，联邦委员会已经行动起来了，起草和讨论新的联盟条约的工作也已开始。我提议以共产党员的名义通过代表大

会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呼吁：让我们中止、停止拿命运开玩笑吧，让我们按我们大家都已清楚的文件和立场行事吧，让我们的联盟获得新生吧。这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我想，大家都会听到我们这个呼吁并且对此作出反应，然而这需要 we 积极地做工作。（掌声）

无论是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上，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各委员会中，我们再次听到了对我们新的对外政策的尖锐批评和明确的反对意见。我们当然会考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权威性意见。然而，我反对有人企图怀疑我们的政策，我认为这种企图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受某种自私利益支配的。

我们新的对外政策涉及到经济、军队和国防。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在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制定军人社会保护的国家计划。我们应当做这些工作，我们要让军队感受到人民的关心。

还应当帮助我们的国防工业集体，那里集中了大批优秀干部和科研力量，对于在短期内转产和着手生产国家非常需要的高水平产品来说，国防工业有着良好的基础。全国都将因此而得到好处，首先关系到重新装备生产日用品的部门。

当然还有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应当尽快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然而，难道这就是对我们的对外政策给国家和全世界带来的一切可以视而不见的理由吗？我反对怀疑这一切。一位书记甚至建议我不要出国访问。我们出国访问为了什么呢？为了防止战争，为了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最后为了腾出资源并把它们用于国家的需要上。

不能听命于对政治不懂行的人，否则将是不幸的。争取成为先锋队的党应当引导各种思潮，而不是顺应各种思潮。

(掌声)请看,还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开始了裁军和削减庞大无比的对保障安全没有必要的军费,这样做对吗?问题本身就自然作出了回答。我们没有干涉东欧发生的事件,这样做对吗?难道我们又要动用坦克,又要去教训别人如何生活吗?我想,当我们在进行改革,并想表明我们的社会能够成为进步的、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社会,而且愿意与人合作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有人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撤离阿富汗是否正确?这里我简直不知道我们是在同谁打交道。

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同各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搞好了关系,我们这样做是否正确?是的,是正确的。它们也作出了反应,不仅是统治者,人民也作出了反应。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点。如果一个人不是被自私的和僵化的考虑搞晕了头,他就会说这一切做法都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道德规范的。不奉行新的对外政策我们就无力改变我们的国家,这一点就更用不着说了。

我认为,我的同事和一些其他发言者在代表大会上和在会前所作的说明,是足够令人信服的了。这里,为了澄清问题我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凡是想听而且长着耳朵的人,就能够听到。谁不想听,那是他自己的事,而我们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还有一个细节:凡是担任国家要职、同我们的国际活动有直接联系的人,即使不同意国家领导制订的政策,也必须放弃个人的意见去执行国家的方针。也不能出现下述情况:总统和政府有一条路线,而某人却有另外一条路线,并推行他自己的路线。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况。凡是担任公职的人都应忠于政府。

如果是一些规规矩矩的人不同意政府的政策，他们就应该离职。（掌声）

下面谈谈党和党的命运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到这里来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是我最为关心的涉及人的立场的问题。代表大会从这里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同志们发出了紧急警报：党正在失去威信，它的阵地不断削弱，它遭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排挤。而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不得不转到反对派立场上。有人认为苏共领导，特别是某些领导成员应对这种情况负责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同志们，这一批评从实质上讲在许多方面是公正的。我只是反对所采取的方式。我们代表大会不应走两个极端：对谁都支支吾吾地说上几句或者蛮不讲理地指责一通。情况就是这样，以后一切都应开诚布公地谈。（掌声）

我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央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做得不够，同时，各级党委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过去可以从中央得到委任去治理一个区、市、州、共和国，并且不管你干得怎么样和别人对你有什么意见，你都可以一辈子坐在这个岗位上，同志们，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高层是这样，共和国一级是这样，地方各级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点。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永远不再回来了。我深信这点。任何办法都无法使昨天回来。任何发号施令的做法——如果有谁的脑子里还在打这种荒谬的算盘的话——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们只能勇往直前，毫不气馁地坚定地走下去。这就是最高任务，我们制订的政策和策略应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在这方面，任何人都无力替代党，党能够胜任这项最高任务。

现在怎样才能提高党的威信，怎样才能使我们具有我们

所期望的那种影响呢？主要的是，要在各个岗位上安排那些思想新、政治敏锐、真心诚意拥护改革的人，而不是那些满口“改革”、“民主”、“公开性”，但在行动上不会和不愿意按新方式办事，并仍然热中于发号施令的看风使舵者。

我完全同意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工人代表们的意见：必须更多地提拔有文化的先进工人——热情的改革者去担任领导工作。通过改革发现了多少卓越的人才啊！即使在会暗时也可以看出，代表工人阶级参加大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都是一些善于思考，善于作政治分析的人。这些人不是客里空，不是那种只想“以工人的冲劲”拍着胸脯嚷嚷他们是直接“从那儿来”的人。

这样讲当然是有意义的，从那儿来的意思，就是从机床，从车间等地来的，是从锻造我们的实力，建设我们立足的基础的各个地方来的。

我们在这里争论、选举、讨论、制定制度。但是国家依靠谁呢？国家依靠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掌声）

其次，不仅在讨论中，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放弃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陈规旧套。仍然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即不是把生活的要求，不是把工作成绩摆在第一位，而是看一个人的某个行为是否符合僵化的教条。死守教条特别妨碍建立新的经营形式和发挥人们的主动精神。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破坏社会主义选择的声誉，人民就会离开我们。

还有，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明白苏共对权力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党就不能进行自身的改革。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我们也应当采取行动争取这个多数并且保持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同党外的人民代表，同法



律承认的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其他政治派别进行合作，也是适宜的。应当结束宗派主义情绪，永远结束这种垄断现象，将其从党务工作者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意识中清除出去。

应当进行合作！我赞同卢钦斯基同志在这里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中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在目前情况下愿意同所有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结成同盟的问题。只有放弃党的分歧、政治分歧和民族分歧，我们才能集中所有力量使国家摆脱目前的艰难状况，实现意义深远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

我确信，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压倒多数的苏联人期望我们的正是党本身以及所有明智的、真正关心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力量的团结。我满怀信心地讲这一点，因为在许多写给我的信和发给代表大会的电报中，人们一再提出的正是这种呼吁。同志们，让我们听一听人民的这种呼声吧！听一听时代的呼声吧！

在许多人的发言中，我捕捉到一种潜台词——把我们的一切灾难都归罪于改革。有人甚至流露出对过去，对旧工作方法的怀念。在会晤区委和市委书记时从他们的发言中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会晤是好的，是富有成效的，我甚至要说，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谈话。会晤时甚至尖锐地提出了许多对于党和社会的命运至关重要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指责总书记，说他用自己的政策领错了路，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对外政策。这些指责我不能接受。应该说，如果改革有什么错的话，这个错就是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和不够坚决。顺便说一下，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干部的立场。因此，让我们改变一下立场，将改革进程推向前进。这样，变革就会进行得更快一些，我们就能更快地取得

全体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我认为，除了坚决地和有明确目的地继续改革，除了继续那些我们在变革我们多民族国家经济、社会领域和政治制度方面所做的一切，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同志们，让我们干起来吧！我们已经进入改革的最重要阶段，下一步将是最大规模的改革。（掌声）

（译自 1990 年 7 月 11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 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 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1990年7月10日通过)

代表大会在听取并讨论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后指出,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作为政治领导的集体机构为党和一切进步力量指明了使国家向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正进行革命性转折的方向。

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的极权的斯大林体制在逐步消除中,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公民的社会正在形成。

整个政治上层建筑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确立人权、自由选择、多党制为特征的真正的民主在日益加强。

超级中央集权的国家正在改造成建立在各民族自决和自愿联合基础上的真正联盟国家。

意识形态专制正在让位于自由思考、公开性和信息公开。

使劳动人民脱离所有制及其劳动成果的国家垄断生产关系正在消除。

正在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者自由竞争的条件。

这样，在改革时期通过的党的决议就为重建人民政权、制定民主国家的法律基础、形成新政治思维 and 实现经济改革的实际行动创造了可能性。所有这一切把千百万人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有助于改革的不可逆转。

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党的命运和党的历史前景同实现改革的目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直接联系在一起。代表大会主张坚决革新苏共，摆脱教条主义，掌握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的艺术，学会用真理的力量和论据来吸引人们，学会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积极合作，而主要的是要有具体行动。

代表大会声明：苏共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联盟，仍然是作出社会主义选择和具有共产主义前景的党，它以自己的政策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同它忠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忠于社会公正是不可分割的。多数共产党员过去和现在都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不应为斯大林及其同谋者的罪行，为停滞年代政治领导的错误承担责任。

代表大会反对专横思维，主张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遗产，主张深入思索20世纪的历史经验、苏共本身的活动、世界社会思想的成就。

苏共认为，丰富体现在科学、教育、文化中的社会精神财富具有头等意义。

代表大会坚决谴责对弗·伊·列宁的人身攻击。保护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受诋毁、污辱，不进行官僚主义的颂扬，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诚实的人的责任。

代表大会反对打着批评社会主义扭曲现象和党的失误的幌子，在社会上灌输和宣扬反共主义、反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

行径，表示要坚决运用一切法律手段抵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排挤党的企图。

苏共是彻底的族际主义者政党，是关心各民族利益、需求和日常生活，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毫不妥协的党。

代表大会认为，当务之急是真正保障普通党员在苏共中的权力、每个党员参加制定和实施党的政策的现实可能性，从根本上提高基层组织的作用。苏共政治和思想上的完整性，是建立在各级党组织自治、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作为苏共成员享有自主权的基础之上的。

代表大会认为，党组织积极参与国内正在恢复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极为重要。

在多党制条件下，苏共准备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公开竞赛与合作，包括在选举中和在议会活动中。

代表大会重申，苏联共产党进行改革和革命性革新的方针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同时，在实现这一方针的时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考虑到所采取的具体步骤产生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后果。反酗酒运动、组织合作社的实际做法，过渡到地区经济核算和实行企业自主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行动没能有系统地进行，没有预先在党组织中进行认真的讨论。这就降低了这些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的效果，甚至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在实际实现改革方针过程中遇到困难和出现混乱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苏共中央对克服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体制遗产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所通过的决议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党的各个环节缺乏在新条件下工作

的经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的工作汇报证明，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执行所通过的决议方面工作做得不够。苏共中央各委员会对党的智力和各级党组织的创造性利用得不够。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提出的许多任务没有得到解决，结果使危机现象加剧，使社会上和党内的形势更趋紧张。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使经济面向社会需要以及面向人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消费市场事实上的瓦解、商品短缺加剧、卢布贬值引起了社会的极度紧张和居民理所当然的不满。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更加尖锐。

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严重削弱，犯罪和暴力行为增多并造成人员伤亡和出现了难民，贪污、投机倒把、酗酒和吸毒、道德堕落等引起了恐慌，使政治形势更趋复杂。

我国现在和未来面临的危险，是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事业的困难状况。

我国许多地区，如切尔诺贝利地区、阿拉尔和阿拉尔附近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塞米巴拉金斯克发射场和其他一些地方没有从生态灾难的状态中走出来。关于生态问题的决定执行得极其缓慢。关于消除亚美尼亚和我国其他地区地震后果的国家计划没有能实现。

代表大会指出，民族间关系的尖锐化使党措手不及。中央委员会在调解冲突时常常不掌握主动权，对中央和地方上采取的治标不治本措施不加过问。缔结新的联盟条约的工作拖延了下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完整性和存在本身受到威胁。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谴责违反各族人民利益的分立

倾向。代表大会对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共产党发生的分裂表示遗憾，这种分裂使共产党失去了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代表大会对坚持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党组织的立场表示支持。代表大会号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共产党员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文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代表大会指出，苏共领导在对党实行革新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之后，没能抓住一切机会对党进行根本改造，使其从国家党变为政治领袖。苏共中央、各级党委会没能改革自己的工作，没能把党组织的创造潜力调动起来。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认为，需要从根本上完善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活动，改革干部政策。中央及其政治局应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保证苏共团结、发扬党内民主、社会团结、用政治手段在国内实现公民和睦等关键问题上，集中在制定和实行紧急措施使国家摆脱危机上。应当采取全新态度对待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老年人工作，要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把这几部分居民完全吸引到党的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来。

代表大会委托新组成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制定出执行代表大会各项决议以及贯彻代表们提出的建议和批评的实际措施。

考虑到国家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建议在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当前形势，讨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委托苏共中央在一年内研究有关革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认为根据党的新任务改组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是适宜的。

党应该奉行一项强有力的和人民容易理解的社会经济政策。党必须有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有自己的独立评价,这样才能向社会、国家机关提出摆脱危机、稳定局势、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途径。

任何旨在从劳动集体中取消党组织的行动以及其他取消派的表现,代表大会都认为是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

代表大会声明:苏共的职责是,完成政治改革,彻底完成将全部权力交给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党委有义务搞好同新的苏维埃的协作,促使它们成为实际行使权力的机构,在选举中给予工人和农民以有效支持。党员代表和各级党组织应持建设性立场,他们的使命是,促进各级苏维埃尽快地转入合格的正常工作。

代表大会认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引进总统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同时指出,还没有从立法上形成总统和各共和国、各地方权力机关的相互关系结构,还没有确定监督执行总统命令的形式。

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活动,根据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结论,这种活动的基础是:有选择的自由,利益均衡,平等和互不干涉,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使关系民主化和人道化。

代表大会指出,根据这些原则制定的苏联新的对外政策有助于使国际局势明显健康化,减少军事威胁,解决全球问题,使经济联成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生态问题上相互协作,在精神领域实行合作,扩大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为减轻军费负担打下了基础。总之,正在为解决国内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国际舞台上出现的积极进展还没有理由取消在合理足够程度的原则基础上确保国家可靠安全的任务。军事政策问题，关心军人及其家属仍然应是党和国家时刻关注的事。

代表大会主张扩大和加深苏共的国际联系，强调指出，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其他左派力量密切协作，寻找同广大的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利益吻合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要从根本上革新党自然要求从根本上革新党纲。代表大会认为，成立新党纲起草委员会并将新党纲草案提交基层党组织讨论是必要的。

苏共向社会和国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行动纲领。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就国家发展的极其重要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对这一行动纲领进行了阐述。

党的代表大会提请所有将被委托在苏共领导机构工作的共产党员注意：不允许重犯过去那种使党和社会陷入危机、使国家走向停滞和独裁、使社会主义被扭曲的错误。

\*                         \*                         \*

国家正经历着困难时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使所有民主力量团结起来。苏共建议所有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各级苏维埃、社会团体和运动中，在日常的实际活动中结成广泛的同盟。为了劳动人民，为了公民和睦和全民族的和谐，苏共维护所有建设性的东西，准备进行平等的对话。

（译自 1990 年 7 月 11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尤·阿·马纳延科夫

(1990年7月3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资格审查委员会讨论了属于它权限之内的问题，现在向你们报告，各级党组织代表的选举符合苏共章程和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90年)规定的程序。选举主要是按党的选区，多数情况下是在差额的基础上进行的。

各级党组织总共讨论了大约8万名候选人。在各地党组织中建立了2968个一名代表选区和497个多名代表选区。前者选出的代表占63.4%，后者选出的代表占10.6%。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在边疆区和州代表会议上直接选举的代表占26%。

代表名额基本上符合标准，每4000名苏共党员中选出一名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了当选出席代表大会的4683名代表的资格，确认他们的全权证书是有效的。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人数如下：俄罗斯——2574人，乌克兰——804人，哈萨克——207人，白俄罗斯——171人，乌兹别克——162人，格鲁吉亚——98人，阿塞拜疆——97人，摩尔达维亚——49人，亚美尼亚——48人，拉脱

维亚——41人，吉尔吉斯——37人，塔吉克——31人，土库曼和爱沙尼亚——各28人，立陶宛——10人。

下列党组织派出了大型代表团：莫斯科市——278人，列宁格勒州——147人，莫斯科州——126人，顿涅茨克州——87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81人，罗斯托夫州——80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67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66人，高尔基州——64人。

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共产党员来自社会生活各个主要领域，来自各个工作部门。其中1005人，即占代表总数的21.5%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部门工作，483名代表，即10.3%在农业部门工作。

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有543名是工人，即占代表总数的11.6%，有255名是集体农庄庄员，占代表总数的5.4%。

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代表名额显然是不够的。

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50名工人和农民。资格审查委员会赞成这里提出的给他们发言权的建议。

同时我们认为，应该给应邀列席代表大会的非代表大会的代表，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以及11个加盟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发言权。

苏维埃国家正准备向市场关系原则过渡。因此，强调指出有很大一部分（占代表总数大约17%）来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领导人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是有意义的。希望他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宝贵经验能在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中得到反映。

代表大会代表组成的特点是党务工作者的代表多，占40%以上。而且其中1/4是基层党组织的书记。

在代表当中有392名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的代

表,其中 53 人是舆论工具的工作者。

代表中有 344 名妇女,占代表总人数的 7.3%。这大大低于她们在苏共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这方面应当受到严厉责备的是各级党委。

委员会认为,有 2737 名代表,即大约 60% 是人民代表,这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有 276 名是全苏人民代表,516 名是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党员代表的工作无论对党,还是对社会以往从来都未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因此,重要的是要努力在各级党委和党员代表之间建立普遍信任的、富有成果的关系。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他们总共占代表总数的 6% 以上。

代表中有 52 名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从党龄来说,可以把代表分成以下几类:1931 年至 1940 年入党的占 0.1%,1941 年至 1945 年入党的占 0.6%,1946 年至 1960 年入党的占 12.2%,1961 年至 1970 年入党的占 37.2%,1971 年至 1985 年入党的占 47.9%,1986 年至 1990 年入党的占 2.1%。

84% 的代表以前没有当选过苏共代表大会和全苏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代表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高。其中近 99% 的代表受过高等教育、不完全高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或者中等专业教育。

大约 1/4 的代表受过党的政治训练,69% 的代表有职称或学位。

从年龄来说,代表的组成如下:30 岁以下的代表占 1.5%,31 岁至 40 岁的占 25.1%,41 岁至 50 岁的最多,占 43.7%。顺便提一下,苏共党员的平均年龄是 46 岁。51 岁至 60 岁的代表

占26.8%，60岁以上的占2.9%。

65%的代表曾获得国家奖赏和称号，14名代表是苏联英雄，64名代表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04名代表曾荣获列宁奖金和苏联国家奖金。

我们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各民族的政党。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民族构成也证明了这一点。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63个民族。

（译自1990年7月5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主席

阿·阿·尼佐夫采娃

(1990年7月3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

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是履行苏共章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规定的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

检查党的预算执行得是否正确，其中包括缴纳、接收和统计党费；

检查苏共中央企业和机关的财政经济活动情况；

检查党中央机关处理案件，处理劳动者来信、申诉工作条例的遵守情况；

指导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边疆区和州党组织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在选举时由83人组成，现在由70人组成。为了领导休会期间的工作，选出了由5人组成的常委会。委员会集体讨论年度计划完成情况，讨论已进行的核查和检查的结果。在报告所总结的时期举行了12次中央检查委员会会议和28

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审理了 50 多个问题。

在报告所总结的时期，中央检查委员会也和所有党的机关一样，解决了革新党、加深苏共民主化、发展公开性的共同任务。我们社会和党内发生的复杂的矛盾进程不能不反映到党内生活的某些方面，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活动就是直接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涉及到党的财政和物质基础。共产党员对苏共预算、苏共预算来源、党费数目、党的开支情况兴趣大增。你们手中都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材料。

大家知道，苏共一切活动的开支都靠自有资金。其中 58% 是党费，41.6% 是党的出版社和企业利润的提成，0.4% 为其他来源。

最近流传一种错误看法，好像所有党的资金首先都集中到苏共中央，然后苏共中央再把这些资金分配给地方党组织。

实际上，地区党组织收的党费和地方党的出版社的利润提成，都直接入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委的账目。正是这些资金构成了包括基层党组织在内的地方党组织活动的财政基础。

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党组织把结余的收入部分上交苏共中央。苏共中央的资金来源还有中央委员会所属出版社和企业利润的提成。这些资金怎样使用呢？一部分资金用于全党的活动（代表大会、全会、会议），用于维持苏共中央机关、中央教学研究单位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用于实现党与党之间的联系。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补贴入不敷出的党组织。

而入不敷出的党组织居多数。例如，1989 年在 86 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有 50 个党组织，其中包括 4 个共和国党组织从全党预算中得到 1.6 亿卢布的补贴。最大的一

笔财政补贴(占支出的40%到75%)给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的9个州党组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党组织也是靠苏共预算补贴开展活动的。

今年人能数出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数目将显著减少。预计党的出版社给党的预算的利润提成也将大大下降。所有这一切都使苏共的财政状况更加困难。

因此,党组织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利和自主权,力争达到开支自筹。毫无疑问,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要寻找新的非传统的收入来源。形势要求大大削减开支,对党的经费要爱惜、要节约。

中央检查委员会同意许多党委提出的党组织预算必须进一步民主化的意见。我们还认为,章程草案中提出的在中央全会上批准苏共预算的建议,将提高党的资金使用情况的透明度和委员会的集体责任。

共产党员对整个党的预算状况和对自己所在的党组织的预算状况了解不够,是引起肤浅的议论、各种臆测和传闻的一个根源,而有时则被用来进行政治投机和煽动偏激情绪。

只有扩大公开性才能消除这种状况。而广泛的公开性同时也是一种监督。现在,尽管中央检查委员会一再建议,但是在许多党组织中甚至检查委员会在党代表会议上的工作总结都不在地方报纸上发表。

同志们!

中央检查委员会在履行自己的职能时,每年两次定期检查苏共预算的执行情况,分析党费缴纳和统计情况。这些检查结果定期在党的中央出版物上公布。

在过去数年中,党的预算各项进款总数一直在增加。1989年进款总数为26.958亿卢布,比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前



夕差不多增加 25%，其中党费收入增加近 30%，来自出版工作的收入增加 17.4%。

我来分析一下党费缴纳情况。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按时按数缴纳党费。1989 年有 15.785 亿卢布党费纳入党的预算，这比预计的要多。党费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国民经济中的工资增长了。但是，只指出这一点是不全面的。在缴纳党费方面还存在着不良现象和趋势，而最近又出现了新的不良现象和趋势。

先谈一下不按时缴纳党费问题。1985 年第四季度，亦即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不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在全党有 3.1 万人，到去年第四季度不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达到 27.9 万人，增加了 8 倍。截至今年 4 月 1 日，不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已经有 67 万人。

同 1985 年相比，没按全工资缴纳党费的党员人数增加了 50%。去年在 1/3 被检查的基层党组织中，查出有 66.3 万党员没有交足党费，占苏共党员总人数的 3.7%。查出的未交足的党费数目也大大增加了（300 万卢布）。

最近拖欠和不交足党费的党员人数如此大量增加，不能不引起不安。中央检查委员会多次提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我们的倡议，同苏共中央各部一起进行了检查。随后，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车臣-印古什州党组织党费缴纳中严重缺点的决定》。遗憾的是，这一决定没有引起各级党委的应有重视，也没有起到预期的组织作用。许多党组织对缴纳党费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党员违反章程要求也没人过问。

缴纳党费方面的缺点反映出党内纪律明显下降，轻视苏共章程的要求，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和党委在当前的事件面前

某种程度的束手无策。现在，除了对苏共提出公正而尖锐的批评外，还经常出现破坏整个党的历史和活动的声誉的粗暴攻击和敌意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共产党员丧失了方向，对党宣布的目标失去了信心，开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疏远党。

近来出现了新的不良现象。某些党组织，主要是基层党组织，但也有市的党组织和区的党组织宣布，它们拒绝把所收到的党费(全部或部分地)转到党委的帐上。同时，主要是对苏共中央经常提出各种各样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认为，这种行为是企图对党组织强行施加压力，具有明显的破坏性质。许许多多党组织违背苏共章程，这是异乎寻常的、引人注目的事件。遗憾的是，这类事件并没有促使包括苏共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及时作出反应和评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袖手旁观，对问题视而不见降低了党组织的威信，促成了恣意妄为的风气。

还有一点。苏共中央根据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提出的建议作出了一项决定，即从1989年起，从苏共的预算中拨出党费收入总额的3%用于基层党组织的需要。1989年用于此目的的拨款为3970万卢布。基层党组织在一年内只花掉了2780万卢布。造成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部分党委没有及时把这笔资金分配给基层党组织，一些党组织不知道这笔资金的用途和使用规则等。

这样，基层党组织手中还剩下近1200万卢布未被使用的资金。按照现行规则，今年基层党组织还会得到4000多万卢布。当然，这笔资金的保存、清点和支出应在监督之下进行，同时应向共产党员定期地准确地通报有关这笔资金的情况。

出于提高基层党组织自主权的需要，我们赞成章程草案

中关于基层党组织在必要时有权选举自己的检查委员会的条款。

党的机关刊物的利润提成是苏共预算收入的第二个主要来源。现在，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拥有 114 家出版社。这是全党的财产。其中 111 家出版社属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管辖。去年这些出版社向自己党组织的预算上交了 3.46 亿卢布。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对发展党的印刷出版基地的党内资金是否得到有效使用问题进行了经常性的检查，对党的出版社的生产活动和财政经济活动也进行了经常性的检查。

大家知道，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检查委员会指出了苏共中央办公厅党的出版社生产科和某些出版社工作中的缺点。此后，一些缺点已经克服。

但是，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于今年三、四月份进行的检查，再次查出许多严重失误。

出现了投资分散和工程拖期现象，拖期的建设项目大大增多。某些投资回收期限长得令人不能容忍。经济效益不高，甚至是亏本的新闻纸生产厂子仍在继续进行设计和建设。例如，于 1986—1988 年间分期投产的戈梅利州党委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党委下属的新闻纸综合生产设施，1989 年亏损了近 78 万卢布。许多新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达到设计标准的时间，和过去一样拖得特别长，超过正常期限一两倍。

一些出版社往往不能保证定期报刊、书籍、宣传画及时出版。在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中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得不到反映。许多出版社的产品，例如，阿塞拜疆、塔吉克共产党中央以及达格斯州出版社的产品印刷质量差，其中一些出版社还出现了非生产性开支，在使用劳动报酬基金方

面也有违反规定的现象，商品和物资储备超过标准。

我们在检查苏共中央政治书籍出版社和宣传画出版社（全景出版社）的生产活动和财务经济活动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缺点。根据检查结果，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定。同出版社职工和党组织一道采取了改变现状的根本性措施。举例来说，选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版物的现实意义提高了，而政治书籍出版社的利润最近三年来增加了将近1/3。

同志们！

1989年党的预算资金的总开支为22.732亿卢布。

为保证党及其机关、机构和企业的活动以及发展物质技术基础支出了17.683亿卢布。在党的预算的各个项目中，地方党组织需要的费用占89%。其中用于基层党组织需要的费用占23%。

用于苏共中央机关的费用为3290万卢布，占预算的1.9%。用于社会科学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列宁中央博物馆等党的中央机构的费用以及用于疗养院和经营单位的费用约为4400万卢布，占2.5%。预算开支的每一部分都没有查出超支现象。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从党的预算中拿出了近5.05亿卢布，用于提高低收入居民阶层的退休金和向亚美尼亚共和国提供物资和财政援助，以消除地震后果。中央检查委员会认为这些行动是人道主义的和正确的。但是，涉及到全党利益的这类问题应当更加民主地由委员会集体决定，并事先广泛征求党组织的意见。

最近几年，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各级检查委员会在地方，对党的宣传工作、培养干部、汽车运输，以及党的机关、党的机构和党的出版社建筑物的建设、维修和医疗设施使

用党的预算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从党的预算中拨出的这些资金，基本上是按照批准的拨款数额使用的。

同时，检查也发现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其中一个缺点是，用于党的宣传和培养干部的资金使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不尽合理。这方面的情况非常反常。一方面，在新条件下拨给党务工作这些重要方面的资金比较少——约占党的预算支出的8.5%。另一方面，正如中央检查委员会多次指出的，一些党组织就连这些资金也使用不到40%。

与此同时，许多政治教育之家、马列主义大学、党务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进修班缺少现代化的教学和宣传技术设备，缺乏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等等。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效果。这些学习形式每年培训数以10万计的宣传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但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刻时这些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我们认为，党的宣传、政治学习和培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党的高等学校的培养工作，需要有一套崭新的方法。这些方面的投资效果目前还非常之低。

我想简单谈谈对用于发展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大笔款项开支情况的检查结果。例如，1989年用于建设和维修党的机关、机构和出版社建筑物的费用和用于汽车运输的费用为4.755亿卢布。

我们的检查表明，苏共中央办公厅和地方党委在整顿汽车使用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地方党委小汽车的数量减少了850多辆，苏共中央办公厅车管处的小汽车减少了15%（30辆）。加强了对汽车使用的监督。

同时，用于汽车运输的费用总的来看并未下降。中央和

地方都没能利用一切可能来提高汽车使用效率和增加有偿服务的收入。有鉴于此，中央检查委员会曾建议扩大汽车输送服务系统，在中央办公厅车管处推广经济核算制，研究用更省钱的汽车取代现有的部分汽车问题。

总之，经营管理费用（汽车和房屋的保养、保管等费用）在党的预算中占很大比重，而削减这些费用却进行得极其缓慢。

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中央检查委员会在上次苏共代表大会上指出的基建方面的缺点。大家还记得，这指的是在建设莫斯科十月饭店、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时出现的浪费现象。根据对这一批评的调查，作出了整顿建设问题的专门决议。同时开工建设的项目数量减少了，工期缩短了，昂贵的装修材料和设备用得少了。

从1989—1990年规划中取消了预算造价为1.63亿卢布的234幢行政大楼的建设。今年开工建设的项目只有34个，比1986年减少6/7。

尽管如此，在基本建设预算资金的使用上仍存在许多缺点。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党委不遗余力地争取建设并非十分必要的项目。苏共中央在审批这类申请时往往也把关不严。

四年内有134个项目没有如期交工，未完工工程的数量增长了28%。在马加丹州、罗斯托夫州、赤塔州、塔沙乌兹州、查尔朱州都有党的“胡子工程”。

中央检查委员会常委会在讨论检查结果之后，曾建议削减未完工的项目，加强对设计预算文件质量的监督，消除苏共中央办公厅下属各部门的工作重复现象，应当无偿移交用党的资金建设的建筑物。

后一项建议需要作一下解释。一些党委已向地方苏维埃等机构移交了250幢旧的、新建和在建的行政建筑物和经营项

目,这些建筑物和项目都是党的财产。其中200幢帐面价值为1.07亿卢布的建筑物为无偿移交。

后来的情况如何呢?检查表明,某些移交出去的建筑物并未用于原定的目的。部分建筑物长期闲置,因为重新装备这些建筑物需要大笔资金。一句话,这项措施考虑不周,因此,效果很差。

中央检查委员会认为有义务对某些党员想要瓜分苏共财产的打算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要求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是不道德的。

党的物质基础是几代共产党人的劳动创造的。想退出苏共的人,当然有权退出。但我们认为,不能同意每个退出苏共的人有权要求得到公共财产中自己的那份。党不是股份公司。

同志们,在报告所总结的时期,中央检查委员会对苏共中央文化部、国家法制部、农业部、信访处、《苏维埃俄罗斯报》、《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杂志、《鼓动员》半月刊编辑部在处理问题,处理劳动者来信、申诉和控告时遵守规定制度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各部处理问题,处理各种材料和起草文件,基本上符合要求。

在检查过程中,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对消除所发现的缺点和改进文件处理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在改革党、精简机关、改变机关职能的条件下,党中央委员会应当更多地注意推广现代化统计、处理和分析信息的方法,更广泛地运用计算机技术。

现在谈谈处理劳动者来信、申诉和控告的工作。

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间

这个时期，苏共中央收到来信的总数达 400 万封左右，总的看来数量并未减少。苏共中央信访处年平均接待来访者 3.3 万人。最近，中央委员会收到的来信数量明显减少。1989 年来信数量比前几年的平均数减少了一半。苏共中央信访处收到的信件数量也减少了。

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给苏共中央的信的一个特点是，内容日益政治化。许多来信证明，劳动者支持党全面革新社会的方针，他们关心苏共威信的增强。

同时，来信中也反映出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恶化、族际关系复杂化、社会紧张程度加剧极为关切。许多来信抱怨地方对他们的请求漠不关心，抱怨办事拖拉和官僚主义。简而言之，来信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看法。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评价了中央、中央机关和报刊处理来信的工作状况，认为对劳动群众的书面申诉和口头申诉基本上做到了及时和有效的处理。

在为中央委员会全会准备材料时，在政治局和书记处、苏共中央各部委的日常工作中，广泛地采纳了来信内容。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和章程草案都考虑了来信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愿望。

苏共中央总务部和其他各部在分析和归纳劳动群众来信的基础上编写了专题和综合性简报和材料，分送给党的领导人。

考虑到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建议，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从今年 2 月起，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接待室定期接待公民。截止 1990 年 7 月 1 日，参加接待的有 84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接待了 800 名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都接见了劳动群众。



与此同时，在处理劳动群众来信的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其中一些缺点并不是因为个别的疏忽，例如某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无纪律性或者无组织性，而是有种种其他方面的原因。

许多给苏共中央来信的人请求干预地方机关、中央各部委和组织的行动，希望协助解决具体的、个人的难题（提供住房，劳动纠纷、法庭和行政机构的决定等问题）。

然而，大多数来信和申诉不可能由苏共中央来直接处理，因此被转给负责解决这种或那种问题的地方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各部和主管部门了。

许多写信的人从这些机构得到答复，而不是从他们致函的单位——苏共中央得到答复，因此，他们表示不满，有意见。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中央没有告知写信人，他们的来信已转给有关机构处理。

还存在其他一些缺点。在处理控告和申诉时往往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造成人们再次来信申诉，还有超过处理来信的规定期限等情况。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处理来信的工作，应当完全符合这方面现行的法律文件。

同志们！

中央检查委员会大力加强了党内的检查工作。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直接了解各级党组织检查委员会的活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近30个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中央检查委员会每年两次定期分析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检查委员会的活动。总结材料上报苏共中央，同时也分送地方党组织，以便各级检查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能考

考虑到这些总结材料。

组织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检查委员会主席学习，是指导帮助工作的一种形式。苏共中央和中央检查委员会1986和1989年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为主组织和举办了两次全苏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的材料已经印刷成册发给了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检查委员会。

代表同志们！

请允许我在总结报告的最后，谈谈根据过去工作经验得出的一些看法。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条件，应当注意到下述情况。第一，中央检查委员会没有权利对检查和监察结果自行作出必须执行的决定。它只能把有关材料连同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起上报苏共中央。

第二，根据条例，中央检查委员会不能领导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检查工作纵向隶属问题。

第三，党内的整个检查工作完全是根据义务原则进行的。只有中央检查委员会设立了由五名负责工作人员组成的机关。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这就是对检查工作的态度问题，以及苏共中央和中央检查委员会之间、各级党委和地方党组织检查委员会之间的协作问题。我们认为，多年来，党内对检查工作和检查工作对加强党的纪律、更合理地使用党的预算资金的作用认识不足。

例如对成立检查委员会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态度。在推选委员时，往往不考虑某人能否真正参加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是否适合于做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还有,应当坦率地说,从苏共中央开始,各级党委对下级检查委员会工作的日常领导很不重视。这项职能已经写进苏共中央1986年批准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区党组织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条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大多数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委员都有这种看法,我们也同意他们的看法。顺便说一下,根据我们共同检查结果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塔吉克共和国党组织检查工作状况的决定》也作了这样的评价。

我们谈这些,决不是想使代表大会相信中央检查委员会自身的工作没有缺点。中央检查委员会在自己的行动中往往不够坚定,虎头蛇尾,没能吸引全体成员积极工作,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在党中央全会上很少发言。

但是,常有这样的情况,在总结时会特别清楚地看到,哪些东西疏忽了,哪些事做得不合适,为什么没能发挥全部潜力。

同志们!

党内出现的情况说明,在改革的决定性阶段,必须以新的态度对待监察和检查工作。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了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条例草案的制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建立统一的、有新的权利和义务的监察机构,会提高检查工作的水平,对党内民主化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并将有助于加强和提高党的威信。

我们认为,在建立新的监察机构时,必须以崭新的态度对待它们,把它们看作是党的革新进程有充分权利和有益的参加者,从事着共同的事业,一道奔向苏共中央政治报告和我们代表大会制定的各种纲领性文件规定的共同目标。

(译自1990年7月4日苏联《真理报》)

# 关于苏联共产党预算和财产的报告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

(1990年7月3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我们的代表大会将要通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决议。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正在革新的党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各级党委的工作方针。

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来改造党，改进党的实际工作，总之，是取决于党为达到改革确定的目标将拥有哪些物质资源。

由于对党的预算缺乏完整的概念，一部分共产党员，而且不仅是共产党员，产生了关于预算来源无限的印象。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党的收入和财产非常庞大。苏共中央办公厅准备了一份有关党的预算和预算前景的详细参考材料，所有代表手里都有这份材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也谈了同党的预算有关的一部分问题。

我想谈谈预算的某些主要指标和预算形成的原则。苏联共产党的预算是根据地方党组织的建议形成的，并由苏共中央审定。商定的指标纳入全党预算，每年由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逐条批准。日常的各种财政问题和涉及到预算的其他问题由苏共中央书记处审定。

中央检查委员会定期检查，讨论预算的执行结果和中央办公厅下属各部门的工作并向政治局报告检查结果。

各级党组织的预算,正如已经讲过的,主要依靠两种来源形成——党费收入和党的出版社的利润提成。各项收入总额存在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帐户上。把收入高于支出的部分列入苏共预算,用于补贴那些入不敷出的党组织。因而,多年来以集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方党组织财力物力的平衡。

依靠党的收入的再分配,1989年得到财政资助的有50个党组织,而今年计划对68个党组织实行补贴。补贴的数额很大(从30%到80%),并根据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地区的居民结构不同、各党组织的人数不一,像对待其他所有人一样向党的工作者支付在边远地区和特别艰苦地区工作的附加工资。

某些地方流传一种说法,说什么苏共从地方上收取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作它的机关的经费。我想重申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中谈到的情况,来驳斥这种说法。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央委员会没有收取地方党组织的收入为中央机关提供费用和进行全党的活动以及开展国际工作。非但如此,正像我已经讲过的那样,今年已经从党的中央预算中拨出1亿多卢布用作活动拨款。顺便说一下,苏共中央机关的支出规定在2230万卢布的限额以内,仅占预算支出部分的1.1%。

最近几年,中央委员会就各级党委的财务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修改了党的预算批准的指标。从1988年起,大大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的权利。它们可以自主决定对自己工作各方面的拨款数额,可以在标准的工资基金限额内确定各级党委和机构的编制人数,建立和撤销下属单位,解决被免职的基层组织工

作人员的编制安排问题。

由于收入上的特点，1989年是党的预算景况最好的一年。你们都知道，工资在国民经济中以怎样的速度增长。党费进项也大致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党费总额大约为16亿卢布，地方党组织的党费收入比1988年增长了11%。

党的出版社从自己的利润中为预算提成11亿卢布。1989年党的预算总支出为23亿卢布。

阿·阿·尼佐夫采娃同志在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对主要方面的工作作了详细的评价。我完全赞成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接受对苏共中央办公厅的批评意见。顺便说一下，我们也收到各级党组织以及报刊的不少批评意见。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说明，苏共中央办公厅的过错是对所发生的变化准备不足。而且就结构来说，我们的机构主要是从事核算和分配，而不是吸收额外的收入。这也影响到对干部的培养，这些干部长期感觉不到有搞经营活动的必要。

党中央委员会始终奉行削减开支的方针。为了执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善了结构，精简了党的机构。各级党委会腾出8500名工作人员。在苏共中央机构中撤销了11个部，腾出680人。许多党组织正在积极完善党的机构和精简机关工作人员。

苏共中央办公厅会同地方各级党委进行了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工作。在此期间减少了汽车数量，削减了党的机关设施的保卫工作以及后勤工作的开支。

这样就节约了4600万卢布党的经费。

从执行结果来看，去年没有发生经费超支的情况，已批准的各项拨款的总节约额为1,132亿卢布。

应当坦率地说，节约的一部分是因为编制缺额。地方机关还有大约 9000 个职位没有补齐，编制不健全的情况有所发展。

谈谈 1990 年的预算。代表们注意到，预算是根据传统的收入来源和支出情况形成的，因此，它将按照我们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来修改。这首先同党员缴纳的党费数额，同实行新的企业税法，同增加用于社会保险的提成，同提高物资的批发价格和交通运价有关。

在年开支的 21 亿卢布中，大部分，即 19 亿卢布，或者说 90% 将用于地方党组织活动拨款，用于发展这些党组织的物质基础。

代表们已经拿到了这些开支的逐条详细说明。

计划从中拨出约 16 亿卢布作为党的委员会和党的机关的经费。这些资金的一大半用于党的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的需要。1/4 稍多一点用于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18% 用作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经费。

在这些开支中，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基金占的比重最大，达 12 亿卢布。党的委员会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技术和后勤服务人员）的在编人数为 21.7 万人。在党的基层组织中，靠预算资金支付报酬的有 7.7 万脱产人员。

由于工作人员数量大，后勤服务的开支也就相当大，因此在总开支中这笔费用占 2.39 亿卢布。服务人员劳动报酬基金比重实际上超过后勤开支的一半。

地方党的机关的大笔开支用作党的机构经费。这些机构是政治教育馆和研究室、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及其分校、16 所高级党校、100 余处党的干部进修班。在这些机构中有 2.4 万

名工作人员，为他们拨款 1.462 亿卢布。各种办学形式的学员每年差不多有 150 万人。有些地方由于追求数量而导致了培训质量的下降。我们应当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也要求从方针和效果以及削减开支等方面修改整个干部培训制度。

我们支持某些党组织把党的许多机构联合成一个单位的决定。这样能消除机构重叠，吸收最有能力的干部，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工作人员，减少开支，在当前形势下尤其需要这样做。

还需要重新考虑对党的中央机构——社会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全苏政治教育馆活动拨款的态度。为了向这些机构提供经费，党每年要支出 2800 多万卢布。看来，这里也有必要改变培训的方式和期限，变动招收学员和研究生的人数。

还有必要研究一下把某些学校合并成培训干部的统一中心的可能性问题，坚决改变对学校搞经营和经济活动的看法。初步研究表明，这方面能够为增加党的预算收入开辟必要的来源。此外，这有助于学校获得自主权，以另一种办法解决为目前的教学计划和长远的教学计划拨款的问题，合理使用现有资金。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认为必须修改建设方面，尤其是办公大楼的建设方面的整个政策。我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代表报告这些意见的落实情况。压缩建筑工程的具体数字已由中央检查委员会作了报告。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停止建设高级党校和新办公大楼的决定。现规定，只有在大楼由于自然灾害而遭损坏和处于危险状态时，方



可另行建设这类建筑物。这些措施可压缩开支5亿卢布。

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建设住房现在按标准设计进行，而监督实施建设的职能交给了统一发包单位——地方苏维埃。

再谈一个往往会引起不同解释的问题。这指的是苏共中央办公厅的疗养机构。在预算中，今年计划为疗养院拨款1100万卢布作为经费，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0万卢布。确实，我们的疗养院很好，那里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配备了业务高度熟练的干部。但是，与传闻相反，在这些疗养院休息和治疗的不仅是党的机关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近几年来，根据合同，别的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工业企业工会组织也得到了进这些疗养院的疗养证。去年在我们各疗养院疗养的有9.2万多人，他们中的32%是党的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党的出版单位的工作人员，39%是老党员、老工人、经选举产生的党的积极分子和苏维埃积极分子、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工业企业和农业综合体的职员、保健机构的职员、国民教育和文化机构的职员。

由于改革党的机关结构和精简党的机关，疗养院今年同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80个单位签订了合同。这可以接待更多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疗养院休养的党的工作者的数量日趋减少。例如，今年第一季度在我们疗养院休养的党的工作者只占21%。

现在我们已制定了各个疗养院实行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措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可享用我们疗养院的服务和利用物质技术基地。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88年在莫斯科近郊“罗斯”疗养院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内第一家医疗康复中心，接纳受伤和致残的国际主义军人。这里为原来的军人进行医疗康复、心理康复、社会康复和就业指导创造了一切条

件。在中心里还开办了假肢工厂、计算机和汽车训练班、画室等。

在这期间，约 4000 名军人和 200 多名军人家属在该中心得到了必要的医疗和安了假肢。国际主义军人及其陪同人员的疗养证是靠党的预算发给的。

一年来，在我们的疗养院里还接收了亚美尼亚地震的 2000 多名受害者。此外，还向亚美尼亚部长会议额外发出 1700 张疗养证，供列宁纳坎、基洛瓦坎、斯皮塔坎的居民使用。现在又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受害地区的儿童提供了援助。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为改善居民的医疗服务，把正在建设中的拥有 300 个床位的“西伯利亚”疗养院交给了秋明州执委会，把“克拉托沃”儿童综合体和“山区空气”疗养院的一座楼拨给了俄罗斯联邦卫生部。为了老战士和老工人的休养，把正在建设中的“克利亚兹马”膳宿旅馆拨给了莫斯科。

代表同志们，我们的预算同任何一个组织的预算一样，无法避免受国内经济中发生的进程的影响，这些进程直接影响到预算开支的增加，仅这一点就使我们不得不大大节约，削减各方面活动的开支，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改变组织结构和减少机关人员。

由于将改变党费的数额并增加给基层党组织的拨款，靠党费得到的苏共预算收入将大大减少。

苏共中央收到了一些党委、基层党组织和个别共产党员的大量建议，其中多数要求减少党费的数额。当然，关于具体数额问题应当由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来决定。

我对这些建议持理解态度，我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经过修改并于代表大会前夕公布的党章草案中规定，收入超过 500 卢布党费的最高限额为 2.6%。这样，党费的总

收入将比现在减少 1/3。这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给工作人员少的地方党委的活动提供拨款。

把最高党费限制在 1%，将会严重损害财政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党费收入将比现在减少 66%。

这样的收入水平将不允许给许多区党委和市党委的活动拨款，不能保持脱产工作人员和许多基层党组织的经费。所以我们建议研究一下按照党章草案中公布的数额确定党费的标准问题。

还有一个几乎所有党的基层组织都在积极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将由这些党组织支配的那一部分党费问题。我认为在党进行活动的新条件下，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

迄今为止，都是从党的预算中拨款给某些地区党委，为它们提供财政援助，仿佛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保证它们的活动。已提出的为了基层党组织的需要而增加提成的建议，无疑将加强其中最大的党组织的地位，扩大它们的自主精神。

但是，这将使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活和文化领域的党组织以及按居住地组成的党组织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而这样的党组织占多数。在我们的 40 万个党组织中几乎 96% 的党组织的人数不到 150 人，我再说一遍，有 96% 的党组织，其人数不超过 150 人。只有 6400 个党组织的人数在 300 人以上。

不拥有地区大型企业的区党组织也将处于同样困难的境地。我说过，首先是农村区委。

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党委会将遇到财政困难，在这些地区的党委会中农村党组织占多数。

看来，在苏共章程中保留有关把党费的 50% 拨给基层党组织支配的规定是合适的。拨款提成的具体数额问题可以由

党组织书记委员会在民主基础上，根据每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形势和具体情况解决。

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必须改变预算形成原则，尤其是必须寻求更多的财源来充实预算。应该更有效地利用党的机关和出版社的物质基础，大大扩大经营活动。为党的预算筹措补充收入的问题是党委会工作中的优先问题。

我不能回避在讨论党的工作者的活动时常常提到首位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提高工资问题。

在报刊上，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足够的阐述。我只想告诉你们，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已经提高到与国民经济生产领域的专家同等的水平。

从总体上看，在劳动报酬基金方面这部分工资提高了34.6%。而且主要是在编制没有减少的区党委和市党委中提高的。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工资增长的84%是靠减少工作人员实现的，苏共中央工资增长的94%是靠减少工作人员实现的。

许多报刊以及某些党组织最近正在讨论关于党的工作者的特权问题。它们指责苏共中央委员会用党的预算资金为不久前还在供某些领导人使用的国家别墅提供所需的经费。我想明确声明，苏共中央办公厅同建造国家别墅以及为其提供经费没有任何关系，与此有关的任何开支都没有从党的预算中拨出过，并且现在也没有拨出。

从党的预算中支付的只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工资。

还有，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构中，最近对使用交通工具作了整顿，对工作人员实行派车服务制度，其中也包括收费制度。

对医疗服务制度进行了修改，负责人员的某些家属和孩子不再在固定门诊部看病。取消了定货处，我们的饮食公司已同 208 号基地脱钩，这引起人们特别大的振奋，但也引来了责难。

取消了各类党的工作者在休养期间免费使用汽车的权利。改变了秋冬季节住两日休养所和膳宿旅馆的收费办法。

整顿了向中央机关、办公厅所属企业和组织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的工作。

有人认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领导人应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并公开定出什么是特权，什么是对劳动的奖励。

代表同志们，我受委托向你们通报党的机构现在所拥有的物质基础和形成物质基础的条件和来源，通报现行法律载明的对社会团体，其中包括对苏共的财产的法律调节原则。

最近有人提出了关于没收党的财产，首先是没收楼房、党的出版社、学校的物质基础的要求。这你们自己已听说了。还有人建议瓜分财产，提出财产国有化和交给苏维埃管理的主张。有人怀疑苏共占有几代共产党人创造的党的财产的合法性，在居民中散布关于党利用国家资金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从而损害了人民利益的看法。

所有这些企图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削弱苏共，使苏共失去物质基础，使苏共没有能力参加政治斗争。

苏共中央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根据苏共中央的授权可完全拥有、利用和支配党的财产。党的委员会以及苏共的企业、机构、组织被授权对指定使用(分配)的财产进行业务管理。

截至 1990 年 1 月 1 日，苏共固定资产价值为 49 亿卢布，其中地方党的机构固定资产价值为 23 亿卢布，苏共中央办公

厅的固定资产价值为 7.63 亿卢布，党的中央机关的固定资产价值为 1.328 亿卢布，党的机关出版社的固定资产价值为 16 亿卢布。代表们手头有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

在我们党的机关系统中有 114 家出版社，其中包括 3 家中央出版社、1 个胶版印刷厂和 1 个中央仓库。

在党的印刷基地出版 406 种报纸，总发行量达 1.07 亿份，还出版 286 种杂志，总发行量达 1.259 亿份。1989 年共出书 5.64 亿册。

党的出版社的物质基础是用苏共自己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只有少量的印刷设备属于例外。是按规定在不同年代从各个国家机构得到的。用于这些设备改造、扩充、现代化和更新的投资已经超过最初价值的许多倍。最近 25 年来，从党的预算中拨出 17 多亿卢布用于这些目的，这有助于建立实质上是新的印刷企业。

至于谈到党的财产的法律地位，那么按苏联宪法第 10 条的规定，社会联合组织（团体）其中也包括苏共的财产，属于受国家保护的社会主义财产。

这一宪法条款也写入了从今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苏联所有制法》，还写入了今年 5 月 3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读通过的苏联结社法草案。

社会团体所有权受苏联和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原则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法典的保护。

民法确认苏共作为社会团体有支配自己财产的绝对权利，按我们法律的规定，除了所有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这样做。

至于社会团体的财产转让给任何其他团体，那么这种转让只有在征得苏共作为所有者的完全同意之后方可进行。

我们的财产是全党的财产。因此，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当关心使这笔财产的使用有益于党和人民。

这就是苏共中央办公厅认为必须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的结论。

(译自 1990 年 7 月 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苏共预算和财产的决议

(1990年7月10日通过)

1. 听取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同志作的关于苏共预算和财产的报告。

2. 代表大会指出，根据苏共在社会中的新职能和作用编制和执行预算的程序进展缓慢。未能把有关党的物质基础和预算的情况公之于众。在通过有关财政和财产问题的一系列决议时没有考虑党的当选机构和党员的意见。苏共中央和各级党委会不能合理地使用资金，项目建设过多，在移交苏共所属财产时放任自流。

3. 代表大会主张扩大党委会和基层党组织在开辟预算财源和合理使用党的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党组织的财政经济活动应建立在民主原则上，要考虑各地区的特点，为苏共每一个组织的工作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4. 代表大会委托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今年年底以前制定出在党组织的自主性扩大、向财政自理过渡和资金分配照顾基层党组织的条件下编制、执行和监督党的预算的新机制，通过完善党委会和党的机关的结构以及精简在编工作人员人数来减少总的开支。苏共现有的医疗机构，可用于所有党员的医疗和休养。

5. 代表大会重申，苏共依法行使自己关于拥有、使用和支



配几代共产党人创造的财产的权利，把全党的财产看作是在实现党的纲领性目标和党章规定的目标方面开展实际工作的必要前提。

苏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在1990—1991年期间对苏共的财产项目由专家作出评估，就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财产提出建议。

在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出让苏共财产时，必须征求共产党员的意见，并根据苏共章程和法律所规定的方式进行。

苏共各级党委员会、组织和机构可以充分行使法人权利，合理利用这些权利来增强党的财力和物力。

6. 代表大会委托新成立的特权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对党内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把得出的结论和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在党的报刊上公布。

\* \* \*

代表大会相信，党委员会、基层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都会积极参与增添党的财产，在苏共活动的新条件下做到有效利用物资和资金。

(译自1990年7月12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现阶段党的军事政策 基本方针的决议

(1990年7月9日通过)

1. 苏联共产党认为巩固和平是对外政策的最重要方针并将大力促进降低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以新的政治思维为基础的党的军事政策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

代表大会全面评价了军事政治形势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认为，目前还没有形成使积极变化不可逆转的保障，对于苏联来说战争的危险性仍然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履行宪法规定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在可靠的合理的足够程度上加强和保持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安全的义务，过去和现在都是全国人民、党和国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苏联共产党主张实现和不断发展苏联的防御性军事学说，重申自己愿意促进形成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扩大以此为目的的军事政治合作，向着没有战争和暴力的世界前进。

党认为有必要通过解决防御任务来防止战争，使苏联国界不受侵犯，制止对祖国主权的蓄意侵犯，一旦发生外来侵略，使祖国进行有保障的反击，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恢复公正的和平。

2. 苏共代表大会指出，苏联武装力量无愧地履行着自己

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义务。共产党员、陆海军全体官兵、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边防军、苏联内务部所属的内卫部队忠于自己的人民，忠于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

陆海军内积累了不少尖锐问题，其中包括履行不是军队固有的职能、官兵配备、专业训练、所提供的新装备和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纪律、组织和人员编制结构不完善、军人及其家属社会保障差等问题。这种情况造成消极情绪和紧张形势，引起对服役的不满。

苏共强调指出，军人劳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军人劳动光荣。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全力促进加强苏联武装力量的威望，提高军队工作的威信，维护军人的荣誉、尊严、生命和健康。

代表大会声明，苏共赞成在统一的全联盟立法基础上集中领导国防、安全和军事建设问题。

苏联武装力量应建立在下述原则上：一长制，超地区性，按混合原则，即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按合同自愿服役相结合而编制的多民族的正规军，社会公正，所有现役和预备役军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苏联武装力量只能按苏联宪法载明的军队的直接使命而动用。

必须制订出党对培养青年人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施以影响的方式方法，并使这些方式方法达到崭新的水平。应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方面的工作以及培养苏联公民履行保障祖国安全的神圣义务方面的工作。要提高党的地方机关在这方面的作用。

3. 苏共认为，苏联社会的革命性改革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要求在苏联法律的基础上分阶段地实行军事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要依据合理的足够防御程度的原则保障防御力量达到有科学根据的水平；制订出长远的军事技术政策，在采用科学、技术和工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为陆海军装备现代化武器和高质量参数的军事技术装备，使苏联武装力量的组织编制结构和管理机关最佳化；改革干部政策，使官兵关系民主化，改革官兵的配备和训练制度，提高官兵的职业技能和改进预备役军人的训练工作；加强苏联公民服现役的立法原则。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尽快通过防御法和国防企业转产法，而在国防企业转产时要考虑到根据外部因素，以及对军人、家属、预备役人员或退役军人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的国家专项纲要来发展这些企业的科学、试验和生产基地。必须把裁减武装力量和国防支出而腾出来的一部分人力和资金首先用于上述目的。

代表大会认为，首要任务是改善军队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为军人确保设备完善的住房，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行补偿措施。

4. 军事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根本改革苏联武装力量的党的政治工作的整个体制。这项改革包括：现有结构的改造，明确党组织和政治机构的职能，使它们符合新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条件，党内关系的民主化，创造新的道德气氛，保持高度的纪律性、法制和军队的同志式关系。

苏联武装力量的政治工作应当建立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以及世界社会政治思想成就和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苏共将努力加强自己在陆海军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团结所有健康力量和进步力量以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代表大会反对武装力量的非政治化。

陆海军的军事政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国防政策和苏联宪法开展活动，其目的在于本着忠于社会主义理想、军民团结、爱国主义、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国际主义、保持警惕性、随时准备保卫祖国的精神对军人进行政治、军事、道德和法律教育。

将建立和调整陆海军党组织的工作机制，建立它们同国内在苏联法律范围内实现党的军事政策的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行有效协作的机制。

代表大会认为，苏联武装力量应当是祖国可靠的保卫者，是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因素。爱护和完善为加强国防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译自 1990 年 7 月 11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维护民主权利、反对 迫害共产党员的决议

(1990年7月9日通过)

苏共确认各国人民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民主是同损害人的尊严、制造仇恨和报复的气氛，同企图以各种借口把共产党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社会运动及其全体成员和拥护者置于非法地位的做法不相容的。不能把被时代推翻的政权的的行为的责任转嫁到他们身上。

在东欧许多国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数以万计的正直的、忠于人类进步思想的人遭到了打击。他们因信仰而遭到迫害，受到歧视，丧失工作。一种难以忍受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的家庭，这种气氛常常导致人们的不幸。

反共主义过去制造了大量灾难和不幸。在所宣布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政治迫害和心理伤害都是不能容忍的，还会引起痛苦和抗议，不管这种现象出现在哪里——在国外还是在我国国内都是如此。

代表大会向遭到政治迫害和精神恐吓的共产党员和所有的人表示同志式的声援，呼吁进步力量维护每个人的荣誉、尊严和权利。

(译自1990年7月11日苏联《真理报》)

#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

(1990年7月11日通过)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认为,客观地评价当前形势,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政策原则,以便克服社会上和党内的危机,更新社会和党,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前进,具有原则性意义。

## 一、社会的危机和党的战略目标

### 对当前形势的评价

改革开创了我国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在社会发展进程充满各种矛盾的情况下,人民正在经历着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人们正在得到公民尊严和民族尊严,正在把社会和国家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愚弄人们意识和妨碍看清前进道路的种种神话不断破产。把苏联同外部世界隔离开的障碍正在铲除。在新与旧的尖锐斗争中,正一步一步地为使社会走出当前的危机创造条件。

代表大会认为,发生危机的深刻根源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有缺陷,而是它过去被扭曲了。社会生活由国家全面控制,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名义实行专制,重新造成了人与所有制和政权的分离,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人的本

性被残酷压制。教条主义横行，不允许不同思想存在。对各族人民的文化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采取轻视态度。世界被看成是各种社会制度不调和的对抗舞台。

30—50年代就已出现的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给国家发展造成了种种复杂问题，20世纪下半期科学技术革命使全人类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但是专横的官僚体制无力把国家引上世界文明的轨道。

然而，进行根本改革的迫切必要性长期被忽视了。脱离人民的党和国家权力结构人为地阻碍解决紧迫的历史冲突。

改革就是从根本上实行革新政策，就是把国家从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形式中彻底解放出来。但是改革也表明，对一个拥有近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进行全面改革是极其复杂的。此外，最近几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决策和行动失之草率和不够彻底，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在投资政策和进出口政策，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开展反酗酒运动等方面的失误，以及在组织合作社运动方面的偏差，都产生了不良后果。

旧的经济机制正在解体，而新的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货币流通和市场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为已经成熟的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建立法律基础的工作严重滞后，极为拖拉。族际冲突震荡着国家。国家政权的威信下降。精神和道德标准遭到冲击，暴力和犯罪浪潮不断增长。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通过和实施各项决议和在改造苏共自身方面，常落后于事件发展，不断按试错法行事。

党正经历着复杂的转折时期。放弃原来的行政命令体制的核心角色，使党具有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导致矛盾空前加剧，许多党组织的积极性下降，意见和立场两极分化，对党的



批评日益增多。

国内正迅速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

保守—教条主义派别活跃起来了，其代表人物认为更新政策是葬送社会主义原则，主张恢复独断专横制度。一部分官僚机构在客观上同这一派别结合起来了，这部分官僚机构无力进行自身改革，认为社会的民主化是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的威胁，因此千方百计要制止变革进程。

否定社会主义选择，主张把公有财产毫无限制地交给私人，主张教育、医疗卫生、科学和文化全盘商业化的各种运动在不断扩大势力。他们自称是君主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分子。

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派别成了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民族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其中除了民主倾向外，沙文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日益活跃。它们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对立起来，提出分立主义和“民族特殊性”口号，他们往往代表旧的或者新的企图掌握政权的反民主团体的利益。

民主的改革的力量是我国当前政治谱系中的中心，这个力量以社会主义选择为方向，大多数苏共党员，以及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军人、老战士政治利益和职业利益的许多组织是其代表。

在可能引起社会和经济混乱的政治不稳定时期，共产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党变为公民和睦的党，保证那些关心社会摆脱危机和民主改造社会的不同社会政治势力的建设性合作，以便团结、支持和保护所有用自己诚实的劳动现在创造着、过去创造过、今后仍将为人民谋福利和创造精神财富的人。党抵制想把社会拉向倒退，即拉向资产阶级制度或兵营

制度,想把社会推向无政府主义和公民对抗,制造民族和人民分裂的势力。

代表大会认为,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坚持不懈地实行更新社会体制的方针,是走向繁荣的自由的社会的现代战略基础,是走出危机的策略基础。

### 我们要走向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极权官僚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条道路尽管艰难,但却是通往美好生活,通往发挥国家物质和精神潜力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苏共同一切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决裂,不同意否定十月革命的理想,不赞成对苏联人民革命成果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我国历史,一方面应明确分清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所产生的现象,另一方面应明确分清苏联各族人民取得的实际成就。党对一代又一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和自我牺牲精神,对他们为国家献身的精神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怀着神圣的感情铭记人民在残酷的考验年代所付出的牺牲。

苏共主张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张在建设性地思考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正确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这些理论和实践。我们认为,必须利用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运用世界积累的有效经营的经验,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以及发展民主制度的经验。

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的党。我们认为这一前景是文明发展的自然历史方向。党的社会理想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及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和社会公正的追求。

我们所理解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激励他们有从事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受社会监督的国家应保证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问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保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

这个社会坚定不移地主张各族人民和睦与平等合作，尊重每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 二、苏共的行动纲领

实施苏共纲领性目标，既要求采取紧急的反危机措施，也要求有一项全面改革社会的长期政策。苏共将通过政治方法，通过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在苏维埃以及在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自觉的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利用宪法赋予的立法动议权，争取群众的信任，来达到这些目标。

### 消除危机的紧急措施

党提出的紧急措施是：

第一，今年制定出作为主权国家的各共和国联盟的新条

约。该条约应建立在严格的自愿、互利、民族自决自由的基础上，既要考虑到共和国的特点和需求，也要考虑到全联盟的利益。

第二，在一年半至两年期间，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实现下述各点：

——通过尽快使经济转向消费领域，全面发挥企业的经营主动性和购买进口商品，使消费市场首先是食品市场正常化，在向自由价格形成过渡时保持一系列日用必需品的固定价格；

——通过财政信贷改革、向居民发行股票、出售多余的物资、出售住房、提高居民的储蓄利率、出卖商品预购债券、把国家预算赤字降到最低限度，以稳定货币流通；

——通过合理削减国防开支、无效投资和管理费用以及通过整顿对外经济联系，来额外增加刻不容缓的社会经济任务的拨款；

——依靠全联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依靠企业、合作社和居民积蓄以及提供优惠贷款来大大扩大住房建设规模；

——制定有效的增强人民健康的措施，对卫生保健增加拨款，并把企业和经济联合公司、共和国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的资金用于这一目的；

——向遭受生态灾害和自然灾害的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制定鼓励自然保护活动的有效杠杆；

——制定防止居民被迫迁移的措施，承认难民的社会地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三，坚决加强纪律和法制，加强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加强预防违法活动。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同影子经济作斗争。立即通过一系列法律，为

消除危机的紧急措施准备法律依据，并制定落实这些措施的办法。

### 争取人的自由和福利

党认为，保证苏联人良好的生活条件是党的政策的中心战略任务。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党主张：

——根据国际公认的准则实现人权；

——取消在民族伦理、政治、宗教、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一切歧视；

——对公民的人身和尊严，公民的住房和财产不可侵犯，选择职业、确定居住地点、出国和回国自由，通信和通话保密，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给予可靠的法律保护；

——人有权确定自己的世界观和精神需求以及信仰自由；

——提高法院和社会团体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

劳动和福利。社会和每个人的福利基础是诚实的劳动。

党主张：

——保证劳动权利，保证按最终成果不受任何限制地公正付酬，克服平均主义和坐享其成现象，根除非法收入和特权；

——形成灵活的现代职业培训体系；

——为工作岗位创造健康和安全的条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假期。

社会保障。党建议：

为贫穷和多子女家庭建立完整的社会保护和物质帮助的国家—社会体系，争取使它们的工资、退休金和补助金的收入水平不低于贫困线；

——保证每个人的住房、免费教育、医疗服务、其他社会福利达到社会保障水平，同时发展收费服务，建立住房市场；

——根本改善保健和药品供应工作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保证实行大规模的康复和预防计划，保证居民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实行改善妇女劳动和生活条件的重大措施，为她们提供缩短工作日、按方便的时间表工作的权利，增加产前假和产后假，额外增加多子女和单身母亲的假期；

——增加用于维持和发展儿童机构的拨款，克服儿童商品、无公害食品的短缺现象，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儿童医疗服务，降低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国家对有子女家庭的帮助；

——保证青年有平等的社会起步机会，保证青年的职业、政治和文化成长的可靠前景，制定帮助青年家庭的措施；

——改善残疾人、老战士、国际主义军人、已牺牲的军人的家属、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其他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所有受害者的处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和医疗服务水平，实施向他们提供住房、商品和服务的专项计划。

教育、科学和文化。苏共认为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是党的政策的重点。

党保护创作自由，坚持崇高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它反对对精神领域的行政干预，反对文化、艺术和教育全面转向纯商业性质。党将争取：

——大力加强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加预算拨款，鼓励有利于居民精神发展的各种社会倡议和捐款，同外国进行广泛和自由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发展体育运动；

——制定并通过国家国民教育系统发展计划，扩大学校的自主权，改善在该领域就业的职工的物质状况，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保护；

——克服祖国科学在一些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现象，增加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拨款，扩大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在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采用科学成果。党鼓励发展安排科学活动方面的新结构和新形式，争取在科学领域内根除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加强科学试验基地，发展图书馆、档案馆和信息技术；

——确保各个居民阶层都能享受文化财富，要像关心民族财富那样关心艺术家的才能，爱护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进行普遍的美学教育，克服农村文化落后现象；

——制定并通过处理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领域活动的法律文件。

### **争取建立有效的经济**

要建立社会进步的可靠基础，就必须实现经济关系的民主化，真正发挥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工作积极性，鼓励高效率劳动。这正是苏共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的实质。

当家作主，热爱劳动。党认为，必须为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和平等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它们的一体化和自由竞争创造条件；

——把国家所有制(全联盟、共和国和地方所有制)由官僚机关的所有制变成由劳动群众在现行法律基础上自己管理的社会所有制，给劳动者集体租赁国营企业和财产的权利以及购买工业、商业、服务领域设施的权利，采用股份形式组织企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所有制和社会组织所有制以及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

——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个体劳动所有制也应在所有制形式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苏共反对全面非国有化，反对强加某种所有制形式。

向可调节的市场过渡。市场经济是排除过时的国民经济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唯一选择。苏共主张分阶段向市场过渡，认为必须做到：

——加快制订保证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立法以及法律准则和机制；

——给企业和所有商品生产者自主权和经营自由，而不问其属于何种所有制形式，促进他们之间发展健康的和诚实的竞争，把国家管理职能同直接的经营活动分开；

——实现生产、银行、保险、贸易、科研的非垄断化，支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国家对市场关系的调节要有利于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有利于国民经济重大的结构改革，有利于实施科技和生态纲要，以及在世界经济联系体系内确保国家利益。在经济核算原则和劳动集体自治的基础上，在统一市场范围内确保国家对运输干线、邮电、能源和军工综合体各企业的管理；

——在计划体制方面，转向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远景规划和国家专项纲要，转向通过国家定货、价格政策、折旧政策、关税政策、税收、贷款利息等手段间接调节经济；

——保证向可兑换卢布过渡，保证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为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吸收外国资本以便最快地采用先进技术和丰富市场。

市场和保护机制。注意到向市场过渡不是目的本身，而



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考虑到这一过渡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苏共建议：

——补偿因调整商品零售价格和服务收费给居民造成的损失；以消费价格上涨为依据，实行灵活的居民货币收入指数化体系；

——建立维持就业、劳动安置和职业再培训的有效机制，在暂时不就业、重新培训和改行期间实行发放补助金制度；

——保证对调节市场关系的法律的遵守情况实行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

农业政策。在农业政策方面党遵循下列原则：

——维护人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土地的权利，维护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拥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

——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等价经济关系；

——在土地经营方面取消一切强制做法和行政命令，相信农民的自由选择，保证公有经济——集体农庄经济和国营农场经济，以及重新得到确认的个体经济、家庭经济和租赁经济有同样的发展机会；

——根据各种经营形式的需要，保证优先发展农工综合体的物质技术基础；

——使每一个农村居民或是愿意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人有可能建设自己的住宅和庭院，改善农村的社会设施，使农业劳动成为社会上有吸引力的和经济上有效的劳动。

### 走向真正的人民政权

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党一贯主张：

——建立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相反，是国家为了人而存在，所有社会集团和团体都有权

得到法律保护,以及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实际可能性;

——加强法制国家,在法制国家里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保证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担任任何职务,国家和公民互相负责,民主通过的法律绝对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社会政治组织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竞争;

——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选权原则。

我们认为;民主不仅是权利与自由,而且还有与权利和自由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公民责任、严格遵守法律和自我约束。

立法权、执行权、审判权分立将能保证防止权力独揽和滥用权力,将能准确地划分权限与责任。党主张:

——立法过程民主化和公开化,各级苏维埃有充分的制定法规的职能和监督职能,各级苏维埃应建立自己的可靠的财政和物质基础;

——执行机关每年向苏维埃报告工作,在法律范围内对执行机关的活动实行社会监督;

——法院和检察院独立,提高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完善诉讼立法,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审判准则和辩护权,发挥劳动改造制度的作用,废除无端剥夺苏联国籍的法令;

——在征聘基础上建立朝气蓬勃的现代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受代表机关和公众的监督。

## 国 家 安 全

只要存在武装冲突的危险,国家就需要可靠的国防。党认为必须做到:

——根据新的防御学说和合理足够原则以及在军事建设中优先考虑质量参数的原则进行军事改革;

——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武装力量的建设、训练和使用等原则性问题仍由苏联全权处理；

——加强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保护（包括现役军人的人寿和健康保险），改善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条件；

——严格按照使命，完全根据法律使用军队；

——对国防领域实行有效的政治领导，最高权力机构对军事部门实行监督，同时根据各国之间达到的信任程度最大限度地公开军事部门的活动；

——通过武装力量内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加强苏共对武装力量全体人员的思想影响；

——实现国家转产计划，并将腾出的生产能力用于民用生产，同时保证工作人员的社会保护。

在当前条件下，内务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仍是保卫宪法制度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极其必要的机构，它们应严格地在法律范围内和权力代表机构的监督下活动。应提高护法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物质保证。

### **走向经过革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

建立各族人民的自愿联盟。苏共认为，只有苏联各族人民之间、民族国家实体之间实现相互关系民主化，只有顺利发展各地区的经济和统一的全苏市场，才能防止离心倾向的发展。党承认民族自决权，直到可以分离出去，但不把退出苏联的权利与这种退出的合理性混淆起来。根据各族人民的自身利益和世界进程一体化的趋势，党认为，保持经过革新后的联盟——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是一项重要的事业。苏共主张我国一切大小民族友好相处和族际团结。

党将执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的路线。党提出了各共

和国之间和各个共和国与整个联盟之间关系的多种政治方案和法律方案，以及在企业经济自主的基础上各共和国之间多种多样的经济关系。

苏共主张提高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的宪法地位，扩大它们的权力。

党认为必须保证为一切大小民族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加强没有行政区域地位的文化—民族共同体的法律保障，扩大这类文化—民族共同体向苏联和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提出法案的权利和在这些机关中拥有代表名额的权利；

——采取紧急的经济、法律和生态措施。这些措施应有助于保护生存环境和恢复能保证少数民族正常发展的条件；

——重申过去被驱逐的民族有返回历史家园或祖居地的权利以及公民有从境外返回祖国的权利。

人的权利和民族权利。苏共主张：

——在优先和绝对无条件地确保每个人的权利的前提下扩大各民族的权利；

——反对实行由于民族不同而造成公民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主张各民族在自决方面有完全的选择自由；

——在通过共和国法律规范和法律时尊重各种族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利益。

## 人类的和平发展

党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战略应以和平、合作、协作、进步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全力促进我国内部改革进程，保证国际稳定。

对外政策方针。为了加强普遍安全，党主张：

——继续大力推进已经有了良好开端的国际关系非军事化进程，把军备和武装力量削减到合理的足够防御限度，从世界实践中完全取消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进一步降低，随之完全消除军事对峙；

——在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全球的和区域的安全结构，以防止冲突和国际不稳定；

——为各国间的关系制定法律基础，以保障社会和政治选择自由、主权和独立，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苏美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把苏美关系纳入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轨道；主动参加全欧进程和克服历史造成的欧洲分裂，同东欧各国发展新型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全力巩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中的积极势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奉行积极政策以便把该地区变成和平与合作地区，参加政治解决区域性冲突，同不结盟运动协调行动，同发展中国家实行合作。

实行新质的国际合作。党认为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齐心协力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苏共主张：

——在改善自然环境和防止生态灾难方面积极地共同开展活动；

——我国和国际社会一道，为解决饥饿、贫困、大规模流行病、严重疾病、吸毒、国际恐怖行动和世界各部分发展严重比例失调现象而共同努力；

——积极扩大世界经济关系，消除科学技术和经济交流的障碍，发展人文领域的接触；

——同所有主张对人类未来负有历史责任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协作与合作。

苏共主张克服工人运动中历史造成的分裂，主张发展同

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民族民主政党以及站在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立场上的一切组织与运动的合作。

### 三、党的革新

多年来，作为行政命令体制核心的党本身发生了严重扭曲。过分集中和压制批评意见的现象在党内关系中严重存在。一些党的领导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腐化堕落造成了严重危害。

代表大会指出，苏共作为执政党对国内形成的局面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党自己公开地讲出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谴责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和对人权的粗暴破坏。但是，代表大会也坚决反对不加区别地指责过去几代和这一代正直的共产党员。千百万共产党员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忘我地劳动，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进步的力量始终在苏共内发挥作用，正是他们发起和领导了社会改革。

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放弃取代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蓬勃发展的变化要求加快把苏共改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在公民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政党。

#### 党在社会中的作用

苏共正在变成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它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设性立场，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自由竞争中捍卫政治领导权。

党将实现下列职能：

理论职能。党在科学地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从理论上估计社会发展前景，认清并考虑在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制订社会主义的革新战略和策略，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计划。

意识形态职能。党捍卫它的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宣传自己的纲领性目标和政策，将公民吸引到苏共方面和吸收到苏共队伍中来。

政治职能。苏共经常在群众中，在劳动集体中进行工作，同社会团体和运动进行协作，争取在各级权力机关选举中获胜，并在取胜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关，进行议会活动，实现自己的竞选纲领。

组织职能。苏共进行组织工作是为了实现它的纲领性原则和决定。在干部工作中，党将放弃形式主义和圈定名单的做法。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有权作出干部任免决定，党内的干部任免权由上级机关下放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在当前条件下，出现了在各级苏维埃建立党团和跨党集团的必要性，参加这些党团和集团的共产党员应当以本人选区选民的意志和苏共纲领性目标为行动准则。

## 党的民主化

党内关系缺少深刻的民主化，苏共在社会中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苏共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原则即坚持选举制和更换制、公开性和报告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党的民主化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全党的和地区的讨论以及全民投票的办法，参加苏共政策的制定工作；

每个党员和党员集体有权在纲领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中实行集体制和公开制，有批评的自由。对党内关系和党的活动进行深刻改革的目的，是保证苏共队伍的民主团结，警惕派别分裂。

吸收新鲜力量加入党的队伍，党的干部队伍年轻化，是苏共革新的重要因素。

基层组织是苏共的基础。基层组织可自主地结合具体条件确定任务和活动方式、基层组织和机关的结构及数目、举行集会、采取政治行动的期限和程序。基层组织拥有接纳党员的最终权力。上级组织不能撤销基层组织在苏共章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作出的决定。

按地区和生产单位原则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必须修改。在保留生产单位和其他集体内党组织的同时，考虑到按居民区开展竞选活动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强有力的、活动能力强的地区基层组织的建设上。苏共党员有权选择基层组织过组织生活，可以选择生产单位的党组织和居住区的党组织或两者兼之。保证建立横向组织和横向组织活动的自由，这类横向组织包括党的俱乐部、党组织书记委员会以及按专项利益、职业利益和其他利益成立的其他联合组织。

代表大会认为，剥夺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共产党员的党员资格权利和剥夺建立党组织以及其他形式政治活动的权利，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组织应脱离国家行政机关，其中包括脱离对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官兵进行道德政治教育的军事政治机关。

代表大会主张以无记名投票和自由提出候选人的方式直接地、差额地选举各级党委的书记和参加党的会议的代表。选举的具体办法由党员确定。



党的监察工作也应是民主的。中央的、共和国的、边疆区的、州的、自治专区的、市的和区的监察机关要独立自主地选举产生，不受党的委员会的支配，只向选举它们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汇报工作。

为了解决面临的任務，选举产生的党的机关在预算范围内可建立能够履行组织职能和协商职能的机构。

自主和团结。在革新苏联的过程中，应保障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要在苏共根本的纲领原则和章程原则的基础上同党的团结辩证地结合起来。各共和国共产党可制定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和标准文件，依据这些文件自行解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干部问题、出版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在各共和国的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中实行党的方针，同其他党和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同外国的党和社会运动联系。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如果不同意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定，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有权要求在苏共中央全会或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讨论问题。

### 党和社会团体

苏共愿意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运动和組織合作，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党准备同这些派别建立政治联盟。

苏共党员可以参加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群众运动。但是，党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其他党派，也不能参加宣扬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组织。

苏共将帮助复兴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挥知识界的社会积极性。

苏共赞成工会进行革新，支持工会积极行动起来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苏共认为，共青团是青年人的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组织，希望共青团直接参加制定和实现党的政策。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应当学会建立自身的政治盟友关系。应当理解新的青年组织的出现，要帮助这些组织树立社会主义的和普遍人道主义的方向，培养青年人树立关心人民命运的感情。苏共要求所有党组织根本转变对待青年问题的态度。这是党本身的利益决定的：没有青年，党就没有前途。

\* \* \*

这些就是苏共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目标。在通过苏共新纲领之前，共产党员、党组织和党的机关在实际工作中都应当遵循这些观点和目标。代表大会希望我国赞成改革、赞成对我国社会进行革新的一切民主力量都支持这些观点和目标。

（译自 1990 年 7 月 1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

(1990年7月11日通过)

1. 通过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

2. 建议全体共产党员、党组织和党的机构在新的苏共纲领通过之前, 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遵循纲领性声明。

3. 成立新的苏共纲领编纂委员会。

(译自1990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状况和实现苏共农业政策的决议

(1990年7月11日通过)

1. 代表大会声明,不根本改善农民状况,不改变农村的整个命运,不始终如一地实现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89年)制订的农业政策,就不能实现社会的革命性改革,就不能解决食品问题。

农业创造1/4以上的国民收入,农产品占消费品的2/3以上,还创造几乎全部食品。

然而,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最近没有改善。漫无节制地征款,社会消费基金增长缓慢。住宅、学校、医院、文化生活设施缺少。交通闭塞,商业不发达,居住区设施不完备,这一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日益严重的不便。

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保障每况愈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加工企业的固定生产基金有一半已经陈旧,需要更新。

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力量已经如此严重削弱,以至如果得不到国家大力支持,它们自身就无力完成社会向它们提出的任务。

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的垄断化和直接的经济操纵加强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非等价交换已成为定规。农工综合体

中仍在进行无济于事的改组。

为农村规定优惠的方针没有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组织措施的支持，因而没有真正实现。

2. 代表大会认为，食品问题的实际解决直接取决于农民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

苏共把保护农民的利益作为自己政治工作的中心，积极促使他们成为土地和自己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确定农民掌握土地的权利和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经营方法的权利，保障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户和个体经营户以及租赁集体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平等的经济条件，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机会根据个人劳动贡献成为集体财产的共有者。

3. 代表大会坚决主张，在从1991年开始的第13个五年计划中大大增加国家的基建投资，扩大建筑安装工程和物资供应的限额，以保障农村的综合发展，保障食品的产量能满足全国居民的需要。要特别注意建设住宅、医院、学校、道路、供水和供气工程、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仓储基地，实行有效的土壤改良措施。认为必须通过关于整治俄罗斯非黑土带、咸海地区和其他生态受害地区以及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专项国家计划。

代表大会着重指出，必须联合城乡的力量来解决食品任务，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周围建立专业化的食品生产区。为愿意到农村工作和定居的城市居民实行优惠。

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工作，在农村地区建立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生产消费品和副食品的企业、生产建筑材料的企业，为这些企业增加生产现代化的设备。

代表大会反对向农民发号施令、侵犯农民利益的一切做

法,主张城乡社会均等,用国家资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4.代表大会支持分阶段向食品和农业原料市场过渡的原则,为国家订货保证资源供应的原则,主张严格遵守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等价经济关系,完全勾销农工综合体各企业和经济单位所欠贷款,为这些单位制订财政优惠、津贴和补助的制度,取消供货单位的垄断做法,建立生产资料市场。

5.代表大会主张有效地发展农业科学,加强农业科学同生产的一体化,对重要的基础和实用科学研究给予优先拨款,广泛运用国内外先进经验,根本改变农庄农场和企业领导人、专家、租赁者、农场经理和普通职业骨干的培养和进修方法。

6.代表大会重申,农工综合体的管理制度应当本着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自愿决定来建立。为了保障国家行使职能,遵守农工综合体活动的法律准则,发展重点科研项目和培养干部,必须建立农业和食品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以及农工综合体物质技术供应和服务系统。对它们活动的评价应当同农工综合体工作的最终结果结合起来。

7.代表大会支持成立苏联农民协会这一群众性的社会政治团体,赞同该会旨在把农民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力量团结起来的方针,以解决食品问题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

8.代表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同人民代表苏维埃、工会、共青团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一起积极促进农村的社会改革,促进家庭的精神和风尚的发展以及恢复农村独特的生活方式。要把关心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和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置于自己活动的中心。认为必须吸收城市的智能和创作潜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号召舆论界工作者揭示全国整

个国民经济综合体参与振兴农村的重要性，更广泛地宣传各种经营形式的经验，提高农民劳动的意义和树立其在社会中的威信。

（译自 1990 年 7 月 13 日苏联《真理报》）

#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审议 苏共章程草案时作的说明

(1990年7月12日)

敬爱的代表同志们,为了使你们有可能作比较和对比,我的报告讲得慢一点。

我想,委员会认为并且我和你们也都认为,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许多文件中,苏共章程占有最重要地位。你们也知道,新章程草案起草了很长时间。三个多月之前新章程草案在报上公布,供普遍讨论,并且立即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已经举行的各级党的总结选举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讨论了章程草案。

我提醒大家,仅苏共中央就收到20余万条对草案的建议,还有50多个可供选择的章程草案。其中有苏共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其他对我们党改革途径发表各种意见的团体的草案。

在有很多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分析和参考了每一个草案和建议。在代表大会之前,参考全部讨论情况并经过120多处修改最后完成的章程草案,重新在中央级报纸上公布。在我们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代表们不论是以书面形式还是在发言中,又对章程草案提出了数千条意



见。从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收到 500 多份来信,包括约 6000 条建议和意见。

还收到 7 份可供选择的章程草案。总共差不多有 1/4 的代表对章程草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代表大会还收到 100 多份对章程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的电报。

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也对这些广泛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你们记得,7 月 9 日,代表大会接受了党章草案,认为可以把它作为基础。我们委员会把这看作是证明草案符合时代要求,证明草案的目的在于解决革新党的任务。

在委员会中工作期间,我们确信,多数共产党员主张对党内关系实行改革,这种改革能把党的广泛民主化同增强党的组织性和活动能力统一起来。他们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和团结的组织。共产党员坚决要求抛弃过分限制和严加禁止的做法,要求为党员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工作,为新政治思维和大胆的实际行动创造最大的可能性。这恰恰是章程草案的基本方向。

同时,委员会详尽研究了批评意见所涉及到的那些草案条款,这些批评意见旨在使章程更符合现代精神,加强章程中对民主化和从组织上加强苏共的保证。

现在谈谈某些原则性问题和我们在委员会中讨论得出的结论。首先是关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它的社会基础问题。我们认为,党的章程应该确定苏共是一个政治组织。这个组织是建立在全人类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在国内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体现和维护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选择的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党,应力求达到公民和陆和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社会的团结。党的这个定义反映

出它真正的实质，再次强调了苏共与人民血肉相连，与人民一起沿着革命性改革和对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实行革新的道路前进。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我已经在中央的政治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委员会也指出，我们大多数党员的意见是一致的。党的生活中最广泛的民主应该与集中制和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党不致变成辩论俱乐部，不致丧失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的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关于在党章中提还是不提民主集中制的争论涉及的不是这个原则本身的实质，而只是这个惯用的术语的实质。委员会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是说，大家发表的意见都是相同的。但是，大多数人坚决认为，我们党的章程正确地反映了党组织的民主和独立自主同普通党员的权力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只是因为“民主集中制”这个术语长期以来被人用来掩饰官僚主义专制和党内生活的死气沉沉而把它抛弃。

应该单独谈谈委员会在讨论党内纪律问题时的不同观点。首先要谈的是执行党的决议的制度。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列席委员会会议的一些代表建议把下面一点写入党章中，即只有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才是党的下级组织必须执行的，而党的委员会和常委会的决议只是建议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制度只能把党组织的事务工作搅乱，使党的委员会受到束缚，不能对情况的变化作出有效的反应和积极执行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要知道，党作出的决定就是为了要接到决议的人去执行。通过讨论，我们似乎找到了大家都能接受的观点。在党章草案第13条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党委会和常委会的决议在起草阶段应在相应

党组织内进行讨论,通过之后,必须执行。”就是这样。

委员会还认真讨论了所收到的关于可以实行党的联邦制结构原则的建议。我们的立场已经确定。我们坚决捍卫有共同纲领和章程的统一的苏共。与此同时,我们主张每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有自主性和充分的权利,主张它们积极参与解决全党的问题。建议正是以这种形式来阐明党章第22条的准则。同时,委员会建议把前一个草案的第23条全部删去,不是你们手里的第二份草案,而是前一份草案的第23条。这一条对党内生活的一些方面作了严格规定,而这些方面完全可以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行解决。因此,我们正在通过一个章程,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纲领,也就是现在的纲领性声明,党的所有队伍和各级组织,其中也包括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应在这个纲领性声明范围内开展活动。然而,我们将把重点放在自主性上,以便强调共产党在目前情况下的新的地位。这符合我们多民族国家共产党员的利益。

作为对所散发的方案的补充,委员会建议写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有权要求不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而且在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给集体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提供更多的保障。

我们确信,只有统一的苏共,所有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都在其内积极活动的苏共,才能够在我们多民族国家中成为真正团结的政治力量。我们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将在新的、现在正在制定的联盟条约基础上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中央机构组成条例的决议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我们大家已经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了表决。

就苏共党员的章程条款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委员会一些成员建议不要写上苏共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另一些成员则相

反,认为需要补充并扩大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两种意见都不能接受。如果我们干脆什么都不说,这就会令人不解和令人奇怪,可是,如果我们开始列举,那么到哪里为止呢?如果到某一点为止的话,那么所有其余的就可以说是超出范围。应当克服这种自然的辩证矛盾。在第2条中指明下述一点是合理的,即苏共党员有权同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的其他纲领派别的共产党员实行联合。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和我都认为,在章程中还是应当指明党员最重要的一些权利和义务。看来,这些权利和义务在章程草案中阐述得相当充分而具体,尽管不能全部列举出来。至于谈到共产党员按各个纲领联合在一起的权利,那么第16条为他们规定了这一权利,只要这不是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的话。

委员会昨天晚上还讨论了纲领草案并提出了一项涉及到一大批共产党员的补充意见。建议在第4条的结尾写上:“如果党员因身体状况或者年龄不能充分参加党内生活,基层组织有权根据他的个人申请解除他的日常工作和免缴党费。”应当本着党内同志式的精神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我认为,这对那些为我们全党事业贡献了自己的许多精力和健康,而现在感到自己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工作的人是公正的。同志们,在第4条的末尾,应该补充这一点。

在讨论第6条时,对在何处规定举行全体投票的方法,是在党章中规定呢,还是在关于党内全体投票和讨论的条例中规定呢,出现了分歧。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倾向于最好是在专门的条款中规定。我想,没有必要加进一些细节和指导性准则使我们的章程变得累赘。如果说非这样不行,那么,章程和准则之间就失去了界限。归根结底,还是不能脱离章程和

章程条例的范围。

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委员会一些委员对第 13 条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之处只涉及到一个词，但却具有原则性意义。这里指的是少数派在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立场的权利。有人建议把“党的”这个词去掉。我想，没有必要解释这意味着什么。我支持委员会中那些建议保留过去提法的委员的意见。并且，在纲领性声明中也正是这样写的。

正如你们看到的，基层党组织在党章草案中占有特别的位置。自主性和积极性的保障首次在广泛的准则基础上得到了加强。为此，委员会千方百计地不把那些可能把我们基层党支部的生活限制得过死的细则写进党章。

你们可能已经发现，委员会已在草案的第 11 条中加进了新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党员不能加入两个以上党委会或党的监察委员会。应该说，许多同志都表示反对这种对共产党员权利的限制。他们认为，这会使我们地方党的积极分子陷入复杂的境地，给许多有威望的共产党员进入上级党的机关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例如，基层党组织书记完全有资格进入几个委员会，从基层党组织的立场可以提出许多理由。其中一种理由是：如果基层组织书记成为区党委委员、市党委委员，就既不能选入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党中央，也不能选入苏共中央。

我认为，这些理由是令人信服的，也许，我们应该从党章中去掉上述条款。代表们现在应该考虑这件事。同志们，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一个共产党员被选进上级机关，那么他就应决定留在哪两个机关中，退出哪个机关，就像我们在苏维埃中所做的那样。也许可以把这个准则列入党章中，这样事情不就清楚了吗？

委员会全面讨论了关于党的议会活动问题的章程条例。着重讨论了党团在人民代表苏维埃中的作用。现在可以把它称作共产党员党团。委员会委员主张党章能为身为共产党员的苏维埃代表实现选民的意志和委托而积极和独立工作提供条件。因此建议规定共产党员党团与党的委员会之间更加民主的相互关系形式，以及他们工作上的协调一致，以代替原先规定的共产党员党团绝对服从党的委员会的条例。委员会这样做了，这一切都反映在党章草案第 34 条中。

至于有关苏共与社会组织和运动相互关系的第 35 条，那么第一句话只写上“党与站在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立场上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就够了，因为在党章草案的其他条款中还有关于我们应如何行动和维护什么的表述。

委员会多数委员主张在章程中保留关于苏联武装力量中的苏共组织这一节。这是有武装力量代表和武装力量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相当持久而广泛的一场讨论。我们反对所谓的军队非党化，认为，在章程中载明陆海军党的工作基本原则确实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根据是，今后只有基层党组织和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才能在武装力量中进行党的工作。这一点极为重要。至于目前领导上述组织和机构的军政机关不再具有这些职能，而成为在驻防军的现役军人及其家属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文化工作的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如常言所说，那里有工作可做。因此，更明确地确定了从全军党的组织选举全军党的机关，以及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程序。

委员会仔细研究了缴纳党费的标准，建议采用如下标准：收入 70 卢布以下的缴纳 10 戈比，71—100 卢布的 20 戈比，101—150 卢布的 30 戈比，151—250 卢布的缴纳 1%，251—700

卢布的缴纳 2%，700 卢布以上的缴纳 2.5%。

代表同志们，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就是这些。委员会搞出的总的成果就是苏共党章草案，我们把它提交给你们，请仔细地、负责地加以审议。因为我们党在民主和革新道路上的整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基本文件。

(译自 1990 年 7 月 13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章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1990年7月13日批准)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捍卫国际主义，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苏共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努力实现公民和睦和多民族苏联社会的团结。

苏共在纲领和章程基础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党、党的所有组织在苏联宪法，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

## 一、党员、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1. 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并履行党的章程，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中工作并以物质手段支持党，可以成为苏共党员。

2. 党员一律平等。苏共党员有权：提出并自由讨论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党内生活的问题，参加制定决议，在自己



的社会活动中得到党组织的政治支持和保护，选举和被选进党的机构，获得有关他们的工作的通报，作出评价，批评党的任何机构和任何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提出申诉和建议并得到它的答复，在讨论他本人的建议或者讨论有关他本人的活动和行为的问题时参加党的机构的工作。

共产党员有权参加其活动符合宪法和苏联法律的社会组织和运动的工作。苏共党员不能参加其他政党。

3. 苏共党员有义务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宣传党的主张，为实现党的纲领目标和保证在社会上的先锋队地位而斗争，在劳动集体和居民中间始终不渝地实行苏共的政治路线，执行党的决议，缴纳党费，在劳动中作出榜样，遵守法制和社会道德标准。

4. 接纳苏共党员根据申请者的申请按照个别吸收原则进行。接纳苏共党员的决议由基层党组织会议作出，并且是最终的。根据基层党组织的审议对申请加入苏共的人可以规定一年以下的预备期，以及由两名党员作介绍人。

苏共使用统一的党证，党员登记程序由苏共中央确定。

共产党员根据本人愿望并经基层组织同意，在工作地或居住地办理党员登记。

在党内积极工作不少于 30 年的苏共党员，经基层党组织决定，可授予“苏共老党员”荣誉称号。

如果党员因健康状况或年龄不能完全参加党的生活，根据本人申请，基层党组织有权免除其日常工作并免交党费。

5. 党员如因行为不符合苏共章程要求而被开除出苏共，基层党组织可根据自己提议或上级党的机关的建议，中止其苏共党籍。

党员如提出自愿退出苏共的申请,经基层党组织审议后,也可以中止党籍。

在接纳苏共党员或开除出党时,只要有在该组织登记的半数以上的共产党员投票赞成,决议即被视为有效。

对于违背党的纪律和公共道德准则的党员,可以采取提意见或警告形式的党内教育和感化措施。

被开除出党或受处分的人,有权向党的监察机构上诉。上诉自呈交之日起,审议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 二、党 内 民 主

6. 苏共生存和活动的基础是,思想的共同性和党内的同志关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将保证党内生活自我管理、党的利益同每个共产党员的利益相结合,保证普通党员的权利和自觉遵守纪律。

党内保证发表意见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各个组织范围内,在整个苏共中,可以对社会和党的生活的迫切问题进行讨论和全体投票。讨论和投票根据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倡议进行,也可根据党组织(其人数不少于有关组织党员人数的1/3)的要求进行。

7. 所有苏共组织,从基层组织开始,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它们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它们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并且在苏共章程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但有关人员问题的决议除外。在出现意见分歧时,任何一个机构为解决争执问题,有权通告基层党组织、直接通告共产党员或举行全体投票。

8. 党的组织和党的机构的工作建立在排除主观主义和独

揽大权的集体制和个人负责制原则基础上。

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是党的领导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须在有半数以上党组织成员或当选代表参加，而在总结工作和选举时须有不少于2/3党组织成员或当选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方能行使全权。党的领导机构选出执行机构（常委会、委员会）和监察机构（监察委员会）。

党的机构可以按工作的基本目的成立常设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和工作组，以及利用共产党员和其他公民参加这些委员会和工作组活动的其他形式。

9. 各级党组织、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工作公开，根据党的决议保证党的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会议的开放性，保证党的报刊人员参加这些会议，保证公布文件草案、速记记录、所通过的决定和其他材料。各级党委会、基层党组织经常向党员和上级党的机构通报自己的活动。党员有权出席自己基层组织支委会会议或党委会会议。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的成员可以自由参加应向他们汇报工作的机构的会议，还有权使用由党的机构及其机关掌管的文件。

10. 党的领导机构、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经选举产生。这些机构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投票名单上可以有任意数目的候选人。党员在选举时有权不受限制地提出候选人，其中包括提出自己作候选人。候选人必须获得参加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党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全会的半数以上党员的赞成票方可被认为当选。

参加区、市、自治专区、州、边疆区、共和国代表会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全苏党代表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由基层党组织提出候选人，通常按党的选区经共产

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党的委员会和监察机构参加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选举程序，由党的委员会根据相应的基层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决议来确定。

基层党组织有权对上级党的机构组成候选人提出建议，其建议由组成这些机构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讨论。各级党的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还可以通过由下级组织直接派遣代表的方法选举产生，下级组织有权召回自己的代表。

11. 区委一级和区委一级以上的党的经选举产生的机构成员被选举担任同一职务的连续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党员不能在两个以上党的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中兼职。党的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人员组成可以在其任期届满之前更新或者全部改选。根据党组织其人数不少于该组织的1/3成员的要求，或者根据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个别成员或全体成员关于自愿辞职的声明，来讨论上述问题。

各级党委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由这些机构的成员，在相应的会议、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或者按照代表们的意见在党委会和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同时选举产生。他们向相应的党委会和监察委员会汇报工作，在除党的机关组织外的任何一个党组织里登记。

12. 党委会和监察委员会向组成它们的党组织汇报工作。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向选举或推荐他们的党组织汇报自己的工作。

13. 在制定决议时，党组织及其机关应该考虑各种观点。多数人通过的决议所有人都必须执行。少数人有权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执行和监察机关的会议上、在党的舆论工具中捍卫自己的立场，提出补充报告，在记录中载明自己

的意见，要求在自己的组织或上级机关中重新审议争论的问题。

如果在党委会和监察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和主席团中产生分歧，应对决议草案进行重新讨论，并由不少于2/3的多数票通过。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会议的决议，党组织必须执行。党委会和常委会的决议在起草阶段应在相应的党组织内进行讨论，通过之后，必须执行。

14. 党的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在其行使全权时，可建立从属于它的工作机关，该机关主要是对它的活动进行情况分析、社会预测和咨询工作。党的工作机构根据基层党组织的推荐组成。劳动法也适用于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

15. 党的组织和党委会有权用自己的资金或与其他组织合资出版报纸、杂志、简报、宣传材料、参考材料和其他材料，有权成立相应的编辑部以及电视广播台。党的舆论工具是党组织和党委会的宣传工具，其领导人在党的相应的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党委会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党的中央舆论工具必须根据州、边疆区、共和国党组织的要求刊登它们的声明和呼吁书，而地方报刊应刊登基层党组织的有关文件。

### 三、党的组织结构

16. 苏共按照地区和生产特征组建。按共产党员的工作或居住地点成立并按地区联合起来的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党的结构还包括在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内联合起来的区、市、自治专区、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的党组织。

根据共产党员的倡议可成立党组织书记委员会、党的俱乐部、理论研讨会、辩论中心、老党员委员会和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其他形式的党员联合组织并进行活动。它们不是基层党组织，而是以苏共纲领性方针为基础讨论各种问题，并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提出建议和方案供任何一级党委会审议。

苏共内部不允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并不限制共产党员在辩论过程中在立场方面进行联合的权利。

### 党的基层组织

17. 基层党组织应在不少于三名苏共党员的情况下，由他们的会议作出的决议成立，并由相应的区党委和市党委予以登记。

基层党组织可在自己的组成范围内成立党小组和车间党组织。后者可根据基层党组织的决议在有关接纳苏共党员的问题上享有基层党组织的权利。

根据具体任务和自身活动的条件，基层党组织可自行决定接受入党和停止苏共党籍，确定自身的结构、工作方针和方法、举行党员大会的间隔时间和程序、政治行动、财政和经济活动问题，建立同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的相互关系。

基层党组织宣传和执行党的决议，在劳动集体中和地区内履行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职能，对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施加影响，维护社会公正。

基层党组织有权在筹备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党委会全体会议期间制定文件草案，表达自己对党的任何机构的决议的态度，并且后者应作出实质性回答。基层党组织可提议从任何一级党的机构中召回由其登记或由其推荐到该机构的

共产党员。

18. 为进行日常工作,基层党组织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每二至三年选举一次党的支委会(委员会)及其书记,以及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选举监察(检查)委员会。共产党员人数少于15人的党组织根据党员大会规定的期限和程序选举党组织书记和副书记,在党小组中选举党小组长。

### **区、市、自治专区、州、边疆区 和自治共和国的党组织**

19. 直接联合着基层党组织的区和市党组织是党的结构的支撑环节。

区、市党代表会议每五年选举一次区、市党委会以及监察委员会。根据党委会决议、相应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或根据党组织(其人数不少于该组织党员人数的1/3)的要求,可召开非例行的党代表会议。

区、市党委会考虑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召开全体会议选举区委和市委的常委会。

党的区委和市委负责党员登记,协调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同它们一起安排在劳动集体中和公民居住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工作,把社会经济、文化等具体问题提交公众和政权机关讨论,并协助实施这些政策和决议。

20. 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专区的党组织在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专区范围内开展执行党的政策方面的工作,保证它们所作出的决议和上级党机构的决定的执行。

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专区的党代表会议每五年选举一次相应的党委会以及监察委员会。按照党委会的决定和监察委员会的建议或应党组织(其人数不少于该组织党员

总数的 1/3) 的要求, 召开非例行的代表会议。

根据需要召开的代表会议以及党委会全体会议, 考虑到党组织的意见, 制订解决本地区的政治、民族、社会、经济、生态、文化、道德问题的计划并提交国家政权机关和居民讨论。在上述代表会议和全体会议上讨论党内生活、干部工作、党组织预算、出版工作问题。

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专区的党委会在全会上选举常委会, 自行确定本组织的结构, 在苏共党员登记的问题上授予最大的基层党组织以区党委会的权利。

21. 区、市、自治专区、州和边疆区、自治共和国的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选举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监察委员会监督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解决有关共产党员遵守党纪和社会道德准则的问题, 维护党员的名誉和尊严, 审理党员的申诉, 追究压制批评和滥用职权的人的责任, 检查党的机关的预算执行情况和经济活动。监察委员会向选举它的机关汇报工作, 根据区、市、自治专区、州、边疆区或自治共和国党代表会议批准的章程独立进行工作。

###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

22.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它们根据苏共基本的纲领和章程原则制定自己的纲领性和准则性文件, 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出版、财政经济和其他问题, 在国家建设、共和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奉行党的路线。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可与其他(包括国外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建立联系。

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涉及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原则性决议应在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参加下进行讨论。如果不同意所作出的决议,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



权不执行这一决议并要求召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或者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 **苏联武装力量中的党组织**

23. 苏联武装力量党组织的活动根据苏共章程和苏共中央批准的全军党代表会议呈请的文件进行。

苏联武装力量中党的工作通过基层党组织和选举产生的党的机关进行。基层党组织和选举产生的党的机关通过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对军人集体的生活和活动产生影响，同军事委员会、指挥员、军事政治机关和有关的地区党组织密切协作进行工作。苏联武装力量的党的最高机关是全军党代表会议，全军党代表会议选出党委会。

武装力量的共产党员可以选举地区党组织经选举产生的机关成员，也可以被选为这种机关的成员。出席区、市、自治专区、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党代表会议以及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部队和军团的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按照地区党委会确定的代表名额选举产生。

陆海军党组织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全苏和全军党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根据苏共章程进行。

附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卫部队和铁道兵部队中党的工作的安排与武装力量类同。

### **苏共的最高机关和中央机关**

24. 苏联共产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例行代表大会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每五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关于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议程和代表名额的决议最迟应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宣布。中央委员会要公布提交代表大会的

主要问题的文件草案。

苏共的非例行(非常)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提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议或联合党员人数不少于党员总数1/3的党组织以及三个以上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中央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应在两个月期限内召开,只有多数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方可认为代表大会拥有全权。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召开非例行(非常)代表大会,要求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组织可以成立组织委员会,并享有党中央召开非例行(非常)代表大会的权利。

#### 25. 苏共代表大会:

——听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工作汇报和报告,通过决定并对这些委员会和个人的工作作出评价;

——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修订党的纲领和章程;

——确定苏共在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路线;

——选举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副书记,同时选举他们为苏共中央委员;

——选举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举他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26.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苏共中央委员会可以召开苏共全苏代表会议讨论党的政策和实际工作的迫切问题。

代表大会有权听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汇报,部分改选(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达1/3)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在苏共纲领性文件范围内通过党所必须执行的其他决议,修改党的章程。

27. 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苏共中央委员会：  
——组织实施苏共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  
——制订有关对内对外政策内容的建议并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指导全联盟代表机关中的苏共党团（共产党党团）的活动；  
——制定和执行苏共的干部政策；  
——建立党的机关和企业并监督它们的活动；  
——与国内社会政治组织相互协作，在同外国党的关系中代表苏联共产党。

28. 为了解决两次全会之间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央委员会选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人员组成由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苏共中央总书记、副总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由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

苏共中央政治局以自己的名义向党组织发出决议。有关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决议，政治局应提交基层党组织讨论并随后由苏共中央全会批准。

中央政治局每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选举由苏共中央副总书记领导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在党内安排执行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指导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

29. 在苏共中央，成立有关中央工作的各主要方面的常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由中央委员以及被批准作为顾问的其他共产党员组成。委员会由苏共中央书记领导。

30.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苏共章程

和党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它在自己的全会上选出主席团。

31. 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年至少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必要时应举行联席会议。

苏共中央委员可以参加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可以参加苏共中央全会，但只有发言权。

党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四、苏维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

32. 党组织和党委会不能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职能，而要通过在这些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推行党的政治路线。

33. 苏共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自由选举和苏联公民表达意志的其他形式，争取在社会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党组织制定和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推荐共产党员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帮助他们组织竞选活动。

党组织可以同其他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宪法进行活动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达成竞选协议，支持它们提出的非苏共党员代表候选人。

34. 在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会议上，被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共产党员可在苏维埃任期内结成党团（共产党党团），以协调自己的活动，贯彻选民的意志和指示。不允许共产党员在苏维埃内建立独立于党的领导机关之外的，但又以苏共名义活动的团体或派别。

党团（共产党党团）要同相应的党委会协调行动，取得它们的帮助和支持，考虑它们的决定和建议。

为了处理日常工作，党团可以选举常委会或主席。

35. 党同坚持民主和社会公正立场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党在政治协作与合作以及尊重其他观点的基础上，同工会、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建立自己的关系。

在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可以按类似苏维埃内的党团建立党团（共产党党团）。

36. 党的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在做青年工作时依靠共青团，并同其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青年组织合作，大力帮助这些组织开展活动，吸收它们参与制定和实施苏共的青年政策。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按政治合作、思想一致、承认共青团组织的独立性、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原则建立相互关系。党认为共青团是补充自己队伍的最亲近的后备力量。

共青团组织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成员有权参加相应的党委会讨论青年政策问题。

37. 基层党组织和党委会可以把党员和非党人士推荐到国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具体部门。基层党组织和党委会以政治方式开展活动，促成选举或者任命他们担任适当的职务，给他们以帮助，听取共产党员的工作汇报，并要把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结论和建议公开。

## 五、苏共的资金和财产

38. 苏共及其各级组织活动所需的财政和物质技术资源靠党的收入来保证。

苏共的资金是由党费，出版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共产党员和公民的自愿捐款以及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其他收入构成。

党员每月缴纳党费的数额规定如下：

月收入 70 卢布以下——10 戈比

71 至 1 00 卢布——20 戈比

101 至 150 卢布——30 戈比

151 至 250 卢布——1/100

250 卢布以上——2/100。

退休后继续工作的党员分别从退休金和工资中缴纳党费。

39. 苏共的预算、预算结构、苏共预算从地方党组织收入中的提成数额和给它们补贴的数额以及党的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由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并向共产党员通报。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其他监察机关的经费由有关常委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确定。

各级党组织在支配自己的预算方面，在解决结构、编制和生产经营问题方面，在创办、改组和撤销定期出版物方面享有自主权。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由常委会全体会议批准。对党委会的赢利性经营活动给以鼓励，但不得违背政治工作利益。

40. 苏共财产是全党的财富。属于苏共所有权的项目包括：楼房、建筑物、设备、器材、文化教育和医疗财产、货币资金、企业、党的出版社及其所属的定期出版物和印刷厂，以及党的活动所需要的其他财产。

各级常委会应对党组织的财产进行有效管理（持有、利用、支配）。苏共中央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地方各级常委会以及苏共所属企业、机关和组织享有法人的权利，可以将这些权利授予自己的分支部门。根据现行立法，基层党组织可以享有法人的权利。

可将党费总额的50%以内的资金用于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为了解决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以及货币资金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区委、市委和享有区委权利的党委会内成立有基层党组织书记参加的财政委员会。

各级地方党委会和监察委员会每年应向党员通报党的预算和资金开支情况。

#### 附 录

依照苏共章程，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制订和批准下列标准方法文件：

关于苏共选举和召回经选举产生的机构成员的程序的条例；

关于苏共党员登记和党的统计工作的条例；

关于党组织和委员会的公文处理条例；

关于党费核算和党组织财政经济活动的条例；

关于苏联武装力量中党组织工作条例；

关于基层党组织书记地位的规定；

关于苏共老党员的规定；

关于进行党内全体投票和讨论的规定。

(译自1990年7月18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苏共在教育、科学和文化 领域政策的决议

(1990年7月12日通过)

改革的年代是克服意识形态教条和行政命令、注重精神遗产、同国际实际协作的时期。

但是，所出现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和互相矛盾的。国家和苏共在对待精神领域的态度上还没有克服剩余原则。党的领导在实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发展科学和文化计划方面没有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国民教育和国家许多文化科学中心处于艰难的状态。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虚无主义、消极冷漠和对党不信任的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大众文化”对青年的有害袭击、精神生活的商业化和人才外流具有特别的危险性。

代表大会声明，精神领域的严重状况、居民文化和教育水平很低以及科学成果未被运用是对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和我国前途的威胁。国家智力和精神的振兴应该提到苏共工作的首位。对这些问题估计不足是不能容许的。

党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必须采取向社会开放的和为社会所接受的政策，这种政策应以承认优先考虑全人类价值观为基础。



代表大会认为，苏共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原则是：

——确定教育的人道主义使命，肯定教育在改善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状况方面的首要意义；

——教育作为生活方式的有机部分具有连续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条件；建立提高干部技能和进修的有效体系，其方针在于使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改进和使劳动使用领域发生积极变化；

——享有根据个人的愿望和能力自由选择职业和专业的实际权利；通过建立不同类型学校和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为使青年享受完全合乎要求的教育创造条件；

——根据社会的长期需求，以及我国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来确定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结构和内容；

——根据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进程对儿童、中小学生和青年大学生的公民品德教育和体育教育进行改革，提高家庭在教育问题方面的作用；

——实行教育民主化，扩大学校的自主性，发展教育领域中的国际协作；

实行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文科学化，加强学校教学与民族文化起源、本国的和世界的社会思想成果的联系，克服文化、科学和教育之间的脱节现象；

——保证对国民教育提供法律保护和经济保护，对教师、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建立社会保证，提高教师职业的威信，关心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关心对教学工作的应有报酬。

科学领域：

——提高科学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并提高科学劳动的

威信；发展各科学学派的竞赛和竞争；从管理的过分集中和命令主义向国家社会调节革新进程的灵活体制过渡；

——提高基础科学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的作用，认为它们是社会团结的因素；苏联科学同世界科学一体化，广泛推广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分工；

——把科学创造的自由同学者对实施科研成果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态后果所负的道义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基础上使科学技术活动和生产活动联系的经济管理机制多样化；学术单位在解决它们活动的内部问题时具有自主性；

——完善培养和提拔科研干部的制度；劳动报酬与研究工作的结果挂钩；

——改革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同时大大扩大人文科学发展的基础；

——苏共直接支持发展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鼓励对理论问题进行科学探讨，包括对社会主义革新问题、党的发展问题以及在社会和国家的民主化、多元化、多党制条件下党的活动问题的科学探讨。

文化领域：

——克服文化领域中的主管部门和组织的垄断权，国家确保人民能够享受文化；在立法基础上完善国家和社会对文化领域的管理和对文化界人士的保护；

——尊重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文化的独特性和平等，扩大和完善各族人民文化的自由协作和相互丰富，为民族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

——实行创作自由，鼓励天才，让各种文化流派、风格、学派自由竞争发展；

——苏联多民族文化向保证我国完全投入现代世界精神生活的人道思想和价值观开放。

代表大会委托新当选的苏共中央委员会：

——以苏共名义提出全面解决有关最充分利用和进一步发展我国智能潜力和加强今后几年精神领域财政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由国家预算追加专项投资，对教育、科学、文化机关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合作社、基金会组织实行鼓励它们给精神领域财政提成的税收政策；应制订和实施国家发展国民教育的长期计划；

——积极促进拟订和实施教育和科学领域的重大计划；积极促进智能潜力的增强和精神领域的发展。为此要利用苏共教育和科学机关、社会政治中心的潜力和物质基础；

——为保护苏联人民的道德品质不受低级趣味、暴力、残忍宣传的影响，倡议通过苏联保护道德法，其中规定对外国的电视和电影产品输入我国进行有效的管制，但是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国际义务；

——成立苏共中央文化、教育和科学委员会，目的是分析情况和拟订有关党组织在精神领域中进行活动的内容和方法的建议。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市场 关系过渡的政策决议

(1990年7月12日通过)

代表大会以焦虑的心情指出,国民经济情况恶化,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生产结构改革缓慢,居民必需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落后于货币收入的增长,工时和物资的损耗依然很大,经济仍然没有采用科技进步的现代成果。危机现象的集中表现是消费市场的解体,这不仅产生了社会后果,而且产生了政治后果,使群众失去了对改革的信任。

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扭曲,劳动者脱离所有权和管理,存在平均主义和依赖心理,对劳动成果实行垄断并缺乏市场评价,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以及地方上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受到干扰。国民经济的失调、社会难以承受的损耗和支出、经营中的消耗机制的存在、根本性改革进展迟缓且有失误,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着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和制定社会经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时,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立场。有人极力向社会建议:要么恢复基于经济生活全盘国有化的旧的硬性行政分配经营模式,要么立即实行一切生产资料非国有化,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

的调节。代表大会认为，这两种解决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两种办法都违反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国际惯例，会使不可剥夺的人权受到限制，不能建立起高效的经济体制。

代表大会强调，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选择，认为向市场关系过渡应该是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改善国民经济状况的主要内容。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能鼓励人们进行生产效率高的、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一种保持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利关系的有效机制，消除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和排队现象，杜绝投机倒把和影子经济的其他表现。

为实现这项任务，苏共将实行保障有效就业、防止广大居民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的政策。同时，党认为有必要及早制定并实施社会补偿制度，首先对投入最少的居民阶层实施社会补偿制度。

代表大会强调，在新的条件下，社会消费基金应该保证维持有保障的最低退休金、住房、卫生和教育、文化与科学的基本需要，促进社会智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代表大会赞成建立有效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应保障不从事剥削人的各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法律平等和竞争。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成为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

代表大会坚决主张，在修改后的联盟条约基础上，在遵守各共和国经济平等和主权的情况下发展统一的全苏市场。

代表大会赞同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制定明确的、考虑周密的、人民可以理解的分阶段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的决议，其中包括稳定国家社会

经济形势的紧急措施。

代表大会认为，广泛开展解释工作以使社会作好接受市场关系的准备，是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委会的政治和组织活动应使社会深刻认识到，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其他选择，过渡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提高劳动效率、使人民生活达到全新水平、加强自由和民主、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完整的手段。

大会代表呼吁共产党员在社会上支持一切能提高生产效率、为劳动人民利益而进一步发扬主动性和进取精神的创举。

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恢复苏维埃充分权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实现党的经济政策，树立新的经济思维，协助培养有能力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工作的干部。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苏共舆论工具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党的报刊在推进革新、民主化进程中，在确定公开性为我们生活准则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新闻工作者的倡议，党和国家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制定了十分必要的政府纲领。

但是，党的报刊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并非在所有方面都符合社会发生的变化，而是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丧失了战斗性，有时在猖獗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改革势力面前丧失原则。

中央和地方的党的某些出版物面对新问题和复杂情况束手无策。党报和党刊的版面有时被用来宣传与苏共格格不入的观点，刊登歪曲苏维埃国家历史，歪曲党和人民为我国的独立和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材料。对那些侵害人民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侵害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不尊重苏联军队和执法机关的人没有给予应有的反击。

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苏共解释和实施自己的政策的可能性。党报是实现党和社会的革新与团结的一个集体组织者，然而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削弱。

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党的中央出版物迄今仍然没有对这些现象作出应有的评价。

1.代表大会认为，在出现多党制的情况下，共产党要求报

刊做到：

——捍卫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苏维埃的权力、在社会主义选择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化以及法制国家的形成；

——客观地反映改革进程、社会发展的革新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寄生生活和小集团利己主义；

——促进党内生活的改革和始终如一的民主化，在自己的版面上反映苏共内部的各种思潮，包括少数派的立场，反映解决社会问题的多种多样的态度，同时要认真分析这些思潮和态度的实质；

——有原则性地、强烈地反对社会和国家内，特别是党内的消极现象，为共产党员的道德纯洁而斗争；

——捍卫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党的企图。不允许以党员自诩的某些新闻工作者企图把党的出版物变成从左右两方面同苏共对抗的势力的工具。

2. 代表大会希望，苏联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同社会运动和组织在合同关系基础上安排自己的工作。主张就苏共面临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政策问题开播定期的电视节目。

代表大会支持在必要时创办舆论工具——苏共区委、市委、州委、边疆区委的机关报。

3. 代表大会建议在编辑出版事业中更充分地采用企业法规定的新的经营方式，大大扩大党的出版物的广告商业活动，更大胆地采用合同制。党打算依据法律规定的准则，同在党的印刷厂出版的一切非党出版物建立经济关系。

苏共不追求特殊的法律保护和经济保护，但也反对使党丧失自己的出版基地的要求。

4. 代表大会提出了大大扩大党委会和舆论工具的日常工作



触并使其制度化的任务。在党委及其报刊的关系中不允许采取武断做法和官僚命令主义。这种关系应该建立在政治上协作和创作上合作的基础上。党委会，首先是苏共中央，应当特别关心培养高度熟练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关心他们的报酬以及劳动和生活条件。

为了克服编辑委员会职业上的封闭状态，加强公众对党的报刊工作的影响，必要时，在党委会组建的编辑委员会中除了编辑部工作人员外，还要吸收有威望的劳动者、经济工作者、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参加。这种人员构成能够更内行地和更正确地确定自己的办报方针。

在目前条件下，党的报刊应当彻底地放弃僵化、命令和教训人的腔调。党的声音能够听到并且深入人心，并不是因为使用了威严的腔调，而是因为论据具有说服力，符合人们关心的事和愿望。

苏共及其机构同新闻工作者的新关系，是建立在尊重新闻出版法的基础上的关系。对社会的、工会的或者青年的出版物的影响不是通过发指示，而是通过威望的力量来实现。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苏共青年政策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青年的积极立场和社会自我感觉在很多方面决定着国家政局。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加快制定和切实执行卓有成效的完整的对正在成长的一代的政策。这种政策应保障为全面发展青年人的个性、实现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为他们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经济活动创造实际条件和激励因素。

1. 苏共青年政策的重点。代表大会认为，党的青年政策应通过下列方式来实现，即国家机关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时应有党组织和党员参与，还要由他们直接做青年工作。这项政策的基础是：充分信任青年一代，尊重青年人和青年组织进行独立自主的政治活动的权利，不干涉他们的事务。

苏共主张同青年进行广泛对话，同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一切青年组织和运动合作，并准备支持以团结社会力量为目的的青年团体。代表大会主张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共同努力解决青年问题。

苏共将以其在青年中间的积极活动来赢得青年对党的行动纲领的支持，为新鲜力量加入党的队伍创造条件，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给他们以实际帮助，从而为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

各个领域的年轻化创造前提。

苏共主张优先发展教育和文化领域，主张在青年中间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全人类价值观，在男女青年中形成以深刻掌握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以准备捍卫祖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和公民素质。发展和加强家庭的道德基础，提高家庭对教育成长的一代的贡献，应当成为社会教育的基础。

代表大会认为，成立苏共中央党的青年政策委员会和地方党的青年政策委员会是适宜的。

2. 实施苏共青年政策的机制。代表大会主张国家在村镇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个级别上，考虑到地区和民族特点形成制定和实施青年政策的有效社会、经济、法律机制，主张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成立处理青年问题的结构。重要的是，青年本身积极参加制定和实施青年政策，然而，在这方面不应当把国家对青年一代的义务转嫁给共青团和其他青年组织。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尽快通过苏联的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青年政策普遍原则法，制定有关青年的标准和社会指标，把有关青年的专门部分列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3. 解决青年的社会问题。代表大会支持青年关于加快制定和实施下述全苏的、各共和国的和各地区的纲要的要求：青年一代身心发展纲要，保障和维护儿童权利纲要，青年就业和劳动培训纲要，残疾青年社会康复纲要，扩大儿童商品和青年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纲要，考虑青年需要的住房建设纲要，支持青年家庭纲要，发现和发挥青年天才纲要，发展同各国青年联系的纲要，开展青年企业家活动纲要。这些纲要必须由联盟

预算和地方预算提供专项资金。青年公民和青年家庭应该利用补助金、优惠贷款来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现代职业培训问题和受教育问题，其中包括到国外学习问题。代表们赞同共青团关于建立向青年提供社会援助制度的倡议。代表们认为，这个制度可以成为广泛的社会和国家社会福利服务的组成部分。必须以人道主义精神处理青年履行法律责任问题，积极同他们中间的酗酒和吸毒现象作斗争。

在青年走向生活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社会应当帮助青年，为此应有必要的法律保证。

代表大会代表赞成建立苏联总统青年基金，在最重要的方面实施总统青年计划，并责成苏共中央研究有关参加这一基金的问题。

4. 苏共与苏联共青团的相互关系。苏共把苏联共青团看作是自己的政治同盟军，在思想上靠拢党的、能帮助党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纲领的组织。

代表大会支持苏联共青团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确认的、积极参加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愿望，用改革的思想团结青年运动的愿望，与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的组织结成联盟的愿望，以及与一切民主运动和民主组织发展对话和合作的愿望。

苏共将帮助共青团成为政治进程中有充分权利的和有威望的参加者，帮助它扩大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权利和机会。苏共将与苏联青年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苏联共青团在同志般合作和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关系。苏共关心共青团直接参加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政策。

苏共代表大会支持共青团旨在对共青团进行组织政治革新、为共青团的自身发展和完善工作方式与方法创造条件而

采取的实际措施。这种工作方式与方法应符合青年的特点和情绪。苏共只有从这个反映和维护青年利益的，并有青年共产党员在其中积极工作的、独立的、民主的和开放的组织中，才能为自己的革新吸取力量。

党将在教育和重新培训干部、加强和发展青年团的物质基础、出版报纸和杂志、利用舆论工具和做男女青年工作的其他条件方面给予共青团以必要的帮助。组织出版面对各阶层青年的党的报纸和杂志是适宜的。

苏共赞成儿童运动民主化，支持必须对全苏列宁少年先锋队组织进行革新。少年先锋队应成为真正有助于发展个性，参加社会创造和艺术创作，造就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的组织。党将利用国家权力机关维护儿童的利益，关心加强和发展儿童工作的物质基础。

代表大会认为，在苏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席全会上以及在地方党委和团委联席全会上讨论青年工作问题是合适的。

\*                         \*                         \*

苏共坚信，在祖国历史上复杂的转折时期，在我们党内和人民当中存在的一切富有创造性的、生气勃勃的、进步的事物，必将得到苏联青年和列宁共青团的积极支持。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 消除事故后果工作情况的 政治评价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我们出席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深切了解和同情数以百万计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人们因切尔诺贝利事故而遭受的痛苦，认为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不幸。

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国家前领导人在制定核能和在非常情况下保护居民的科学技术政策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苏联动力和电力化部、中型机器制造部、卫生部、国家水文气象委员会、国家原子动力安全操作监督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和苏联民防部门没能确保居民的生命与健康，对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毫无准备。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已呈送苏联检察院审查。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有关党员对党所负的责任问题。

由于参加设计、建设和使用核电站的一些主要科学家、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过于自信和不负责任，断言核电站绝对安全，结果实际上没有建立起应付紧急情况的国家工作制度。

苏共代表大会指出，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乌

克兰共产党中央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和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没有及时估计灾难的规模、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没有采取坚决行动来作出和实施国家对居民在辐射污染区安全居住的规定。

这一切动摇了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对苏共中央和政府的信任，降低了它们的威信。

在遭受灾害的地区，社会紧张气氛在加剧。对切尔诺贝利不幸事件毫无理由地长期保守秘密，作出的评价特别是医疗方面评价的自相矛盾，以及缺乏客观的、居民可以获悉的有关事实真相的消息，都促使紧张气氛日益加剧。

代表大会承认，对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后果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不够的。

代表大会主张：

——共产党员领导人应对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有关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的全联盟和共和国计划的工作负有特殊责任；

——保护居住在遭到放射性污染地区的居民健康的一切措施应立即实施，将人们迁出危险地区，要特别关怀儿童和所有在消除切尔诺贝利不幸事件的后果的过程中遭受灾难的公民，包括现役军人。

代表大会号召各级苏维埃人民代表、劳动集体、社会组织和运动最大限度地关心遭受灾难地区的居民，最大限度地关心为他们创造应有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解决医疗、商业和公用服务问题。

代表大会委托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从党的预算中拨出专款5亿卢布用于实施污染地区儿童保健措施。

我们请求我国社会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直接参与解决与

切尔诺贝利灾难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提供实际援助以减轻灾难的后果。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民主的民族政策是通向 自愿联盟、各族人民之间和 睦与和谐的途径的决议

(1990年7月13日通过)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我国各族人民的联盟正经受着严重的危机。苏联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得不到解决给已经开始的民主进程造成了现实威胁，紧张程度的进一步升级有使社会遭到瓦解，使世界局势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威胁。

已经形成的形势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列宁主义的民族关系模式要求建立以各族人民自由的自决为基础的国家的自愿联盟。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但是，苏联的实际形成是根据斯大林建立单一制国家的认识而实现的。曾发生过强制取消国家体制，驱逐出境，包括驱逐整个民族的情况，忽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其结果是许多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他们的独特的文化发生退化，相互埋怨和指责。然而，在党的文件和宣传中却提出了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口号。

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革新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具有民族复兴和民族运动的自然形式。这些运动的民主力量反映了各族公

民向往自决和自治、改善社会生活条件、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合理愿望。这些运动是对官僚主义集中制，对它不重视社会生活民族形式的自身价值作出的反应。

但是，对历史不公正事件的记忆、对民主改革速度的不满、生活水平的下降、权力结构的危机、罪恶地利用民族感情为小团体利益和自私利益服务——这一切现象为激化族际矛盾和离心倾向提供了基础。

民族冲突已经导致了人员伤亡和几十万难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政治和物质损失，严重地损害了民主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如果经济形势得不到改善，区、州、共和国和整个地区不能实现真正的自治，如果在民族运动中仍保持偏执的立场，如果民族沙文主义的极端情绪得不到制止，那么等待我国数以千万计的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将是更严重的动荡和悲惨时代。

代表大会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特别是最近对事态和某些尖锐问题的状况表现出关注，探索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同时，苏共中央和党的最高领导未能及时估计到在民族政策方面扭曲和矛盾的深度，没有及时预见到这些扭曲和矛盾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没有及时克服教条主义，先于事态的发展制定出原则性新立场。许多党委会对领导革命性变革缺乏准备，对寻求民族地区解决问题和消除冲突的特殊途径和方法没有准备。不少共产党员经不起族际主义的考验，屈服于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不善于提出论据来说明跟着民族纠纷挑拨者的口号跑是危险的。在许多共和国，政治主动权交给了民族社会运动。在民族社会运动中民主原则往往同其首领的政治野心交织在一起。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摆脱当前局势的出路在

于,要明确指出业已形成的现实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这方面的政治战略。

无条件地承认每个民族和个人在自由民主选择基础上的自决权应当成为这一战略的基础。

要使人民拥护党的新的民族政策,支持我们的纲领和纲领性声明,就需要进行具体工作来解决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问题。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平,恢复对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尊重态度,恢复公民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和睦关系等方面,经常不断地扩大成果,哪怕是一点一点地扩大。

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应当特别关心少数民族的命运和过去失去自己地位和历史故乡的人的命运。在这方面需要采取经济、法律和生态性质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保持经营管理的传统形式,同时又能扩大运用现代文明成果的可能性,为使用土地及其资源,运用经济活动成果创造特殊条件。

代表大会主张切实执行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关于恢复被镇压和被驱逐出境的民族的权利的决议。这些决议应当为居住在该地区的各族人民所接受,要有联盟机关、共和国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具体规划来充实。这样就能实际上表现出真正的族际主义和人道。这些规划的实施要在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进行。对难民问题今天也要求采取具体的和刻不容缓的措施。

就全国而言,有几千万名不同民族的公民是混杂在一起生活的。正是他们常常成为族际冲突、仓促的和考虑不周的修改现行民族国家体制的行动的牺牲品。

中央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在使用政治方法和立法动议权的时候,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主权原则的实施包括

捍卫所有公民的权利，包括共和国、边疆区、州和民族专区的自治形式和文化自治纲领，而这些形式和纲领应能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

最近通过的全联盟的和共和国的立法文件为解决起草和缔结新的联盟条约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创造了必要前提。代表大会认为，主权国家联盟的思想应该成为这一条约的基础。主权国家联盟思想的基础是：所有缔约各方实际平等、明文确定条约参加者的地位、划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在它们之间实行多种形式的联系、自愿和互利。在这一进程中，所有民族国家实体，包括自治实体，都应该成为平等的参加者。

苏联从单一制国家变成真正的各民族大家庭要求作出经过周密考虑的决定和采取负责的行动。这一改变过程不可能是瞬息之间完成的，因为这关系到亿万人和许多民族的命运和历史选择。代表大会认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全联盟的政权机关和共和国的政权机关，还是所有社会政治运动和力量，都应该表现出理智和克制，不采取可能导致新冲突和使局势不稳定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共和国同中央一道应当对组织和保证公民社会和民族生活的基础负责，求教于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睦邻和缔造和平的经验。代表大会谴责解决民族问题时的任何暴力形式，认为政治手段和宪法准则是解决所有冲突形势的唯一途径。

共产党员有义务反对民族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代表大会坚决谴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仇俄情绪、反犹太主义、宣传和实际运用民族偏执情绪和民族歧视，要求国家尊重和捍卫公民的民族尊严。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意识到自己对所通过的决议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份量。在痛苦中诞生的人道的和公正的

社会有义务保证民族间的和平与和睦。否则，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就没有前途，就不值得信任。只有我国各民族齐心协力，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质的革新，我们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译自 1990 年 7 月 1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代表提出委托的决定

(1990年7月13日通过)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家和党的转折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关于苏共中央报告的决议、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共章程等文件，为党的团结、党在革新的社会中达到崭新的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个最艰巨、最重要的阶段——实现所通过的决议已经开始。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委托自己的代表在党组织、劳动集体、舆论工具中积极阐明和宣传代表大会决议。

揭示代表大会文件对党的命运、国家政局的稳定的重要意义。

直接参加地方上的组织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改革，在制定和实施有关执行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具体措施方面，给本选区的常委会和基层组织以有效帮助。

作党内认真讨论苏共未来纲领内容提案的倡议者和组织者。这个纲领应当符合时代的召唤和党在日益变化的政治体制中的新地位。

苏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

央、边疆区委、州委、自治专区区委、市委和区委要规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党委的有关全会和委员会工作，参加坚定不移地和始终如一地执行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实际工作。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起草新的苏共纲领的决定

(1990年7月13日通过)

1. 成立新的苏共纲领起草委员会。<sup>①</sup>

2. 该委员会和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广泛吸收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工人和农民、党的科研机构、苏联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学者和专家参加起草和讨论纲领的工作。

3. 该委员会应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基础上,起草未来的纲领草案并于1991年上半年公布草案供党内讨论。

4. 全党讨论结束后,不迟于1992年上半年在全苏党的代表会议或党的代表大会上审议新的苏共纲领。

(译自1990年7月14日苏联《真理报》)

---

<sup>①</sup> 委员会名单略。——译者



# 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1990年7月13日批准)

1.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目的在于让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及其全体工作人员。委员会遵循苏共章程和本条例，它的活动是独立的，并向苏共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汇报工作。

## 2.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监督苏共纲领性文件和苏共章程、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工作中对人道主义、集体领导制、公开性等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如果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决议不符合党纲和党章条款、现行法律，则对这些决议提出异议；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党内政治的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滥用职权；

——加强党的队伍和党的集体的团结，促进基层党组织威信和自主性的提高，捍卫共产党员的权利，监督党组织和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使少数人坚持自己立场的权利不受侵犯，使全体共产党员执行所通过的决议；

——监督苏共预算的执行情况，检查苏共中央及其机关、报刊、出版社和企业的财政经济活动；

——检查苏共中央及其执行机关和工作人员、下属各机

构和企业是否遵循所规定的处理党组织申诉、信函和声明的程序；

——研究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向它提出的申诉，提出建议来克服业已查明的缺点，要求进行解释，根据苏共章程追究任何以自己的行动破坏党的威信的共产党员的责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开除出党的决定将下达到有关基层党组织，如有异议，将邀请该党组织代表参加重新审议，之后即认为通过。

审议对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相应的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出党和处分的决定提出的上诉；

——指导帮助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监察委员会，自治共和国党组织，边疆区、州、自治专区、市和区党组织，分析党的监督的实际情况。

3.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由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经选举产生。当选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共产党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需要召开，但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也可以应中央监察委员会 1/3 委员的要求召开。

4.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全会上从自己的委员中选举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其中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批准为顾问的共产党员组成各常设委员会、监察小组及其他机构，确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所设立的机构的权限。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每年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汇报一次工作。

5.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苏共中央全会和各委员会的

工作,并拥有发言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

6.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具有公开性,系统地向党组织通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它所通过的决定在党的报刊上公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定期在党组织中汇报工作。

7.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依靠党的预算资金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并确保自己工作的物质技术供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经费在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确定。

8.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之间出现的分歧,由在对等原则上建立的协调委员会解决,也可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全会和会议上解决。如果在分别表决时有不少于 2/3 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投赞成票,联合决议即认为通过。

9.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属于它处理的问题通过决定,根据检查结果行成文件并通报苏共中央和被检查机构和企业的领导人,后者应当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汇报所采取的措施。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使用党的一切文件。

(译自 1990 年 7 月 19 日苏联《真理报》)

#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1990年7月13日)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议事日程已经全部结束，最后我来讲几句话。

现在，看来还很难充分估计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对党内和社会事件的进程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一影响将是重大的和长远的。代表大会为党通过了哪些方针呢？代表大会向社会发出了哪些信号呢？

首先是，苏共决心克服当前仍然存在的党组织、党委会脱离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决心同我国劳动集体建立密切的经常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先锋作用，为实现我们革命改革的目的作出更大的贡献。党的这一决心将根本改变对待苏维埃的态度，彻底摒弃取代其活动的做法，大力促进苏维埃的成长，帮助人民代表解决满足居民各种迫切需要的问題。

代表大会表示，党愿意面向其他社会政治运动和组织。现在我们就应当用实际行动证明，在关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宣布的为克服危机和实现深刻改革而进行广泛联合的主张，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提出来的重大建议。提出这样的主张是不容易的，在我看来，领会贯

彻这一主张更加不容易，但是我们作出了选择。我认为，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和非常必要的，是由改革进程本身提出来的。我们向所有坚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人伸出手，并且呼吁他们进行合作。

我们的代表大会还向社会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为使党摆脱危机，代表大会采取了极其重要的措施。我们诚实地揭露了错误，坚决谴责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犯下的种种罪行，抛弃了所有束缚我国人民创造力的东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断然否定了抹煞几代共产党人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有益工作的企图。（掌声）那些要求党忏悔，要跟党算帐，甚至要宣布党为犯罪组织的人，不过是企图把党从政治生活中抹掉，并以此来打击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革新事业。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没有别的看法。简单地说，我们奉劝使用这类手法的人停止这种反民主的和教唆性的活动。同志们，共产党员应当抛弃各种复杂心理，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掌声）苏共怎样行动，人民就会怎样评价它。（掌声）

这些天，代表们在这里广泛而详细地谈了改革下一步应当怎样搞，首先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终于认识了根本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发展农村、解决食品问题、起草和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改善消费市场状况、彻底进行经济改革、加强纪律和秩序。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应当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掌声）

从自己方面说，我想请大家相信，我将为达到这些目标而运用苏联总统的一切宪法权力。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改革！（掌声）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有许多重要任务。我想借这个讲台对西方国家领导人声明他们不再把苏联看成敌人，并向苏联伸出友谊与合作之手表示满意。老实讲，实际上是我们先伸出

了手，但我们不去争论在这件事上是谁先采取了主动。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了。（掌声）

不久之前西方七国领导人在休斯敦举行了会晤，讨论了可能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持什么立场呢？这一援助问题不仅是舆论界，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政府提出来的，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我们希望克服自我孤立、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愿望正得到积极的反应。我们愿意进行合作并对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我们不是乞讨者，而是伙伴，是不想白拿别人任何东西的伙伴。同时我想强调指出，进行这种合作是不能提出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能够而且只应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掌声）

现在谈谈党本身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把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传达给共产党员，帮助他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党已经进入了根本改革时期。下面我来谈谈党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和在实际上获得先锋队地位的三个条件。

第一，党应该在新党章和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的基础上坚决地和毫不拖延地改革自己的全部工作和全部结构，以便在新条件下有效地发挥自己作为先锋队的作用。我们应竭尽全力努力在苏共内在全面民主、同志友爱、开放性、公开性、批评的基础上确立广大党员的权力。

第二，在对待许多政策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上存在各种观点甚至各种纲领的情况下，多数应该尊重少数。我们应该学会互相听取意见，不要以势压人，不要恫吓。让我们用真实成绩证明谁是谁非吧。

第三，学习。同志们，要学习，要提高自己的素养。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同其他力量打交道就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就会得到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更多的信任。

中央和作为总书记的我，将全力协助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尽快获得自己新的自主地位，这种自主地位不会导致共产党员和各个民族的分离，而会使苏共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达到新的族际主义团结，这有利于我们伟大的多民族联盟的完整。（掌声）

最后，我想再谈谈其他问题。

有一件事已经不是秘密，这就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在代表大会期间，特别是在开会的头几天，我们国内和世界舆论都表示担心，认为苏共已经丧失了革新的能力，已经无力同侵入其机体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决裂，苏共注定要陷入保守主义，就是说，注定要分裂，注定要离开政治舞台。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担心都是杞人忧天。那些预言这次代表大会将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并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为苏共举行葬礼的人又一次失算了。苏共现在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为我国的进步以及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掌声）

在党的革新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不寻常，可以这样说，直到最后时刻代表大会还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我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代表大会终于作出了符合改革精神和目标的重要决议。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无比满意的心情宣布，我们是一些关心自己的党、关心社会主义、关心我国人民、关心我国人民的今天和未来的人。（掌声）

现在我们应当坚持已经采取的正确方针，不要再留恋老一套东西了，不要再回到习惯的轨道上去，因为对党来说走回头路就是死亡。我们实在无权辜负千百万苏联人民的期望，

他们相信党，把党看成是在新条件下能够代表和保卫他们利益的政治力量。让我们证明，正在进行自身改革的苏共能够实现人民的这些期望，那时苏共将恢复自己的威信，将成为真正的起先锋作用的党，党的力量不在于发号施令，而在于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

请允许我到此结束自己的讲话，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感谢大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作。（长时间的掌声）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和 中央书记向苏共第二十八次 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汇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2日)

同志们！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和全体苏联人民正在经历的一个异常复杂的时期举行的。人们对这一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所抱的期望带有各种各样的色彩。一些人认为，这次代表大会预示着国家在朝着进步方向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将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另一些人则对改革的命运感到忧虑。但是我认为，人民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采取的态度根本原因，是他们希望健康进程在党内得到更快的发展并使党成为国内日益发展的改革的强大支柱。

我明白，对于我这个共产党员和国家最高政治领导成员，大家首先期待的是汇报党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

我先从五年前制定的今后五年的社会经济战略说起。这一战略是以必须解决两项任务为基础的。第一项任务是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科学生产潜力，加快经济发展。

第二项任务是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要制定实现经营管理的新的经济方法，即找到发展经济的新的先进模式。

现在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是在保留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社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宣布加速战略的，没有考虑到这种生产结构的潜力已经枯竭，这种结构已成为障碍。

以往年代的生活与实践证明，从一开始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结构改革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使经济面向社会的转变。现在，当民主化进程最充分地暴露出许多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的全部尖锐性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清楚了。这些问题首先是食品问题、住房问题、用消费品充实消费市场问题，以及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等问题。

重要的是在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及时修正已经制定的方针，放弃加速战略，并以优先解决有关人民福利的迫切问题为基础提出使经济进一步面向社会的纲领。

这一切已在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确定了下来。在这次代表会议以后，我们就立即开始实施重大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质是重新分配物资和财力使之有利于发展消费部门和社会文化领域。而且应该综合地实现这一转变，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和全国所有地区都纳入这一转变之中。

作出这一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由于是处在五年计划中期，所以必须作出选择——是中断五年计划，还是仍然按照原样完成计划。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不去列举一大堆说明经济已开始面向社会的数字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绝对增长额已明显增加。最近四年同四年以前的比较表明，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为55%。乙类工业产值的绝对增长额将近40%。

在投资的重新分配方面也在发生有利于非生产领域的重大变化。在国民经济的建设安装工程总量中，非生产领域投

资的比重已接近 50%，而五年计划规定的是 37%。

另一方面，今天谁都对已经取得的进展感到不满意，因为这些进展仍大大落后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暂时还不能明显地改善现状。

这些年来所犯的错误和出现的失误成了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口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我只谈几个原则性问题。这首先涉及到消费市场的平衡、居民的食品供应和减少国家预算赤字问题。当然，对于其中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在这个简短的发言中要作出这种分析是不可能的。

居民货币收支平衡问题最近两年来表现得更加尖锐。这个问题实质上导致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国家社会紧张状况大大加剧。人们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发表了不少意见。然而批评的重点主要是说政府忽略了这个问题，没有给这个问题以应有的重视。

我想就这个问题作如下说明：的确，在向经营管理的新的经济方法过渡和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经营形式的情况下，各中央经济机关，可以说还有政府，都没有充分地制定出可以准确调节收入的法规，使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 and 产品产量的提高而增长。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我已经说过，最近两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增长了 1050 亿卢布，即增长了 23%。这相当于前七年居民货币收入增长的总数。这种看来是好的趋势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居民购买力迅速增长了，可是却未能使商品生产和服务量出现相应的增长。而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其他能够使居民花钱的方式。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另一点。为了使当前形势正常化，政府采取了各项措施，而且是十分重大的措施，办法是实行调节

收入的各种相应机制,但这既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实质上,我们采取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受到舆论的消极抵制和舆论工具的猛烈批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已经由此作出了相应的结论。

食品问题仍然是国家的极其尖锐的问题。不能说没有给予这个问题以应有的关注。近几年来,苏共中央历次中央全会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方面并未见明显好转。1984—1986年农产品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6%,而最近三年里增长速度下降到1.5%。居民对食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日益严重。据专家估计,未能得到满足的需求近500亿卢布,相当于全国食品产量价值的1/3。

国家越来越陷入了依靠进口食品的境地。现在,通过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

对农工领域正在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造成目前形势的基本原因是经营方式变形、城乡不等价交换、农村的社会发展严重落后。

农村的状况是造成国家许多问题的根源。农村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服从这项优先的任务的解决,在这方面应当实际采取根本性的步骤。

再谈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目前我国卢布贬值,是国民经济失去平衡,企业之间开展实物交换,即恢复市场关系最原始的交换方式的主要原因。现在的任务是要使卢布开始起作用。在卢布没有开始起作用之前,国民经济中的消极现象将继续存在。

加强卢布的途径我们是清楚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是减少国家预算赤字。政府使经济正常化的计划确定了这方面的具体行动。我想谈谈其中的一些行动;从1991年起将根据新

原则形成国家预算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预算。新原则的实质是：根据已通过的各项法律文件和从扩大各共和国主权出发，每个共和国将结合实际收入形成本共和国的预算。而对待减少预算赤字也应采取新的态度。我们要大力削减支出并为开始增加收入创造经济条件。

现在我想特别谈谈制定和实行根本经济改革的许多原则性问题。

制定改革原则的最初几年是困难的年代。但是后来改革原则开始变为实践的几年就更困难。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在主要方面，即在实现根本经济改革中，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赞同的方针。当然，今天回顾过去三年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改革的最初步骤中仍然保留着旧作风，夸大了集中计划协调的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开始彻底实行生产基本环节转向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原则的方针。而且这一转变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大约只用了两年。

现在，竞争、市场、租赁、私营农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平等、自治、共和国主权等这样一些概念已牢牢进入日常经济生活，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这里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但是，改革的最初步骤也引来许多消极后果。根据改革发展情况通过的那些原则性决议，在许多情况下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执行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为实行这些决议作好准备。改革管理结构的过程和形成经营管理新方法的过程不相适应。在合作社这种经济成分中出现了引起居民理所当然的不满的严重扭曲现象。

对外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使进出口积极性大大活跃起来的

积极变化,但同时国家却处于外汇困难的境地。我们认为,最近通过的政府决议、立法文件有助于消除现有的缺点。

我只是非常简要地列举了一下根本经济改革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政府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研究过的一些问题。我想,这可以说明,在把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全国人民讨论之前,我们走过一段相当困难的道路。全社会都关注向市场过渡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最近几周以来出现政治热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

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党的经济战略的最高目的。怎样才能改善苏联人的生活,使苏联人成为自由的和生活富裕的人,确保他们物质丰富,使他们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福利呢?

怎样达到社会生产的有效增长呢?

我认为,今天各个社会阶层都坚信,现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不仅用尽了自己的潜力,而且成了有效使用物资和其他资源以及人们的创造力的明显障碍。

向市场过渡能为我国公民带来什么呢?首先,在较短时期内就应当解决平衡的问题。市场关系的发展将提高生产效益,使供求平衡。消费市场的形势应当稳定。

随着建立生产增长的刺激机制和开展竞争,市场上的商品将充足起来,商品品种将扩大和更加多样化。已经规定了具体的期限,即打算在1991—1992年解决这一问题。

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向市场关系过渡带有全局性质。不能从这一体制中单独抽出某一因素。我们清楚了解即将进行的改革的复杂性,了解实现改革可能有各种方案,特别是在市场形成的头几年情况更是如此。政府已邀请所有提出建设

性建议的人参加对话，共同工作。

我想特别谈谈市场条件下居民的社会保护制度，因为这个问题很尖锐。我只谈两点。

第一点涉及到保护居民收入，使其在向市场过渡的情况下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

应当说，不管选择价格形成的哪一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走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个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到“以后”去完成，那将是最大的错误。

政府已经提出了对建立社会保护机制的见解，但是我们不拒绝讨论其他建议的可能性。

我深信主要的一点是，国家有义务保障那些由于客观原因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的居民阶层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里指的是退休人员、大学生、残疾人、多子女家庭。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些社会阶层的状况恶化。

另一个方面是，社会文化领域的部门，即国民教育、卫生保健、文化工作在市场条件下发挥作用的问题。市场关系在这里也要求打破我们的许多传统观念。要使所创造的经济环境不致抹煞这些问题，而是解决它们。不能使社会的文化教育潜力蒙受损失。

在向市场过渡时，政府将特别关心动用一些杠杆和刺激因素来创造加强国防能力的条件。

由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瞬息万变，以及有必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全联盟市场，就需要从实质上改变苏联政府的结构和活动。简言之，这意味着要从直接的硬性行政管理向实行管理政策过渡。

这里有两项任务。第一，从根本上改变与加盟共和国协

同工作的性质。如今不应脱离它们来解决原则性的社会经济问题。第二，把能表达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积极支持和推动彻底革新社会的构想的新生力量吸引到政府中来。形象地说，这应该是一个依靠人民信任的同心协力的政府。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具体步骤。

如今，苏联政府和各加盟共和国政府工作中的最紧要关头已经到来，要根据收到的大量建议和建设性意见，结合对构想的积极讨论，在今后两个月内草拟出并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这项工作已经展开。重要的是要就改革的根本原则作出协商一致的决议，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具体步骤走向民族和睦。

同志们，市场关系客观上包含了一体化的原则。对此我应特别强调指出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倾向。我指的是正在出现的经济分立主义。它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危险并不亚于政治分立主义。

今天，某些共和国越来越起劲地想要建立闭关自守的共和国市场。这种趋势会造成什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下去，在某些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企业之间自由贸易的道路上会开始出现重重障碍。发展下去就将违背历史进程的逻辑，不是实行一体化，而是搞分离，搞闭关自守，搞小区域内的实物交换。这条道路会把国家引进死胡同。

还有，我并不怀疑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同时也坚信，只有全联盟市场才有助于发展每个共和国的潜力。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在于此。

再谈一个与形成市场直接相关的问题。我们已宣布了向法制国家过渡并且已在这方面进行具体工作。一切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毫无疑问，在我国法律不健



全的情况下,这是良好的现象。但是,引起人们不安的是这一进程如何向前发展。立法方面行动不协调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在社会积极性增长和民族自觉性增长的浪潮中,否定法律基础的现象开始滋长。个别加盟共和国不仅不顾及苏联宪法和其他联盟法律,而且常常违背这些法律,擅自通过造成法律混乱局面的立法文件。要知道,这可能破坏我们的国家体制。因此,今天大概没有比在新联盟条约基础上达到国家的团结一致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新联盟条约将把各加盟共和国活动的广阔天地同它们团结一致的威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同志们,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报告中,已对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你们将对我们在这一极紧张时期的活动作出评价。我认为,我们不只是带着一大堆错误和未完成的许诺来参加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五年来,做了许多事情,完全有理由把这记在苏共的功劳簿上。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面:党的政治影响下降,信奉已经过时的陈规,缺乏自由民主讨论问题的政治经验、素养和技能,社会科学落后。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紧张,促成了滥用民主,激化了情绪。

代表大会应当确定现代条件下苏共的作用、纲领性方针、职能和行动方针。这将为地方党的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指明目标,有助于加强党同劳动人民群众日渐削弱的联系。

同志们,五年过去了,这是进行特别紧张改革的五年。这是进行艰难探索、社会思想腾飞、取得巨大成就和由于未实现期望而失望的年代。对这些年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苏联人会对此作出评价。

但是我相信,我国拥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使苏联成为伟大

的强国，确保人民富足安康与自由。

（译自 1990 年 7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瓦·安·梅德韦杰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2 日）

尊敬的同志们！政治局委员作工作汇报是我们党内生活深入民主化的又一新事物。我意识到，带着这项使命登上讲台不仅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而且考虑到过热的政治情绪，这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首先，我想强调指出，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我的政治立场已反映在戈尔巴乔夫同志所作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了。我认为，党在 1985 年 4 月采取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要说有什么令人惋惜的地方，那就是这个转折没有在更早一些时候完成。除了转折，过去和现在都别无明智的选择。我认为，任何利用当前的困难进行投机的行为，败坏改革名声和攻击改革的企图，无论它们出于什么立场，都是不负责任的。我相信，这一切必将受到代表大会的批驳。

我说这番话绝不是为了粉饰当前形势和掩饰失误和错误。在这段时间里失误和错误相当不少，我所负责的部门也不例外。但是不能不看到主要的一点：社会解放了，人的精神和公民尊严得到了恢复。

不错，在从个别的不配套的改革措施向全面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过渡的时候，国内思想状况开始迅速恶化

起来。这个转变打击了死水一潭的“上层领导”的利益，使所有那些工作马马虎虎却享受社会财富的人惶恐不安。它使保守情绪不断增长，保守情绪的第一次骚动发生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前夕。

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社会团体，而且由于是新成立的，这些团体充满活力，十分活跃，甚至是咄咄逼人的。在给经济、政治和思想生活带来活力的同时，其中一些团体开始感到包括社会主义框框在内的所有框框都是累赘了，因此，极端激进的思潮加剧了。社会经济混乱，特别是市场混乱，族际冲突和国内法制削弱，都对思想状况产生了极有害的影响。

这一切使得4月最初的欢欣气氛变成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紧张。改革失去了它在初期的那种生气勃勃的势头。

根据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着手进行的改组党组织的工作，正赶上改革紧张时期。1988年9月底，即在一年零九个月前，中央全会通过了成立意识形态委员会的决议。我受命领导这个委员会。当时党的领导人重新分配了职务。我被选入政治局，改做意识形态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三个部合并成一个意识形态部。

这个时候，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成了一个特殊的危险区。这里指的不是我自己，首先是指新一代工作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正直诚实的，不管在停滞时期还是在改革时期都没有得到好处，他们不是为了官衔和称号而工作，而是为了社会复兴而工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自发思潮的打击以及人民和党进行的历史性突变带来的道德心理冲击。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两年来我们作了些什么呢？

首先，根据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继续

执行了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我们从两个原则性的决定开始了工作；取消了征订《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限额，撤销了使党蒙受耻辱的联共（布）中央关于这两种杂志的决定。至于说到限额征订，我认为不能允许再这样做了，尽管现在纸张十分困难。

早在新闻出版法通过之前，我国实际上已经取消了政治审查制度。成千上万本书开了禁，摆上了读者的书架。

新的出版物丰富了生活。值得首先指出的是《苏共中央通报》这份杂志，现在还出了它的每周增刊《公开性》。《联盟》、《祖国之子》、《家庭》等出版物均已问世。《我们》、《和睦》杂志，《仁慈》周刊以及其他许多刊物也即将出版。

电视和广播的容量不断扩大。

中央委员会赞成坚决扩大俄罗斯的舆论工具系统。正在筹办《苏维埃俄罗斯报》副刊。中央电视台已开通俄罗斯频道。《祖国》杂志已转交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妇女》等杂志已问世。

总之，我国信息市场从来没有这样丰富多彩过。我知道，许多人对舆论工具有不少严肃的实事求是的要求。是的，舆论工具成了尖锐斗争的舞台。由于读者群不同，由于思想、政治、民族利益的差别，各种报刊正在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合乎规律的。

社会两极分化在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不仅反映而且能制造社会舆论的报刊保持一片宁静和发出一片赞美声，那是反常的。这不可能办到。但是消极地、不分是非地反映发生的一切，也是不允许的。

党影响社会意识的途径是什么呢？我确信，首先是通过党的报刊。必须严肃认真地办好党的报刊。在公开性条件下，

党的报刊份数下降,已经不是秘密。在过去垄断的情况下,党的报刊根本没有健康的竞争风气,丧失了战斗精神和吸引力。

我们对整个党的中央报刊系统重新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对话》杂志,取代了墨守陈规、粗糙肤浅的《鼓动员》和《政治教育》两种杂志。《对话》是一本现实的、尖锐的、面向爱思考的人的杂志。

改革非常需要这种人的支持。在半机关报《社会主义工业报》和《建设报》的基础上创建了《工人论坛报》,它不是生产性报纸,而是社会性的、面向最广大劳动读者的报纸。

整个来说,党的报刊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鲜明了。我想,我们大家首先可以从《真理报》上看出这点。你们有权问:改变的结果如何呢?我的回答是:最近几年来,党的主要出版物的征订数今年第一次出现稳定,其中一些报刊的订户数量出现增长。而这是在目前激烈争夺读者的情况下出现的!

至于谈到党对整个舆论工具的影响,新闻出版法的通过改变了整个形势。我们曾积极促进通过新闻出版法。对共产党员记者进行政治工作被提到了首位。在同他们的关系方面,我们从强制转为对话和伙伴关系。为此专门在党委会下面成立了新闻中心。苏共中央也成立了这种新闻中心。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改组了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以及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等舆论工具的领导班子。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倡议,提高了记者的工资,扩大了编辑部的经济自主权。

我要专门谈谈电视。如果说对其他舆论工具来说,分化过程完全是自然的,那么电视则复杂得多,因为电视是国家的,这就决定了它的立场。电视应客观地、不偏不倚地反映社会舆论,为社会和民族和睦的目的服务。正在研究苏联国家

广播电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对待组织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的新态度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它对社会的责任心问题。建立党的电视频道或者租用频道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其次，我们认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更新意识形态，坚决把它从过去僵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和世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当代社会主义概念，首先对制定新的精神价值观和方向来说是重要的。这是捍卫我们的思想遗产、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最好方法。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构想，在总结报告中已相当详细地谈过了。我想补充一点，我们曾努力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力量参加制定这种构想。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实现了科学研究所、科学杂志编委会领导班子的更新和年轻化。取消了给国际学术交流设置的大部分人为的障碍。苏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创造性作用提高了。值得指出的是，与科学院共同完成了《改革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大规模研究工作。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如库德里亚夫采夫和利哈乔夫、马尔丘克和萨哈罗夫、切雷舍夫和韦利霍夫、沙塔林和亚多夫以及数百名（如果不是数千名的话）年轻科学家参加了这场困难的讨论。

科学院举行了探讨现代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论研讨会。多次召开了全苏科学实践会议。编写和出版了新的社会科学教科书。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在发展那些过去几十年根本没有进行研究的学科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

我指的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这样一些学科。最近一年半我们终于在党内建立了社会学工作部门。顺便说一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首次进行了社会学问卷调查，

你们参加了这次问卷调查。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崭新的理论知识水平。还没有建立起全新社会的完整理论。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心以及我们的干部还不成熟。他们一再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性，但是当迫切需要实现这个公式时，他们却无能为力了。

我想，由于正在起草新党纲，建立社会主义新概念的任务将随之加快进行。

第三，向意识形态工作新模式过渡的任务被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老模式的出发点是，党是行政命令体制的核心，它直接控制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进程——教育、科学、文化、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一切的一切，直到体育学校和幼儿园。一切工作都是在温室条件下，在没有反对者，在表面意见一致和赞同中进行的。我们摒弃了这个模式。苏共中央不再是“意识形态部”。党的努力集中到制定政治、精神、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思想理论方法上，集中到通过在群众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上。我们摒弃了对不同思想采取的好斗的不能容忍的态度。

远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些变化。他们往往从过去那种关于苏共是支配一切和对一切负责的力量，能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强迫所有人和禁止一切的概念出发批评我们。但我们已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不可能恢复老一套了。

当然，还未能完全消除取代国家机关的现象，例如在教育方面。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未能消除问题的尖锐性，而且越来越无人过问这些问题了。最近，根据我们的建议，改变了高等院校讲授社会科学的体制。这个体制目前执行起来还有些勉强，不大顺畅，但是正从落后的教条主义轨道转向思考新的生活现实的轨道。

我们十分重视制定新的文化政策。它的基本意义在于，保证真正的创作自由，使社会舆论转向文化问题和过去蒙受的灾难上，结束臭名远扬的剩余原则。意识形态委员会制定的相应办法刊登在最近一期《苏维埃文化报》上。

是的，新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建立是在矛盾和痛苦中进行的。它受到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的干扰。我们的错误和经济、政治领域的错误带有共性——创造工作落后于对旧体制的破除。最近，中央、共和国和地方机关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之间的接触和交换意见增多了。但仍然明显不够。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出现了张皇失措情绪，但我想，在这方面已开始出现转折。意识形态不再是小范围的党和国家上层人物的特权，而成了全党的事。代表大会前的讨论已充分表明了这点。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改革工作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进一步前进的保证。

同志们，意识形态工作现在是被猛烈批评的对象。一切——从阿尔巴特街到社会主义概念——都受到批评，而且批评来自四面八方。一些人指责调和主义、价值观失落、向资产阶级蜕化，另一些人指责不愿改革、教条主义、抓住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放。但不必讳言，这已经不是什么批评了。这是立场不一致。

就实质而言，有人有时要求我们使意识形态工作不为改革服务，而为这个或那个小集团，为这个或那个派别——徒劳的保守主义或有害的超激进主义服务。

在自己的工作中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必须遵循的不是哪个人的非难或赞扬，而主要的是要遵循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革新的利益。我曾努力为它贡献一切力量和不倦地工作。

同志们，最后再谈一点想法。今天最重要的是恢复人们



对改革的坚定信念。我认为，为此改革应更广泛地依靠我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的看法是你们的事。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正是这种感情不止一次地根本扭转了国家的命运。因此我认为，党的未来领导人应努力这样进行工作，即不要让人们把改革的构想理解为异己观念，而是充满我国人民民族复兴思想的崇高精神。我相信，那时改革必将取得胜利。

（译自 1990 年 7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亚·尼·雅科夫列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2 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种种迹象表明，不轻松的时刻也在等待着我。20 分钟容纳不下五年的生活和工作。不仅如此，坦率地说，对要求作工作汇报的意义，看来认识也不一样，但这毕竟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再次阐明自己立场的机会。事情虽然不简单，但是也有容易的一面，因为我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同志报告的论点和结论。这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共同的汇报。所以说，主要的内容那里都有了。

根据白热化的情绪来看，我相信，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敌视和怀疑的污垢从脚上抖掉，大讲光明正大和与人为善、人格和良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现在是结束我们一直闹个没完的内战的时候了。对

党来说，这正是采取主动，从精神上净化生活和意识的时候。

正因为如此，我对1985年所作的选择的历史正确性及其深刻的道义性坚信不疑。无论是国家还是党，不进行全面的革新就没有前途，在世界上也不会享有应有的地位。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以便对发生的事情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曾经发动人民为正义和兄弟情谊进行革命的党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不幸，因为一个有思想的党，有革命思想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其实下述两点始终共存：既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又是不可抗辩的、专横跋扈的和好斗的党。正因为是有思想的党，所以开始了改革，以免祖国遭到毁灭。如果要谈今天的紧张状况的主要矛盾，那就是鼓舞人心的人民政权思想与起瓦解作用的镇压人民的做法之间的激烈搏斗。

垄断真理是有致命危险的，但接受这种说法是多么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的脑壳是最难以攻克的堡垒。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只有经过革新的、左派的和年轻化的党才能引导国家继续沿着认真改造的道路前进。这个运动是不可制止的，有党或没有党它都要前进。近来大大自我表现一番的保守情绪和保守倾向，是党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社会停滞体制的结果和证明，这种体制是个人专权造成的。

改革所要打断的正是这个极权体制的脊梁骨。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改革招致某些阶层的刻骨仇恨。现在是该指责改革呢（它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是该认真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改革，什么东西阻碍改革，什么东西抵制改革呢？我认为这就是代表大会应作出的抉择。

这就是关于我的立场的一个简要叙述，我对此从不躲躲

闪闪。现在具体谈谈。

首先，作为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我参与了制定和实行新政治思维，虽然我不准备夸大自己的作用。

我们经历了整整一个“冷战”、两个体系对抗、集团对立、经常不断的核威胁的时代。现在我们去分析谁首先开始这么干的，谁的过失更大些，这已失去实际意义。主要问题在另一方面，即这个可怕时代提出了人种灭亡的问题。本世纪的先进思想家爱因斯坦、卡皮察、罗素、萨哈罗夫早已指出过这一点。政界的认识要晚得多，而行动实际上是从改革才刚刚开始。

这一切都应当重新加以思考。当新思维仅仅作作为一种假设被提出来时，改革已准备起步了。尤其是最近大家都清楚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建设性的。

国际政策委员会成立时间不长。但是所有基本概念差不多都是通过它制定的。按工作程序审查和讨论了大量文件，并就此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这包括为戈尔巴乔夫同志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准备，与第二国际一百周年有关的一些问题，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各种问题。

委员会根据联合国提出的倡议讨论了国际关系发展前景。不但要考虑分析具体问题，还要预测这些倡议将把国际体系引向何种状态。

本着向前看的观点，还讨论了在苏中关系正常化条件下，同中国发展两国两党间关系的构想。讨论了实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提出的主张和倡议的途径，从苏联利益出发研究了中欧和东欧的变化，发展同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接触与合作的问题。讨论了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中国、美国关系的各个方面。

苏共中央的这个委员会力求不让自己的工作直接介入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特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职权范围。与苏联外交部的工作配合是在密切接触和创造性基础上进行的。

我想，委员会的工作经验使我能够对它的未来成员谈几点建议。我的出发点是，这种工作形式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依我看应当得到发展。主要的潜力在于更紧密地和直接地与立法人员一起工作。委员会应鼓励和倡导在党内和国内广泛而负责地讨论有关我们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各种重大问题。

这几年我曾直接参加了准备和实行许多重大的对外政策倡议、会晤和最高级访问。既在莫斯科，也在国外——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波恩、罗马、巴黎、北京和其他城市参加了这些工作。当然，这是集体的劳动。我谈这点只不过是这类工作占有显著位置，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是同志们，在这方面我认为什么是最主要的呢？通过外部条件的正常化，通过我们对今天整个世界的开放，我们也改变着国内的精神面貌。安定、没有恐惧感、不再到处寻找敌人、现实地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有助于在社会上建立一种健康的精神气氛。

其次，最近几年我工作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在重新研究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老实对你们说，这项工作沉重的，当数百万遗骸不断迫着你时，精神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在这段时间里恢复了近 100 万人的名誉，毫不怀疑、毫不勉强地恢复，坚信正义必将出现，真理必将胜利。

但是还需要社会真理、社会历史真理。毫无疑问，上百万人恢复名誉，这个数字足以使人作出结论：这样大规模的冤案和迫害不可能是偶然事件，也不可能只是罪恶意志的后果。

镇压机器是谁和怎样建立和发动起来的，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它的策划者们怎么能够把党、国家机构、社会都压在镇压机器之下？为什么它能畅行无阻？我们的发展蒙受了多少创伤，后果怎样？为什么后来又试图重新恢复斯大林主义的血腥面目？

所有这些都不是无聊的问题。但答案只有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就是对他所建立的体制的判决。

委员会的工作是同革新社会主义，同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性质同时进行的。

已经查明，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四起公开审判外，30年代仅在莫斯科就进行了60多起背着社会舆论巧妙安排的审判。其中有所谓的“克里姆林宫案”、“莫斯科中心案”、“列宁格勒中心案”、“工人反对派案”等等。

那时人民遭受的无边灾难和无法想象的残酷令人震惊。

委员会得出结论，法院以外机构的行动是违法的。在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年1月16日关于废除当时作出的法院外决定的命令。

根据对政治迫害材料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作出了新的决定。特别是出现了集体化时期的农民问题。据我看，这是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当时数十万农民家庭被赶出农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的命运落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死在他们自己建立的政权之下。谁也没有像俄罗斯农民那样在斯大林主义祭坛上遭到如此悲惨的浩劫。死去的人已经无法复活。让历史恢复他们的名誉吧。

这里又出现了道德问题。背着这样不堪负担的包袱是无法前进的。这段悲惨的历史是不容半吞半吐、沉默和模棱两

可的。

第三，现在再谈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工作。我曾参与同发展公开性和民主有关的活动，我知道，这使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如果把这项工作算到自己的份上，那是过于自信了，可是提出批评的人仍然劲头十足，所以我只好谈谈了。是的，当我两年前研究这些问题时，我积极地促进了公开性清新的水冲到地面上，它清洗了我们的面孔，解除了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干渴。公开性是民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长期被禁的几十部文学作品发表了，多年来被封存在库房里的影片同观众见面了。实质上，创作已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洗刷了压制艺术家自由的耻辱。检查起来，我在这方面为了改革的利益只是做得还不够坚决。

是的，在舆论工具中，在创造性的探索中，今天还存在着过火、水平低、不负责任和平庸等现象。但尽管存在种种缺点，我们的知识界还是作了大量的正本清源工作，在推动改革中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是的，有震动。是的，有痛苦。是的，有不习惯和不愉快。是的，有人还感到厌恶。但难道不正是在这里我们形成了言与行之间的鸿沟吗？！

所有这一切曾经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仍然是不容易的。最近五年证实了这一点。在经济、政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民主改革晚了10年。社会的种种弊病还能够“治愈”，但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在危机线上做这件事的。

历史是不容争辩的。遗憾的是，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我们过份经常地鄙视所有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扪心自问，就是现在我们还不时地继续这样做，并自己跟自己说假话，口是

心非。国内的社会生活还充满着由于过去的种种欺骗而造成的复杂情况。

改革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意识和实践的反理性主义，对当局的言论、意图和诺言不信任，厚颜无耻和流氓无赖心理，坐享其成和向上爬等现象还大量存在。

改革的矛盾还在于，社会及其各种制度彻底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遭到顽固的保守主义的抵制。

认识上的局限性以不同方式产生着影响。教条化的历史按自己的方式控制着每个人。许多人都在责备中央、责备党的领导，说他们迟迟没有制定和采取措施。这一批评的许多方面是公正的。我不推卸中央和我个人的责任，但是，我想说几句话，也许说得不恰当。当然，我们是迟了。大概是迟了50年。就是这个长时间的迟误才使我们的改革时冷时热。（掌声）

我讲几句题外的话。大家知道，耶稣当年为了给穷人建立自己的宗教便把法利赛人，即商人赶出教堂并改革了宗教。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只是在一年半以前，亦即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过了几个世纪以后，梵蒂冈才公开承认，只有挣得的财富才能帮助人净化灵魂和使人进天堂，应当支持企业家的活动，因为它能改善这个世界上人的处境，给人以变得高尚的手段。

同志们，难道我们也要围绕市场问题开展经院式争论，再来创造一次这种迟误的记录吗？

时间过得很快，在它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了。请原谅我有点感伤，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是伟大国家的伟大革新、它向自由世界历史性进军的同时代人和积极参加者。

同志们，今天，许多事情取决于勇敢和良心，但也取决于是否能无愧地度过我们生活的新篇章带来的苦难。如果能消除持续不断打内战的心理、尖刻的指责、人们之间互不相容以及被视为生活准则的顺从和卑恭屈膝的意识——为了培养这种意识斯大林曾十分顽固地推崇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在这个新篇章里我们会学到许多新东西。

我们知道，不仅空空的柜台，而且空空的心灵都在呼唤改革，都在要求革命性变革。

当然，有人想算帐，找“罪人”，统计异教徒。看来，也可以这样干。但是，同志们，窗外是一片苏醒的生活，有它的现实问题、忧愁和欢乐，也有期待、奢望和冷漠。所有这一切都在身边，只隔着大会堂和克里姆林宫的双重砖墙。人们对我们的话、争论和责难已经厌倦了。讲话的叫嚷声并不是历史的回声和时代的脚步声。如果我们辜负这些期待和错过这些机会，如果我们陷入互相争斗的漩涡中，那将是十分难堪的。如果我们找出一两个“不干净的”人之后，就开始自我谴责，擦着因紧张而冒汗的双手，忘记醉心于做这件事是在拿党和国家的命运冒险，我们就会无比羞愧。我们需要更多一些同志友谊。可以在某一段时间里维护教条，但是谁也不能使生活停下来。

还有最后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从当前形势来看，可能是容易受到攻击的。但是，由于我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因此我能够大声地提出问题：同志们，我们对待自己的领袖们是否太不慎重了？过10天你们将选举全新的领导人。这是正常的。但是明天党在动荡的政治海洋中将不再是孤独的，将出现更多的批评者。那时我们特别需要一致、信任、团结。今天就应当学习这些。让我们一起来考虑这些吧。



谢谢大家。

(译自 1990 年 7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3 日)

尊敬的同志们！众所周知，我的工作负责对外政策。作为政治局委员，在过去五年里，我参加了党和国家生活的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我将对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所有决议负全部个人责任。对所有问题，对所有决议负责，毫无例外！尤其是对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所有决议负全部个人责任。我现在就来谈谈对外政策。坦诚地说，尽管我并不全然清楚作这种工作报告的目的。有人会问，在作工作汇报之后，面临着党的机构的选举，我将何去何从。勿庸隐瞒，我准备不选进党的领导机构。我认为，部长并非一定要在政治局、总统委员会、国防会议以及各种国际机构中工作。

再谈谈工作汇报。工作汇报的目的何在呢？明确立场吗？我从不隐瞒立场，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拥护改革，拥护我们及世界上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拥护革新社会，拥护建立法制国家，拥护全面民主化。汇报具体事务、会谈、会晤、访问的情况吗？近五年来，这类活动数不胜数。实质大概并不在于此。主要在于我们向世界提出了哪些构想，如何帮助国家解决问题。

请相信，我不愿意突出个人。我也无法肯定，昨天的一位党务工作者会在顷刻之间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整整五年之

前，一天不差，选中了我，这是思想一致和同志情谊的选择，是党的同志情谊的选择。由于意识到对人们所负的责任，这种同志情谊起着凝聚作用，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我们。

我坚信，使一名党务工作者也好、外交官也好、苏联军官也好，成为真正职业革命家的，正是这种情感——个人责任感。这种情感以及其他一些情感决定了我的生活道路。在这些情感当中，也有因现实与所宣传的理想和口号大相径庭而产生的极其深刻的感受。正是作为一名明确感觉到四月全会前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的共产党员，我接受了改革，接受了外长职务的任命。就我本人来说，我不觊觎制定对外政策战略和构想模式的创作权——大家知道这些权利、政治新思维构想属于谁。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些构想的积极传播者和宣传者。

在 20 世纪的后 25 年，世界的发展已不是在两个对立制度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不单单受制于阶级利益冲突的发展趋势。这一结论的形成过程是众所周知的。教条主义和扼杀活生生思想的意识形态模式把我们引入死胡同。很久以来，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我一直积极坚持和实际贯彻全人类价值优先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或其他利益这一思想。我过去和现在都从未隐瞒过这一点，因为我相当清楚地懂得，除歪曲目的和偷换概念的本性外，假意识形态还拥有力量、价值和明确的物质表现。

例如，我来到外交部接触了有关材料以后得知，单是在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最近 20 年里，除军事对峙的费用外又多花了 7000 亿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为求得同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平衡所需要花费的费用。我知道，对外政策和我本人都受到指责，而最近，直率地说是遭到了咒骂，这无非是由

于在安全领域内作出了让步。我完全相信，我们这个大国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然而，不能把一切归结为这点。我们可以因为害怕进攻而武装到牙齿，但是，更可以相信自己不会遭到进攻，因为政策可以为此创造条件，使我们国家不会有反对者和敌人。

苏联对外政策为使我国没有敌人，使我们同所有国家保持正常的互利关系做了不少工作。我这里引述一下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对布什总统讲过的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我们苏联愿意不把美国看成是自己的军事敌人。”这句话当时使我感到吃惊。后来，布什总统在华盛顿最高级会晤时也说：“您可以从这样一点出发：美国将决不会威胁苏维埃国家的安全。”

这在目前还是说说而已。然而，进入新时期、开辟崭新的阶段、两大国间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景已经在望。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谈得上向防御的足够原则过渡。这不是随便说说的防御，而是牢固的、现代化的、以最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成就为基础的防御。

这种“足够的防御”也需要资金和不少资源，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需要关心那些保障这种防御的人，需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然而，十分明显，如果我们仍然像过去那样把全部预算的1/4花在军费上，我们最终会毁掉国家。我们将会根本不需要国防。军队也就用不着去保护那种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的制度了。出路只有一条：政策应当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在缩减国防费用的条件下确保安全有备无患。

同志们，我们曾在阿富汗打仗，其原因之一似乎是为了保卫我们南疆的安全。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如今，在阿富汗

问题取得政治解决以后，我们的南疆却安全多了。在这种场合下，最终的结果是：政治手段收到的成果更快，花钱更少。这次打仗究竟花费多少，这个数字大家都已知道了，除了人员伤亡和其他灾祸外，我们花费了 600 亿卢布。

顺便提一下，我今天本来可以以政治局阿富汗问题委员会领导人的身份向大家汇报，但这个委员会不久前已经解散了，因为它已完成对它提出的任务——我们的子弟兵已从阿富汗回国，这个国家依然是我们的友邦。所有这一切工作是在政治局领导下完成的。

许多同志记得，当年同中国的对抗演变成武装冲突，那时远东乃至全国的形势曾经多么严峻。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更安全？是在花费 2000 亿卢布建设军事对峙基础设施的时候，还是如今同这个伟大的邻国关系正常化并开始举行消除对峙的谈判的时候？我们同中国军方代表正在进行谈判。如今我们在发展互利贸易，把钱花在既有利于苏联人民，也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事情上。

我想回答一位代表昨天向我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是不是您所领导的苏联外交的惨败？”要回答吗？

（有人喊：要。）

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它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今天我们不是

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

我认为，在盟国人民命运发生这种危险转折的关头，我们大家仍然坚持站在一起并且继续并肩前进，在这点上苏联的外交和我们的整个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盟国民主选举出来的新领导人前来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最高机构会议，并没有由此而使我国联想到外交工作的失败。我认为，他们的到来是对我们的改革和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尊重。

还有一个问题：外交官、外长和最高政治领导是否都曾知道东欧的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是的，我们原则上预测到会发生变化，觉得变化势在难免。有朝一日可以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谈话记录拿出来，可以了解从这些国家的首都发来的电报。我们感到，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和改革，情况会发展到悲剧事态的地步。然而，我们从新的政治思维原则出发，不能干涉别人的事务，不能干涉他国的事务。我认为，我们做得对。

我们对德国统一进程感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家身心的某个深处被刺疼了。考虑到我们过去的经验、我国人民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遭受的重大牺牲，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的话，那就奇怪了。诚然，我们已经习惯于既定的“德国”现实。认为这种现实才是自己安全的保障。可是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这种以人为地和违反自然地分裂一个伟大民族为基础的保障可靠吗？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呢？

难道战后时期没有由于德国事务和围绕着德国问题发生

过危机吗？也许，最好能找到确保自己安全的其他途径——依据国际法在欧洲求得最终的解决，并使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得到这样解决，即保证永不再从德国土地上发生战争威胁。

我提醒一下，德国问题的调解是在我们的直接参加下进行的，没有取得我国同意就不能通过。四大国和两个德国达成的协议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它意味着欧洲要降低军队和军备水平并以此为依据。这一清除军事对峙的过程已经在进行。在这些削减的范围内，联邦国防军的人数将大大减少。在将来的“大德国”中，军队将比联邦德国现在的军队少。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好呢？是同 50 万联邦德国国防军打交道好呢，还是，譬如说，同统一德国的减少一半的军队打交道好呢？还应当考虑到，目前的欧洲是相当“透明的”大陆，军事活动方面的这种开放程度今后仍将提高。还不能忽视一个事实，欧洲已经开始向新的民主和集体的安全结构过渡。这种结构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就将成为现实。已经对赫尔辛基进程的制度化取得了共识。我预测，各个集团本身，它们的学说、战略、军队和军备水平将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各集团之间、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并实现正常化，这些国家现在已经是民主国家，它们将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对抗。

由此可见，我们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欧洲中，生活在另一种军事政治格局中，在这种格局中，1939 年的事件不可能重演。可以排除这种情况。我也相信，苏联将同统一的德国在政治、经济和所有其他领域进行广泛和大规模的互利合作。同志们，我可以坦率地、十分负责地说，迟迟不在总体调解范围内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对我们没有好处。

新的政治思维使我们同世界大多数国家进行对话、合作与协作。这种状况既有助于我们，也有助于其他人大胆地重

新估计对内对外政策中的轻重缓急，优先考虑和平的需求，共同寻找解决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昨天所说的越来越尖锐的全球问题的办法。发生这种变化是所有国家的功劳，是它们表示愿意更加相互信任和相互采取迎合伙伴的步骤。现在，已经毋庸置疑，改革所产生的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正在积极地为改革服务，帮助改革解决革新和复兴我们的社会、使它向完全民主化和法制统治过渡的任务。我们的计算表明，在本五年计划中，由于执行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政治方针所得的“和平红利”的总额可达 2400 至 2500 亿卢布。

如果我们置身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金融机制和关系体系之外，我国就没有前途。我们应该摆脱自己陷入的自我孤立于世界和进步的状态。我对此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是因为有一个明显的道理，这就是目前任何人也不可能在自给自足的原则上生存和发展下去，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是如此。各国人民和所有先进国家的联合努力推动了世界的技术革命。

但与此同时，我还想说，我们并不想使苏联“依附”于任何人。我国同欧洲、美国、日本和亚太地区一样将在经济力量中心的行列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我们有充分基础和全部条件成为这些经济大国之间的联系环节。我们所有共和国、边疆区、州和所有地区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最近几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排除了或大大减少了我国在获得财政资金和先进技术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苏联的改革得不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坚定的巨大信任和善意支持，那么在国内发生的某些事件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那些本来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的地方，这些国家都表现出了理解态

度。无疑，为了利用有利的国际气氛和开始从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中得到实际好处和成果，我们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不言而喻，我不能将自己的工作同外交部的工作分开。同志们，如果说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做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么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外交部门和外交官对改革思想和新思维具有高度的理解。现在当某些批评我们的人试图把“外交政策成就”这几个字放在引号里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外交政策，这不仅仅是外交官的事，这首先是最高政治领导、国家总统的事，是议会议员的事，是我们党的机构、军人、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农工综合体工人的事，是在这个大厅中所有在座的人们的事，是我们全国和全体人民的事。我们在同我们的伙伴进行谈判时是一个整体，受统一的指挥。也就是由于这种统一的指挥，最近才得以签订几项意义重大的协定。

深刻的社会民主化，国内立法人道化，恢复公民权，恢复被无辜关押的人的自由，恢复因受侮辱和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而被剥夺苏联公民权的人的公民权和回归祖国的权利，为教徒们恢复教堂和根据他们的信仰和良知进行祈祷的权利——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们，那我们就接受这一指责。因为这些人道主义的姿态和行动构成了我国的新面貌。现在我国在世界上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人们对我国的命运感到忧虑，担心改革失败。

既然我已经说过我们的成就是大家的，那我也应该说，争取改革胜利的斗争也应该是大家的共同斗争。如果没有党内健康力量在党的革新纲领基础上的团结一致，那我们是不成功的。

（译自 1990 年 7 月 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 叶·库·利加乔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

尊敬的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我首先要说，我喜欢昨天在这里宣读的条子。我谈谈自己、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立场。补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内容相当充实的报告，我对自己的工作能说些什么呢？试试看吧。

我的工作可以相对地分为两个阶段。我曾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88年9月中央全会任命我为苏共中央农业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我首先谈谈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头三年里中央书记处全力开展了工作。书记处研究了现实生活的各种问题，对中央历次全会和政治局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书记处十分重视干部工作。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因为在这之前不少领导人用自己不体面的行为败坏了自己的声誉。许多积极投身改革进程的年轻的、有专长的工作人员走上了党组织的领导岗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麻烦。那一时期我们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地方党委、中央书记处、中央各部没有充分重视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充分依靠劳动集体。你们都记得，领导人照例是按照上面的提议解职和任命的。那时党的生活还处于进行差额选举领导人的准备阶段。

我用许多时间直接同地方党组织打交道。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特别是从研究和传播地方经验的角度来看。同时我要完全负责任地说，书记处远

没有抓住一切机会来完善包括中央机关在内的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有时忙于解决许许多多经济问题，我首先应对这种现象负责。

1988年中央九月全会后组建了中央各种委员会，书记处很长时间没有开展工作。后来偶尔举行过会议。我怎么看这件事呢？我认为，这段时间错过了很多机会。实践表明，书记处应该是经常发挥作用的机构，应该研究党的生活的各种迫切问题，不言而喻，要考虑新的要求，要吸收共产党员和中央委员广泛参与。

关于我担任的中央委员会农业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同志们，我想谈谈下面几点。大家知道，农业政策不是指示怎样种田和怎样饲养牲畜。我认为农业政策就是在党的活动中结合整个社会利益来考虑农民的根本利益。

请允许我简要地回顾一下。三月全会后各种社会主义经营形式得到了发展，国家提高了谷物收购价格，土豆、蔬菜和水果实行了合同价格，建立了现代化的食品工业和贮藏基地，在这方面国防工业开始发挥作用。将着手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还有一点，就是组建了农民联盟。我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政治组织。

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党的基本上正确的农业政策却在社会上遭到尖锐的批评呢？尽管去年获得了大丰收，畜牧业产量也很高，为什么我国食品市场上的状况却非常严重呢？依我看，问题在于，中央三月全会制定的纲领，没有立即用经济措施、更多的物质技术资源和科学保障来充实。而且还应当指出，农业改革是在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志们，我经常到共和国和州视察。这是我的作风，是我

的习惯。有时我站在农村的街道上同村民谈话，心里想：“给农民自由是一件正确的好事。让他们真正地劳动。让他们真正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但要知道，他们需要好用的拖拉机、好用的联合收割机，而不需要歪歪斜斜的破房子。但是没有木料，没有水泥，甚至没有钉子。”还是涅克拉索夫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房子都支着支柱，就像是拖着讨饭棍的乞丐”。而这样的房子比比皆是。

农村的出路如何呢？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在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民的生活方式在解体，农民在继续往城里跑。

我想举一个数字。有些人认为，农业投资多得不合理，并且都白白地浪费了。我不这样认为。生活告诉我们另一种情况。根据学者们的统计，仅在1988年一年中，全国农庄和农场就失去了近80万名职工。这是战后年代的最高数字。

其实，在本五年计划的头四年里，农业基金几乎没有增加。人走了，技术设备又没有增加。试问靠什么提供产品呢？

乌克兰有一个十分权威的经济研究所。据它统计，为了拉平，我强调一下，只是为了拉平农业经济同工业经济在技术装备、工资和社会服务设施方面的水平，国家就要增加投资50%以上。同志们，我还想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投资绝对不能采用直接补贴的形式。增加投资应当在考虑工业品价格的情况下，通过主要产品的收购价格来实现，还应当通过对农工综合体专项计划的预算拨款来实现。

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平价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在农业委员会会议上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最好是在年中举行三方会谈讨论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问题，我强调一下是政府、农民联盟、各部委的代表三方会

谈。今年就应当做这项工作。

毫无疑问，计划—市场关系也会有助于这一进程，但是时间不等人。

农业委员会和各地党组织都关心为发展个人经济创造条件。同志们，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认为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民终于相信了党的政策。他们对家庭经济的态度变了。私人宅院中各种牲畜的总头数多年来第一次增加了。这种经济具有商品性质，是按市场原则运行的。制定了用小型技术设备装备农户和私人宅院的计划。农户经济产生了，也应该关心它们。

我现在谈一件最可叹的事。无论是中央农业委员会，还是我这个中央农业委员会的领导人，都没能说服政府、最高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相信优先发展农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果一切依旧这样下去，那么我国食品供应情况将变得更尖锐、更危急。我明白解决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和多么困难。但是，今天向你们、向党的最高机构作工作汇报的时候，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假如不改造所有制关系，巨大的投资就无济于事，同样，没有额外的投资，只是完善生产关系也不会有多大收效。

此外，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在发展农村生产合作方面做的工作也很少。在这方面，我认为这首先是我本人的过失。我们很少关心这件事。还有，这里说的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农村生产合作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认为公有制使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而私有制使人们的利益互不相干，而且毫无疑问会使社会分化成各个社会阶层。

有鉴于此，同志们，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想一想，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潜力。既然如此，我就要问，难道把企业卖给私人能促使社会主义制度

所具有潜力发挥出来吗？当然不能。“劳动个人所有制”被当作一个新范畴来使用，并被认为是当代理论界的最新成果，但这并不能使我信服。

如果我说所有制的类型已经不是个策略问题，而是个战略问题，我想你们是会同意我的说法的。在谈到所有制类型时，我还要谈谈全人类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完全全包括了全人类价值观。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两者不是等值的和相同的。比如，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价值。我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个更广义的概念。我们忘掉阶级观点也是不合情理的。由此出现了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阶级成分没有任何意义的说法，出现了低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现象。这一切造成了什么后果，现在已经清楚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探讨。

我认为，我应谈谈1985年5月通过的与酗酒和嗜酒成癖作斗争的决定。我不想回避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应不应当开展这项斗争。为了公正地认识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开始同酗酒展开斗争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地松了一口气啊。但是，从自我批评的角度说，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考虑不周的。首先，我显然曾抱过幻想，认为这个死死缠着人的阴险的敌人是能够一下子就制服的。此外，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在很大程度上把我国财政工作失调归咎于禁酒运动。

可悲的是，酗酒之风又在全国刮起来，街头巷尾许多地方，甚至在生产岗位处处可见酗酒现象。我明白，今年这同物价上涨有关，酒类销售量预计可达最高水平，可能达到600亿卢布，甚至更多。重又收到大量来信和电报，从中可以听到被酒鬼闹得无法过日子的痛苦绝望的呼声。

当然，对反酗酒运动需要进行批评，但我认为，谁也不能而且也没有权利因此而幸灾乐祸和煽动偏激情绪。酗酒和酒癖是我们的不幸，是社会的悲剧，对全国来说，也可以说是慢性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遗憾的是，同酗酒和酒癖作斗争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

最后一点。我国现在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这些势力活动的劲头十足，咄咄逼人，在某些舆论工具中有强大的影响。这些舆论工具为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搞垮党拍手叫好，卖劲地将其吹捧为一种创造，吹捧为真正的改革。而对革新和加强社会主义则大加斥责，叫嚷这是保守势力的行动。

我还想谈谈我自己。我在对待真正社会主义、对待党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所采取的坦率的，甚至是毫不退让的立场，我的原则性（我重复一遍，我想不会有人指责我不谦虚）成了我被置于政治斗争中心的原因，同时还给我安上了保守分子，甚至是反改革分子的恶名。你们都知道，卑鄙的诽谤和荒唐无比的指责等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古人云，“真金不怕火炼。”但请相信，要顶住这一切可是不简单，不容易啊。

常常听到关于加强公民和睦和党内同志式团结的呼声，在这里也有人呼吁这一点。我赞成公民和睦，当然也赞成党内同志式团结。

但是，同志们请看，我们这里的情况如何呢？仿佛是按照某个人的命令，仿佛是来自某个中心，正按照一个著名的原则在搞一个侮辱人的阴谋：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现在有人简直把自己的整个队伍都投入了战斗，极力给全体俄罗斯共产党员抹黑，也有人大肆攻击军队，军队开始了

自卫。

同志们，除了改革之外，我看不出还有别的选择，除了社会革新外，我也看不出还有别的选择，我要全力同你们一道把自己的力量和经验献给这一事业。

我既不把自己列入保守派，也不把自己列入激进派，我只不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形形色色的轻率的激进思想、感情冲动的行为、心血来潮的做法，在五年的改革时间里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我主张循序渐进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逐步地——这并不意味着缓慢，逐步地——这意味着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水平到另一种水平。

同志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改革转向做实事。国家确实需要政治稳定。

确实，近来有人说，有党还是没有党这没有什么关系，改革照样进行。我不这样看。我们只有同起先锋队作用的党在一起，才能沿着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前进。没有共产党，改革就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非常可贵的是，我们把共产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置于正在进行革新的党的全部生活的中心。

我相信，而且深信，党将成为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生命力的、非常民主的政治力量，它的队伍是由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中坚力量组成的。我愿意终生同这样的党在一起，在它的队伍中继续前进。

（译自 1990 年 7 月 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列·尼·扎伊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

同志们！我是1985年中央四月全会以后到中央工作的。那时，我坚信改革思想是正确的，因为我作为工人出身的人，作为厂长，作为苏维埃和党的一名工作者切身体会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种体制的种种弊端。

我是在1986年3月，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委托我负责解决国防部门的问题，实现军备计划，研究国际政策军事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要立即说明的是，我决不想过高估计改革年代的成就，也决不想过高估计自己在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处理的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

如果我说国家的一切防御问题当时都汇总到政治局并严加控制，这并不是泄露秘密。这既涉及到研制军事技术装备问题，又涉及到军事建设以及制定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问题。

虽然政治局委员今天在我们党的会堂只是汇报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可我认为，不考虑过去，不深刻分析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就很难对我们工作的结果作出正确的结论。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这一点已讲得很深刻，而且我认为也很令人信服。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代中期的情况。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那时阿富汗战争还在进行，全世界，特别是东欧的形势日趋紧张。由于军备竞赛造成的沉重负担，我国的经济背



上了沉重的包袱。

应当说，当时掌握国家军事大权的人都经受了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综合症，体验到在达到力量均衡之前我们国家处于无能为力、得不到保护的苦闷。当然，如果存心要骂人，可以把一切事和所有的人都骂得一无是处。从今天的高度审视过去很容易，今天当个激进分子或非正式组织成员也不难。但是，历史是不能重写的，事实就是事实，无法改变。重要的是作出无愧于文明人的结论。

全世界都曾把我们看成是潜在的侵略者。谁也不愿意和我们打交道。当时必需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对国防建设和国际问题采取新的态度。

可以设想，为了使我们党的领导人能在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政治局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这个声明阐述了使世界局势根本正常化的行动纲领。

这就是现在世界上称之为新政治思维的开端。

你们还记得，当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外代表我们国家，同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进行了会谈。而政治局就是根据我们对会谈所持的立场提出建议的中心，并协调外交部、国防部、总参谋部及其他部门的活动。

为此，政治局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国际政策的军事技术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为裁军谈判做准备工作。委托我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其成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尼·雅科夫列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和其他主管部门的领导人。

关于该委员会的活动，目前还不便讲，不过，请相信，这是紧张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

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跨部门工作小组。其成员除了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的专家外，还有苏联科学院、总参谋部和工业部门科研中心的学者和专家。党中央国际部，尤其是设有负责军事政策问题专门机构的中央防务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工作的原则是：通过自由交换意见集体制订文件，就所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专人负责执行各项指示。还要强调指出，即使委员会中有一个成员提出异议，文件也要作进一步研究。这样就避免了任何一个部门把意见强加于人和可能发生的错误，保证了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我们工作的成果如何呢？首先是结束了阿富汗战争，随着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会谈、中导条约以及斯德哥尔摩军事信任措施协议的签订，世界的气候普遍转暖。其次，完成了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工作。

取消不必要的保密规定，公布国防预算，单方面的裁军措施也是活跃苏联对外政策的理由。不仅政治家，而且世界人民都信任苏联了。他们再也不把我们看作“罪恶帝国”了。

有人说我们对西方，首先是对美国作出的让步太多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保守分子也正是以同样的理由来指责布什总统的。

的确，没有相互的让步就不可能有谈判。但是，第一，我方作出的让步从未对苏维埃国家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第二，即使作出了让步，那也是由历史形成的苏美军种不对称所决定的。例如，在我们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当中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占多数，而美国是潜艇载导弹占多数。我们在坦克和大炮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他们的优势则是在舰载飞机和海军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力量平衡并在谈

判中达成协议，其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我举个例子。美国人四年来一直不愿接受我们关于按射程计算战略巡航导弹的立场。我们也不能向他们作出让步，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国防是否可靠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动用了全部外交力量，表现出了克制，最终获得了结果。

其他就不在此细说了，但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只是在对等的基础上，在不损害我国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今天已无须追求那种所谓“一颗子弹对一颗子弹”、“一发炮弹对一发炮弹”、“一枚炸弹对一枚炸弹”的均衡了。今天，重要的是拥有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抵挡住任何侵略者的最低数量的武器。这一点是苏联防御理论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防体系的神圣职责就是用最现代化的技术兵器装备苏联陆海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同我们的谈判伙伴做到所谓的步调一致，以免有人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同我们谈话。

过去一直由中央总书记领导的苏联国防会议就是以解决这些任务为目标的。从1985年6月起我就是这个会议的成员。对我们在削减和限制军备方面采取的步骤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及其对力量总平衡产生的影响，国防会议都作了估计。国防会议通过和批准了最重大的战略军事计划。

应当说，1985年以前的办法是：先由国防会议批准军备计划，然后是强制性的如数为实施这些计划提供所需的费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军工系统的膨胀。

在新的政治结构中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今天的国防会议是附设在总统之下的。

在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职能分开的条件下，党不应卸掉对国家安全方面重大问题所负的责任，但决策的重心要转向

国家总统,转向最高苏维埃。我想,我们不能破坏已建立起来的跨部门研究军事问题的机制。要在苏联总统下设的国防会议中运用这一机制的结构。

应该做自我批评的是,在工作中我们的措施不总是能跟上具体事件的发展。例如,我们往往不能为从东欧国家撤回的部队准备好社会生活条件,就属于此类问题。国防工程竟会遇到国内如此强烈的反对,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人们要求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导弹发射场,关闭古比雪夫州的销毁化学武器工厂、穆卡切沃雷达站和其他一些设施。在这方面我们的解释工作显然没有跟上。在停止生产过时的武器并减少其型号方面的问题至今解决得很慢。我们显然延误了解决批准国家军转民计划的问题。

在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仍然兼任国防会议委员和政治局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的职务。关于调到首都市委来工作的情况你们都很清楚。在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我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让党的干部有可能信心十足地、无拘无束地工作,吸收各部委为满足莫斯科的需要而努力,使国防企业为莫斯科的事务多做贡献。

至于做成了些什么,哪些事还未能做成,已经讲得很多了。关于一些具体的事,我在今年6月24日答《真理报》记者问时已经说过。

当政治局认为我应集中精力做与国防问题和军事政策有关的工作时,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同意了这一意见。莫斯科的同志们在我离开市委时,既向我提出了批评意见,又表达了良好的祝愿。这使我有权继续同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保持正常的事务上的联系。

现在我就政治局本身工作的气氛说几句话。这是一个真

正的集体机构。要求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深刻了解提出供讨论的问题。我可以说，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不会放弃自己对苏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决议应负的责任。

我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工作是我的幸运。我们诚实而勤恳地工作。我也没有愧对父老乡亲。

历史将为我们作出评价。然而我要肯定地说：只有团结一致和齐心协力才能前进。同志们，我呼吁你们朝这个方向努力。

还想说最后一点。1941年，当敌人逼近莫斯科大门的时候，大批新的力量开始涌入党内。但是也有人烧毁或埋藏了自己的党证。我并不想把今天的形势与1941年的形势相比。不过，现在也像在那个转折时刻一样，要求我们有不减当年的勇气。今天也应该表现出这种勇气，党需要这样做。

（译自1990年7月4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维·伊·沃罗特尼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

尊敬的同志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我分担着对这一机构通过的决议、对它的全部活动所负的责任。作为多年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随后作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当然首先对那些有关俄罗斯的决议负责。我有机会不止一次地在中央委员会历次全会上，在公众面前，在报刊等舆论工具上，就涉及全党事务和俄罗斯形势的许多关键

问题发表过讲话，通报自己的立场和行动。

今天我想表示自己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包含的评价和结论。在给我安排的时间里，我认为只谈某些方面是适宜的。

中央政治局是个集体机构，政治局的工作是根据集体原则、在讨论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辩论中每人都完全有机会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的方案。如果认为我们只是对总书记唯唯称是或者彼此随声附和，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争论，提出并讨论各种看法，辩论多次地延长，而且不止一天，但是最终我们几乎总是取得一致。

当然，从今天的立场结合积累的经验来研究某些决议时不能不看到，既有错误，又有失误。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不总是能够全面地仔细分析形势，对这些或那些事件作出审慎的评价。

有时，而且这需要自我批评地承认，我们的行动有时冲动，想更快地对社会发生的尖锐的政治进程作出反应，对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作出反应。当渐渐坚信作出的决议缺乏根据时，遗憾的是，没有及时地改正决议。结果，没有理由地丧失了时间，很清楚，这无济于事。

这大概是我们的最薄弱的地方。在这里表现出了党和苏维埃结构共有的痼疾——决议很多，而执行决议的具体工作做得很少。我所说的也完全适用于我本人。

但是，断言领导人陷入错误中不能自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否认改革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强大动力，否认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是进步的，否认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都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根本就是不诚实的。我想，报告中已经明确

地和令人信服地谈到了这一点。

有些人说共产党内存在深刻危机，共产党不可避免要发生分裂，我也不能同意这些人的观点。我相信，共产党仍然是人民可靠的政治领导。是的，一部分党员已迷失方向，不知所措，某些党员困惑于各种纲领之间。但我坚信，党会渡过这一复杂时期并保住自己高度的战斗力。

在我看来，今天的主要任务在于，坚决地踏上根本改革之路，消除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是中央政治局，而且也是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和俄罗斯各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领导所犯的错误。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尽管我意识到，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必须提高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水平。我们科学的普遍危机，特别不正常地影响了各个社会学科。遗憾的是，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很晚才开始加强共和国的科学潜力，而在解决改革任务时，本可以依靠这一潜力。

今天我们尝到了关于政治领导的形式及其实质本身的幼稚简单概念的苦果，这种概念是由于多年来（特别是在停滞时期）陶醉于党的舒适的垄断地位而产生的。我们为此付出代价。实用主义的、近似于唯意志论的态度深深扎下了根，落到科学和理论身上的只不过是给所通过的政治决定找论据了。是的，即使在今天，这种态度也很少有所改变。理论家们事后又要论证在改革情况下所出现的种种矛盾了。

举例来说，关于经济改革的内容和合理性的概念，就没有及时地形成。结果，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正在改正这些错误。但是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看看吧，讨论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任务，在居民当中引起了多大的恐慌。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思想在社会意识中毫无准备。但是，

要知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许多国家早就研究过它了，而且现在还在研究。

我想，对苏联社会民主化进程所持的轻率的，我要说甚至是很不切实际的态度也应该属于失误。然而，生活经常告诫我们，民主化只有作为一种有严格秩序的、可调节的、有法律保障的过程，才可能得以实现。特别是，不应该忘记，只有在稳定而可靠的国家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经济向市场关系的那种过渡，在所有国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如此。

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就是始终如一地实现党的机关和政府机关职能的明确分工的方针。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之后，好像大家都认清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但是，在解决这一任务时，说得好听点，我们却是不慌不忙。

可以满意地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注意到了俄罗斯联邦社会生活的问题和共和国党组织活动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在这方面我们照例是把重点放在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不应属于政治局的职权范围。但是党干涉国家和社会一切事务的做法，已经根深蒂固。

共和国经济生活中一切比较重大的问题都要事先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书记处审议和作出决定，这一点被认为是常规，应该说，我对此也没有产生过多大疑问。比如说，书记处往往绕过政府，对共和国各部和主管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听取各部门的工作汇报，或是农工综合体、住宅公用设施、生活服务业等企业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往往把地方苏维埃和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召去汇报工作。不错，最近不再采取这种做法了。

显然，对苏维埃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采取这种包办代替的做法不能不束缚他们的手脚，不能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此



外,这种做法破坏了对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妨碍了培养有主动性的有严格要求的人材。

我谈这个问题并不是把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和共和国各部委工作中很明显的缺点诿过于人。但是,我希望人们能理解俄罗斯领导当时开展工作的条件、为他们设置的框框以及我们对全联盟机关和机构的直接从属关系。当然,我们也绝不只是作为一个乞求人到那里去的,在那里我们往往发生认真的争吵。可是,无论是在政治局各委员会,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即便是长时间地就国民经济管理结构的改组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议,那又有什么用呢?

围绕建立农工综合体机构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应当说,俄罗斯领导人曾努力地积极捍卫共和国的利益,尽力参与提出适合俄罗斯条件的改革构想。

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尽力关心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需求,关心加强我国共同的经济潜力,同时也不让俄罗斯受到损失。

这里要提一提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把西伯利亚一部分河水南调的事情。引水灌溉中亚田地的主张曾经多次提出。但是,经过必要的科学论证后才弄清楚:提出的方案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危险。早在1983年,俄罗斯政府就表示反对调用西伯利亚河水的计划。不错,直到获得广泛的、积极的社会支持才给这个问题作了结论。

不妨再谈谈我们今天已经第三次提到的那场戒酒斗争。我们支持这场斗争,但同时也坚决反对试图把这种复杂的、牵涉面很广的运动变成一次竞赛的做法;比比谁能更快地压缩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可是直到1987年底才听从了我们的劝告。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转变……结果如何大

家都是知道的。

我们认为，不把共和国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像上级联盟机关所建议的那样统归一个主管部门领导是正确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你们现在可以判断，我们是多么正确。当然，总是能找到改进工作的形式和方法……

同志们，生活表明，现阶段的关键任务是加强共和国的主权。当然，这个任务不是突然出现的，然而在过去的年代，不能像现在这样广泛和大规模地讨论整个主权问题。只能通过中央机构和共和国机构之间已经确定的从属关系来对待这个问题。只有改革经济关系、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从而发现我国民族政策中所有空白点，才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加强俄罗斯主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解决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問題的手段，这是很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中有一个原则性提法，就是俄罗斯和联盟相互依赖的思想。把共和国看作是与苏联没有联系的单独实体的企图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认为，那些企图使俄罗斯联邦推卸对整个国家命运的责任的人，那些力图导致它孤立的人，是在把共和国推向不负责任的和毁灭的道路。

在代表大会上，把主权问题同人民政权机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这绝非偶然。这是统一的整体两个方面。为了调整权力结构还需要做不少的工作。例如，我们对从最高苏维埃到村苏维埃各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问题还考虑得很不够。党务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曾试探过这样做在实际当中会得出什么结果，他们趋向同意下述想法，即在村苏维埃、镇苏维埃、小城市或者区苏维埃中设立两个权力机构未必有此必要，而且这种做法会给工作带来混乱。

最后，在我们在族际关系领域存在着各种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局势是相当稳定的。俄罗斯人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我们也应当珍惜和保护各族人民的这一成果——他们几个世纪共同生活的结果，还应当捍卫居住在自己的历史故乡以外的俄罗斯人的利益。

同志们，毫无疑问，在苏共范围内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应当在完成所有这些任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我可以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某些政治局委员一样曾经对是否需要成立俄罗斯党产生过怀疑。然而，生活表明，现在这是唯一正确的决定，我们也同意这一点。当然，成立大会上的所有东西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致）的。必须认真分析它的结果，思考它的结果。我们相信，俄罗斯共产党将作为苏共的组成部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党应当深刻意识到自己对共和国和全国命运所承担的责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不应当降低苏共内其他兄弟党的作用。俄罗斯人应当始终不渝地争取全国所有共产党员行动的团结和统一。这是他们的义务，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我确信，俄罗斯共产党定能承担这一责任。

（译自 1990 年 7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  
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  
尤·德·马斯柳科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3 日）

代表同志们！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苏

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这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因此我对完成这项工作采取完全负责的态度。

1988年2月，我被任命为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并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项任命使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老实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主要的困难在于：国家计委及其领导人不仅要比国内其他任何人更清楚经济中和人民社会生活中尚未解决的和无人过问的问题的真正严重性，并且还有责任定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也许正是这点迫使我积极寻找发展经济的新道路，研究在调整国家经济政策方面的世界经验。重要的是，要在改革给我们社会带来的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找到合理的因素。

去年9月，我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我们公开声明：除了市场别无他途，并且开始了制订市场关系构想的极复杂的工作，探索向市场过渡的途径，研究过渡的后果及实现过渡的机制。下面谈一谈发展经济和改革生产关系的一些关键性方面。

谈到实践中未能奏效的最初的设想和所犯的错误时，应该指出下列几点：对全面加速经济发展问题作纯机械论的解释，过快地取消现行的社会生产管理体制，在缺少相应的经济调节手段和建立市场关系的一般经济素养的情况下在生产中实行选拔领导干部的制度，以及禁酒运动等。确定企业在新经营条件下活动的标准文件和经济法规实际上根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都可以干”这个口号起了消极作用。

结果是，国家管理机构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发展的许多

重要方面的控制，其中包括对居民货币收入调节的控制。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我们今年的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其后果是许多种产品的生产绝对减少。而最为严重的是市场上消费品的供应空前紧张。

苏联国家计委和作为计委主席的我当然应该对那些开始震撼我国经济的不良过程的发展负有责任。我们受到的主要指责是，虽然对某些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作过研究，在起草计划时也同加盟共和国国家计委一同作过分析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但是没有采取积极的有的放矢的行动来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在没有发达的市场关系和法制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过高地估计了各种可能性和经济核算管理方法。应当承认，在实现过渡阶段的正确决策时，尤其是当这些决策受到抵制时，我们往往还缺乏毅力和顽强精神。某些类别的居民肆无忌惮地捞钱，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苏联国家计委和其他一些机构采取了完全正确的决定（现在我仍然坚信这一点），但是，遇到工业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强烈反对后，就没再坚持下去。当然，整个政府都没有顶住极其尖锐的批评。不过，这不能成为我们辩解的理由。

作为过去行政命令体制核心的国家集中计划制度，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遭到破坏。在经济的运营和发展中，作为指令性法律的国家计划，已丧失了其决定性作用。今天国家依靠的是企业的计划，在经济方向改变的条件下，这些计划暂时还远远低于人民的需要。也就是说，国家计委在某一阶段上忽略了大家都想少生产而过好日子并达到经济平衡的这样一个苗头。很多人已没有可能再增加生产，而另外很多人根本不想扩大生产。军事工业转产民用品，对我国的经济来说是

一个完全陌生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使形势复杂化了。

所有这些趋向在我出任国家计委主席以前就已开始出现。然而很明显，我应该而且有责任作出比今天可算作自己成绩的那些事更多的努力。

请允许我就国家如何才能摆脱不景气和危机状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现在任何人都不怀疑，达到局势正常化的原则性途径在于：继续加强我国社会的民主原则，大力使用经济手段管理国民经济，加速经济的改革进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要求采取空前果敢的行动，然而令人关注的是，当前的社会不是在围绕着一个思想团结起来，而是相反，对于摆脱危机状况的途径和方法，有着越来越多的各种不同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一个掌握着有关经济中各种进程的最大量信息的机构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向你们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

去年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关于振兴经济和分阶段实行经济改革的措施。政府在为自己的纲领辩护时曾反复强调：只有当劳动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下，纲领才可能顺利实现。

然而大家知道，正是这个条件没有具备。一再爆发民族冲突和劳动纠纷。依赖心理、平均主义倾向和本位主义比以前更加严重了。许多人仍像过去一样，指望中央出面来代替他们解决问题，而且现在采取了强硬的、不容分说的专横态度，更以罢工来要挟。市场已开始取代计划，不过是采取了完全无组织的、无调节的形式。由于一心只想从过时的、“被扭曲的”价格体制中获得利润，企业开始拒不生产那些薄利的商品。

这不可避免地使企业之间业已形成的经济联系体系遭到破坏，从而使生产失调，使我们的发展速度降低。这就产生了

改变纲领实施办法和加速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迫切需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在政府中和在总统面前坚持的正是这一观点。应该坦率地说，以前，直至今日，都有人（从政府部门和从地方上）提议回到旧的、硬性集中的体制上去，似乎旧的体制能够稳定局势。天平也曾一度朝这个方向倾斜。

在第三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设想，就其内容来讲是直接来自振兴经济的纲领的。区别仅仅在于，它建议更加坚决地前进，以便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损失走出今日我们所陷入的“死胡同”，在这条“死胡同”里，旧的管理体制已不大管用，而新的尚未起到应起的作用。

同时，我们和过去一样，在准备向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时，摒弃了立即全面向市场过渡的所谓“震荡式”方案。不能硬要人民接受他们尚未作好准备的东西。必须让人民自己理解转向市场经济的每一步骤都是不可避免的和合理的。

对于政府和我本人来讲，都有责任阐明我们所选择的坎坷道路的全部真实情况。

我再强调一次：在执行已作出的决定时，我们常常未能及时制订出实际可行的机制来。而所提出的措施很难通过旧的管理结构来实施。这当然是政府工作中的一大缺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最正确的决议也会变得分文不值，然而生活已经不可能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了。

有鉴于此，正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说过的，在今年7—8月间政府准备制订出一整套具体的紧急措施。决定不再抽象地议论所有制的非国家化，而要确定它的具体实质和规模，规定通过立法途径来保证国家对企业活动的支

持,准备订出反垄断立法,为形成市场基础奠定法律基础。还准备与各加盟共和国一起最后商定:如何对待价格形成的改革,如何处理在市场条件下保障居民社会利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制订新的财政信贷政策的基本条例,根本改革对外经济活动,解决有关准备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系列其他复杂的和我们所遇到的新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在9月以前基本上研究完毕。

我认为有必要特别就国家的集中计划对市场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施加影响的问题,向代表大会说明我的原则态度。这个问题在当前不仅具有管理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和党的意义。

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行动实际上正在导致我们联盟的解体。而且,在这一进程中,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在同时起着作用,它们甚至破坏着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一切是在全世界都已从实践中意识到共同努力解决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仅会有好处而且也有必要的时候发生的。在这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上,匆忙和自负可能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最糟糕的后果。这些进程是不会自行消除的,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改变现状。像以往经受考验的年代一样,这里需要整个共产党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起特殊的作用。

我深信,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市场的自发势力会自动进行调节,所以我曾倡议并直接领导了制订提交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的文件的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利用计划原则来管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我相信,一个联盟国家如果不想遭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裂,不想发生社会动荡,而是力图保持自己的完整,保



持自己是一个各主权共和国的联盟的话，那它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机构来制订在社会、经济和国防稳定性方面反映自己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家的调节应保证把加盟共和国间最重要的经济联系合理地组织起来，保证建立全苏市场，使它成为既考虑到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又考虑到苏联整体利益的全国经济稳定性的基础。国家的调节应该成为保证苏联人享有社会保障的主要工具，成为协调国营经济、科技进步及国防能力的主要工具。预测和计划的核算，应该成为建立经济调节手段的工作的基础，而调节手段要指导物质生产领域中一切再生产过程，使之适应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要求。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改造苏联国家计委及其他中央经济机关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些机关的任务是确定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确定保证这一政策的实施的经济调节参数。在我们日常的实际工作中今天执行的就是这一原则方针。

从这点出发，苏联国家计委在从企业和组织开始的各级管理机构中展开了1991年计划的制订工作。制定这些计划时应该考虑到在扩大共和国、地区及经济单位自主权的情况下为经济向市场关系实际过渡创造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不能让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任意中断，以致成千上万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找不到伙伴。

对在可调节的市场的条件下利用中央计划方法采取这种原则态度，就有可能完全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选择。

在评价和选择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方案时，我始终坚持并将主张采取慎重和按部就班的态度。解决当前的任务用不着任何突击性的手段，要有连贯性和系统性。不能把个别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从整个经济中单独抽出来。这就如同生活本

身一样，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

经济中必须确定轻重缓急，这样才不破坏经济的平衡，在一些地区实行地方政策不能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而是要以整个经济力量的合成为基础。我不能接受那种来源于停滞的命令式经济的众所周知的公式，即：奉献出一切资源，即使损害别人也在所不惜。我坚持主张首先支持农工综合体，但是没有其他各类经济，农业也无法存在。我衷心地支持文教卫生工作者的呼吁。必须向这些领域提供一切他们所需的东西——从纸张到最新医疗器械。处理问题要统筹兼顾，注意平衡。

前一时期，对生产关系进行极其艰巨的改造，在进行这方面的具体工作的各个阶段，我都把苏联拥有统一的经济基础这一主要的客观因素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今后如果还委托我主持这项工作，我仍将这样做。在这方面我认为，保存、继续增加我们全联盟的财富和我国各族人民的财富的唯一途径就是新的联盟条约。大家知道，旧的联盟条约从1922年起就未曾修订过。订立新的联盟条约需要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组织 and 民族运动的通力合作，需要各加盟共和国议会及其政府、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及苏联总统的共同努力。

大家的目标应该是崇高的、一致的，那就是使苏联今后发挥这样的职能：让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并与其他各国人民和平相处。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愿意为之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知识的目标和工作。

（译自1990年7月5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的汇报

(1990年7月3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大概在整个苏联历史中，在各种性质和级别的党的会议上，没有过如此尖锐和激烈的涉及到我们党和祖国命运的辩论。我们这次会议刚才发生的情况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请允许我向代表大会汇报我在政治局不太长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情况，并说明自己的某些原则立场和评价。

在自己的全部实际工作中，我的出发点是：深信改革是摆脱我国在80年代中期陷入的那种绝境的不可避免的和唯一可能的方法。改革揭露出来的现实情况使人不再怀疑，拖延开始革新的每一年都孕育着不可预测的社会爆炸危险。因此，尽管我们今天经历着巨大困难，改革仍将作为净化和自我净化的开端，作为革命中的革命，载入史册。不管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发生什么困难和经受什么样的考验，这些困难和考验都不能降低改革进程的意义。

是的，国家、社会、党正在经历着危机。可以利用丰富的俄罗斯语言没完没了地谈论严重形势的原因，可以无所作为地高谈阔论。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变得轻松。今天特别珍贵的是采取具体的步骤、实际行动和有所作为。

对于共产党员和政治领导成员的我来说，忠于列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巩固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革新，是对待任何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的标准。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讨论问题时，我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点。

我认为在政治局研究 30 至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积极工作，是自己作为党员和公民应尽的义务。在这一工作中我依靠保安人员集体的支持，顺便说说，保安人员都想恢复真相，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良好名誉，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才是与过去的悲惨历史有关系的。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法院外判决的法律文件。我们的出发点是，恢复公正不仅是对死者的神圣纪念，这对现在活着的人和未来几代人都有意义。

我认为，以实际内容来丰富新政治思维构想和建设无核的非暴力世界，是我在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工作的意义。我是合理足够学说的坚定拥护者，这一学说可以使国家在保证国家防御能力情况下避免多余开支的负担。

在使国际局势健康化政策的范围内，必须克服对抗的老框框，寻求削减军备和地区冲突的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政治局的同志们，首先是同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和德·季·亚佐夫同志一起，我有机会直接参与调解阿富汗问题，多次到过阿富汗，会见各种力量的代表。我同所有苏联人一起感到高兴的是，苏联士兵回到家里，民族和解方针的正确性在阿富汗得到证实并且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很遗憾，今天也不得不谈论在我们自己家中寻求民族和解的问题。作为政治局民族关系委员会成员，我应当说，不得不在紧急状态下工作，忙于消灭此起彼伏的冲突策源地。不断来自全国许多地区的报道有时像战报。分立主义的滋长、族际冲突、人的死亡，所有这一切既是人的痛苦，也是保安人员每日斗争的战线。人们被杀害只是因为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在和平时代出现了数万难民。而且，这种事情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当你读到关于数百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又有数万人被赶出家园的报道，你就会觉得你远远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不立即制止暴力的浪潮，后果可能是无法预测的。毫无疑问，执法机关的工作曾经有疏漏，但是，你们会同意，同这类消极现象作斗争应该以有原则性的政治态度为基础。

尽管我从来没有像最近几个月在政治局这样紧张地工作过，但是整个来说对其结果我并不满意。光制订政治决定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实施监督机制，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失误。还应该学会在没有宪法第六条的情况下生活。我们常常按一种惯性在行政命令的路上滑行。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党的纪律，降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管他们身居何职。顺便说一下，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而且在我国诞生的党在这方面都作出了样子。

在当前尖锐的争论中出现了完全对立的观点和见解。人们并不愿意同阻止我们发展的种种现象妥协，他们在寻找真理。社会的健康力量，他们是绝大多数，力求找到最佳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得到解放，保证苏联人享有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过火行为和极端行为，不管他们来自哪一方，上述一切都会正常进行。

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民有一切理由坚定地说，在苏维埃国家风云变幻的历史上除了犯有严重错误和悲惨的一页外，还有许多积极的和光荣的东西。想要用黑色颜料来涂抹这一切的人，要么是什么都没有看见，要么是居心不良。我们看到，甚至有诋毁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绩的企图。但是卫国战争的胜利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力量的反映吗？不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友谊和兄弟般团结的优越性

的反映吗？！社会发展有过严重的扭曲，有过停滞年代，有过苏联人的精神被牢牢控制的年代。主客观原因都很多。但是难道不是党和社会从自身找到内部力量宣布了这一切和走上革新道路的吗？

我们对事物常常失去有理智的态度。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写道，西方的一切都是坏的，我们这儿一切都是好的。现在我们有些人又说西方一切都好，我们一切都坏。我们曾吸收过外国的经验，努力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除了有益的经验外，能允许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极的东西搬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吗？在苏维埃政权建立70年后，苏联人难道能接受大量失业的前景吗？我们难道能接受最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大规模犯罪和吸毒吗？我们难道能接受千百万人没有医疗服务和不能受教育的现实吗？要知道，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一切都存在。

我们走向市场，但不是走向亚当斯密式的自发的和漫无边际的市场，而是走向可调节的市场。因为在21世纪前夕，把我国投入市场自发势力控制中，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们在我们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开始发展合作化运动，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但是各方面都应该有经济标准和调节手段。我国形成了影子经济，财富上的分化日益严重，出现了一整个百万富翁阶层，人数以万计。一个极端是奢侈，另一个极端是艰难和困苦。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所有这一切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如果不及时醒悟过来，那么，在现在这种社会倾斜速度加快的情况下，我们或是我们的儿辈难道没有可能再搞一次十月革命吗？

今天已形成的分化程度向政治进程中的每一个参加者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以社

会主义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呢，还是别的，有别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与苏共角逐的许多运动和政党今天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想讲真话。但是迟早要露馅的。

有人用种种惩罚来威胁苏共，解散、自行解散、交法庭审判、政治诉讼等等。当你听到这些，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这难道不是搞政治活动的悲哀吗？

看来，对我们的一些对手来说，否定、不容忍其他意见不仅成了灵感的源泉，而且成了他们的政治生活方式。他们有时甚至把自己提出的东西也推翻了。

党的一项重要最重要的任务是，集中一切智力，为社会提出一项人们能理解的、现实的、正确的、强有力的、为苏联人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纲领。我认为，提交大会讨论的纲领性声明草案基本上符合这些要求。

谈一谈我对党的建设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我主张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在现阶段，我强调一下，在现阶段，即在我们发展的过渡阶段由一人兼任。如果不这样，就将既削弱总统权力，又削弱党。我认为，应该保留苏共中央总书记制度和政治局制度。政治局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最符合对党实行政治领导的要求。我支持在党内设立拥有一切必要权力的第二把手职位的建议。

代表大会应该团结全国的共产党员，坚决主张在寻找解决尖锐问题的方法方面同其他民主力量进行建设性对话。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克服不稳定因素，否则改革之舟就可能倾覆，大家都将落水。

同志们，民主化和公开性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旗帜。苏联人有机会大大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政治积极性的水平。在我们的报刊上出现了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政治家、哲学家、学

者(国内的和国外的)的名字。这一切丰富了我们的智力。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各种观点和这些观点的争论,我们将怎样生活。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主化和公开性与法制脱节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脱节。脱节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不能只主张大力发展民主而不主张法制,不主张法大于一切。允许嘲弄法律的社会已经自食其果了。

在现阶段,国家安全机关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人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干什么?简而言之,我们在干应当干的事情。而且我们干了不少事情,并及时地将其报告给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关。这些机关应当是什么样的,有力的和有效的还是软弱的和无组织的,这要由社会去决定。我的立场是,我们有可捍卫的东西,应该说也有办法来捍卫。

社会不能容忍对我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能允许不受惩罚地把人民的财富偷光并运到国外,不允许偷窃军事秘密和国家秘密,这些秘密包含着千百万人的劳动和利益。仅美国间谍波利亚科夫和托尔卡切夫——他们的堕落历史和对他们的审判我在报纸上公布了——就给苏联造成了实际损害,而给那些他们为之效力的人带来数十亿卢布和美元的利润。要知道,仅最近三四年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揭露了数十名充当外国间谍的苏联公民。

应不应该指责委员会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呢?如果我们有可能指责的地方,那就是工作效率还不够。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要求继续革新、思考它们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的作用和地位。改革涉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根本措施,使安全机关的工作在严格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进行,使保障国家安全不同社会民主化进程相抵触,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合法利益得到



维护。

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撤销了委员会的一个从事于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参与下，废除了反苏宣传鼓动刑事责任法准则。安全人员保护苏维埃宪法制度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崭新内容。

制订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并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第一次提出了从法律上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权利和义务明确固定下来的问题。其中包括遵守法制的可靠保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通过这一法律的主张引起某些人的反对。我们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党员代表支持上述法律草案。

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今天在广泛的公开性条件下工作。顺便说一句，公开性是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监督的途径之一。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工作能得到理解。在同人们交往过程中了解到许多问题，这迫使我们批评性地思考自己的活动，寻求并找到改善活动的途径。实际上公开性是在经常向公众通报工作过程和结果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社会联络中心并在地方上成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我本人也不拒绝会见劳动集体和各级苏维埃的代表，不拒绝通过舆论工具发表讲话。

国家安全机关既解决国外问题，也解决国内问题。

情报机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在国际生活的全部问题中，维护和平占绝对优先地位。遗憾的是，不得不指出，战争威胁现在依然实际存在。在这方面不应该有糊涂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存在的。情报机关所关注的仍将是使我国不被某种突发事件搞得措手不及。情报机关顽强地工作，以利于加强我国的国防能力和经济实力。顺便说一句，西方公开地说，西方不打算收缩对苏联的情报工作，而

且为此拨出比我们能拨出的要多几倍的资金。

我国的反间谍机构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同外国间谍组织的反苏活动以及同特工机构和国内的犯罪分子破坏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行为进行斗争方面。把我们所有的困难和失误都看作是特工机构“插手”所致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中发生的积极变化使一部分苏联人产生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反映出另一个极端：全部或部分地丧失了危险感，对苏联人民政权受到的威胁估计不足。

五年的改革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和民主需要保护。极端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他们广泛使用武器，煽动人们去干反国家的罪行。我们把制止煽动分子和极端分子的犯罪活动看作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家安全机构现在所注意的范围包括由于国内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增加而给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过程。最近我们的特工人员破获并切断了从苏联非法运出价值几千万卢布的战略原料、贵金属、艺术珍品的渠道。我们同检察机关和内务部机关一起积极参与了同贪污、受贿和特大规模盗窃社会主义财产行为的斗争。

生活使保卫苏联国界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接近需要改变保卫边界的观念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对保卫陆疆和海疆的问题中的许多方面进行重新审查。尽管一些地方政权机构提出使一切全都保持原状的建议，但我们确信，我们决不能这样做。我们将把现有占地 360 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地带缩小到几分之一。要知道，同志们，这个面积占我国内地的 1/6 以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保卫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在道义和政治上得到人民的支持。保安人员处在斗争的最前

沿,看来,你们也已看到,就连我们的武装力量也遭到了公开污辱和诋毁。有些舆论工具发表歪曲国家安全委员会活动的材料,而且我们国内出现的材料甚至比国外还多。有人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将机构分散,把部分单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到其他部门,或者干脆取消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机构本身。我们太使某些人头痛了吧!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坚决赞成改革,而且是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我们严格遵循法律条文,维护真理。服务祖国,忠于祖国的利益,是我们的全部生活目的。保安人员多半是苏共党员。在目前这个转折时期,苏共党员身份是国家安全机构人员的自觉的选择。因为我们认为党是为进步、为人民而斗争并同人民站在一起的充当先锋队的政治力量。同时我们尊重对政党、各种社会团体和运动的活动作出规定的法律。

最后,至于我个人的立场,我愿意在这个党的最高会议面前表示如下一点:我将永远同自我革新和革新社会的苏联共产党站在一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译自 1990 年 7 月 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国防部长 德·季·亚佐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3 日)

尊敬的同志们!大家知道,当前党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内的政策的基础,是由 1985 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奠定的。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使这项政策具体化了,确定了它的主要目标——确保苏联人民能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劳动。那

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确保国际安全的崭新构想。

今天,构想的公设已得到普遍承认。第一,确保核宇宙世纪的安全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这项任务应当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第二,安全对所有国家来说只能是普遍的、平等的、同等的。第三,安全不能用最高水平的,而要用最低水平的战略均势来保障。其中应当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各方的军事能力应限制在合理的足够程度范围之内。

这些原则已经变成苏维埃国家崭新的防御理论。贯彻这一理论是一项首要任务,我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和在1987年6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就立即直接参加完成这项任务。

请允许我向代表大会汇报一下在过去的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我们优先采取了两个步骤,体现了新军事理论的宗旨,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在军事领域中是言行一致的。第一个步骤是签署并执行了1987年的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第二个步骤是作出了苏军撤出阿富汗的决定,并于1988—1989年完成了撤军。

现在谈谈中程和短程导弹问题。你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了不对等的解决办法。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容易的。当时有人提出过另外的意见。经过对各种方案的反复推敲,对所有“赞成”和“反对”意见的权衡之后,为了全面销毁这两个级别的导弹、达到实际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才决定这样做的。生活证明,这一步是走得对的。

迄今为止,在短程导弹方面,我们彻底履行了条约,在中程导弹方面,销毁了80%的弹头和导弹。销毁中程和短程导

弹形成了武装力量重大的结构变化。例如，战略火箭军正在撤销六个火箭师和一个火箭集团军。

再谈谈从阿富汗撤军问题。同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主管部门共同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先是准备日内瓦协议，而后是直接撤军。这项多层次的工作由党中央政治局负责协调。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计划，撤军是从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进行的。撤军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打破了阿富汗反革命让苏军“血流成河”的计划。

对抗的减弱、世界发展中积极势头的加深，为进行深刻的军事改革开辟了现实前景。军事改革实际上在1987年就已经开始，在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相继开展起来。

其中第一方面是武装力量的改革，它是整个军事改革的核心。你们知道，我们曾单方面主动地大规模裁减了军队和武器。有关此事的决定是经过仔细研究后作出的，由米·谢·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宣布的。按照这个决定，1989—1991年期间，我国武装力量人数将减少50万人，还将减少1万辆坦克，8500门大炮，820架战斗机。截止今日，武装力量人数已经减少30万人。同时，有8.6万名军官已经退役，他们在军队中已经服满规定的服役期限。考虑到各军队集群和军区部队及兵团改为防御结构的补充措施，坦克数目裁减了1.5万辆，火炮裁减了2.1万门，战斗机裁减了860多架，水面舰艇裁减了28艘，还有12艘潜艇退役。

此外，我们还单方面主动地于去年12月20日前从华沙条约缔约国境内撤走了500枚核弹头。根据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达成的协议，规定明年年中完成从这两个国家境内撤走苏联军队，而今年年底以前从蒙古撤走苏军。

由此可见，我们正坚定不移地、目的明确地在苏联边境内建立武装力量崭新的防御性军队集群。

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西部军队集群暂时还留在那里，但是，同美利坚合众国有一项原则性协议：它们在西欧可以有 19.5 万名官兵。这大约为三个集团军。

同时，本着防御精神正在对武装力量的结构及其训练和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目前，已经解散 21 个诸兵种合成师，还有其他军兵种的一些兵团和部队，取消了战役机动集群，它是我军集群的重要进攻组成部分。从一些诸兵种合成师中取消了 20% 到 40% 的坦克。同 1986 年相比，在军队训练方面，战役战略一级的活动次数减少了 2/3 以上。在管理系统中，撤销了平行重叠的机构，解散了两个军区、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和五个步兵军的管理机构。总之，中央管理机构、各方面军总指挥部管理机构和各军区管理机构的数目已经减少 20% 到 60%。现在，我们正准备采取措施实现日内瓦和维也纳谈判协定。它们将涉及到武装力量结构的许多环节和几万人的命运。

第二个方面是根本改革军工生产及其转产问题。我们正在同国防工业各部门密切配合解决这一任务。计划大大削减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的生产，这将使民用产品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40% 增加到 1995 年的 60%。转产包括整个国防工业的 400 多家企业和生产军用产品的 100 家民用工厂。从转产前的 1988 年至 1995 年这七年中，民用产品的生产总值将达到 1100 多亿卢布。转产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大量开支，需要把国民经济和国防两者的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

军事改革的第三个方面是裁减国防拨款。你们都知道，

今年的国防预算已减少63亿卢布,即减少8.2%。本五年计划的国防费用比已批准的计划总共节约将近300亿卢布。我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是必要的。这些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状况决定的,但是,实现这些步骤要求我们进行仔细的、客观的和负责的权衡。何况我们是在世界形势非常复杂的背景下进行军事改革的。

西方并不十分急于放弃“核威慑”、“直接对抗”和“灵活反应”等惯用的方案。美国和北约的所有主要军事纲要和计划都在继续全力执行中。对保障国家安全采取慎重的负责的态度,要求我们在进行军事改革时使国家的防御能力和我国的武装力量保持在合理的同时又是绝对可靠的足够的程度上。我们认为,解决这项任务的关键是在实践中真正把各个方面的质量放在优先地位,在武装力量的组成、结构和技术装备、全体官兵的培养和训练、军事科学、解决社会文化生活问题等各个方面都把质量放在优先地位。处处都应该考虑质量问题。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提出了把质量放在优先地位的政治方针。在国防部的工作中,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中都在始终不渝地实施这一方针。

我们力求使中央机关的工作同军队的具体问题和任务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消除一部分军队干部脱离部属的现象。

我想告诉大家,武装力量面临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正在得到积极的解决。军队的改革进程、民主化和公开性进程正在不断深化。然而,还有许多问题解决得不够得力,效果不佳。对解决某些问题我们还很缺乏经验。

当前,保证军人及其家属的住房问题十分尖锐。尽管采取了措施,但我们仍然未能改善住房状况。目前,我们有17.3万名军人没有住房,如果加上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撤回的

军人，无房军人将增加到 20 万人。

地方政权机关经常完不成政府关于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住房的决定，使情况更加严重。目前，这方面欠的债已达 3 万套。实际上我们已动用了国防部拥有的几乎全部建筑力量来建设住房。已制定了全国专项社会计划，如果实现这一计划就能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状况。但是，没有地方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帮助，我们仍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加强军人纪律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必要讲一下，同 1985 年相比，陆海军中的违法次数减少了 25%，其中违反条令的行为减少了 40% 以上。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像党中央委员会要求的那样解决好这项任务。

不仅如此，1989 年违法现象的下降趋势停止了。我们又失去了很多人，抢劫活动依然存在，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抢劫武器弹药的案件时有发生。去年和今年，过去未曾有过的逃避服役和开小差的现象极为普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亚美尼亚、乌兹别克的地方权力机关所采取的违反宪法的行动。

族际纠纷和冲突，给军队的道德心理气氛打上了最深刻的消极烙印。在这类纠纷和冲突的影响下，陆海军内在历史上形成的友谊与军队团结的传统开始受到冲击。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准备，因此，要求我们共产党人深刻分析族际关系。

今年我们第一次碰到了有人试图有组织地破坏征兵工作。在亚美尼亚这种活动最为突出，那里中止了执行苏联义务兵役制法，春季征兵工作实际已经中断。今天，军队缺额 40 万人。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一些高等院校的领导人企图通过提前把中学生和生产技术学校的学生录取为大学生的办法，以逃避征兵。遗憾的是，这种举动不仅有人为之辩解，而且还得到了舆论工具的支持。举例来说，7月1日《共青团真理报》在一篇题为《又让大学生去扛枪》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这一点。

我想请《共青团真理报》和《论据与事实》周报的记者们研究一下军队的情况并回答：谁的儿辈在扛枪？（掌声）

大家都知道，军队中有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和消极现象，国防部、指挥干部、政工干部以及我本人的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在这方面我想强调指出，我一向主张，缺点、疏忽，尤其是形形色色的滥用职权和违法行为都应毫不妥协地揭露出来，并公开曝光。我觉得，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在这方面能起巨大作用。但是，我认为，不客观地、有成见地、不正确地对待军队问题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种做法将导致对服兵役、对军人职责和对保卫祖国的事业采取消极态度。

至于谈到我对军队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想法，对军队的现在和未来的看法，我想非常明确地说，我们的军队今后仍然应当是真正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军队。它应当是正规的、精干的军队，应当是在义务兵役制基础上按超地区原则建立起来的军队。今天常常听到军队非政治化的提法。我认为，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我们的军队只能按自己的明确宗旨来使用。这支军队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内稳定、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谢谢大家。（掌声）

（译自 1990 年 7 月 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格·彼·拉祖莫夫斯基的汇报

(1990年7月4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的代表大会正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大家都很关心关于党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辩论，这个事实令人鼓舞。这表明人们信任党，对党满怀希望。只有对有决定意义的和极其重要的问题，人们才这样争论。这场辩论是激烈的，提出的批评有时是毫不留情的，这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极其坦诚的谈话。

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作工作汇报的决定，迫使我认真思考了过去的整个这段时期，总结了已完成的工作和未完成的工作。我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后来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最高政治领导层决策的工作，因此我认为自己对整个工作结果负有责任。这些结果在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已经作了分析。我要强调指出的是，过去和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执行1985年4月制定的进行根本改革的方针，是自己对党应尽的职责，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改革把人及其关心的各种问题、利益和对美好前途的追求置于一切的中心。

我们是在一个极不寻常的时期工作的，每天都要处理几十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分析某些党组织内出现的具体的、往往是紧张的形势。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始终放眼未来，放眼改革向党提出的那些任务。

在我领导的组织党务工作部和1988年9月起我开始领

导的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中，这一点表现如何呢？

这个时期我们把精力集中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那就是在已经恢复的和得到的丰富充实的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深入研究和推行革新党的措施，以及党的所有组织自下而上目标明确的民主化，以便提高每个党小组的活动能力和每个党员的积极性。现在，党内围绕民主化的速度问题还在进行热烈争论。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正像生活表明的那样，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党本身也具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特点。除热切盼求变化和革新外，还表现出保守、惰性、墨守成规，甚至还有偏见。中央委员会在着手改变党内旧结构以及党内各种观点和对党的看法时，应适当地考虑到这种情况。

换言之，党内日益发展的改革进程不能脱离社会发展，不能脱离社会意识中已经成熟的对改革和进步的要求。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跟在变革的后面，而是要和各级党组织一起积极推动这种变革，走在变革的前头。否则，党在新条件下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确定基本工作方针时，我们注意到了所有这些看法。其中有几点我想详细谈谈。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改变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摆脱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形成的、不属于党的职能。

我们在和地方党组织一起为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准备的材料中就提出了一些激进的建议，那次代表会议的决定还在继续推动我们社会的民主发展。现在，我想你们都会同意我的观点：社会政治生活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党的活动条件和活动内容也根本改变了。这不仅仅是放弃了法律规

定的党的领导作用。这里的意义更为深远。我们改变了对党的活动性质,对党的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观点。

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新章程草案中。它是广大共产党员集体创作的结果,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建议。苏共所有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分子、科学家、专家、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参加了党章草案的讨论。关于这个文件的构想和草案曾多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过。

总之,应当说,我认为过去在章程草案中从没有进行过今天这样的尝试,从没有这样坚决地改变党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党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党内秩序。

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问题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认为,恢复党组织活动的政治准则,恢复党内同志团结,确认在苏共章程面前所有党员一律平等,用生动具体的内容充实党员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利和职能,是几项最重要的工作。基层党组织是我们的真正基础,而不是一种摆设。总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支持并要为一切有助于加强党员群众权力的事物创造条件。

基层党组织在决定自己活动的许多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克服了上级党委指挥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修改或废除了规定所有党组织要如何工作的指示,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基层党组织的自主性。

加强政治领导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对机关的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不再按管理部门划分机关,那种划分方法过去客观上导致了党的机关与苏维埃机关、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平行工作,直接促成了取代它们的工作。

重新认识党的建设最主要的基础之一——接受入党问题。从改革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过去那种分配名额的做法是

不正常的，扭曲了党的成分，把形式主义带进了接受入党的整个工作中。根据苏共中央一些部的倡议，通过了文件，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现状。第一次坚决声明，接受加入苏共的工作，首先应当建立在和人们密切交往的基础上。

后来直接在基层党组织进行的试验迫使我们认真考虑了在当前条件下是否还需要候补期的问题。我们考虑了怎样既简化又不歪曲接受入党工作的实质，让党组织按它们的想法自行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试验在党的新章程草案中得到了反映。

党内形势迫使我们认真考虑我们吸收党员和整个党员工作的内容。退党人数不断增加。去年 13.66 万人退党，今年看来将多得多（第一季度为 8.2 万人）。其中许多人认为留在党内是累赘，但也有人没弄清形势。

应当承认，我们对这些进程没有及时作出反应，没有深刻理解其实质。在这些进程后面的是活生生的人。应当不惜力量和时间去做那些能够在党的队伍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的工作。

因此，我想表示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员真正直接参加制定和实现党的政策的机会越多，入党的人也就会越多。这样，关于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之间疏远的说法就会失去任何根据。如果要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正是革新党的关键问题之一。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在工作中真正做到集体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确立选举产生的机构、党的会议、代表会议、党委全体会议至高无上的地位方面，在提高解决属于它们职权范围的问题的自主权和责任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我想，党内已经创造了使常委会、书记处等执行机构和相

应的党的机关按选举产生的机构规定的方针进行工作的先决条件。

我们希望，写入苏共新章程的有关这方面的条款将有助于发展这种做法。

苏共中央各委员会以及各级党委的各委员会的建立，有助于更充分地吸收选举产生的党的积极分子参与党的政治活动，扩大他们对制定决议施加影响和对决议的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可能性，有助于加强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作风，使工作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我们主张扩大这些委员会的权利。

我还坚信，只要善于集体地工作，教育每个党员尊重不同意见，就能使我们大家，使全党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条件下成功地开展工作，把各种社会力量团结起来。

由于党的干部政策改革缓慢、干部工作的失误，苏共中央和我本人常常受到公正的批评。我想要汇报的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以后，通过共同努力，清除了斯大林主义余毒的新的干部政策已经初具轮廓。主要是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整两年时间里，干部任免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干部任免决定中已克服了形式化的、上级任命的做法。在各级党组织中，已经从固定不变的由上面分配干部过渡到由各级党组织直接推举干部。

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这种过渡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干部进行了大规模更新。差额选举、与党组织协商、广泛地预先讨论党组织领导职位候选人等做法，均已付诸实践。

同时，令人不安的是，新一代党务工作者熟习政治活动缓

慢。党关心的是，让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没有行政命令综合症的和摆脱了固执的、已被生活抛弃的一套思想方法的人担任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但是，目前各级党组织的干部状况还不能尽如人意。

为了在干部工作中普遍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树立所有共产党员都能理解的干部变动的自然风气，吸收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这一工作，以及建立干部向选举产生的机构、党和社会舆论报告工作的制度，还需要做许多事情。

今天，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做法在选举过程中已很少有市场了。但由上级任命的做法还很普遍。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些工作，以便彻底根除老一套做法。

同志们，我想汇报的还有，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曾努力抓了一些党内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在广泛民主和集体领导的情况下，委员会提出和研究了全党关心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如吸收新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程序、新党章的构想、居民区工作、干部工作等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对党内生活的变化速度，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作出不同评价。但是，如果持客观态度，现在就可以说，今天的党和1985年4月时的党已经不同了。不论从什么角度——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党都变成另一个样子了。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也已变成另一个样子了。为了使党的面貌真正焕然一新，需要完善一些措施和作出新的努力。

我不想在这个讲坛上描绘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我十分清楚，我本人和我的同事们还有许多事情没做。老实说，在组织工作方面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我们在活动和工作中还没有根除老方式和老方法，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由于用老

方法处理新情况处处碰壁，同时导致政治工作失误，往往引起党务工作者和选举产生的积极分子的困惑和无出路情绪。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心。

最后，我想说，我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力求发扬民主作风，经常与同事们，与地方党务工作者商量。我知道，在代表大会前的讨论过程中对我提出了批评意见。我会正确对待这些批评的，因为我认为批评是正常现象。我将努力作出正确结论。

（译自 1990 年 7 月 5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阿·伊·卢基扬诺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我的工作汇报可能比我的政治局同事们要容易些，因为最近一年半以来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大家的眼睛下面进行的。如果说，这个大厅里的争论已经开始引起某些人的过敏性反应，我并不感到奇怪。因此，我不仅想利用这个讲坛来作工作汇报，而且想谈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国家最高苏维埃主席感到不安的一些事情。而且我的这个想法正好同我们小组的工作任务相一致。

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之后我担任党中央书记一年半，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近两年。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和作出了一系列困难的政治决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许多价值观进行了重新估计，确定了在民主基础上革新社会生活的道路。也是在这一时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



的一系列根本改革的方针开始形成。受政治局的委托，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这方面能谈些什么呢？我认为，筹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特别有意义和有成效的一段时间，这次代表会议在确定政治改革战略方面占有关键性地位。随后花了很多力量来执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决议。我觉得，正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真正感到了变革的清风。

大家明白，政治改革与其他一切重大改革一样，是一项集体的事业。经过争论，对比各种意见，论战，有时是长时间的论战，我们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作出了新的原则性的决定。自然，作为政治领导层的一个成员，我对作出这些决定负有部分责任。

费了不少功夫来起草修改宪法、制定新的选举制度、完善护法机关的工作、提高国家机关和政治机关效率等文件。在大量实际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学者的参加下，当时还制定了司法改革的构想，这一构想后来得到党代表会议的批准。为了发展这一构想，起草并通过了法官地位法、司法制度立法原则、关于提高检察监督作用的决定、关于扩大仲裁机关权利的决定，制定了关于改善护法机关干部物质状况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得到实现。

我还参加起草了关于加强军队纪律的若干问题，参加制定了我国现代防御理论，参加制定了军事改革的途径，苏联最高苏维埃很快将讨论军事改革问题。

除了法律和政策性问题外，我作为政治局重新研究 30 至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的成员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多。有人在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这一委员会在撤销非法判决、恢复成千上万人的名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

千上万件案件得到了处理，许许多多无辜受害者的党籍、荣誉和尊严得到了恢复。

这项工作也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因为要求恢复名誉的还有很多数量的冒牌“受害者”、过去的刑事犯、纳粹的走狗、民族主义匪帮组织的参加者。给这些人恢复名誉，简直是对成千上万的真正受各种迫害的人的亵渎。

当然，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最高苏维埃工作。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有过的崭新的议会。规定了它工作的新原则。重新确定了立法职能和其他职能。

我们对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各加盟共和国议会以及其他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经验评价不一。有些人看到的优点多一些，有的人把新的权力机关比作火车头，它把全部力量都用在高声的汽笛上了。

一般来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同志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没有谁能比苏维埃更全面、更充分地反映我们那种集会不断、情绪激昂、极左极右表现处处可见的社会状况了。

当然，这一切都给通过法案，讨论各种问题，采取决定打上了烙印。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苏维埃，别的议会了。如果说，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还有人把在议会中提出纲领或出现派别看作是一大灾害，那么，今天我们已完全平心静气地看待它们的现实存在和相互影响了。

我要坦率地说，做组织工作，进行管理，成为这样一个乐队的指挥——这个乐队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熟练——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应该说，现在全体代表都在学习，我同他们一道也在学习。我首先要学习保证在最高苏维埃内活动的

各种社会、政治、民族、职业集团，运动和联盟联合行动。

最近一个时期，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的工作量，苏联最高苏维埃系统和党的系统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了。我就不去说每天同人民代表的工作会晤以及处理来信和申诉的工作了，这些来信和申诉是非常非常多的。

最高苏维埃主席还有不少国际性事务。仅最近一年来，就同外国议会代表团、外国大使和其他代表至少进行了100次会晤和会谈。从实现新思维的观点来看，不久前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访问是不寻常的和有益的。

总的来说，我对我们已经做过的工作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也不能不这样。我认为，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解决得和做得更好一些和更有成效一些。我们已经通过的决定有错误，缺点和考虑不周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应该公正地说，虽然，我们大家都碰到了大量尖锐的、有时是出乎预料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迅速采取决策，我们经过自己错误的教训，毕竟有了进步。

现在谈谈对我们代表大会工作的几点想法。同志们，问题在于，现在苏共正开始进入可以说是全面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阶段。是的，对党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环境。但是，这也是唯一可能的环境。我们这个政党作为一定思想的体现者如今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应该习惯这一点。

我已经是第二年陷入各种争论的旋涡，会见各党派和阵线的领导人，会见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的发起人，会见社会运动和罢工委员会的代表、神职人员、退伍军人和青年。

从这些会晤中，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和社会上的讨论中，我越来越明确地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社会中意见和观点分歧越大，共产党员的立场就应该越鲜明。据我看，中央委

员会及其政治局的主要缺点在于，在这种全新的条件下党的组织团结和思想团结实际上没有提高，在这种环境下中央和地方党委发生了一定的脱节。

遗憾的是，我们代表大会上的气氛，据我看，也并非都有助于这种团结。我们听到的“不采纳”，“不选举”，“不支持”的口号是太多了。在这许多“不”字中，在这种否定气氛中，当然，反映了社会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苦恼，对实现不了的希望的失望，不再相信言论和许诺。但是，大家知道，只有在除了否定气氛外还有肯定气氛时才会产生力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不久前的俄罗斯代表会议上，我们都缺乏这种肯定的气氛。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一切是在我们的反对派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普遍的世纪末心理，给苏共扣的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帽子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发生的。

同时有人一直在向我们灌输：党内似乎没有团结的基础。我认为不是这样，团结的基础是有的。这就是改革本身和继续改革的必要性。这就是苏共章程草案，它在我们党的民主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是纲领性声明草案，这一草案为批评提供了广阔天地，据我看它可能是今天可以接受的克服国内危机形势的基础。

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完全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是党和苏维埃之间的关系将是什么样的，在加强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改革？

仔细分析一下全党讨论、全联盟代表大会和俄罗斯代表大会的进程和材料，首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们社会中党领导苏维埃的旧观念还很强。然而，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大家都清楚，这一问题本身对管理国家几乎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

为什么？因为，据我看，我们中央和地方最近两年发生的所有灾难中有一半，首先是由于各级党委实际上已不再管理国家，而苏维埃，无论我们怎么说，都不能担负起管理的职能。也就是说，在口头上，在会议上的一时冲动中，苏维埃似乎表现了自己的政权力量，而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却形成了权力真空。因此，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克服苏维埃的这种贫血症，使它们变成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工作机关。

为此应该做些什么呢？我首先要提出三点。

第一，应该尽量利用现在苏维埃的民主潜力，现在的苏维埃中有成千上万热心的积极的人，他们珍视自己选民的信任并想有所作为。我已经说过，要取得一致意见是多么不容易，要使苏维埃中现有的各派代表协作行动是多么困难。但是，举凡事业的利益占上风，而不是集团斗争占上风的地方，那里的健康理智就必然取胜，而狭隘民族主义的、集团的或个人的野心就必然失败，举凡政治偏见能服从共同目标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就能通过决定社会进步和人民福利的重大法律和决议。

因此，在国家议会中以及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应该更彻底地和更坚决地利用政治多元化带来的积极气氛，同时压缩它所引起的紧张气氛。出于这一原因，在党员人民代表中有人说，我们在不同“加油站”加油，但我们应该学会在同一车流中一道行进，不要争先，而要表现出合作和共同行动的愿望。用政治语言来说，这就是呼吁苏维埃成为真正合作、协调各种政治力量和运动的立场、寻求和采取经过权衡的人民需要的决定的主要场所。

我要指出，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止一次地

提出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结构中必须建立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工作部的问题。虽然晚了一点，但是现在这个部还是建立起来了。它要做很多事情，才能避免置身于事件之外。但是，应该考虑在地方如何组织这一工作，因为这是各级党委整个工作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今天特别尖锐的一项任务是，苏维埃如何掌握自己的新的经济权力和组织职能。今天我们不仅土地法实际上没有生效，就连大家期待已久的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一般原则法也没有得到实施。为什么？因为这个法的许多条款没有直接效力，而在各共和国中至今根本没有这种法律。在今年年底之前，无论如何应该通过这种法律。

如果看得更深一些，我们就会再一次相信，法律得不到执行，缺乏监督机制和杠杆，包括议会监督，这是改革的真正灾难。应该承认，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和各个委员会有许多工作做得很不够。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不小的责任。

特别应该谈谈苏维埃对遵守法律和保障法制的责任。这方面的情况是极尖锐的。它同社会不稳定，同护法机关的消极态度，同“街头大民主”对它们的压力，有时也同苏维埃本身对它们的压力有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有一个同犯罪作斗争的全国纲领，现在正在制定这个纲领。总统和政府正在全力研究这个纲领，最高苏维埃也十分关心这个纲领。

倘若地方苏维埃不起来同有组织的犯罪、影子经济以及其他反社会现象进行斗争，倘若我们全社会不群起反对这些犯罪现象，那么这场斗争是不会胜利的。

第三，共和国代表机构和地方代表机构的组建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在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新的最高苏维埃、地方苏维埃

及其主席团同执行机关的关系了。这里有很多事是很难办的。苏维埃主席团的任务是协调各常设委员会和代表的活动，但它们总想履行直接的管理职能。而习惯于指挥苏维埃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现在也很难在管理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甚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来自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代表也向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划分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只有在州一级和边疆区一级才行得通，而往下，在区和区属的城镇一级，尤其是在村镇，根本行不通。例如，沙特列娃同志昨天在发言时说，集体农庄有8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三个主席，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一个苏维埃主席，一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另一些人异口同声说，我们在地方上实行权力划分做得太急了。第三类人抱怨说，苏维埃主席团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间的“绳索绷得过紧”。

总之，同志们，这是可以理解的。谴责权力垄断是很容易的，而真正划分权力职能那就非常困难了。不言而喻，在制定新机制时应借鉴过去积累的经验，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得作出相应的决议。要知道，我们应当变得聪明起来，对应该纠正的东西必须纠正。

但是，健康的思想告诉我们，只有有一个强有力执委会的苏维埃，这个苏维埃才会是真正强有力的，只有下属每一个政权和管理环节都认真从事自己的事业并对其完全负责，这个苏维埃才会是真正强有力的。

即使不是在更大程度上，至少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代表机关和其他机关的权力关系问题也是这样。政治改革进程动摇了苏维埃联邦旧的金字塔。我们的联盟进入了根本改造阶段。而现在，在我们正处于通过新的联盟条约

的前夕，我们应该避免走极端——避免中央发号施令，避免完全从中央到共和国重新分配权力的做法，避免经济一体化道路上的地方主义，避免大家再次紧握一个拳头的企图。总之，这里需要有一个我们从来不习惯遵守的尺度。

革新我们的政治机关、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关，这直接涉及到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大家在讨论过程中已谈了很多。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现在政治形势的发展排除了苏共完全变成议会政党的可能性。同时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党应该努力学会进行竞选。斗争和在议会以及其他代表机关中积极工作的学问，这是一门很难的学问。

让我们坦率地说，今天已很难说党员代表在苏维埃里是一支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力量。其中有些人加入了对立的集团和派别，而有些人走上了同党的路线直接对抗的道路。参加代表大会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说，在苏维埃里有反共集团而没有共产党集团。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认真深思。深思一下，在权力代表机构里党员丧失积极性和内部纪律对党来说包藏着多么严重的危险。

因此，在苏共新章程草案中建议在苏维埃建立共产党议会党团以便推行有关党委的路线，这是非常及时的。奉劝那些否定党员在议会中或其他苏维埃中不仅要遵循自己选民的意志，而且要遵循党的统一路线的必要性的人认真考虑一下，党在苏维埃中的反对派是怎样工作的。可以相信我的观察，他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施加压力，退出会场，抢扩音器讲个没完，威胁要采用记名投票——显示尚未被民主集中制最强硬的捍卫者践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一致”和纪律。

我认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或是在新选出的党中央委员



会最近的一次全会上通过姑且称之为《关于苏共保障苏维埃全权》的专门决议。在这一政治文件中可以写入这样一个主要思想——党愿意在权力机关积极工作，巩固和支持它，向各级苏维埃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方案，广泛利用立法权，大力促进苏维埃决议的实现。

同志们，最后我想再谈一点。过去五年中我们学会了许多事情，有许多人白了头。但是有许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学会，首先应当记住，在剧烈的变革时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内讧和“自相残杀”。

现在，我们国家处在最困难的时刻，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像登山运动员那样，加强每个登山者之间的联系——加强党员之间的联系，社会内部的联系，承认社会主义选择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

我相信，我们党代表大会能够而且应该向这方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向根本革新党迈进，向建立统一的强大的全民阵线迈进，为改革而奋斗，为揭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我们伟大的人民过去有过的，我相信现在仍然拥有的强大潜力而奋斗。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鲍·卡·普戈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

共产党员同志们！我领导党监察委员会已经一年半，去年9月我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你们知道，苏共中央党监察委

员会也曾有过我们全党都存在的那些弊端。党监察委员会曾是苏共的一面镜子。党过去干预了经济、文化，有时也干预个人生活；党监察委员会也这样做过。同志们，过去就是这样，我应当讲出这一点。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多年以来，委员会实质上搞的是经济监督，取代了很多机关。然而，我们党的实际状况，党的纯洁、健康等主要问题却变成次要的事了。我面临的任务是使党监察委员会工作具有崭新的性质。

现在我们都直言不讳地说，党有病了。贪污、本位主义、官僚主义、讨好逢迎、说谎等丑行从内部损害了党。这就是为什么使党健康起来的问题被提到了首位的原因。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我们从根本上改组了委员会，撤销了过去监督各部、主管部门、各种经济机关的分支机构。这样就有可能集中精力处理党内问题了。我们研究了如何在党的工作中真正确立民主、公开性和集体领导制的问题。

委员会同共产党员，特别是同领导人形形色色的滥用职权，同违犯党的纪律，同压制批评，同官僚主义表现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党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直到把有过错的人开除出党。剥夺了蜕化变质分子梅杜诺夫、丘尔巴诺夫、纳斯里丁诺夫的党证。经过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解除了乌克兰共产党切尔诺夫策州委第一书记尼瓦洛夫、伏尔加格勒州委四个书记的职务，处分了阿穆尔州56个党员领导人等等。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了解这方面的工作的，因为报刊上刊登了委员会的所有决议。

恢复共产党员的名誉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过去那些被赶出党的人，在停滞年代受到诬陷的人都要恢复

本来面目。保护他们的荣誉和尊严，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项任务，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顺便提一下，委员会恢复党内名誉的决定在地方上常常遇到顽固的抵制。这使我们确信，恣意妄为、独断独行的细菌已经渗进了党的所有环节。

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党要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到镇压的共产党员恢复名誉的问题。作为政治局下属委员会的成员，我想告诉你们，这项工作的主要部分恰恰落到党的监察部门了。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劳动的工作。我们工作人员的心灵深处感受到受害者那种无尽的恐怖和亲人们流淌成河的眼泪。现在关于镇压迫害已经谈得太多了，有的人对它已经有点麻木不仁了。然而凡是直接接触到这场悲剧真相的人都知道，无法无天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啊！在翻阅档案时，你就会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他接受了革命，可他却是一个敌人。一个妇女，一个多子女的母亲也是敌人。军人、党的工作者、教授、文艺界人士，他们全是敌人，敌人。不，同志们，这不是错误。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个严重的罪行。只要最后一个无辜遭到迫害的人不平反，我们就不会得到宽恕。我们一定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你们可以对此坚信不疑。

为了使你们对党监察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我来列举几个数字。一年半以来委员会为向我们上诉的198人恢复了党籍。实际上这占上诉人员的一半。为390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名誉。处理了5.4万封来信。

当然，问题不在数字。但是在每个申诉的背后，在每封信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和遭遇。我们竭力帮助每个受侮辱和受委屈的人。

同志们，我扼要谈谈停滞给共产党员带来多少灾难。在许

多党组织内，伪善和欺骗、赤裸裸地捞好处、为了达到卑鄙和微不足道的目的而滥用崇高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准则。而党监察委员会过去对党的同志式团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等问题显然估计不足。要知道，这些问题是党的血液循环系统。没有这一点党就无法生存下去。

人们常常问我：“党监察委员会在加强党的团结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立即要说：我绝对不同意有人想把党监察委员会变成党的裁判所，变成党的大棒，无法无天打击不同意者脑袋的组织。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类现象，大家都知道，这类现象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我本人反对那种“铁的”团结，这种团结窒息人的思想和行动。你们知道，现在苏共内部都有哪些派别。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各种派别现实的体现者。我们在一些最严肃的问题上确实有分歧，对党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知道，也有许多东西使我们联合起来。我们都主张有一个强大的党，主张改革最终能够加快自己的步伐。既然如此，是否需要人为地加剧形势，使问题发展到分裂的地步呢？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团结。我们需要的是只有通过苏共的革新才能达到的那种团结。党已经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样继续干下去了。对权力的垄断已经结束，不能为了狭隘的党的利益，其实是个人利益而抓住权力不放。必须意识到，党的许多旧有职能根本就不再需要了。那些职能已经过时了，甚至阻挠改革和民主化。

我明白，塑造党的新面貌多么艰难，但是，不这样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团结劳动人民的政党，成为将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政党。改革党的深刻意义就在这里。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还有什么个人得失好考虑呢？

我作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同许多人会晤过，谈过话，其中包括所谓的党内极端派人士和各种纲领的拥护者。在所有这些谈话中，我都直截了当地、坦率地谈到了极端主义——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的危险性，谈到了党的队伍分裂，党按照民族特征分家的危险性。我相信，在解决这些复杂而又微妙的问题时要把重点放在对话上，放在寻找一致意见上，我们做的绝对正确。

同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坚决措施。例如在杜尚别发生那些人所共知的事件时，委员会曾经帮助过塔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有些实质上企图搞政变的党员领导人已被开除出党。

对此我想谈一点情况。地方上有人跟谁都不想搞坏关系，想躲在我们背后。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们应当帮助各级党组织研究形势，进行检查、提示和商量，而由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是这样做的，追究了煽动民族不和的肇事官员们的责任。我告诉你们几个数字，32名党员领导人被开除党籍，61人被解除职务，418人受到党纪处分。

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我知道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追究停滞时期有过错的人的责任。被点名的有格里申、阿利耶夫、库纳耶夫、罗曼诺夫和其他一些人。作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我对此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是党的监察，我们做的纯粹是党的检查工作。我们不是侦察员，不是法官，不是检察长。苏联检察院——我本人曾经就这个问题询问过他们——说，没掌握有关这些人为了私利滥用职权的事实。如果缺乏事实，那么又根据什么立案审查呢？政治错误吗？的确，政治家应当对自己作出的错误决定或对自己的无所作为负责。但负什么责任呢？政治责任。

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大会可以委托未来的、将拥有更大权力和更大可能性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制定一种为政治错误追究党内责任的机制。中央监察委员会还要确定追究那些使国家陷入停滞的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责任的尺度。

我应当本着自我批评的态度承认，我对委员会的工作和对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满意的。思维的情性尚未彻底克服。虽然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最近实际上已经更新了，但是我们仍未能完全摆脱那些经济问题。显然，这比处理那些党内热门问题要简单些。处理热门问题不仅需要知识、经验，而且需要党性原则和一个人的敢担风险的精神。但是，老实说，党监察机关的从属地位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同志们！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了撤销原来那种样子的党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问题。党员们当时就感到这两个机构不符合时代要求。我认为情况的确如此。

我认为，党在某些历史阶段犯错误，甚至遭到完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来自群众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治监督。党的监察机关过去实质上是行政命令体制的驯服工具。不管名称如何，它总是处于“从属”地位。问题甚至不在地位，也不在主席本人，而在过去年代的党的领导人恰恰需要一个能放在衣袋里的监察机关。

党监察委员会主要做了些什么事呢？检查了下级党的机关执行上级党机关决定的情况。可是各级党组织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监视者呢？对修正党的决议提出建议，有时也对决议提出异议，这是做的另一项工作。有这样一个事例：我们代表大会很喜欢谈的一个题目是反酗酒运动。你们都会同意，我们开始干一件好事，但是结果如何呢？禁止，销毁，关闭。党监察委员会也插手了。不应去干预，而应是警告和提示另一类解

决办法，也就是承担起反馈职能。不过，那个时候的党监察委员会未必有能力这样做。然而对于新的最高监察机关来说，这项任务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最后一点。我本人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作出了什么贡献？

第一，我到处在捍卫一种思想——自主与独立的思想。我多次到地方视察，会见党的积极分子，阐明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第二，在我们的倡议下，许多边疆区、州、市、区党组织作为试点建立了监督检查委员会。这种监督形式证明是正确的。它有了更多的拥护者。第三，领导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起草工作小组。这个条例怎么样，要由你们各位代表来判断。我只说明一点，这个条例包括了我本人对监察工作的理解。

我谈谈两个最原则性的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加强党员直接进行监督而成立的。我认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是这个委员会的骨干；中央监察委员会首先是为了监督党的各中央机构的活动而成立的。

不言而喻，根本谈不到任何双重权力的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应经常高踞在党的各高级机关之上，干涉它们的工作，拿一些小事去打搅这些机关，招人讨厌。我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充当党内某种宪法监督的角色，注视各中央机关的决定是否符合党纲和党章条款，在各中央机关的活动中是否遵守了民主原则。实质上过去没有向监察机关提出这些任务。

我主张建立这样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用列宁的话说，它的成员应当“不顾情面地”坚持做到不管什么人的权威，无论是总书记，还是中央其他成员中的哪个人都不能妨碍他们提

出质询，检查文件以及无条件弄清案件的情况，并使案件得到最正确的处理。

我主张我们党有一个强有力的和独立的最高监察机构。

(译自 1990 年 7 月 7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 副主席亚·帕·比留科娃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5 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我是苏共中央书记，从 1988 年秋天起，我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这整个时期内，我负责处理社会问题，因为我还是苏共中央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委员。要在 20 分钟的发言中把差不多五年工作中的问题谈清楚，说出自己在苏共中央和政治局的集体活动中的个人贡献，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尽力去做到这一点。我想首先强调指出，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从一开始就坚决地采取放弃所谓剩余原则的方针，转向优先考虑社会领域的问题的方针。对这一点，政治局过去和现在都是观点完全一致的。自然，也出现过意见和观点上的分歧，不过，这些分歧通常都不涉及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只是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有关。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得到全体政治局委员，首先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的理解、帮助和支持。我完全同意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政策的评价和结论。我认为，尽管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种种问题和困难，但是五年中我们还是做到了主要的一点——为国家国民经济发展面向社会的转变过程、为把国



民经济的发展充分纳入改善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渠道现实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我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事情依我看是办到了，什么事未能办到和为什么未能办到？

我从最尖锐的，恐怕也是给人民的生活、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造成最大困难的问题开始谈起。我是指消费市场上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做了些什么呢？

我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直接参与的一项工作，是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首先是在轻工业部门开始推行经营管理的新形式。

在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时，仔细分析了这个生产着40%非食品消费品的部门的整个状况。状况是严重的，实质上是危机性的。其基本原因是，为了充分发展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而需要的投资不足。你们自己来判断一下，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只占约14%，而对这一部门的投资比例一个五年计划比一个五年计划低，到这个五年计划它只占2.5%。正因为如此，我才尽力所谓打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88年至1995年轻工业企业技术改装计划的决定，争取吸收外国贷款来购买设备，由外国公司来建设13个鞋厂和5个皮革厂。

为实现对这一部门技术改装计划，拟定拨出200亿卢布的各种来源的投资，这要比本五年计划的投资多一倍。非常重要，要真正拨出这笔资金，而且主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这笔资金。否则我们就要失去这个对人民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如果认为我们能靠进口来供应3亿人口的服装和鞋，那简直是荒唐。整个欧洲和美洲加在一起都不能满足我们对服装的需求。

早在大家大谈特谈“转产”这个词之前，就根据我的倡议，

在政治局和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实际行动,广泛利用国防部门的潜力为社会领域的需要服务。使国防部门为轻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商业、生活服务和加工部门生产设备。把原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机器制造部的企业和科学设计单位移交给了国防部门,这个部在它存在的25年中始终未能保证它所服务的部门的科技进步达到应有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所有部门都参与消费品的生产。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作出这种坚决的转变,远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不去列举其他的措施。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整个四年中,得以增加了500亿卢布的非食品商品的生产,这超过整个前一个五年计划所达到的增长额的60%。那么为什么居民们感觉不到商品增多呢?因为,稳定市场的一切努力都被居民现金收入增长的强大浪潮冲垮了。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详细谈到了这一点。现在还未能阻止这一趋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在继续发展。

这些年来使我坚信,我们未能大大增加商品生产的原因还在于实行经济改革的行动不彻底,没有对增加消费品生产的科技潜力和生产潜力给予应有的注意。今天,用于这方面的固定基金的数额太小了。“甲类”生产潜力中只有3%多一点用于这一目的。只有14%左右的固定工业资产用来生产商品。

要在最近几年内改善对居民非食品商品的供应,就应该使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能力比本五年计划至少增加两倍到三倍,就应该大力发展生产这些商品的原料基础。在这方面已采取了某些步骤。例如,大大增加了国防工业和机器制造部门对耐用商品的生产,并且首先是使现有的企业和建设中

的企业改变产品品种。

扩大商品生产的重大潜力在于更好地利用生产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制定出使劳动集体关心尽量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机制。最后，要像一切先进和文明的国家那样，至少在两班时间里利用生产能力（而目前普遍都在实行三班制或连续生产进度表）。

最后，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在农村地区建立生产商品的中小企业、分厂和车间，并且广泛利用多种所有制形式。这将使我们能够为一系列地区解决一个尖锐问题——为有劳动能力的待业居民建立工作位置。

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得越顺利，我们实现上述任务也就越快和越有成果。这是满足有支付能力的居民对高质量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的光明大道。

我的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苏联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我执行党的路线，具体制定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一整套符合现代标准的制度，直接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对一系列重大立法文件和标准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工作。我仅举出其中的几项。

退休金法已通过，它改善了约 6000 万人的生活。一读通过了休假法，大大延长了假期的时间。已通过的《关于改善妇女地位、保护母亲和儿童、巩固家庭的紧急措施的决定》将大大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家庭生活条件，根据这一决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就实行一岁半以下婴儿补贴，每月补助 70 卢布。

社会领域中最荒废的部分之一——社会赡养得到根本改善。老年人和残疾人之家增加了 80%，开始发展对我国来说是新的国家赡养单身汉和老年人的形式，如老年人和残疾人

社会救济上门服务 and 地区服务中心。

改善妇女地位的国家计划、苏联国家青年政策一般原则和这一政策基本方针概念法、苏联残疾人社会保障原则法和救济残疾人国家计划都处于草拟和制定阶段。

社会上对于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反应，尖锐地表现出人民对自己的物质状况以及过渡时期和市场条件下社会不稳定的担心。

我还兼任苏联部长会议社会发展局局长，在这个局的直接参加下，苏联政府目前正在草拟一项计划，其中规定了一整套措施来保障居民不受生活费用提高、失业，以及其他可能的市场经济不良后果的影响。

据我看，在向市场过渡的情况下，居民遭受一定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和政府的义务是使这种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特别是绝不能使低收入阶层、儿童和青年学生受任何程度的损失。要公正地使各类居民分担重担。作出过渡完全无害的承诺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当居民意识到他们的希望破灭时，不仅会引起他们对市场改革的失望，而且会引起他们的反抗。

现在再谈谈我另一个方面的工作，说心里话，它使我大伤脑筋。这就是对居民的保健和医疗服务工作。在本五年计划中，由于政治局的坚定态度，我们真正地发展了，我甚至要说是复苏了我们的保健事业，大大增加了发展保健事业的预算拨款和投资。但是，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在极其危险的关头采取措施的，我们制定和采取必要措施不仅晚了几年，而且是几十年。

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诊疗所和门诊部网点扩大了。建立了诊断中心。到今年年底诊断中心将有 40 个，而

到1993年,应该使每个州都有这样的诊断中心。

农村的医疗服务有了迅速的发展。居民平均寿命下降的趋势停止了。儿童死亡率大大下降了。

然而,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有些问题还是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就像脚镣一样妨碍我们保健事业迈步。由于医疗器械供应时有中断,使医务人员的努力受到削弱。有几十种设备国内根本不生产,而没有这些设备简直谈不上现代医学。连必需的用品,如手术刀、剪子、针头、输血器械都供应不足。这些东西价格低、费工,企业根本不生产。生产一次性注射器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不错,部长们曾保证将完成这些东西的国家订货。

现在药品问题也未能解决,虽然四年中国产药品增长了35%。尽管外汇困难,但是政府还是拨出了足够资金向国外购买重要药品。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自然不是个办法。

要满足保健机构和居民对药品的需求,只有一种办法,即大大增加药品的生产。在这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但是我们也常常碰到生态运动和地方当局的抵制,他们不同意建立新的生产能力。不仅如此,甚至还关闭了现有的生产药品的企业。

我意识到,我在这方面负有多大责任。但是坦率地说,20年来在这方面奉行的政策是完全不合适的,形象地说,是“犯罪”的。我仅给你们举两个数字。最近12年来(1977—1989年),向社会主义国家购买了几乎100亿卢布的药品。即使按最低利润率30%计算,苏联也为发展经互会国家的这些部门投入了30亿卢布以上的资金,而用在发展自己工业的只有13亿卢布。

但是,我显然应该表现出更大的严格要求精神和毅力,争

取完成国家和政府的决定，更灵活地同地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协作。透过种种困难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可以看出社会领域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即技术至上的框框还没有打破，不少干部，包括党的干部，仍把社会问题看成是第二位的问题。

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想强调指出，我相信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内容是正确的。民主化、公开性、经济和政治改革、革新苏联，这就是最宝贵的并且我认为是不可逆转的成果。对我们大会代表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批判地分析改革的实践、改革过程中的误算和错误，不要把遇到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归咎于改革本身，而是要消除一切妨碍改革的东西，帮助改革健康地发展。一切想倒退的企图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只能带来总是由人民身受其害的大震荡和大灾难。

我们应该也能够作出合理的妥协，非此不会有认真负责的政策。

为了达到政治稳定和苏联人的幸福，我们应该也能够保证全国的公民和谐。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亚·弗·弗拉索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把自己向代表大会代表作的工作汇报看作是民主化进程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实际表现的一个事实。这里首先是指在党员关系中克服上级任命和按资排辈的观点，是指坚决抛弃把党员分成发号施令者和执行者的做法。换

句话说,就是指恢复真正的党内同志关系。我认为,采取这种工作汇报的做法就是恢复集体领导制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列宁思想。

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已经具体地分析了党的改革和革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政治方针的实施情况。这一方针是党的集体思想和集体意志的结果。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一方针的制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最先提出的。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进行了目的明确的、紧张的和创造性的工作。为了通过每一项决议,专家、学者、党组织、党的委员会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并考虑了民意。但是,最近对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批评,其中也包括对个人的批评日益强烈,这已不是秘密。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正的。当然,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对方针的正确性,对所犯的 error 和失算首先负有责任。

我强调负有同等责任,是因为这里指的是集体领导的机构。这决不意味着,政治局的工作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过长时期的和激烈的争论,不同意见的交锋,捍卫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少数地位。

例如,在中央三月全会之前制定新的农业政策时,在讨论中央十二月全会文件时,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还有,在审议中央委员会公开信〈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奋斗〉时,我和另外几位参加会议的人认为,必须就这一问题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我们的立场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现实生活证明,通过下达指示信来解决这类问题是无济于事的。通过这个例子,我想强调指出,我作为共和国领导人之一不是总能论据充分地 and 令人信服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不是总能承担

责任。发表讲话或者批条子，这不意味着解决了问题。主要的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使思想得到合乎逻辑的贯彻或者形成政策。

自然，在制定党和国家的总方针时，我的任务就是尽力做到更充分地考虑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和特点。而且我把自己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事同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直接联系起来。

我想指出，在我担任这一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正是党向苏维埃移交权力的积极进程开始时期。如果说以前共和国的许多经济问题、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是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决定，那么最近两年这些问题的一切责任就由共和国、地方政权机关承担。在没有成立共和国党组织时，这就需要部长会议领导人负特别责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处于一种什么状况，现在大家不论是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还是从第一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都能看得出来。

同一时期也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俄罗斯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以及关于共和国主权的问题。老实说，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就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众所周知，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社会经济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触及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尤其是我们共和国种种方面的政治问题。我们共和国是联邦共和国，有 31 个自治实体。当然，一切原则性问题需经政治局讨论。需要制造舆论，通过政治决议。

共和国政府在对民族和自治地区的情况进行经济分析、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具体建议，俄罗斯的问题第一次在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1989年）的材料和



文件中得到反映。这是一个转折关头。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必须制定经济主权的构想，从基层环节，即地方苏维埃开始制定在自治和自筹资金基础上的新的管理原则。为苏维埃在新条件下的活动创造法律基础，制定自治实体联邦地位的文件。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政治局里讨论过，而且通常都得到了支持。

但是，也应当说一说另一方面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为时过晚，并且缺乏足够的深度。我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提出关于建立共和国过去所缺少的那些共和国管理机构的问题，以便获得完全的国家主权，解决建立共和国新闻系统（共和国实际上没有这种系统，只有两家报纸）的问题，解决成立俄罗斯科学院、内务部、国家民族问题委员会的问题，以及建立其他国家机构。政府在第一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都详尽地谈到了这一点。报告已经公布，看来没有必要再谈这些问题。

我要指出的是，所做的工作、所制定的经济主权构想、所通过的一些地区向新的管理原则（自治、自筹资金）过渡的决议，还有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文件，都为宣布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过渡时期条件下，在政治局的支持下，还解决了其他一些刻不容缓的经济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也应当承认，我们还未克克服俄罗斯联邦经济中的消极趋向，消费市场的形势继续紧张，财政的不平衡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我们还没能根本改变社会领域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在非黑土地带、西伯利亚、远东这样的地区。一些地区，尤其是极北人口少的民族地区的综合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拖延了下来，而且我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没能利用我所拥有的一切机会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联盟机构中具体地和更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以便监督

有关这方面现有决定的执行情况，制定出在根本经济改革条件下的新方法。

遗憾的是，最近政治局放松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已委托中央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去做。当然，我绝不是想回到由最高政治领导来决定经济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的那种局面。同时，我坚信，制定既符合共和国也符合整个国家工人和所有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今后仍应当在党的活动中占有关键地位。在这方面党的不介入只有利于那些急切想得到权力的反社会主义势力。

我要特别谈谈政治改革问题以及党和苏维埃职能分开的问题。应当承认，在党将权力转交给苏维埃问题上，在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开的问题上，我们是毫无准备的。连构想也没拿出来，工作进行得毫无章法，如常说的是摸索着进行，没有制定出地方苏维埃机关的结构和职能，这些机关沿袭了党委会原来的结构，没有考虑到经济改革和向自治和自筹资金过渡。毫无疑问，这对执行机关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地方所建立的经济计划总局时至今日实际上还处于未被批准的状态，关于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法的起草工作被拖延了下来。一句话，党把经济职能转给了执行委员会，而苏维埃对接受这些职能却毫无准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未落实。

在人民代表苏维埃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开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情况。这个原则本身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却采取了形式主义态度，而在村苏维埃这一级我可以说竟然闹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无论是市一级，还是区一级，都有问题。权力的这种划分，除了滋长官僚主义和增加同执行委员会相互关系中的磨擦外，我想，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自然，我们不能等待指示，现实生活要求自行作出决定。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制定了执行机关的结构，起草了法律基础，这既是共和国的地位，也是自治的地位，等等。主要的是我们已把解决一切结构问题和编制问题的权限交给了地方，使执行机关、地方苏维埃、人民代表苏维埃自行解决这些问题，从1991年起向自治和自筹资金的新原则过渡。由它们自己解决问题，它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结构，需要多少人员编制。

看来，我作为同苏维埃机关工作有直接关联的人，应该在这里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坚定性和彻底性。而总的说来，我认为，政治局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不够积极的，我要说是不明确的。其中包括苏维埃主席和党委书记兼职的问题。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兼职的决议，已按工作程序交由地方机关处理，地方机关表现出主动精神，有的地方实行了兼职，但也有许多州没有这样办。但是，即使这小小的经验也使人确信，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把党和苏维埃职能分开的思想理所当然地贯彻到底。

我想，我的立场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筹备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过程中，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集中力量制定党的纲领性文件、苏共纲领和章程。你们知道，围绕这些文件草案全国展开了广泛的全民讨论。对这些草案进行的真正民主的讨论毫无疑问产生了结果。据我看，提交的草案总的说来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苏共的社会作用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革新的苏共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党，现在的苏维埃应当成为什么样的苏维埃。答案的实质看来就在于，党在坚决清除历史扭曲现象的同时，正在按其性质、目的、组织结构重新成为列宁式的党。我认为，有广大党员参加起草的草案将成为能够保证苏共团结、防止党的队伍

业已出现的分裂、恢复党同人民团结的纲领。苏共不接受虚无主义对十月革命理想的否定，苏共仍然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把共产主义作为前景的政党，这一点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革新只能在社会人道化和民主化、为每个人提供广泛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一点也不容置疑。我们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虽然应当坦率地说，这里并非一切都已确定下来，许多东西还处于所谓“初具规模”之中。

自然，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立即就利用了这一局势。在改革的流行口号掩盖下，这些势力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本身。因此，为了十分明确起见，应该在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中特别强调指出，这里不是指一般的社会主义选择，而是指科学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指具有全部固有的特征的社会主义。

总之，我认为，改革要求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给予十分认真的关注。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最近正在公开宣扬各种机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所谓向社会主义自发运动的机会主义理论。

所有这一切实质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击。我同意在这些问题上对政治局的批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我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对此也负有个人责任。

同修正主义斗争、积极捍卫自己学说的原则，这一贯是列宁党的传统。这一任务就是在目前也没有失去迫切性。这一任务应该在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中得到反映。

我们今天正在为教条主义和学风在理论和政治教育中和在党和苏维埃工作实践中的长期统治付出高昂代价。我们应当承认，在新的生活现实条件下，许多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在思想上缺乏武装，在同人打交道的严肃政治

工作方面缺乏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党内的形势，我们就必然处于政治生活之外。这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今天已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和意义。现在，对在权力机关贯彻苏共政治方针所负的责任已经成倍加重。这一责任落到了党的各个组织身上。而且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不受实用主义和权宜之计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党的纲领目标。只有在这种原则基础上才可能走上明智的妥协，走上建立党派之间联盟的道路。总之，为了调整好人民政权机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共产党的使命自然就是在这里起重要作用。我相信，同这一机制有机地协调起来，大力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共产党就能在苏联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占据先锋队的地位。

（译自 1990 年 7 月 10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总统委员会成员 叶·马·普里马科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7 日）

尊敬的同志们！决定让我在代表大会党的国际工作小组会上作工作汇报，我想说这有点勉强。由于我担任过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在是苏共中央国际委员会委员，由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我确实参加了国际领域一些重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特别是从日内瓦到华盛顿的苏美会谈以及北京、德里最高级会晤。但是，这些活动不属于我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又作为总统委员会成员的直接职责范围。因此我要声明一下，作为新政治思维一贯的和坚决的支持

者，我在政治局内一直支持把新政治思维应用于国际实践的行动和倡议。我同意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报告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同志工作汇报中的结论和论点。

我深信，党在总结时期的国际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成功的。这是健康思维对轻率举动的胜利。这是对全面毁灭的恐惧的胜利。这是对僵硬对峙、挥霍巨资、把世界分裂成两个彼此永远对立的集团的教条主义的胜利。

毫无疑问，世界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的进程目前还没有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在出现信任的同时还存在着内部的不安和警觉。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以新政治思维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国内的改革将怎样发展。从这个观点出发，今天在这个小组会上，我认为我有权谈谈国内和党内的的问题，谈谈我对所发生的情况的看法。

我的政治履历比较浅，完全同改革的时间一样长。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年4月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这个时候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

我可以坦率地说，从学院式的学术工作改为职业政治工作是很不轻松的一步。我决定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深信必须根本改造社会，我无保留地相信改革和赞成改革的思想。我为党的行动纲领、政治领导方针所吸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非常钦佩米·谢·戈尔巴乔夫思维的胆量、广度和不凡。

因此，我想就有关对党的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同志个人提出的批评的性质坦率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近几个月来，这种批评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确确定这种批评出于什么立场。如果批评的对象是国家从极

权制度向民主制度，从单一制国家向主权国家联盟，从经济上的指令性分配制度向正常的市场关系，从无法纪和玷污法律向法制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错误和不正确的做法，那么这种批评就证明，我们的社会十分关心尽快摆脱使它走下坡路的所有东西。这种批评则是合乎情理的，应当受到欢迎。

然而，也还有另一种批评，包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另一种批评也赢得了掌声。这实际上是在指责政治领导人不再使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是对第六条的怀念。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让我们走回头路，使我们重新回到命令管理制度的怀抱。这是旨在把苏共变成复旧的党的一种破坏性批评。然而，这样的党注定要灭亡。我想十分明确地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党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它如何投入社会的实质性革新进程。一个组织上和政治上强有力的、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党将成为改革的极重要的杠杆。然而，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不革新的和非民主化的党的结构会像磁铁那样吸引那些客观上并非出于自己意愿地反对改革或者主观上就反对改革的人。从党面临的这两种情况出发，从现实的而不是杜撰出来的两种情况出发，我赞成在我们发展的这个阶段总统兼任党的领导人。然而，这种兼职显然应当只限于总统这一级。我坚决认为，总统委员会成员不应当进入政治局，我也将照此行事。

我在党的最高政治机构中工作了九个月，从内部理会到了通过各项决议的情况。现在回过头来说，不是所有的决议都是很理想的。而且时代也是复杂和矛盾的。政治领导人观点的演变也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而且解决的问题也是无先例的。然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政治局，首先是苏共

中央总书记不能陷入任何一个极端，要使社会摆脱极端主义的决定，而这种极端主义决定会从根本上断送掉极其艰难的历史过渡的和平性质，会给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这一过渡的愿望带来极其沉重的打击。让我们认清并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点吧。

现在谈谈我们的缺点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当然，从一个有阅历的和懂得事理的人的立场来看，这些缺点和问题就更加明显一些。在这方面，我想谈三点。我认为这三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国内和党内复杂形势的原因。

首先，在实现了社会民主化的同时，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党内民主化，这是一个道地的失策。要知道，在党内革新方面本应以超前速度采取行动。可以说并且应当说，中央、中央机关对地方党组织没有进行足够的领导，甚至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没能帮助它们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能在党放弃宪法保障的领导作用并走上争取社会领导力量地位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情况下，帮助它们获得新的生气。

党内的民主化进程直接取决于对党内各种派别所持的态度。当然，这里我指的是那些忠于社会主义选择，同时又谴责过去对社会主义进行极权主义歪曲的派别。我认为，只有在这种两者兼蓄的世界观基础上才能维护党的统一。

难道应当用组织上和章程上的问题的分歧来遮掩这种主要的东西吗？在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危险面前，在新政党和运动（其中某些是公开反苏的）的对立活动面前，这些分歧还算得上什么呢！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我坚持党的统一，支持在思想方法不同，但对改革承担同等责任的力量团结的基础上的统一。只要同那些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或者同那些以不想折磨自己为借口而不愿正视被扭曲了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



其他派别在一起，党内就不会有统一。同路人可以是不同政党的人士，而不能是同一个党的成员。

过去一个时期的第二个工作缺点是，虽然有充分根据地放弃行政命令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可是却迟迟未在维护法制和法律方面采取行政措施。然而，坚决放弃行政命令管理体制恰恰是标志着法律的胜利，法律不仅应当遵守，而且还应当防止对法律的任何践踏。如果在发展民主进程时不采取维护法律的措施，十分必要的民主进程就不能发展，就会导致混乱。自发性的民主发展对于我们这个有着自己的历史和独特的心理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是尤其不能接受的。

我受政治局的委托去阿塞拜疆时，对这个问题想了许多。我现在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确信，现在当我们对新的联盟条约的性质理解已经十分深刻时，族际关系方面的民主进程必须用坚决的行政（请别害怕这个词）措施来加强。

我坚定地拥护民族间关系的根本民主化，坚持对各共和国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考虑到各共和国的历史特点、人口因素和文化政治传统。我认为，必须由共和国自己来确定自愿移交给联盟的职能的范围。在所有其他方面，共和国应当拥有完全的主权。但是，即使这样有人还坚持退出联盟，把分立主义变为目的本身，而不考虑全国的利益，那么我们中央也应当采取明确立场。例如，我认为，对于这样的共和国来说应当按通过的退出苏联法的规定来确定必须举行的公民投票日期，包括考虑非本地居民的意愿，对经济财产和军事基础设施的赔偿。让我们坦率地说，一旦退出苏联，我们对这个退出去的国家，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要做的只能是有利于联盟的事情，如果不退出，那么可以在联盟范围内享有最充分的主权。这样的立场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央和地方之

间的关系完全民主化方面，我们正在坚决地走自己的一段路。

第三个缺点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对政治和对国家前途都有着直接关系。我认为，失误就在于我们过分强调了地区经济核算的作用，而没有加速建立全联盟的市场基础结构。从经济观点看，地区经济核算是没有道理的。从政治观点看，地区经济核算同共和国拥有主权，其中包括在经济方面拥有主权的合理要求没有共同之处。

什么是共和国的经济主权呢？这就是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为居民造福。就是拥有和支配在该共和国领土上营业的所有企业必须上缴共和国预算的提成的权利。就是实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策的权利。就是为在自己领土上做生意创造良好条件的有保证的可能性。最后，是对自己居民实行生态保护的神圣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将纳入经济主权的广泛概念。难道这种概念与实际会使共和国脱离全国共同经济机制的荒谬的地区经济核算有相似之处吗？

如果及时地注重建立市场基础结构，而不是强调政治上时髦的和经济上荒谬的地区经济核算概念，那么我们就已经能看到全苏市场的形成，而全苏市场可能成为阻止各种分立主义势力的障碍。

我想，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中央同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之间的矛盾。在企业 and 地区之间形成的对抗性关系才是最危险的矛盾，将来更是如此。许多共和国目前在经济上的做法正在加剧这种对抗。这种矛盾的发展可能破坏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或者至少会使这种过渡变得极为困难。全部世界实践说明，市场关系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只能是生产者，而不是某个地区的政府或领导人。

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围绕这些和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展

开辩论，而不是去争论某某领导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应当站得高，不要为个人野心奔忙，不要考虑小集团利益。应当通过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党的利益。苏共应当成为改革的党！

（译自 1990 年 7 月 8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 奥·德·巴克拉诺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5 日）

尊敬的同志们！由于生活的安排，我曾亲眼目睹过法西斯的暴行，消灭爱国者，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各民族互相残杀，叛国，饥荒，我也亲眼目睹过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在这个时期，我形成了对善和善的象证的信念，那就是能够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形成了对力量的信念，那就是粉碎了法西斯的我们的军队。

因此，今天当我耳闻目睹我们有些共和国发生的流血事件和错误行动，以及围绕这些悲剧表演的假仁假义和投机行为时，我感到痛苦和悲愤。当我听到对苏联军队的攻击和诬陷，对我们国防建设的恶意中伤时，看到对我国各族人民用勤劳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文化等各种成果进行的诽谤时，我同样感到悲痛。

还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骂共产党，把它同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苏联人民对立起来。最近时期，把这一切脏水都集中泼向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我们正紧张进行的社会革命改革工作。

我深信，必须把苏共内部一切视改革为客观的、辩证的、党内民主化必然过程的健康力量团结起来，必须发展党、加强党，把有创造性的积极的青年力量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只有党的族际政策才能抵制民族悲剧。

新的政治思维要求我们另眼看待我们的整个国防事业，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在苏共中央工作的。一方面，苏联的和平倡议导致了走向裁军的现实行动，另一方面，战争危险还没有消除，还需要在保证足够防御力量的范围内，在减少国防开支的条件下，关心用有效的战斗技术装备来装备武装力量。同时，要把利用军工潜力解决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问题放在首位。

我相信新思维、相信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倡议，但我也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们的西方伙伴现在还没有采取对等的行动。巴拿马事件，企图把统一后的德国拉进北约，企图在现在正进行的谈判过程中在削减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取得单方面的优势就是证明。我认为，我们军队的改革应该符合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其组织方面的改革应该考虑到我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我相信，不能忘记一句英明的格言：“火药应该保持干燥”。国防工业应该胜任自己的任务，应该根据防御理论合理地武装我们的军队，人民的劳动应该得到保护。

我感到自豪的是，1950年我被安排在制造导弹的国防企业中工作，我在1953年成了党员。部队的全部战斗装备和保证战略均势的一切，都是广大职工的劳动结果，我有幸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项劳动。

两年多来我是负责国防问题的苏共中央书记，我把这两年的工作看成是过去劳动活动的结果，是党的巨大信任，是

对人民负的特殊责任，我一直用上述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

同志们！最近时期很多人都在谈国防工业地位特殊，吞没了大量资金，没有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还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军转民的高论，说只有它能挽救国家。我应该说，这同开垦荒地的神话一样，当时我们认为只要一垦荒，国家立即就能丰衣足食，并且还能出口粮食。这也和北方河流改道的神话一样。

针对这些情况，我应该向你们说，国防部门的工业潜力占国家总生产能力的6.4%。1988—1989年如果以国防工业潜力为100%，它的利用情况如下，40%用于生产国民经济产品，60%用于生产武器。今天，1990年，这一比例是50%对50%，明天，1991年的计划是60%对40%，是一种向保障国民经济方面发展的势头。我认为，以后的转产变化，应取决于外国是否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990年，将为农工综合体的加工部门、商业部门、公共饮食部门、轻工部门、医务部门生产约50亿卢布的设备。1995年这一数字将比今天的计划增长一倍。1990年将生产395亿卢布的消费品。1995年这一数字应达到710亿至720亿卢布水平，即增长80%。

我提醒一句，现在全部彩色电视机和黑白电视机，无线电收音机，缝纫机，冰箱和其他一些消费品都是国防部门生产的。但是，这同我们人民的需求相比，当然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应该注意到，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国防工业中集中了一大批科技精英。伟大卫国战争的结局和战后所取得的均势都证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本着新思维把这种潜力用于国民经济，而在转产过程中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利益应该得

到国家的可靠社会保障。

我们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自由，在经济领域中也同样应该获得自由。必须利用新的经营形式，促进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智力，为国民经济创造最大效益。因此，我要向我们尊敬的国防工业职工们说几句话。有人抱怨说，某人给某人下达了不符合他的业务水平和学识的任务，迫使他去制造勺子和盘子，这类怨言听起来令人感到奇怪。现在很多人用这一点在大做文章。

同志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才智担负起自己胜任的工作吧。要知道，选择范围是很广阔的。有30%的农产品被糟蹋了，我们不会加工，不会贮存，不会包装。轻工业靠进口设备工作。没有高水平的医疗设备。这类高水平的设备要到国外去买。

主要的是，在转产过程中必须对职工实行社会保护。我指的是就业安排问题，在改行学习期间保留平均工资问题，优抚保障方面的优惠问题，保留经济刺激基金问题，等等。

计算表明，为了实行转产措施，仅在1995年以前这段时间就需要110多亿卢布。改造整整一个行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转产远远超出了国防工业的范围。实质上这是全民的全国的任务。1995年以前时期国家转产计划草案已由我国政府起草和讨论完毕，并已提交给总统委员会。我应该作自我批评，这一文件应该在去年就草拟好，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问题拖了半年多。

同志们！在削减资金的条件下保留国防部门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的科技人才，已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深信，削减科学研究经费就是自己使自己倒霉，自己断送自己的前途。不论是实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都是如此。因此，应关心科

学发展,采取措施防止“智力外流”。据我看,遗憾的是,这是我们至今未能解决的最主要的任务。我们现在企图把基础科学也纳入经济核算。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要说,我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同国防部门共同解决了制造和生产军事技术装备的实际问题。把军事建设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提交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讨论。

首先是,随着国防开支最近两年降低14%,我们为大幅度调整过去制定的生产和供应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计划草拟了建议并通过了决议。这项工作是同军事专家、国防部门和国家管理机关的领导人共同完成的。

在降低军事开支的条件下,在详细分析某些部门发展的预计前景基础上,我们把电子工业、计算机、无线电技术和通讯技术以及加强把宇宙研究用于国民经济等方面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设计组织制造新式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样品的过程,始终是在监督之下进行的。在武器数量减少情况下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由于做了这些工作,保证完成了中央和政府关于制造新技术装备的决定。顺便说一下,根据对第一次在国际沙龙中公开展示的宇宙航空技术“能源”号、“暴风雪”号、米格-29、苏-27、“姆里亚”号的反应,可以判断这些技术的水平。

应该负责地说,所有这些工作我们都是从保障我国可靠的国防能力这一原则出发的。现在由于我们的和平倡议,开始了裁军过程,销毁了中程和短程核导弹,这一工作实际已经完成。我们已单方面宣布大幅度裁军。

我们作出了大量的预支。但是据我看,西方国家现在还没有采取相应的迎合步骤。这是值得警惕的。要知道,采取

对等措施和遵守严格的均势,这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有些外交官不惜以任何代价同对方妥协,这种企图是危险的。只有我们党中央总书记经过仔细权衡的立场才能使人确信均势将不会被破坏。

作为参加筹备谈判的苏共中央书记,我不断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在报刊上谈这些问题,虽然这一立场也是可以商榷的。军事建设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保持战略均势。

我在党中央工作期间,自己的工作远不是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虽然我并没有高高在上,躲在办公室里。我认为,任何领导人的主要资本,就是同人们接触。我始终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因为现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最近走访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克麦罗沃、车里雅宾斯克等一些热点城市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人们对经济改革进行得不彻底感到很不安。

现在我想谈谈我认为经过革新的共产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首先,应当是思想上团结的强大的党。所谓思想上团结的强大的党就是能从精神上、物质上和法律上捍卫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强大还在于同群众的联系,党吸收了由革命思想和全人类的理想所产生的新事物,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我相信,只有具备了这些品质,党才能成为真正的起先锋队作用的党。

我认为在改革的现阶段必须支持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总统由一人兼任的建议。这里也应该把党内第二号人物确定下来,这样在总统和总书记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就不致中断。

我认为,现在在党内、在我国社会中推行民主化措施的背



景下和在建立法制国家的背景下，最明显地暴露出两个阻碍因素，这就是经济状况和我称之为所欲为的那些现象。

我们打算通过向可调节的市场过渡来改善经济，我理解，可调节的市场是提高人民福利的手段，是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情况下的生产者的自由，是多种经济结构。但是，不能把这一过程简单化，应该对它作深刻的分析。大家知道，许多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过着极其可怜的生活。约有 100 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其中只有 10 至 15 个国家堪称富国。其余都是借债度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慎之又慎。因此，只有在我国劳动人民有了可靠的社会保护时才有权向多种经济结构过渡。

至于为所欲为现象，苏维埃和护法机关在这方面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我认为，有些法律应该在宪法范围内更加严厉一些。还应该尽快解决消除影子经济的问题。我认为，在结合实行累进税的同时实行经过周密考虑的所得税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那时，我们将会大大充实我们的国库，把资金首先用在发展卫生保健、教育、文化、科学以及军人、退休人员和大学生的社会保障等事业上。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经过更新的苏共才能成为社会的凝聚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来实现这一点。

还有，今天《工人论坛报》发表了普图什科同志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北方钢管厂的炼钢工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没有纪律就不会有民主》。我认为，这是当前最主要的一点。

（译自 1990 年 7 月 7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 古·伊·乌斯曼诺夫的汇报

(1990年7月5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我是从去年9月开始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我被委托负责俄罗斯联邦的农业、社会经济和民族政策问题。作为对不满10个月的工作汇报，我仅根据议事规则的要求以及民族和经济问题所处的直接联系的程度简单谈谈这些方面的具体工作。

我在中央工作期间，坚定了这样的思想，即俄罗斯联邦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并不亚于苏联。然而，俄罗斯的这个在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民族和族际问题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的历史背景。

同各地一样，这一因素可以用来创造，也可以用来破坏。俄罗斯各民族传统的睦邻关系由于爆发出来的偏执性而变得复杂起来，并且不断显示出这里是潜在的和已经表现出来的危机局势的策源地——所指的是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北方民族的生态和种族悲剧，被驱逐的民族的悲剧，几万名难民，而现在又加上了图瓦。有不少头脑发热的人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这些症结。我们认为，需要做连续不断的、慎重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原则是不要产生弊病。譬如200万苏联德意志人的问题。我们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有许多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恢复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的要求是完全公正的，它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众所周知的决议的支持。另一方面，萨拉托夫和伏尔加格勒

州的大部分居民不愿意接受这一主张。还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外政治方面。实质上形成了僵局，我们同德意志族公众代表一起寻找摆脱僵局的出路，好像已接近问题的解决了。这是个新问题，因此我要特别谈一谈。实质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关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自治问题没有消除。需要在那里创造正常的道德和政治气氛，需要寻找既对当地居民，也对德意志族居民和想迁移的德意志族家庭有利的解决办法。第二，出发点为：甚至根据最乐观的预测，同意迁移的大约将有 30 万人。其他 150 万德意志人看来将留在目前居住的地方，而且是分散居住的地方。第三，这一最大部分的德意志族居民的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当然也应当得到解决。通过创造性地思考世界经验，建议为此目的而成立苏联德意志人非区域性的联合会并赋予它自治共和国的权利——在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席位和组成政府结构方面，在教育、文化、培养干部方面和其他问题上。在联合会中可以成立创作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当然，看来要对苏联宪法进行相应的修改，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组织问题。重要的是，克服众所周知的对民族文化自治主张的偏见。

我们的构想原则上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然而最后的决定将由苏联德意志人代表大会来通过，已经开始筹备这样的代表大会。我如此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还因为，我们认为，所确定的态度可能具有远远超出德意志人问题范围的意义，可能成为苏联其他许多民族安排民族生活的模式。当民族联合会的原则，譬如说，被苏联的朝鲜族人效法的时候，我们就确信了这一点。

北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采纳了联合会这个独特的方案。针对这次代表大会，我想指出，在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时，出

现了党委会相互关系的现代化新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是俄罗斯中央局(这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之前)和苏维埃权力机关——从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到村苏维埃,最后还有公众。我们感到满意的是,正是北方各族的本民族知识分子、人民代表在筹备和顺利举行代表大会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确切地说甚至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和我们也根据政治机构的职权范围做了工作。

生活表明,对民族利益和表达这一利益的社会运动,需要持最关注的态度。如果放任事物自行发展的话,其结果就会具有最不愉快的性质。然而,经常会碰到党委会同民族运动保持不合理的距离的情况。当然,这有一定的理由。但应当懂得,追求民族自我肯定的意图是应当考虑的现实。我觉得,在实践方面,应当迎合民族愿望,而在战略方面,应当学会为这种愿望充实社会主义内容。

还有一个原则性的方面。我们远没有克服旧的认识,认为似乎除俄罗斯以外所有民族都有民族问题。这个旧框框仍然还留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实际上,民族问题也是一些古老的俄罗斯地区和州的特点。

同时,恢复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进程正在发展,我们也无权对此袖手旁观,何况人们对整个这一进程的解释是过于简单化了。因此我谈谈关于俄罗斯主权这个微妙的问题。顺便提一下,我记得第一次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是今年年初在中央俄罗斯局的会议上。这是俄罗斯局的活动为数不多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讨论。

我也参加了这个问题的准备和讨论。对于在第一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国家主权宣言,我持理解的态度。

同志们，我同时深信，从实际落实的意义上讲，应当极其谨慎地对待这一主张。否则我们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反俄罗斯联邦和反俄罗斯人的情况，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好处。

根据这一情况我再谈谈另一个问题——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问题。你们大家都记得，共和国各级党委会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结果，生活本身提示的意见——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必要性占了上风。根据俄罗斯局的决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及其各个工作小组，我同其中一个小组进行了经常性接触。该小组起草了俄罗斯共产党人纲领草案。应当说，其中搜集的许多材料奠定了成立大会第一阶段各项决议的基础；我希望，在起草俄罗斯共产党第二阶段会议的纲领性文件中，它们也得到利用。

简单谈谈向市场经济过渡。我的立场是，我们没有其他道路。然而，我作为中央书记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现在尽可能预料到不仅会出现的优点，而且还有缺点。还应当诚实地向公众说明这一点。

我们已经开始在市场对整个民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初步的具体分析。其中一个结论是，考虑不周的实际行动可能引起族际矛盾的加剧和离心趋势的增强。

有一个现实的危险，即比较发达和不太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将增大，而经济上的不平衡必然加剧族际矛盾。因此在可调节市场的概念中，我们应当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可调节上（哪怕是违背某些意见），以便能够本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精神确保人们的社会保障。我们认为这是主要的。我强调一下，我所说的完全不是打算支持好吃懒做的情绪。

分析表明，族际关系中的消极趋势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在中央民族关系部的倡议下，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

关于在选举出来的机构中某些民族的代表席位急剧减少的报告。政治局同意所阐述的意见，并把材料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以便它们讨论、研究这个问题，通过排除这种倾斜现象的可以接受的决定。我们大家都看到，选举工人、农民、妇女和青年的代表参加权力机构的工作是多么不顺利。而现在，这又有了民族色彩。当然，问题不在于把这一事实记录在案，而在于日益尖锐地感到有必要寻找有助于弥补目前选举工作和整个干部工作中的缺陷的机制。

至于谈到族际矛盾和冲突，遗憾的是，首先不得不指出，我们进行的主要工作是灭火，而并没有真正弄明白深刻和根本的原因。而发生这种情况还因为，无论是在共和国一级，还是在联盟一级，目前实际上都不存在相应的政府结构。已经原则上通过了关于成立苏联国家民族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决定。然而遗憾的是，它们的成立工作目前拖延下来了。因此我们正在脱离主要的工作——制定政治对策。

我已经说过，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我认为，俄罗斯联邦必须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当然，在概念方面是以苏共纲领为依据的，同时也考虑俄罗斯的特点。

生活迫使人们放弃自古以来的习惯，我甚至要说，是迫使人们放弃追求适用于生活各种情况的包罗万象的决定的激情。需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具体的生活。它在于，在俄罗斯居住的各个民族，在民族起源、语言、文化、历史经验和其他方面都各不相同。<sup>3</sup>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习惯。

因此，必须同每个民族单独建立特殊的关系。我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不仅需要一个俄罗斯民族问题计划，而且从理想上来讲，这一计划应当是居住在共和国的100多个民族中每个民族发展计划的汇编。这有助于揭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都不会拥有的财富、文化和生活方式。

我们认为，地方苏维埃可以充当这种计划的发起人，而制定这种计划只能由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专家来做。在某些自治共和国中，例如在马里、楚瓦什、科米自治共和国中，已经积累了这种经验。然而，首先需要进行组织工作。我们希望，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委员会有能力解决如此大规模的问题。至于谈到我们，显然，应当帮助挑选真正业务熟练的干部，其中包括完成这一任务的干部。

在政治方面，打算在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上表示这种态度。

最后一点，现在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自治实体的新的法律和政治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如常言所说，早就熟过头了。尽管我们也为解决它绞尽了脑汁。我认为，用不着提醒说，这指的是 31 个自治实体。所指恰恰是所有这些自治实体，因为不仅仅自治共和国在提出关于地位的问题。

我们认为，解决办法是，从在法律上承认自治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联邦联盟实体的地位出发，制定条约机制和宪法机制。毫无疑问，还应当考虑实际提高其他自治实体的法律地位。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

### 尤·阿·马纳延科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5 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在去年 9 月底被选为中央书记。时间

虽然不长，但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改革的缺点和错误应负的责任，尽管我曾努力防止独断专横作风再次扼杀党和国家活动中还很稚弱的民主萌芽。改革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你们都清楚。

从去年12月成立俄罗斯局起，我开始负责协调俄罗斯联邦边疆区和州党组织的活动。这项活动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因为该局没有任何权力和信息来源，而且实际上是按社会原则工作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我能够说话的地方，我都反复谈过。

此外，过去和现在的形势都要求迅速向群众掌权和个人自由迈进，我指的是法律和道德占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社会。我认为，党内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应当是地方党的机构，但是，按重点的顺序来说，实际上应把基层党组织摆在首位。

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使俄罗斯联邦获得政治主权和国家主权。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建立了共和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独立工会和共产党。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目前还有各种不同看法。同时，我的大多数计划和设想都没有实现，这是实际情况。此外，也有必要指出，书记处工作的最大缺点是，我们没有学会预见性地工作。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进入中央的共产党员们首先应当以批判精神反思这个问题。

经济状况仍然很不好。毫无疑问，向市场关系过渡很有必要。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贫困居民根本无力承受这种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额外负担。我认为，我们目前对农村形势为什么继续恶化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在我们的工作中草率从事的情况很多，我们进行改革不



仅仅是要抛弃某种东西，我们主要是要建立某种东西，从这点出发来看，草率从事的事就更多了。人们不是根据旧建筑物的废墟，而是根据出现的新建筑物来评判改革者，而且已经在这样评判了。

我认为，摆脱危机的主要条件是采取紧急的综合措施，来稳定国家的政治形势，首先是稳定族际冲突烈火熊熊燃烧的地区政治形势。是最终找到政治和经济以及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等整个权力之间最佳关系的时候了，以便加强社会的纪律和秩序。

一切由党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也不应随波逐流。想把社会团结和加强起来的党，自身不能不团结起来，自身不能不加强起来。党只有变得强有力时，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否则它将把政治领导地位送入档案馆。这里别无选择。

我们党需要新的活力、新的工作形式，它应当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方针和标准，还应当有灵活的活动形式。党应当加强自己的团结职能，联合和凝聚所有健康力量和运动，并同所有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组织进行合作。

令人非常伤心的是，削弱和损害苏共的行动往往是在苏共本身参与下进行的，确切地说是在脱离了苏共怀抱的政治力量参与下进行的，它们就像不记得血统关系的儿子一样，在党最艰难的时刻对它采取了忘恩负义的态度。

党正在为我们前辈的所作所为进行忏悔。然而，它越是宽阔地敞开胸怀，就有更多的人把不属于它的垃圾往它那里倾倒。因此，总是充当无休止忏悔者的角色是危险的。搞假革新，就离只要外衣而不要自己的灵魂不远了。

我认为，不能允许把对党的批评态度变成对它的庸俗否

定，变成代表大会的两极分化。因为一个古老的真理告诉我们：人心开始涣散，祖国就将开始分裂。

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对党感到满意。远不是所有人。然而它，也只有它还有能力治理有病的、受矛盾折磨的国家。不管支持哪个纲领，不管集团的和个人的好恶如何，我们都应当在这方面帮助党。我不相信，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分成几部分会比完整的整体更有生命力。多党制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伴侣。然而，它应当珍惜，不应当把从前几代人手里接过来的东西分成几部分。倘若各个政党在这个主要问题上不一致，我们不禁要问：这算什么进步呢？这不是进步，这是某种别的东西，只要人及其道德方向和知识方向仍受自发的激情控制和各行其事，我们就不能保障社会发展。

我认为，党需要收集和整理许多世纪积累下来的一切财富以及苏联的整个文化和历史经验。现在是该重视人的灵魂的时候了。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幸在于，党在历史的每一个新阶段从没有真正地敲过警钟，种子不是播在教育 and 培养人民方面，而是播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贫瘠土地上。假如我们在一些意识形态和道德问题上不改变主意，我们就要在一次又一次的道德沦落中艰难度日。

我们的前辈把真理归结到几个人身上。然而，马克思和列宁恰恰与这种自杀性的孤立和糊涂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现在是把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的哲学搞清楚的时候了。在地方上还不知道组织方针和意识形态方针的时候，中央却指示他们自主地行动，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实际上应当是党朝着一个方向走的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随后汇合在一起，其相互关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旦把理论和实践运用于工作时，个人就应当对实践和理论负责。

对党来说，改革的哲学基础应当是极其广泛的思想多元化，但应当是符合社会主义本义的思想多元化。人道原则永远应当是文明和整个社会生活结构进步的基础。否则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将发生灾难性的“塌方”。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因此，我们需要永远记住自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和为了劳动群众的党的社会基础。同时还应记住，在党的摇篮中也曾出现过国家的知识繁荣。

因此我认为，当前应通过广泛地吸收优秀人物入党来复兴我们的党。令人伤心的是，我们提高干部水平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认真研究过青年政策。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简直赶不上青年的发展。假如我们对青年的挑战不能作出回答，不能创造条件把他们的精力和聪明才智用于社会政治实践，那么我们就不仅不是政治先锋队，而且简直就没有未来可言！

最后，在社会动荡和革命的时代，世界上总有许多怀疑和动摇的人，总有许多说空话和落荒而逃的人。但是，我们不应加入这类人的行列！

（译自 1990 年 7 月 7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 安·尼·吉连科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5 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在去年 9 月举行的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那次全会上，中央委员会还制订了党在民族政策

方面的任务，并提出了我认为是相当明确的理论方针和实际工作的方向，这自然也减轻了我的任务。困难就在于，长期以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机关，都没有对民族关系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这种问题被放在其他意识形态问题之中加以研究。在民族基础上发生的冲突被压制下去。

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中缺少相应的结构分支部门。因此，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我认为必须使各级党委致力于宣传和解释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新的政治方针，使党的政治方针体现在工作实践中，建立必要的结构分支部门，深入分析民族关系领域过去和现在都十分迅速发展的进程并使其在社会意识中得到反映，总结实际经验并用这种经验来武装各级党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在中央政治局为实现苏共纲领的条款而起草并通过的行动纲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中反映出来。

在现代，如果不从组织上和科学上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讨论（不仅在党的工作者中而且也在专家中），要有效地解决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同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学者，包括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工作的学者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根据对我国正在发生的进程进行的全面分析，就民族政策的各种问题起草了70多项建议和决议草案，并提交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审议。当然，我并不是说，其中每一项建议都已经取得了所需要的结果，除了这些建议外不存在其他选择的余地。然而，广大公众参与这些建议的制订工作，有助于改变对正在发生的进程及其深度和广度的认识本身。因此，认为有必要成立全苏民族关系科学研究所。关于成立这个研究所的问题现在正处在解决的阶段。我认为，社会科学学院中的一个新教研室将从明年起开始工作，这个教研室也将研

究这些问题。

我们很清楚，不说实话、真话，不让居民广泛地了解情况，要解决民族关系方面积累的问题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努力利用公开性把这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使这些问题处于报界的注意中心。还应当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得到舆论工具方面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苏共中央成立了民族关系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党的州委会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就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各级党委在这方面的活动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苏共中央民族关系部成立了能够对地方党务工作者提供重要帮助的工作方法办公室，出版通报《苏联民族关系》，通报的第二期的出版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要同地方各级党委一道分析民族问题的状况，帮助作出及时的和正确的决定，尤其是在所谓的热点上。该部的工作人员以及我本人都力求尽可能经常到各级党组织中去，以便不是从汇报中和别人的讲话中，而是根据个人的印象、同当事人的交往对情况作出判断。

我们认为，这样的信息是进行分析和作出可能决定的可靠基础。当然，族际冲突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冲突是由某个地区的特点决定的。但这种冲突也有共同点。我现在当然不可能详细谈到我们的这种热点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但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些问题中今天引起每一个苏联人注意的那些问题。

这首先涉及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问题，我这样说是不会错的。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同这几个共和国的共产党的关系中犯了错误，如果苏共中央能及时地指出这几个共和国

的同志的错误，提醒他们应当如何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按照惯常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做法行事，那么这里的事态可能会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我深信，这是一种基于旧思维的误解。问题的实质在于，在实际的政治多元化（在这几个共和国出现得比较早）的情况下，各级党委由于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因而不善于抵御民族分立势力的进攻。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过这种危险。你们会记得苏共中央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特别信件、苏共中央给立陶宛共产党人的呼吁书等文件。

在使我们大家现在感到不安的所有这些进程发生之前，苏共中央就同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和中央局成员举行认真的会谈（我向代表大会代表报告这一点）。遗憾的是，同志们没能采纳所提出的种种忠告和建议。

我坚决不同意一种意见，说什么以前或者现在用某一项决定就能扭转这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发展。问题不这么简单。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内部矛盾和通过的独立决定以及非常紧张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在那里每天都在发生使这几个共和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进程），我不去详细分析，只想说，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这几个共和国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主要的是要从我们联盟的完整性的思想出发，同中央进行全面的谈判。

所有这些我并不是从某种抽象议论的立场来说的。我曾不止一次会见过这几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不同居民阶层的人。上述看法就反映了他们的意见。

另一个关键问题几年来不仅在整個外高加索地区造成非常紧张的形势，而且的确使全国感到激动不安——这就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造成

了几十万难民，造成了数百人伤亡，两个共和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持续不断地对立，两族人民遭受苦难。即使我的看法使某些人感到过份严厉，但是我一点也不怀疑每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利。我深信，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含糊地需要对每一个共和国的主权持尊重的态度。每一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种种权利，对这些权利应当尊重。

看来亚美尼亚居民的运动发生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一系列文件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但问题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我认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找到了摆脱现有局面的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既考虑到亚美尼亚民族的利益又考虑到阿塞拜疆民族的利益以及这两个民族当中每一个民族的权利和民族尊严。我还认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这两个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非正式运动的领导人，都应怀着理解的态度对待最高苏维埃的这项决定。血已经流得太多了，给千百万个家庭造成的苦难也太多了，足可使人理解到继续对抗下去是完全没有前途的，是十分有害的。

其他地区也强烈地表现出民族偏执情绪。请你们相信，苏共中央经常十分认真地研究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局势。分析结果一再让人相信，问题越积越多，冲突是在各个级别上，由各种机关和领导人，遗憾的是也包括党的领导人挑起的，正在出现违反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方针的现象。这就要在今天强调指出，不仅是中央，而且还有各共和国领导人对及时采取措施来解除紧张状况和消除民族关系中的矛盾所负的责任。这绝不是说中央不再保证对每个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的权利给予保护，然而要知道，十分清楚的是，在每次地区性冲突中寄希望

于联盟机构，就意味着贬低近来谈论如此之多的那种主权。只要每一个共和国还没有找到保护自己少数民族的办法国家就不可能会有安宁。

在过去遗留的问题中，有人民在个人崇拜时期所遭受的痛苦。古梅尔·伊斯马吉洛维奇已经谈到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通过了关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的宣言。已就恢复克里米亚鞑靼人、苏联德意志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的权利开始了实际工作。已建立了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尽管应该非常坦率地说，这项工作是不简单的，是非常复杂的，这既要花力气，也要耗费资金，所以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几十年来对这些民族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也还在起作用。为了创造不是挑起相互追索，而是形成族际关系真正文明的良好道德环境，党的组织可以做许多工作。

在划分党和国家机关职能的条件下，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决定贯彻党的路线变得特别重要。所以，党中央和我本人都致力于使党的决定能够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活动中得到贯彻。我要提醒大家，在今年才通过了一系列直接涉及苏联各族人民及我们联盟的各个民族国家实体相互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你们都知道这些法律，这就是：关于划分联盟和联邦主体权限法，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程序法，关于经济自主权原则法，以及其他法律。

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苏联最高苏维埃过去从未通过这么多关于民族和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决定。不过这些法律还没有包罗全部民族问题。生活在自己民族国家实体以外和没有这种实体的人们的公民权利需要保护，而这样的人有600万。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正在建立民族同盟、各种民族协会、联合会等等。但是，至少有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应该



注意。

第一是各个民族的代表，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管理，参加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工作的问题。在旧时代，当我们这里盛行各种指派的时候，在苏维埃中虽然可能是徒具形式，但总的说来，具有各个居民阶层的代表，包括按民族特征指派的代表。而今天如何呢？在民主和差额选举的条件下，甚至土著民族在各级苏维埃中的代表席位在一系列情况下也明显减少了。很显然，这有损于少数民族的利益。看来，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俄罗斯两院议会的工作实践。只有这一个共和国组成了这样的两院议会。其他具有自治实体和不同民族的人聚居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也应该研究这个经验。可能，将来也应在各共和国，在某些地方苏维埃和在有关的执行机关中建立专门的民族事务机构。这将能够更加充分地保证对一切民族群体利益的重视，并且可以说是成为反对各种唯意志论的保障，限制民族间可能发生的矛盾的扩大。

第二是解决族际冲突的经验既表明了立法基础的薄弱，也表明了护法机关缺乏能力，不能有效地保证法律的执行，制止由于民族偏执性而犯下的罪行。无论是法律、有关的机关，还是苏联宪法都显得无能为力。

看来，苏共中央和党的各级委员会应该更积极地推动法制领域及建立法制国家方面的改革，更积极地推动在护法机关中建立能够制止犯罪，包括由于民族偏执性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的联盟机构和全国性机构。当然，在还没有这种法律和机构的时候，应该促使护法机关更积极地工作，在这一事务中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

无疑，苏共的民族问题纲领已在社会意识方面有了突破，加深了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如果昨天我们

觉得，只要简单地革新我们的联邦就足够了，那么今天，生活本身使我们得出了一个必须修改国家建设原则本身的结论，提出了一个主权国家联盟和各共和国同中央以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多种方案的设想。

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个条约将会稳定国内政治局势，使经济关系正常化，将为自然发现一体化的利益和民族精神复兴的可能性创造条件。应该承认，浪费了一些时间，没有对一些学者的结论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些学者在两三年之前就建议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尽管我个人更倾向于支持雅科夫列夫同志的观点（他在代表大会发言时阐述了这个观点），即这项工作本应在很久以前，也许是在50年以前就开始。但为了使社会意识接受关于我们全联盟大厦的新概念，仍然必须有改革的经验和一定的法律基础（这就是已通过的所有制法、土地法、经济自主权法）。今天这些东西都有了。

制定新联盟条约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了。当然，我们想一下子把极为迫切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正是这种愿望推动着群众和人民进行自发的和有组织的集会，在自己周围寻找有罪者，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的邻居。这种愿望恰恰被善于利用人们的民族自我肯定的自然愿望的破坏势力，包括反社会主义的和反苏的势力所利用。影子经济的投机者，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立主义分子以及任何原因造成的冲突都对之有利的刑事犯罪分子竭力与上述力量相勾结。

我认为，必须让代表大会代表们注意引起民族仇视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分立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改革和我国整个社会的特殊危险性。在我们坚决放弃以武力方法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条件下，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就面临着一个从思想上

解除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势力武装，坚决地和毫不妥协地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上和在政治实践中反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分立主义的任务。

很明显，如果共产党员本身坚持不懈地去实现自己的纲领，我们就能够在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我相信，在起草我们代表大会的文件草案中，会正确地谴责和批驳那些在给党抹黑方面几乎是在同党的公开敌人竞赛的党内政治两面派。我觉得，当一个共和国中不是存在两三个派别，而是存在实际上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两三个党的时候，这种情况能认为是正常吗。很明显，特别是在多党制条件下，这不会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只会导致它的分裂。

我深信，在充分考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所有民族特点的同时，苏共不应失去自己的族际主义性质。否则，那将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别的什么党。

在结束自己的工作汇报时，我想强调指出，民族关系问题具有全国性意义。我想，新当选的党中央委员会定会从我们在改革的转折年代艰难取得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译自 1990 年 7 月 10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总编辑 伊·季·弗罗洛夫的汇报

（1990 年 7 月 6 日）

尽管我担任中央书记只有一年半，但我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了，在此之前几天，成为《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后来，我担任了两年半苏共中央总书

记科学、文化、教育问题助理。从去年10月底起任《真理报》总编辑。

当然，我将尽量集中向大家谈谈我的活动中与中央书记工作有关的方面，但我自然不能忽略和故意回避我在此之前的工作。因此，如果大家允许，我谈两句我以前的工作。

应当说，1985年在我的生活中，在思想演变中意味着很多东西，于是我全心全意接受了新的政治方针。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一点。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某种随风转舵，相反，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从实践上和政治上落实我至少在多年来打算实现的那些构想。这既包括我对科技革命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还包括我对全球性的、全人类的问题的研究。在那些年里，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只是在改革开始之后，这项工作才开展起来，我这才有可能积极参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活动。

我要指出点什么？我能突出地谈点什么？大家认为这些年集体从事的这项紧张工作的成果总的看来是什么？我应当告诉大家，尽管我毕生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但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后的这四年零四个月，大概是工作最紧张、使人筋疲力尽的时期。全体同志都是这样工作的，我也是这样。我还应该告诉大家，如果我现在要把某一点突出列为自己的工作成果，那我永远将它同自己的理论工作和学术工作联系在一起。但当谈到制定我们党的重要文件时，很难启齿。当然，我参加了这些文件的制定。但我的贡献是什么，这些都很难说清，因为工作确实是集体做的，我们的总书记突出表现出了领导作用，但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给他写过书面的东西。要同他讨论，同他共同研究某些问题，仅此而已。总之，我的工作多半属于顾问工作，而不像某些同志有时提到的那样，是在那里起草文

件和讲话稿等等。不，并非如此。对自己来说当然是写了一点东西，准备一些材料等。亲爱的同志们，我再一次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发自内心地想强调一下这个情况。

在这个工作中我能提出作为重要标志的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中央在1985年召开的加速科技进步会议。老实说，在这次会议上我才真正接受了所说的新领导。因为我在此之前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又来了个某人，对我们讲一通我们以及我本人已经听过20遍的话。老实说，对我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但人们立刻注意到科技进步问题，这一点对我来说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于是我在当时写了一篇题为《决定性变革时期》的文章，并开始积极从事政论文章的写作。结果我被任命为《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可见，我的工作在某些方面还是需要的。

我说过，在此之前我有时完全脱离具体政治因素来研究全人类问题、全球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等，我现在看到了把这一切全部纳入政治领域的可能性。结果真是这样。从这一点看，我想强调指出，改革的许多主张不是1985年后一下子突然产生的。它们是在我国社会中长期酝酿出来的，可以说是处于隐蔽状态。也许，由于我们已经承担了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的思想家们一直力求实现的某些东西，因此，甚至在我们党内，也形成了对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的某种错误印象。压制所有这些主张和那些就改革过程中的中心问题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并把这些人排挤到次要地位。

譬如，全人类的、全球性的问题。它是新政治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的核心，米·谢·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止一次谈到这一点，因此我可以提一提这一点。

我认为，起草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文件也是我本人的

非常重要的阶段。凭心而论，在这种直接同米·谢·戈尔巴乔夫一起参与的工作当中，我感到自己的主张是制定构想和报告所需要的。我是作为助手、咨询者、顾问被邀请去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他希望我们更密切地干个两年左右。果真是这样。我们干了两年半。后来我发现有人对那些与十月革命 70 周年有关的文件的评价很不够。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某些人有意识地为党的这一创举抹黑。出现了大量的伪理论家。我称他们为改革的同路人。他们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未引用过党早先得出的理论结论。但是，正是在报告中第一次在这样高的政治级别上谈到我国历史发展的整个时期，谈到譬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这样的人物。这在报告中是第一次谈到。或者说，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有关的整个活动时期。关于这一点在报告中也第一次谈到。一切从这儿开始，随后这简直被忘记了，被抹了黑，似乎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我指的是那些伪理论家，如我们所称呼他们的，是在 1985 年后变得勇敢起来的伪理论家。

我认为，正是党的这种积极的工作导致确定改革的某几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你们知道，会议实际形成了一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应该在经济改革之后有效地进行政治改革和党自身的改革。遗憾的是，这第二个任务，虽然它被制定出来，而且我在这方面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 年）上提出的有关干部政策、有关干部革新的那些正确思想，似乎陷在某个泥潭中了，明白吗？似乎没有特别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问题也没有什么进展。我为事态的这种发展感到极端失望。我从未隐瞒过自己对这一点的否

定态度。但是却这样发生了。之所以发生了，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自发地产生了党的革新过程。只是现在，一切才以半爆炸的形式落到了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身上。由于我也参加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我主要是以这一观点来看待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本身的。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党的改革，党的革新，实质上建立新党。我不认为这一切我们大家都能在代表大会上解决。这似乎无关紧要。但是我们能够给发展指出某些这样的方向，提供推动力，党在这一方向上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是我们大家的任务。在起草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时，我也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作用的，我恰恰是起草这一报告的委员会的成员，并相应地参加了对报告构想的讨论和就报告某些问题的讨论。在这里也可发现已经是中央书记的我的个人作用。

很久以来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问题，民主化问题，人的问题，如我说过的那样，是中心问题，因此我积极参与制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是合乎情理的了。现在围绕这一问题有许多争论，这很好，我认为一切都值得讨论。

但是不能把这看作新的修饰语——在我们的全体会议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从前说过发达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又把它叫作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不可对比的事情，同志们。我们现在以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新面貌定性，是表明要坚决摒弃在此之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摒弃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否定人性的“兵营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一表述的最后部分几乎从来没人引用过。但是马克思专门强调过这一点。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构想必须应该与人、与人的个性相联系。而且我认为，我党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人是中

心,这是很大的成就。如果我们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目标时不做出这一转折,甚至纯粹是术语上的转折,那么其他人就会做到这一点,并且会由于正是他们在强调这一点而感到十分骄傲。我不认为需要放弃这一点。

现在我想对党的问题说两句。我把正在革新的党、新的党、朝气蓬勃的、工作的党,主要看成是能够动员群众的思想政治力量,动员他们在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精神领域,积极工作。这是我对党的作用的理解,我打算坚持这种理解,特别是坚持消除中央机构的那种机关性质的主张和建立委员会的主张,我也参与这件事,这是我应该告诉你们的。但是我想象的这些委员会确实稍有不同。我认为这将是取代部的机构。将是把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正如我说过的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干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下设必要的为这个委员会服务的机关,这是绝对需要的。当时我们对这一切进行过讨论,并且作出了决定,也许现在将确定下来,将组建委员会。而后,根据党的发展、革新的进程,也许我们将做到我已经说过的一切。遗憾的是在代表大会上我没有听到对这种想法的讨论。不知怎么的,对这一切都避而不谈。而我认为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陈旧的命令式工作作风的斗争中这是十分重要的。

(会议主持人:伊万·季莫费耶维奇,请原谅,只剩两分钟了。)

谈《真理报》的工作,这点时间我就足够了。为什么够了呢?因为《真理报》是我每天的工作,你们每天都可以对我的工作进行评论。你们每天都可以对所读到的内容表示气愤或表示赞同,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既然这是掌握人的感情的工作,在日报工作就是这种工作,报纸每天发行,这一



切你们都是看得见的，我又何必在这里说什么呢。我只想强调一下，我在担任总编辑的六个月工作中所做的一切。总的说来，当我还是个22岁的青年时就在一家出版社当助理编辑从事出版工作。从那个时候起，我不止一次地当过总编辑。我始终认为，讨论能使报纸活跃起来，能使某种出版物活跃起来。因此你们看到我们出了“讨论专页”。我告诉你们，我甚至不相信这一切在我们这里能行得通。我感到自豪的是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完全是借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时代《真理报》的做法。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出了50期“讨论专页”。我认为这使报纸十分活跃，也许更加加强了与读者的联系，但这有待于你们来评论。

对工作的前景，包括《真理报》的前景说两句话。我认为现在我们必须组建强大的联合公司——独立的、自筹资金的、实行经济核算的《真理报》联合公司，这家公司将包括一些其他党报、青年出版物、杂志并且必须有电视台，党可以通过电视台发表对形势的分析和党制订的主张。我认为现在可以把这件事办成，而我们已经拟定了这个公司的地位。遗憾的是我在《真理报》才刚刚工作了几个月时间，因此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公文包里，因为暂时，正如你们所了解的，这些方案无人可交。

同志们，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我觉得自己与我们党的政治领导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把所有的批评性意见、所有对党的政治领导的活动作出的评价都看作是自己的事。我完全没有想用我担任书记只有半年时间这个事实来掩饰自己。因此我才依据我原先的工作来表明，改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对改革的理解，以及我今后在委派我去或者我自己选择要去的地方准备怎样工作，将怎样来发展我想在一生中，包括在

当中央委员的最近四年零四个月期间加以体现的那些主张。

我力求在宏伟的社会事业——改革的背景下把我进行的工作介绍给你们。我谈自己的想法和疑问，并不指望博得掌声。这一般说来不是我的作风。有一次在同代表们见面时，我收到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可惜，您来不及实现善良和热爱人的思想，以及全人类的理想。不满和无知的浑噩力量将把您和您的追随者再次消灭掉……”

尽管谈这件事是沉痛的，但是最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张便条。改革所设想和表述的目标和意图与一部分人接受这一战略路线的程度有着明显的不一致。说得确切些，这条路线常常被社会所抛弃、所排斥，这里的问题主要不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也不在于一切都远非像所希望的那样能迅速地得出结果或者实现。我认为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初给党的全部政治工作定下的高亢的理智调子，可以说在振幅上与通常的社会意识的节奏不合拍。

的确，在改革的进程中，在制定改革的理论基础和使之实现的过程中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件事，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已经谈得不少，而在代表的发言中至少在数量中谈得更多些。这也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进行了这样的批评。但是我们可别因此而失去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意识到我国改革的开端在我们多灾多难祖国的历史上是件雄伟的和令人满怀希望的事业。我们是在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上前进，因此我们应该亲手为自己开辟道路。这项工作是谁也无法代劳的。

我并不想以此来为我们的错误辩解，但是仍然要提防出现起码的不理解，有时则要提防一些人的不光彩和不道德的攻击，他们早已敢于在“允许的”限度内抓住发动改革的人的

真正的过错和臆造的过错而排斥他们，要不就是根本对 1985 年作出的选择表示怀疑。的确，我所援引的那张便条上提到的心怀不满和无知的力量能够消灭一些人，但是消灭的不是革新社会主义的思想，消灭的不是改革。改革将生存下去，并将得到发展！

（译自 1990 年 7 月 7 日苏联《真理报》）

# 党政各部门负责人在苏共第二十八次 代表大会上答与会者问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在我作完工作汇报以后，我收到了大约600个问题，而且还在继续收到。因此我遇到一个难题，当我走上这个讲台并且只能用20分钟来回答问题时，我该怎么办。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能回答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问题只得放一放了。因此，对多数问题我只好设法作书面回答，昨天已经把书面回答分发给同志们，尽管我知道，那里也没有回答所有问题。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后面写着，大约200张字条将送给有关单位，让它们解决某些个别问题。这些字条涉及到物资技术供应问题和私人性质的问题，譬如说某个企业的经济状况问题。因此，我现在只想谈一些没有收进这个小册子（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的原则性问题。看情况，如果还有时间，同志们可以再向我提一些问题。

我首先要说的是，正像在字条中反映的那样，许多代表把我的工作汇报看作是政府的工作汇报。一些代表认为，我的

工作汇报实际上是对我们党的总书记报告中有关社会经济部分的补充。关于这一点我能说什么呢？是的，我的确想过，怎样作自己的汇报，特别是在作出最后决议，即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发言，而是要在 20 分钟内作汇报以后，我想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当然有许多我想谈谈自己想法的问题。其中有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生活的问题，不仅有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而且有政治生活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涉及到族际关系。当然，我的许多问题和担心涉及到我的党内生活。但是，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在工作汇报中把重点放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问题上，因为按职务分工和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如果只谈我国其他尽管也同样重要的问题，而不多谈谈这个问题，那就不完全合适了。

坦诚地说，党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给了我一个教训，当时我发言时谈的完全是党内事务，于是马上就有人提意见：为什么雷日科夫同志只字不谈经济，而只谈党的事。然而我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表明对党内已经形成的局势的担忧。恰好又碰上要取消宪法第六条这件事。当然，我们应当明确，在新的条件下党今后应怎样继续存在下去。

我还想回答没有收入这个小册子的许多问题：我本人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情况如何？当然不是作为部长会议主席，而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工作。

我是 1985 年 4 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同年 9 月底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看来，对我在政治局的工作作出评价的应该是你们，而不应由我来作这种评价。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很积极地参加了政治局的工作，从来就是有话就说。我不逢

迎讨好，不要滑头，而是说出我认为需要说的想法。

在政治局工作的头三年里（当时政治局还直接管各种经济问题），部长会议就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当然，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积极参与了对这些建议的讨论。

在讨论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向我提出过，为什么我代表政府作工作报告。看来，这是我的错误。但是，我希望你们对我的工作的主要方面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当我讲政府，讲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讲政府所犯的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把政府所做的许多事情一笔勾销。政府不仅犯了错误，而且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我作为政府首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使自己脱离政府。因此你们数数看，凡是在写着或说出“政府”这两个字的地方，都有我存在。作为政府首脑，我对政府的工作完全负责。而且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划分这样的界限：这是我这个政府首脑的事，而那是政府的事。因为这些事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在政治局工作中，当然我首先研究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在政治局并不总是安逸的，因为每个问题都非常认真地讨论过。

我要说，同志们，政治局正在受到许多批评，对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对所犯错误的批评。我作为中央委员曾经有机会参加过列·伊·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的工作。当时我担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由于职务的原因我有时列席政治局会议。可以说，那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会议只进行15—20分钟，宣读一下问题，表示一下“是”或者“不是”，整个讨论也就结束了，而最近一些年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一般是在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8—9点，有时到10点结束。

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之所以说是对的，因为全体政治

局委员都有可能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种做法已经深入到我们政治局的生活,而我认为……(大厅里有人喧哗)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喧哗。我想,但愿别让我们回到过去。现在形成的气氛使人有可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当然,那时是困难的。因为当时党中央委员会也有各种专业部,它们实际上同政府的专业部是重复的。因此,政治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在党中央委员会投下了影子,因此有时也发生非常尖锐的争论。

同志们,我们收到了许许多多条子,可以说有一半是关于经济改革的。我想,现在我没有必要再谈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即继续进行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性论点了。关于这一点说得够多的了,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看来,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应当多几次认真讨论这里提出的所有建议。对一切有建设性内容的东西都要再次权衡一下,以便在9月以前,即在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起草的政府纲要以前进行讨论并提交最高苏维埃。

我只想谈一个问题,以便使我们在这里不说什么吞吞吐吐的话。许多同志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向市场经济过渡从提高物价开始,是荒谬的,你对这些话有什么看法。我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显然这里有些不准确,从而引起了这样的议论。我也认为,向市场过渡只是,我强调的是,只是从提高物价开始,是荒谬的。不能这样看待市场经济,也根本不能这样看待我国今后的发展。因此,如果加上“只是”这个词,就完全符合要表达的意思了。

向市场过渡是一项综合性的计划。不能把事情只归结为价格。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对此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关

价格的建议提了很多,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我们无法回避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我的时间还剩下 10 分钟。如果同志们还有问题就请提出来,我愿意回答。

**B·A·科利佐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苏联部长会议贵金属和金刚石管理总局“乌拉尔金矿托拉斯”南扎奥泽尔斯克砂金矿联合公司经理),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在发言中抱怨说,他三次把农业问题提到政治局,可是却没有讨论这些问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的这种相互关系是令人不解的,三次提出问题,却没有讨论。您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尼·伊·雷日科夫**: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不止一次地提到政治局,正像您知道的那样,也曾经提交给去年的三月全会。因此,我可以说不,不是三次提出这个问题,而是许多次,而且每一次我们都讨论了农工综合体发展的某些问题。在去年 3 月和 3 月以后,叶·库·利加乔夫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应当确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数额,以便使农工综合体能够知道必须用于农村发展的投资数额。我的意见(前天我对国家农业工作者也讲过)是:的确,下一个五年计划应当优先发展农工综合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要优先发展农工综合体,就应当说到做到,否则我们就解决不了农业问题。这样,我们就应当对某些方面作些限制,也就是要停止执行我们的其他一些计划。问题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一旦我们确定了投资数额,确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那就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说不,在制定计划时为下个五年计划农村社会领域确定的初步投资额为 800 亿卢布。我们现在定为



1200 亿卢布。怎样把这一点同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协调起来，过几个月就可以定下来。因此这里的问题没有原则性分歧。

**9. 10. 尤苏波夫** (乌兹别克共和国，国立塔什干列宁大学校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怎样看待今后种棉业方面国家订货的发展前景呢？这种国家订货可真是彻底毁了我们。我们按国家订货缴售了棉花，却既没有换回肉类，也没有换回任何别的东西。我们的一些农业地区肉类的人均消费量为 13—15 公斤，甚至也不允许我们向外国销售超产棉花。如果允许我们用 10 万吨皮棉进行易货贸易，我们就可以给共和国换回 10 亿卢布的食品和工业品。您认为继续保留种棉业方面的国家订货的前景如何呢？

**尼·伊·雷日科夫**：同志们，眼下我们正在研究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用产品的物质技术保障问题。我在发言中说过，我们认为，明年在市场的其他调节因素当中，物质技术保障系统应当占重要地位。我们认为，明年大约 40% 的资源应当集中分配。

棉花方面也存在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把我国的出口义务和留作储备的数量不大的棉花纳入国家订货。其余的全都留下来用于共和国之间搞直接关系。明年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我们对此还有很大疑虑。但愿轻工业不要停产。因此我们认为，显然大部分棉花应当纳入国家订货，只把一部分留给棉农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10. B. 利霍什娃** (乌克兰共和国，切尔尼戈夫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住宅公用事业局局长)；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住宅—2000”计划今天成了基础中的基础。我想知道政府和您本人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完成这项计划，特

别是今天当有苏军从经互会国家调回国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政府在收割庄稼和保障燃料供应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看到，机器都停工了，我们把谷物丢弃在地里。

**尼·伊·雷日科夫：**我想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十天以前通过了政府关于保障农业燃料供应的决定。我们不得不从出口中，包括对经互会国家的出口中拿出700万吨石油送去自己加工，以炼取农业用的柴油和汽油。我们认为，这项决定可以使我们保障农业的燃料供应。

您提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住宅—2000”计划。我认为，不能废弃这个计划。现在我们正在修改这一计划，因为1986年的原始资料已不合适了。考虑到我国人口发生的变化，我们应当对计划作些修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了保障这个计划的实现。我们要建的住房不是这个五年计划打算建设的5.5亿平方米，也不是6亿平方米，而至少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9亿平方米。有这么多能力吗？有，如果我们能发展起相应的建筑工业的话。我们认为，在住宅方面是有进展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他的报告中说过，我们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多建设了1亿平方米住房。在个人住宅方面发生了迅速的转折，我们使个人住房建设增长了40%。但是建筑材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应当解决这些问题。

**A·H·伊萨零科**（立陶宛共和国，克莱佩斯商港司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是一个党员给另一个党员提问题。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也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有一种看法：在共和国发生的一切都表达了共和国居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共和国政府没有充分反映立陶

宛存在的看法。现在，在准备进行共和国政府和国家政府之间谈判的时候，在共和国居民中间进行关于是否信任这个政府的全民投票是不是合适，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谢谢您的回答。

**尼·伊·雷日科夫：**同志们，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很重要，需要回答。显然是不能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赞成现在发言的这个同志的意见，为了代表人民说话，就应当先知道人民的看法。下面就是我的立场。你知道，立陶宛已宣布从开始谈判之时起暂停执行要求独立的文件100天。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共和国都在组建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我提出问题。我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立陶宛来参加这次谈判并且表示，除了退出苏联它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它就应该严格按照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法律，就是从开头到尾原原本本地按法律走这条路。包括必须进行全民投票。但是我想，在立陶宛终究会听到理智的声音，居民们未必会表示赞成退出苏联。在我们建设联邦国家的新的构想中，有许多能使共和国为自己找到合适位置的可能性。

（译自1990年7月11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瓦·安·梅德韦杰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由于给我提出了550个问题，我的处境也相当困难。有些问题我昨天在意识形态小组开会时实

际上已经回答了。但是，当然不可能把如此之多的问题都包括在内。尤其是，这些问题简直涉及到所有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一样，反映了我们社会发生的所有过程。当然，意识形态也还有它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努力把所提的问题归类排队。我将谈到其中的某些问题，着重回答条子中最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我想首先谈谈那些包含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我个人的工作评价的条子，这些字条实际上不是问题，而是发表意见。

加尔金同志（莫斯科州）写道：“在您进入政治局之后，党的全部意识形态工作都被取消了，怎么能这样呢？”

格拉德夫同志问：“您与苏共的垮台有关，您对已形成的政治危机打算负什么个人责任？”

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具体谈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急剧恶化？是什么东西把党的意识形态搞成这个样子？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问题中，没有什么可怀疑、思考和不清楚的地方。说出了非常坦率的观点，意识形态完蛋了，这就是一切。这类条子肯定地说，新的意识形态，改革的意识形态尚未形成。

当然，这是令人痛心和相当伤心的。但是，让我们想一想，弄清楚：我们作出这种评价（我这里指的不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评价，而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评价）会不会使我们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

请问，如果一个人，而且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能把意识形态搞垮，那叫什么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那么搞垮的是什么意识形态？如果指的是旧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和停滞的意识形态，那么这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好。应

说明白这一点。

怎么会是这样呢？在过去，当意识形态中盛行阳奉阴违和谎言，思想停滞，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和狭隘的思维，言论和行动严重脱节，公开性受到无耻限制的时候，意识形态是发达的。而现在，当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现象并走上革新道路的时候，意识形态却垮台了。

同志们，这种评价不是颠倒了吗？这不是怀旧思想在作怪吗？这不是把旧时代的垂死挣扎与新生儿诞生时的阵痛混为一谈了吗？

当然，我丝毫不想以此来粉饰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意识形态工作仍然是近乎病态的、困难的和有危机的。在清除锈蚀层的过程中，也触及到了我们机体的健康部分。出现了一种吹毛求疵，妄图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切原则的浪潮。

我不想为意识形态部门的不灵活性，包括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辩解。关于这一点我还会讲到。

但是仍然需要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仔细的思考。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改革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失败，如同经济的失败一样，那就应该停止改革并向后退回去。

如果这是指改变我们立场的过程，哪怕是痛苦的和困难的过程，那就应该促进这个过程，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同志们，在理论方面也出了许多问题。我认为，现在还不是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和地点。这些问题涉及到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否缺乏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我个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理论研究的贡献。

我只想讲一点。是否存在改革的意识形态和构想？现在，否定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社会意识中的某种时髦东西了。

现在，我想引一段我同尊敬的塔夫赫利泽院士的对话。他现在坐在主席团里。在会议休息时他对我说，“我不懂，怎么能说不存在改革的意识形态呢？改革本身又是什么？要知道，这就是意识形态。”

我要补充说，它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首先是意识形态。要知道，这的确是与旧观念和教条，旧思维和旧心理的彻底决裂。怎么能说缺少改革的意识形态呢？

当然，还没有对所有的问题都作出回答，还没有一幅总的蓝图。这也是应该承认的。但对此我想谈下面一点：认为可以制订一个完整的蓝图，一个改革事业的完整设计，然后才着手付诸实现，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即使是搞个工程，也不得不按施工设计来施工的，而在社会改革这样复杂的事业中，这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还有一点，由于我们都是由过去的一套传统教育出来的，所以总是习惯于认为会出现某个圣人，某个救世主，他将告诉我们一切，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我们只要对此加以谈论，加以实现就行了。或者可以使某个研究所，某一批学者坐上一个月，让他们给我们制定出一种改革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们自己对马克思和列宁却生搬硬套，提出了一套幼稚的想法。然而，这些思想家不是孤立的，他们反映了自己时代的革命进程，他们曾处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

我丝毫不是要减轻理论家和意识形态战线所负的责任，但同时我认为，改革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及我们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社会的认识，只有在我们革命改造活动的熔炉中才能锻造出来，并且只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至于我个人的贡献，那么我可以说，我直接参加了最近一

个时期一切理论和政治文件的制订工作。此外，我还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文章。我可以提一下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其中有1988年底发表的主要文章《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理报》上的文章，包括作为整个经济改革核心的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文章。许多方法论问题收入了在我作意识形态工作之前不久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我在各种不同场合所做的数十篇讲话以大小不同的篇幅刊登在报刊上，成了公众的财富。

这是多还是少呢？也许是少。但是，应该说，我不习惯于在别人写的文章上署名。

我收到100多个舆论工具方面的问题。这些字条、问题和意见的绝大多数的基调是为了“压制某个人”，尽管也有相反的指责，指责我“压制”《莫斯科新闻》、《论据和事实》、《星火》杂志和电视节目《七天评论》等等。我本人受报纸的批评也不少，所以谁也不能怀疑我想阻挡对报纸的批评。但是，与此同时，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如果把自己同报刊的关系建立在激烈的冲突而不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由此得到好处。

我想为党的报刊开脱一番。顺便说一说，对于有关党的报刊的变化情况这一明确的问题，我可以更具体地谈谈。《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产党人》今年订数下降的趋势已止住了，而《工人论坛报》、《农村生活报》、《经济和生活》订数不断上升。我们经常做党的报刊工作。每周都开会，有时开得更多一些，讨论当前的各种问题。有一张条子指责党的报刊萧条了，对此我不能接受。

至于这里提到的《莫斯科新闻》、《星火》、《论据和事实》及其他报刊，我对它们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和批评性的，这首先

是对那些放肆地宣传反对我党和党的工作者、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而言。我们在《真理报》、《共产党人》和其他许多出版物上组织回击。我能够讲出报刊和电视中那些非常成功地回击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对手的文章。但是我应该坦率地讲，这种猛烈的批评现在阻止起来越来越困难。

但是，我想，事情不仅仅如此。主要在于，我们报刊的工作条件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这一点同志们在这里谈到了。因此领导方法应该是另一种方法，应该依靠严格遵守我国法律。

当然，新闻工作者和舆论工具领导人的党性和公民良心具有原则意义。这里有些问题具有全党的性质。我们代表大会明显地显示出这一点。舆论工具的领导人这样分析道：在历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党的历次会议上都有不同的观点，乃至遭到我们大多数人否定的那些观点。这种发言是存在的，为什么它们无权在报刊上发表？我们告诉他们——是的，有这种发言，但是请你们也谈谈党的观点。同志们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这方面的问题在于确定党的意见多元化的限度。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之一。我们应该扩充我们的行动纲领，但是应该明确地确定行动纲领的思想政治限度。而且将来要据此行动。

文化方面的问题不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问题涉及到性放纵和淫秽作品。这说明文化问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也免不了发生荒唐的事。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怎样评价苏联的性革命，您对它有何贡献？”你们看，还得回答这样的问题！

同志们，文化领域正发生着最深刻的变化——矛盾的变化，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我同意坚决提出不能容忍庸俗、下流、放纵、残暴的问题。多元化和扼杀全人类的价值——这远



不是一回事。

我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的立场反映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公布的意识形态委员会有关党在文化领域的政策问题的文件中。

我们大家都应该致力于使我们的文化免受腐蚀性影响的工作。而且我想，在这里首先应当依靠法律的力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依靠法律力量的。

苏联检察院的官方材料。几年前因生产和销售宣扬暴力至上和残忍行为的诲淫诲盗的制品和作品，每年受到刑事处分的有300—400人，主要是一些从事放映外国录像带的人。1989年根据刑法典的这些条款受到刑事处分的有52人。我们自己正降低要求而且不想运用法律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法律机制应该加以补充。在这方面意识形态委员会制订出了有关建议。

我认为，需要建立保护社会道德的社会和国家机构。也许，可以隶属于最高苏维埃。不是要发挥东正教式的作用，而是要发挥干预那些超出社会道德标准的进程的作用。

同志们，谈两句族际关系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人向我提出问题：为什么缄口不谈族际关系，似乎这不是意识形态工作。确实，我没有谈这一点，也没有谈其他许多涉及这一领域的问题。我可以证实，我参与制定了中央有关族际关系的行动纲领。在此之前，在意识形态委员会曾讨论了族际关系的意识形态方面。

至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当然，在这方面应该对许多事情进行深入的分析。有过错误，但是，如果谈到我们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次视察，那么，我向你们保证，我的良心百分之百清白。无论是在每一次发言中，还是书面或口头讲话中，我

从未回避尖锐问题，我对民族情绪和分立主义情绪作出了局势所要求的评价。而且我也阐述了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同志们，最后有几个涉及我个人的问题。

有人问我：“您如何评价政治局中主管意识形态的您的前任利加乔夫同志和雅科夫列夫同志的工作？您认为，您本人是否已经为迅速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尽了一切努力？”

我不对自己的同行发表看法，况且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我在1988年秋天踏上这艘意识形态之船时它颠簸得很厉害。既向左晃，又向右晃，而且与一般的船不同的是，它同时向左和向右摇晃。产生了一个任务——使船的行进保持平衡，使它走向建设性的轨道，活跃意识形态工作。于是我努力使一切事情都符合这一方向。我相信，意识形态中的方针、改革的方针过去和现在都正确。因此，说我搞某种游戏，把什么都搞垮了等等指责我一概不接受。我真诚地和准确地遵循着改革的经过调整的政治方针。

当然，不足和错误是存在的。我想，主要问题是，我们在拆除旧的机制时，远没有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坚定性和精细的精神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机制。缺乏足够的积极性、战斗性、进攻性。特别应该指出与地方联系不够的问题，但是我应该说，过去党的州委书记极少一起开会，与此不同，我们已经召集他们开过三次会。召集宣传部部长开过两次会。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没有深入到区委、深入到基层党组织，很少帮助基层党组织改革自己的工作。

同志们，我的汇报就要结束了。但是我想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您在所汇报的期间有没有产生过辞职的想法？如果产生过，那为什么没辞职呢？

应该说，这一想法不仅产生了，而且一直盘踞在头脑中。

而且不时地使我想起这一点。在各种事件以及来自右的和左的批评的最残酷的压力下，担负起所有这些工作是不那么简单的。但是对所承担的工作，对发生的事情，对国家政治领导的稳定性的责任感阻止我辞职。我所希望的是，我能以某种合理的、某种现实的态度对待所发生的进程，对这一局势有点益处。

可以说，我从未奢求领导者的宝座，我为它的许多标志感到苦恼。同志们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努力诚实地工作，贡献全部力量，为社会正义革新事业紧张工作，而且，同志们，诚实地说，在这方面我从未受到良心的任何谴责。

我并不抓住领导职位不放，而且现在，当代表大会开创着我们发展的新时期，十分复杂和十分困难的时期的时候，我不放弃工作，但是我认为，应该给更年轻的和头脑更新的，也许是更坚毅的人让路。这样的人是有的，他们出现在意识形态舞台上，其中包括在党中央意识形态部。现在应该抛弃一切个人打算。

我感谢命运使我得以参加革新我国社会的进程。我打算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工作并且永不背叛改革的目标和理想。

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抛弃一切个人打算，应该考虑使代表大会在忠于民主改革的领导人的领导下走上新时期，使代表大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和情绪，否则对我们大家都将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希望代表大会完成这一任务。

问：近年来，先进生产者、农村的实际生活在报刊、电视、影片里不见了，报刊、电视和影片反映了社会的许多消极情绪。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想近年来党的报刊在这方面发

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工人，也出现了集体农民、劳动人民，也许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多。但是同志们，这里必须现实地衡量一切事物，并且不要回到先前那种状况，即恢复报刊的那种不涉及任何人、粉饰太平、表面上令人满意的版面。

**问：**为什么建设者的机关报《建设报》不存在了？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想，重新办建设者的报纸是将来的问题。但是，《建设报》保持老样子是不能使读者感到满意的，我们曾经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建设报》的读者改看《工人论坛报》，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发生恰恰是符合需要的，并且证明我们进行变革是正确的。

**问：**能不能不搞人身攻击，多关注先进的劳动者？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已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新条件下，在新环境的背景下，应当加强对劳动者的关注。

**问：**高级党校毕业生的理论水平是否使您满意？如果不满意，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来纠正这种状况？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以为，无论是高级党校，还是我更了解的社会科学院的理论水平，主要是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的理论水平，现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把重点放在培养专业很狭窄的专家身上了。必须把党的工作者培养成全面的政治人才。既培养他们具有理论知识，也教会他们在现代条件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

**问：**您如何评价莫斯科会议上形成的局面，即从大厅里搬走列宁塑像的情况？

**瓦·安·梅德韦杰夫：**当然，我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证明很大一部分代表的情绪不对头，遗憾的是其中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我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亵渎。

问：请问，为什么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政治工作实践的基本问题方面，在研究和预测舆论，发展政治社会学、心理学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不完全同意这一点。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院，它正在转向迫切问题，包括转向社会研究和心理研究。但是，我认为，社会科学学院也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也好，都需要深化改革。这方面的建议已经制定出来了，我们只是还没有实施这些建议，等待着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进行这项工作大概将是正确的。

B·A·拉祖特卡（立陶宛共和国），尊敬的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最近您不止一次地视察过我们共和国并且应当说，您为避免我们的共产党分裂和团结党的力量做了许多工作。发生了分裂这件事大概不是您的过错。您过去帮了我们的帮忙，现在也正在大力帮助我们。请允许我以立陶宛共产党的名义为此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但我有这样一个问题，还在3月11日以前很久，在分立主义分子掌握权力之前，归苏共和苏共中央所有的舆论工具、党的报刊，包括物质基础，印刷厂等等，实质上就由反对派和反党势力掌握了。苏共中央或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高高在上地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或是有意这样做，于是全部基础交给了反对派，直截了当地说，是交给了对手，结果，党连一个机关报也不掌握了，并且绝对地没有物质基础了，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印刷厂和诸如此类的手段，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这一点我们至今莫名其妙。谢谢。

瓦·安·梅德韦杰夫：您指的是立陶宛的舆论工具吗？

B·A·拉祖特卡：是的。但是，我认为这恐怕不仅仅是我们的特点吧。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们曾经尽一切努力首先帮助立陶宛共产党成为一个统一的党，然后是使苏共舆论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情况是“萨尤季斯”（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确实一步一步在各种舆论工具中加强了地位。党的出版社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您是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尽管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出版社的决议，也采取了严肃的措施，可是出版社仍然掌握在已经脱离了苏共的立陶宛共产党手中。从法律方面的保障来看，事情取决于实际上对出版工作的影响。

我们也曾帮助创办报纸，这指的是《苏维埃立陶宛报》。

我们还将帮助做好电视和广播工作。

Г·Е·科利佐夫（伊万诺-弗立科夫斯克代表团）：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您知道在足球场上，裁判的这种手势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对您和您的工作的评价。

瓦·安·梅德韦杰夫：这是您的权利。

Г·Е·科利佐夫：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是意识形态小组会议总结文件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七个人花了两个小时研究这个文件。大家安安静静进行了研究，可是有人给我们换了个文件，提出了原先的、代表大会以前的方案。《真理报》总编辑使事情得到补救。他坐了下来，抢着说：“我来挽救局面。”当时我们召唤第918室的一位同志，可是他没来。只是后来，当我威胁说要抢话筒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的时候，他才前来道歉，但是这个文件到底还是没有“出现”在这个讲坛上，而我们的党在今后五年内将有一个没有发动机，没有思想的现代化汽车的模型，因为我们今天的思想还很差劲。我们将在五年内乘坐一辆没有发动机的汽车。一个没有思想的党代表大会还算什么代表大会呢？我也希望，如果我们计划明天就再举行一次工作集会的话，思想问题仍将是首要问题。我

们在这样的集会上也应当把一切说清楚，能够带点什么东西回家。否则还算什么代表大会呢？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与意识形态小组的总结工作没有关系，因此我不能对您问题的第一部分作出反应。至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义，则我支持一种想法，即新领导必须在近期内，也许在中央全会上认真讨论意识形态问题。

**Б·З·卡西莫夫**（塔什干州党组织），尊敬的梅德韦杰夫同志！某些中央级舆论工具为什么无礼干涉加盟共和国的内部生活？它们把自己绝非客观的评价当作至高无上的真理，恰恰是中央级的舆论工具因制造“乌兹别克案件”、“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案件”而使苏联人民对乌兹别克人有了偏见。所有这一切在开始时都受到了鼓励和支持。而且只是在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成了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的时候，只有在这之后才开始对他们在乌兹别克非法地和不人道地进行的那项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为什么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没有深入了解族际关系方面发生的情况？为什么意识形态专家没有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作出政治评价？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与乌兹别克老早以前发生的所谓的“乌兹别克案件”时的各种情况无关。至于近来舆论工具，尤其是党的报刊的工作，则同志们知道，我要坦率地说，在座的编辑们也可作证，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真理报》和其他报纸长期不报道加盟共和国的情况时，人们感到很委屈，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开始报道加盟共和国的情况，立即又产生了相反的信号，说什么这个弄错了，那个也不是这么回事，等等。我认为，发表议论应当十分慎重，尤其是涉及到族际问题。但是你们明白，报纸是不能提供绝对无菌的真实情况的，总会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如果出现了某些不确之处，

报纸应纠正，我一贯主张在报道中刊登这类更正。

**И·Н·舍佩列维奇**（爱沙尼亚代表团）：尊敬的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国家政治领导的基本职能之一是预测国内和党内的事态发展。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昨天在发言时向我们共产党员发出了警告：我们很快就会遇到东欧国家发生的事情。请费心预测一下，或是猜测一下，那种事情首先会在哪里发生——莫斯科、列宁格勒还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瓦·安·梅德韦杰夫**：我想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面临的一项任务主要不是预测，而是尽一切力量使党保持自己的阵地，积极地捍卫党的阵地。当然，必须分析和预测情况，我们也正在做这件事。我应当承认，党的中央委员会目前还没有组织认真的预测工作。可以说只是在某些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我觉得，这是未来领导层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译自 1990 年 7 月 11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亚·尼·雅科夫列夫答与会者问

（1990 年 7 月 7 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由大会秘书处转来的以及我本人收到的条子，共计 155 张。它们包括 250 多个问题。而其中 80% 是来自地方的，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问题说得客气些，是以尖锐的形式阐述的，另一部分——怎么说呢，还算是善意的。

对于那些对我的工作表示某种或多或少肯定态度的问



题,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就不作答复了。首先,我先谈向我提出的有关对一系列事件应负责任的那些问题……许多问题涉及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问:来自莫斯科州、拉脱维亚、维尔纽斯和塔林的同志要求我谈谈我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时局的看法。他们还问,我对于党的分裂、对分立运动应承担什么责任。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

答:这段历史由来已久。坦白地说,迄今为止,我一直想搞清它的目的和趋向。但是现在——我向大会代表们表示歉意——我除了引用我自己讲过的话外,没有别的办法。

问题在于,在所有这些指责中并未提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也未引用发言或者讲话。

举例来说吧。1988年8月,我在维尔纽斯曾就民族主义问题讲过,“显然迫切需要对族际关系作出有分量的法律评价……防止自身的缺点,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认识是民族英明与否的见证。民族自觉是否仅仅归结为属于某个民族的自豪感呢?我们是否该走上在自豪感方面进行竞争的道路呢?理智不属于非理性情感。哪里没有理智,哪里就没有责任感……这里所谈的族际主义不仅是作为政治范畴而言的,而且也是作为道德范畴而言的……一旦本族人民或者本民族的利益与他族人民和其他民族利益相抵触,一旦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受到限制或者破裂,民族主义便开始表现出来。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盲目的,而且是反人道的。它寻找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它搞的是对抗,而不是团结。”

还有我在里加说过这样一番话,“回避自己的历史是愚蠢的。历史不容置疑地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和斯拉夫民族的命运自古以来就是休戚相关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苏联人,无

论在哪儿都应该感到如在自己家中一样。按民族特征划线就是埋葬希望和葬送民主……在民族关系中……最有害的莫过于不慎重，仓促行事，缺少策略，强行推动事态发展和过分的民族自大……把社会划分成民族、社会、宗教或某些其他禁区，就等于使社会和我们自己注定要停滞、退步，注定要遭受最坏的和无端的考验。不是前进，而是后退，退得很远。”

这就是我曾说过的话。

两年前，当我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时，我在那里讲过话。我曾讲过，必须享有主权和制止主管部门的独断专行，谈过要真正地建设一个新的联邦等等。那时，任何有关党的分裂、有关分立的话题，都没有议论过。谈话完全是在另一种环境下进行的。把这种环境生搬硬套到今天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事态是沿着非理性的途径发展的，对此我是绝不支持的。

有同志们问，现在需要什么？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各个方面保持克制和责任感。政治对话，还有在维尔纽斯和莫斯科采取的最后行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需要尽快地推进改革，首先是向市场过渡和制定新的联盟条约。

我坚决谴责对共产党员的任何污辱，对纪念碑和军队的流氓暴行，以及类似的一切野蛮举动和感情，遗憾的是，最近一段时期在哪里都出现了这种举动和感情。

这就是我对形势的一个总的评价。还有一些个别问题。

问：您是否准备就波罗的海沿岸之行的结果向政治局提出什么报告？报告的内容是什么？所作出的结论对今后发展是否有影响？

答：任何报告我都没写过，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报告了。这是同一范畴的问题。

还有，指责我坚持主张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公约。

答：不对。我在报告中说过，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公约是合情合理的，只有历史才能评判它对我们国家所具有的意义。我还说过，在当时的局势下，它是必要的。可是，根据国际法，1941年的战争废除了苏联和战前德国之间的任何协定。

我曾坚持认为——而且委员会也同意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也同意过，这个公约的秘密议定书是非法的（因此废除它，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谈过的话。因此，谁也没有怀疑这个公约，何况它从1941年起就不复存在了。

同志们询问刊登在《俄罗斯文学报》上的“联盟”议员团的呼吁书的情况。

我没有看过它，但是听到过。他们建议调查我在波罗的海沿岸，乃至整个这个地区的活动。我同意关于成立由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在立陶宛的活动的建议。但是，有一个请求，如果查明我在某件事上有过错的话，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觉得同志们这样做是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话，那么对不起，看来也要同样问罪。

许多问题是关于东欧的。同志们，无论是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还是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的工作汇报，对这方面所做的评价，我都是同意的。每个国家各有各的发生变化的原因，但是，对于所有国家也有共同的原因。如果人民不再理睬这些党，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把这些政党的政策看作是自己的政策，人民的政策。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存在反社会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主要的恰恰是人们和广大共产党员对党的态度。今后还可再作分析。但是，同志们，现在有人指责苏共中央使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了，我们应该记住，1953年在柏林所发生的事情，1956年在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1968年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

情。1968年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重建社会主义基础，我至今还对这一使命感到很尴尬。

同志们，但是应该深入地考虑一下。难道在改革之前，我们同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就没有破裂过吗？

也不应该急于在东欧埋葬社会主义。假如说社会主义的重要成分现在也在西方存在，特别是在社会领域存在，那么这些成分也会在这些国家里显示出自己的作用。但这是生活现实，毫无办法。用中央决议的办法并不能取消这样的事实：目前南朝鲜比北朝鲜工业产值高九倍，西德的生活水平比东德的生活水平高得多。难道我们大家在这里的代表大会上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不成，我们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有一张条子说得对。写条子的人说，欧洲局势的正常化客观上降低了我们作为军事保证人和头头的作用。我同意这一看法，但是欧洲局势的正常化不仅降低了我们的作用，而且也降低了美国在欧洲作为军事保证人和头头的作用。我想，这是好事。

正如我们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每个党首先对自己奉行的政策向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负责。也应当接受关于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意见，是该认真接受的时候了。我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过去支持而且现在继续支持兄弟党和它们的党员。当然，当有人搞反对兄弟党的活动或者进行政治迫害的时候，就像美国在麦卡锡时期做的那样，就不能不表示愤怒。但是，我想，理智将会占上风。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共产党在大选中得到了比它们预期的要多得多的选票。

最近，我会见了居西同志，还会见了莫戈里塔同志、米勒同志、利洛夫同志。当然，他们的处境不轻松。但他们对前途

根本没有丧失希望，他们也说，他们确实应当进行改革，应当走到群众中去并重新在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中赢得失去的威信。

有人说什么，我们瓦解了共产主义运动。对此我是绝不同意的。在这期间，我们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恢复了党的关系。而且这对国际工人运动来说也是有某种意义的。许多社会主义力量和运动自动向我们接近。我们现在同社会党国际和其他社会党保持正常关系。这些党在西欧掌权，而且不仅在西欧掌权。当我们抛弃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蒙蔽的时候，我们同许多西方共产党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再有，同志们写道，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遭到破坏。

可是，在国际小组会上莫伊谢耶夫同志关于华沙条约的发言是足以令人信服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改革，确实在改革。我们在向企业的直接联系过渡，向按世界价格结算过渡，单是这一点就要求进行改革。看来，某些直接联系并未奏效，而另一些直接联系刚刚产生。我想，经济互助委员会作为经济组织在改革自己的工作之后是会有前途的。至于谈到华沙条约组织，我没有看到有任何根据可以说它遭到了破坏，而且我认为，华沙条约缔约国国防部长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证实了我的评价。

我应该向你们谈谈我对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印象。这是相互信任的人们的会议，而且没有任何人提出关于解散的问题，不像这里有些同志谈的那样：大家庭、互助、经济联系等都已瓦解。我想，所有这一切还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也都适用于所谓大家庭的“垮台”……还有所谓国际工人运动的“垮台”。有人问：“您是否认为，有

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共产国际类型的国际组织呢？”

即使我们非常想这样做，我想，我们也做不到。共产国际在战争期间已经解散，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是在 50 年代解散的，想把整个运动联合起来的一切想法所遇到的将不是我们同这些共产党的分歧，而是共产党本身之间的分歧，它们对现实生活的立场和观点的不一致。

有人问“为什么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对资本主义国家正式访问期间不同共产党领导人会晤呢？”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情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他所访问的某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见。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还有关于德国问题。

是的，这是重大问题，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在这里谈过这一点。确实，这个问题不能不使苏联人感到不安，但是，同志们，这不是改革臆想出来的，也不是我们现有领导人臆想出来的。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我们一直在提。我记得，第一次还是在 1945 年底或者是在 1946 年初，后来在 50 年代又提过多次。而现在现实生活又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另一个话题就是，必须做到从德国领土上不再产生对苏联的任何威胁，必须做到使我们不再经受我们曾经受过的那种灾难。

问：您是否相信，人类生活中和平时期已经开始？

答：是的，我相信。

问：您是否相信，已经开始建设没有战争和武器的新型的文明？

答：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问：关于全欧大厦。听人说，有人在西方建设全欧大厦，

然后将允许我们进入这座大厦并发给我们一处住宅的钥匙。

答：同志们，全欧大厦的主张是苏联提出来的，而不是西欧国家提出来的。而且这一主张的推行是很困难的，是在包括我们的巨大压力下和在进步力量压力下才推行的。因此还需要看一看，到底是谁将允许谁进入全欧大厦。

问：有人问，在镇压时期死了多少人？

答：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一情况。有这样一种情况：既无名单，也没有其他材料。而且我们简直不知道，有些坟地埋葬的是什么人，如何确定和验证他们。正如我告诉你们的，已恢复名誉者达 100 万人。这一过程应当继续下去。暂时还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数字，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说出，而且也会说出的。

还提出了我认为谁可以当总书记的几个问题。我回答：我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可以当总书记。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这里有一些条子要求我辞职，而另一些条子，这么说吧，正好相反。对自己来说，我已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对支持我的人表示感谢；对要求我辞职的人，我将满足这些要求，今后我也请你们原谅，尽管任何提名尚未开始，我请求原谅（我简单回答条子上的问题），我不想在这个讲坛上以我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而使任何人为难。谢谢。

K·M·加里宁（莫斯科市，代表证第 1431 号），尊敬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是否支持雷日科夫同志的建议，即“但愿大会代表给我和政治局作出评价”？

亚·尼·雅科夫列夫：我要坦率地说，我不很理解这些汇报，原因如下：政治局是个集体机关，各项决议是集体作出的，也是集体执行这些决议。我们曾试图寻找我们个人，即每个

人单独做的事情。但是，90%的工作是在集体条件下和在通过集体决议的情况下做的。因此，我现在认为，最正确的做法是对中央委员会及其两次全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政治局的工作作出评价。我想，我们现在就加以区分和衡量谁少，谁多，谁好，谁清白，也是不完全合乎道德的。

**А·И·列别德**(武装力量)：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有一本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书厚达600页。作者就是您。如何理解您说的话：您将因发表这本书而被吊死在“第一棵大白杨树上”，谁又是吊人的人呢？

您宣布库纳耶夫、阿利耶夫以及和他们一起受当时体制之害者是一些不幸的人。您如何看待把勃列日涅夫同志也列入这个队伍呢？总而言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那里有多少人？

**亚·尼·雅科夫列夫**，同志们，的确，我曾同民主团结组织会过面。我们商定，我们的会晤是坦率的，不公开的，须守秘密的和真挚的。可是，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拿到这里来了。是的，我写了这本书，并将在某个时候发表这本书。您援引的话不完全确切，大概也有速记稿。我说过：有些论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怎么好的，有人现在可能为那些论点产生上吊的想法。可是，过一两年后，那些论点又变成正常的了。这就是实际生活的变动情况。

至于阿利耶夫、拉希多夫、勃列日涅夫，我认为您还可以点几个人的名……在这里我想把我的回答同某些问题结合起来：如何对待那些躺在克里姆林宫墙边的，但又不配躺在那里的人呢？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很接近的。当然，我并不为那些……辩解，并且谴责，从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谴责先前这些领导人当时所进行的那种活动。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开始



挖这样的问题,那么在现在,即在目前我们就脱离实际了。必须从政治上在这些领导人现在所在的党组织内谴责他们,但愿在这些党组织里弄清问题。

至于现在躺在克里姆林宫墙边的那些人,我反对掘墓,无论是谁的墓。时代在前进,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坟墓好像并没有变成所谓的罪人的坟场。历史就是历史,但愿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M·H·卡恰诺夫(立陶宛共产党监察检查委员会委员、苏共纲领派):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向您提几个问题。第一,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1939年条约的报告时只字未提斯梅托纳政府从1939年8月23日至9月28日前后共36天的所做所为。

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确实签署了不道德的条约,那么斯梅托纳政府遵循的是哪种道德呢,当时在维尔纽斯参加准备将维尔纽斯交出去的谈判时,波兰已经在战斗了。斯梅托纳政府1940年向希特勒发出各种信件并且已经发生分裂,那时斯梅托纳政府遵循的是哪些道德因素呢。为什么委员会没有提到这种情况并且给形形色色的激进势力以机会来奉行使社会主义制度庸俗化的方针呢?

第二,我在1989年秋天致包括您在内的政治局各位委员的信里,曾经表示了不容许举行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愿望。在我的信里曾经谈到,这样一次代表大会不仅将导致立陶宛共产党的分裂,而且也将导致我们苏联共产党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分立主义运动。我曾恳切地请求政治局各位委员以集体智慧仔细地研究这一情况。这是1989年秋天的事情。只是到了1990年2月4日,族际关系部才通知我说,政治局全体委员阅读并研究了我写的信。您知道这封信吗?

您对这封信有何反应？

第三，我本人给您寄过几篇阐述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您将这些文章转给《共产党人》杂志了，可任何一篇文章也没发表。您愿意于明天公开地在这里的一个委员会就这些问题同我辩论吗？

亚·尼·雅科夫列夫：第一，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委员会的任务只涉及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涉及研究您所说的那些政府的活动。当然，我们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不能脱离以前历届政府和1939年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您和我都很清楚，那些政府奉行了反苏的政策，即亲德国的政策。

第二，我没有拜读过您的信，我愿意拜读它并且前来请教。至于第三点，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同您辩论，请指教。

（译自1990年7月11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叶·库·利加乔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我通过代表大会秘书处和亲自收到的书面问题共有157个。很自然，由于时间不太充裕，我也像我在政治局中的同志们一样，把这些问题分了类，请允许我回答这些问题。

大批余子涉及到农业政策和这一政策的实施问题。来自阿尔泰的代表阿夫多什金同志说，《文学报》在6月27日写道，国家每年给农业的投资为1000亿卢布。为了改善农村的状况和使商店的食品琳琅满目，还需要多少投资？其他一些

条子谈到的大致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想首先告诉你们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材料，最近五年来平均每年用于农业的投资为510亿卢布，也就是说报纸上谈到的数字正好比这多1倍。我认为，倘若我们真的投入了这么多资金，我们国家的食品问题自然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有权威的科学研究所和专家们的看法。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主要的在于，这是一个城乡之间价值均等的问题。

为使你们能正确理解我，我想十分坦率地说，我不主张轻率地给农业追加投资。不主张！我主张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和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主张农民真正自愿选择经营管理形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者建立独立自主的农业经济。

简言之，我们需要真正的综合态度：完善经营管理和所有制形式，大力加强农村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

**有几个同志这样问：我是否多次讲过要从经济上加强三月全会的决议？**

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只需再讲几句。是的，我确实谈过这些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想说，我也很好地懂得，这是些多么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要知道，历史上又是怎样办的呢？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基本上是靠牺牲农村的利益来办这件事的。后来制造了原子弹，保证了军事战略均势，除其他来源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牺牲农村利益实现的。以后又是冲向宇宙，这又使农业大大地延缓了下来。不客气地说，看来现在应当对某些人施加点压力，促使他们把农业放在首位。其他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有的。当然，这是困难的，但又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决定。

问题并不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或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些既复杂又困难的问题呀！我认为，三月全会后（请你们接受我的极为真诚的说法），在人民代表大会、在最高苏维埃、在政府、在政治局、在党中央和在全国（发表过很多讲话，其中我也讲过多次）我们没有白白做了大量工作，推动社会、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终于开始重视解决保证人民食品这样非常重要的任务。大概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非经历不可的阶段。我相信（我是这方面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现在能更快地前进，能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但是同志们，这绝不是说，在这里、在中央和地方大家都懂得食品是最终保证我们国家更新和改革成功的问题。不是的，在最好的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应当密切注视这些进程。

问：你认为改革时期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当是个什么样子？

答：我已经讲过，经济和经营管理上自由的劳动集体合作社这一过程正在进行。我想强调指出，除此以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农民经济和家庭经济之间的合作制问题已提上了日程。

在这里，生产合作社、农工联合工厂、农工联合公司和其他联合公司应该千方百计地加以发展。

还有不少与农村社会设施有关的问题。

问：你认为，除采取社会措施外，制止青年离开农村的途径还有什么呢？

答：我想，主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再加上改善劳动条件，也就是说要使农业成为青年人感兴趣的工作。还要关心他们的前途。

很多人问：我认为怎样实际解决国家的食品问题，我是否相信农业政策和我们计划的现实性。

答，我想极为负责地说，我从事这项工作已有一年半多时间，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党的农业政策的现实性，相信我们计划的现实性。

我再重复一次，应当双管齐下，全力完善生产关系和用物质技术资源和财政资源大力加强农业。

有几个问题涉及到同酗酒作斗争。部分问题提到酗酒将再次出现，这种现象在蔓延，它是社会的一大公害。一些条子提出了被砍伐的葡萄园和被毁掉的企业的问题。

我想非常具体地谈谈下面一些情况。1985年至1989年更新葡萄种植园，每年比颁布有关命令前少砍了1.15公顷。是的，某些共和国的一些地方以种植食用作物代替了种技术作物。但是，难道因此就该指责人们吗？要知道，不管怎么说，国家对新鲜葡萄的需要量增加了一倍多。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而其他的都是捏造，是在加剧人们本来就已经很激烈的情绪。

很可能，我作为一名西伯利亚人过份重视了这件事。但是，我是在西伯利亚长大的，几十年都没有见到过新鲜葡萄了。为什么？当我开始工作时才弄清楚，1985年77%的葡萄用去造葡萄酒了，供消费的新鲜葡萄仅占10%。我们开始了这项巨大的工作，这是件不容易的事，建立新的技术基地，贮藏基地，运输基地，三四年以后，国家已经拥有100多万吨新鲜葡萄。

一些人还提出了有关食糖的生产问题。

我想向你们通报一声：由于甜菜种植者们采取集约化方法，去年，我国甜菜生产取得了最好的收成，就是说比1988年

增产100多万吨。现在食糖剩余量比去年多30%。一些同志提出取消糖票的问题。我想,这样做为时尚早,应该再扎扎实实地干一阵子,提高食糖产量,然后再来解决将这种重要食品转入正常销售的问题。

一些代表要求点出那些参加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具体人的姓名,他们问道,究竟谁是这种势力的急先锋。

我不想点所有这些人的名,因为你们自己在报刊上读到许多材料,是了解他们的。例如:最近,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在最新一期的《文学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谈论自己的反共目标和意图。特拉夫金同志提出与共产党作斗争的目标。其他一些人也是人所共知的。

一些同志要我谈谈我本人对党实行邦联制的看法。我想再重复一遍我以前说过的话。我反对按照邦联制原则建设苏共,主张党的统一,而在党组织内,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拥有广泛的实际权力来开展自己的活动。否则,同志们,苏共就会退出政治舞台,苏维埃联邦就会四分五裂。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还有人提到那个曾使我受到不小伤害的问题。这就是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我的指控有关的那个问题。我只想告诉大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委员会的材料已就这一问题作了回答,委员会在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曾两次向代表作了报告,检察院和党中央全会的材料也回答过这一问题。我再次指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纯纯粹粹的政治挑拨,我认为,其目的是想在政治斗争中捆住我的手脚。我应该对你们说,这些年来,他们在其五花八门的计划中,除了诽谤和谎言外,没能对我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给了您力量和您是如何

在这场斗争中站稳脚跟的呢？”我想直言不讳地十分坦诚地来谈谈。这使我很高兴，总的来说，我是个十分幸福的人。从哪方面来说呢？从这个肮脏的勾当一出现，同我共处了几十年的朋友和同志没有一个离开我，他们在全力支持我。我想，靠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生活下去了。我收到许多来信。我想，这恰恰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党的同志关系的東西。我收到许多信，而且越来越多，在信中同志们支持我，他们认为我应该表现出勇敢精神和坚定性。

我坦率地说，鼓舞着我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榜样，他说过，尽管有不少诽谤，但他决不与官迷和庸人们沆瀣一气。我遵循的正是这种观点。当然，我决不会用参与这些人的某些肮脏勾当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些问题与第比利斯事件有关。我提醒一点，我就这一问题已作过详细的答复。我在中央二月全会上的发言已经发表，但是，既然代表们提出这一问题，我愿意再重复一遍我的答复。这—问题是集体讨论的，参加讨论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赞同那天上午政治局一部分成员起草的那些建议。做出了这样的政治决定和建议：不允许在这之前其他地区发生过的事件重演。

同时，我想讲讲我过去大概还从来没有讲过的一点。同志们，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遗憾的是不仅仅是在这次事件中，有一点令人十分奇怪——至今没有对这类民族冲突的任何一个煽动者和策划者追究责任。这简直像克雷洛夫寓言中说的那样——“你说你的，他干他的”。人死了好几百，伤了好几千，难民就有几十万。可我们大家却在最高领导中寻找罪犯。

最后，大量的条子大概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利

加乔夫同志，您主张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首先，我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按照社会主义道路更新社会。主张建立列宁指出的那种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顺便提一句，有人说，列宁在临终前彻底改变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没有改变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只是改变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的想法。我把改革理解为保证让人享有充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保证让劳动人民真正参与社会管理。

我再次重申：我反对私有制。因为我确信私有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将把我们拉向倒退。我坚决反对大量失业，并且再说一遍：谁想把国家推向自由的市场经济，那么就让他成为苏联的第一个失业者吧。

关于党我讲几句。除了党和苏维埃，我看不出有第二种力量能够把我国引向进步。我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恰恰是主张民主的集中制。我要说，我主张提高共产党员个人的作用和给基层党组织最广泛的权利。主张党的活动按地区一生产原则进行。反对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护法机关非政治化。我同意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同志们说的那番话，他们在这里发言说：这实际上就是政治蜕变，就是夺取政权。我认为，一切都十分清楚。轻而易举地就给我们偷偷地塞了个特洛伊木马。

我主张与所有的社会组织进行对话，主张妥协，但反对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主张在苏联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公开而坦诚的思想斗争。

我坚决主张加强自觉的劳动纪律和生活纪律，并认为，可以考虑到当前的条件利用1983年的经验。我认为，我们有现实的力量来大大降低犯罪和投机倒把，并加强法制。



现在我们有许多事情还只是在各总部和委员会中闭门造车。顺便说一下，有许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否使国家最终从乌烟瘴气的会海中摆脱出来？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我们最好规定这样一种制度，一切会议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这样，会议就可能少一些。

同志们，最后回答一些条子。这些条子要求评论一下在报刊上不时出现的关于在政治局中，军队中和社会上搞阴谋诡计的消息，关于留恋铁的纪律和铁腕人物的保守势力的消息。

我想谈谈下面一点。关于阴谋诡计的谣言是由破坏势力传播的。我认为，其唯一的目的是，转移社会和党的视线，使社会和党不去注意他们正在进行的破坏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危险。

有人抱着这一目的制造出所谓保守势力留恋铁腕人物的说法。是的，是有这样一些人。但是，我再说一遍，最主要的危险首先是反社会主义势力，是民族主义势力，他们瓦解党组织，破坏苏维埃联邦，在某些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往往把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经验奉献给实际工作的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改革国家的人都称为保守主义分子。

我坚决主张政策的继承性。这就是说，要在改革过程中考虑到党在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

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伟大十月革命70周年时提出的论点，即我国人民一年也没有虚度光阴这样一个论点在我们党的政治工作中没有得到发挥。同志们，应该明白，人们是赞成改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们不愿容忍物质技术保障的解体、消费

市场的混乱、投机和犯罪、兄弟自相残杀、给我们的历史抹黑、侮辱真正的文化和艺术。人们不能容忍电视和电影中不道德行为的泛滥。我曾会见过很多人，视察过很多地方，不仅很多妇女，还有很多男子汉含着眼泪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用什么样的理想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我简直无言以对。

最后一批问题是问我有什么打算。一些同志直截了当地建议我退休，另一些同志则相反，他们支持我的立场，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并坚持要我继续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同志们，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问题。

**Б·З·卡西莫夫**（苏联内务部高等消防技术工程学校副校长兼塔什干分校校长）：您认为自己对1985年至1988年乌兹别克粗暴歪曲干部政策这件事是否负有责任，为防止永远不再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做些什么？

**叶·库·利加乔夫**：如果您认为，撤换许多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人是干部政策中的错误，那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我受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委托，同乌兹别克共产党人一道，同党中央一批工作人员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许多州、边疆区一些组织一道积极进行了使乌兹别克局势正常化的工作，这是我的荣誉。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还有人说，从西伯利亚、乌拉尔、白俄罗斯、列宁格勒、莫斯科向乌兹别克派去了许多人。我认为，我们要经常地不断地这样做，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干部交流应该经常进行。反之，也应该由这些共和国向党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各部和许多其他领导机关派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代表。这应该是一个双行道。我认为，这将会有利于我们的民族政策。

如果这项工作只单向进行，那不好，我同意这一点。

**A·И·卡恰罗夫**(苏联普通机器制造部中央专门设计局设计工程师、古比雪夫州代表):叶戈尔·库兹米奇,尽管您粗略涉及了这一问题,我们还是想得到具体的回答;您对作出导致第比利斯事件的决定负有多大责任。问题是,有您在索布恰克委员会上的证词,有中央二月全会的记录,会上政治局委员有两种意见,一个是您的意见,一个是谢瓦尔德纳泽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说,举行了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局会议,第二种意见,也就是谢瓦尔德纳泽的意见说,没有举行这样的会议。给普通党员的印象是,政治局会议不是一开就12至14个小时,而有时是在下飞机走向小汽车的路上举行的。

**叶·库·利加乔夫**: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他们在大厅里,他们可以再次证实,利加乔夫当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在这个大厅里说了些什么。可以指责利加乔夫做的别的什么事情,但是,要指责他不诚实和不光明磊落,那是不可能的。

**B·M·拉扎列夫**(纳希姆松第25医院外科医生、列宁格勒州代表):我手头有一份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纪录,我念一下。6月20日会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的发言:“政府关于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措施既没有在政治局讨论,也没有在中央全会上讨论。”6月21日会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根本经济改革,其必要性和构想,曾在党中央六月全会上讨论过,因此,认为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那是诽谤。”请您评价一下“诽谤”一词。

**叶·库·利加乔夫**,好。顺便提一下,我请你们仔细听我的发言,这样就会明白,二者都是绝对正确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说的是我们在两年前讨论的构想。这

是完全正确的。而我说的是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政府根据这一构想制定的，并未经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事先研究就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了。顺便说一下，如果要说的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举行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会议时已经承认这是一个失误。我认为，这给他增加了荣誉。问题不在于得到中央或政治局的批准，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执政党及其领导机关应该从政治方面来讨论这些问题。我相信，虽然可能也不完全正确，倘若一开始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在理解向计划市场关系过渡的问题时困难就会少得多。

**P·马马托娃**(吉扎克州米尔扎楚利区阿拜国营农场技工学校工作队队长)：尊敬的叶戈尔·库兹米奇，我提一个问题：您长期在苏共中央负责干部政策工作，您不会不知道，乌兹别克出现过无法无天现象，侮辱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迫害，开除他们出党，撤掉他们的职务，把他们投入监狱。您个人对这一切负什么责任？

**叶·库·利加乔夫**：在乌兹别克，领导工作人员有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我想告诉你们，党中央在有关乌兹别克共和国局势正常化的问题上采用的完全是政治方法。至于属于刑事处分的一切问题，那是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事。

**H·H·卡尔金**(赤塔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内务局副局长兼干部科长、赤塔州代表)：尊敬的叶戈尔·库兹米奇，我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俄罗斯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之前，在同西伯利亚代表们会见时，您就谈了这样的想法，最近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中集体制的精神淡薄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始不定期开会了。您作为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如何看？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因为，正是最近时期国内局势大大尖锐化了。谢谢。

叶·库·利加乔夫：同志们，首先，我想说一点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已经说过的话，有个时期书记处没有全面开展工作。这是在建立了党中央各委员会之后的情况。我们本来以为，委员会能够认真地取代书记处的工作。我个人持不同观点。总结最近一年半以来的经验，我相信，应该组织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这样的民主机关全力开展工作。

И·А·戈尔布诺夫（苏共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叶戈尔·库兹米奇，您在中央委员会曾连续担任过组织党务和干部工作部的领导人，随后又领导了意识形态部，最后又担任了农业部的领导工作，请您谈一下，您在哪个部门自我感觉最好？如果您仍然从事政治活动的话，是在哪个方面？下一个方面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和这次代表大会上您都说过，您在政治局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某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支持。请您谈一下，您为什么不向全党呼吁？这怎么解释，是胆怯还是不愿意同自己的同事争吵？

叶·库·利加乔夫，好，我来回答。在改革的最初三年我感觉很好，当时我们的工作搞得比现在好得多。我认为，头三年我们做了不少事情，事业顺利发展，而且党的政治威信也提高了。现在我和你们一样，感到不安和忧虑，感到对我同政治局其他成员一道从事的工作负有责任。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点，我承担了农业部门的工作，因为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部门，一个复杂的部门。我自己并不是自愿承担这一部门的工作的，但我的出发点是，农业政策既不是耕地，也不是播种，农业政策就是考虑农民的利益，就是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维护农民的利益和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食品问题。因此我承担起了这项工作。农业专家能证实，我们经

常见面和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州委书记和党委书记们能证实我在这个岗位上是如何工作的。

第二点，的确，我曾经说过并再次重申，我认为，如果政治局委员给政治局写报告，这是无可指责的。我在3月和5月写了这样一些报告，我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国家当前的局势和政治形势以及党内状况。第二个报告是，讨论同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有关的问题。

然而，同志们，请你们同意另外一点，这就是在实践中可能从来没有要召开这样的全会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我就是这样越过了一些界限。很遗憾，并没召开有关这一问题的全会。我深信，如果我们当时进行了这样的讨论，那我们在这里，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M·A·鲁西诺娃**（彼尔姆州别廖兹尼基市苏共乌索利耶区委第一书记）：叶戈尔·库兹米奇，关于当前农村的一个灾难——城乡之间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已谈了很多。您现在又重复了这一点。我想问一下，在制订城乡之间等价交换机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叶·库·利加乔夫**：不久前我们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农业委员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专家和著名经济学家。这是一种工作方法，甚至提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工作，并像其他许多文明国家那样，着手在每年的年中，在政府、农民联盟和有关部、主管部门和工业联合公司的参加下讨论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水平问题。

**B·A·阿塔扎尼扬**（阿塞拜疆斯捷帕纳克特市党委第一书记）：尊敬的叶戈尔·库兹米奇，请您谈一下您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否通过卡拉巴赫运动这个例子，就可以把民族主

义、分立主义和改划边界看作是人类要求把已分成几个部分的同一个民族重新统一起来的合乎情理的权利？顺便说一下，今天早晨有人证实，苏联政府支持两个德国统一，甚至是实现统一的倡议者。谢谢回答。

叶·库·利加乔夫：我想再简短地说一下，我的确在巴库讲了话，我说过，在目前条件下，任何民族国界的改变都尤其是不能接受的。我是依据已通过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样说的。顺便说一下，一开始，当这些事件刚刚发生时，我们就通过了正确而英明的决议，决议中明确指出，改变民族国界会给我们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我重复过这一点，现在再说一遍。

C·T·米列伊科（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叶戈尔·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提三个简短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去年秋天，您在同《论据与事实》周报记者谈话时说过，您作为党中央书记曾犯过干部方面的错误。您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曾谈到这一个错误。我想更详细地知道您所说的那些错误。

第二个问题。在俄罗斯联邦党的代表会议上您批评了中央领导同志，因为在几次全会上都没有讨论东欧国家的局势。我想弄清楚，您认为应当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这类问题？

最后，第三个问题。您刚才谈到，列宁没有改变自己对社会社会主义的看法。我有一个印象，在这方面您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观点不一样。列宁断言，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究竟是谁正确？是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叶·库·利加乔夫：我很高兴您给同志们带来了笑的快

乐,因为需要有点幽默感和笑声。顺便说一下,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可太宝贵了。

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在干部方面是犯了一些错误,但我要说,同前一个时期不同的是,尤其是当我们开始采用另外的方法,即差额选择干部的方法,并在选择干部时真正考虑到党员群众和非党同志的意见时,这类错误开始越来越少了。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容忍这方面的任何一个错误,领导人已重新开始研究解决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等问题。但是,的确出现过一些能力较差的人,在目前的困难时期他们未能做好新的工作,不能胜任改革要求解决的任务。这种人是有的,可能为数还不少。

现在谈谈东欧国家的问题。我想告诉你们,在这些事件当中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德国问题。我深信(这不是一些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在我们的社会中,我国高层的国家组织、党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中应当研究这些问题。因为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巨大经济潜力的德国正出现在地平线上。例如,当有人说,看起来是在搞统一,事实上顶多是并入,从根本上说是吞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我没有同意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应受指责的事……顺便说一下,此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不是单独地讨论,而是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作了美国之行的报告之后讨论的。这些问题也在最高苏维埃讨论过。这是稍后的事了。如果人民要对使他们不安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丝毫没有应受指责的。

И. Я. 斯科罗普德(乌克兰共产党杰拉日尼亚区委第一书记、乌克兰赫麦利尼茨基州区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尊敬的叶戈尔·库兹米奇,继1985年作出的众所周知的决定之



后,1986年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少向种植甜菜的人员销售50%的食糖的决定。原说决定是两年的期限。可倒好,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时间。时至今日它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法律依据。您怎么看?应不应当废除这项决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应当废除,那您为什么不在部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叶·库·利加乔夫:我想表示非常遗憾,我们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没作出决定。我还想十分坦率地说,我积极支持使实物报酬能成为一个经济刺激因素。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非常好的作用。

Ю·В·利霍什娃(切尔尼戈夫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住房公共事业局局长):尊敬的叶戈尔·库兹米奇,我认为,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人不关心农村的改革。一个主要方面是,要采取综合的办法,我要强调是用综合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的煤气化和电气化问题。政府和中央目前是否有一个经过深入研究和有物质保障的综合计划或者是这种计划的一个章节?

第二个问题:为了减少煤气管道的金属用量并使钢管产量相应地增长四到九倍,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需要按科学方法解决的煤气化问题的?我指的是聚乙烯(同志们提示了我)。这是一个方面。我认为,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取消平均压力管道网并减少,迅速减少煤气管道。

叶·库·利加乔夫:说到煤气化和电气化,请允许我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我想地方上也会支持全力以赴地解决非黑土地带的煤气化和电气化问题。尽管这方面还有所不足,不过已有了这样一个煤气化计划,也有了个电气化计划。

然而,从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情况看,需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至于金属用量,这是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可以借助于聚乙

烯和聚丙烯以及其他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

(译自 1990 年 7 月 11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答与会者问

(1990 年 7 月 7 日)

我的情况和我的同事们一样，也收到很多问题。其中有一半在不同程度上同东欧事件和德国问题有关。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一些人认为这样，另一些人认为那样。有些人表示不同意我对东欧进程和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评价，我也不准备说服这些人转向我的信念，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

早在代表大会前，在报刊上，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详细地阐述过我对东欧进程和德国统一的看法。我只想讲一点：对外政策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意见和态度制定的。在列·尼·扎伊科夫和德·季·亚佐夫同志的发言中，在我对《真理报》的谈话中，都谈到了作出对外政策决定的过程。我再次强调指出，所有有关国家安全和军事问题的决定都是在国防部，其中包括总参谋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国际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参与下作出的。所有与东欧和德国问题有关的决定都是由最高政治领导层集体研究和作出的。

一位代表指责我，说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哥本哈根讲话说了假话，我在那里谈了对欧洲战术核武器的态度。这位代表写道：“您的讲话没同苏联国防部商量。这是什么，是在提高我们的国际威信方面又一次‘跃进’吗？”鲁萨克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我来提一下我在丹麦讲了什么。我说“我们早就提出消除核军备，包括双重用途工具的部分以及能携带核武器的飞机。

在华盛顿，我们曾建议今年秋天就开始谈判。为了给谈判创造有利条件，苏联将单方面削减部署在中欧的60个战术导弹发射装置，250多门原子炮，撤出1500个核弹头。到今年年底，总计将削减140个导弹发射装置和3200件原子武器。”

难道有谁当真会相信，外交部长是在自作主张讲这些事吗？然而，这是不是表明这个问题对某些人有利，有人想诋毁外交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把这些文件带来了。我请代表们在休息时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们看这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下面都有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外交部长和其他同志的签名。我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都提出过类似的指责。

代表们递了几张条子，希望我谈谈东欧问题、德国统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今后将会怎样发展。

关于德国已经谈得很多了。

同志们，我想告诉你们。凡是登上这个讲台的人都紧张极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感情，因此，大厅里一出现喧闹，无疑会产生干扰。如果你们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我当然也可以不讲。

米·谢·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不是还接着听谢瓦尔德纳泽同志的回答？要是接着听，那我请你们认真听，否则会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许多人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关于德国问题已经讲得很多了。

我希望同志们能了解这方面可能有哪些方案。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可能有哪些方案。

第一个方案。争取在“二加四”即“六国”范围内，在全欧进程范围内，就德国统一的外部条件达成一个最终的国际法解决协定。这个协定应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应有利于欧洲稳定。这是可能的。第二个方案：利用我们驻扎在民主德国的50万军队来阻止统一。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同志们，我们选择了第一条道路。我想，所有明智的人，所有不想把欧洲和我国人民推向灾难的人都会支持我们这样做。这就是对那些主张不应同意统一的人的回答。

现在谈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亚·尼·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谈了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来讲几句。这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理论问题。这里需要弄清楚“体系”这个概念本身。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过去这样讲过。现在我们明白了，到社会主义还要走很长的路。正确地讲，应该说：不是“社会主义体系”垮了，而是对社会主义的一套歪曲概念垮了。世界上过去和现在都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将继续发展，对此我毫不怀疑。

洪卡耶夫代表写道：“从您对消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过程的评价出发，从您对消除极权制度的评价出发，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否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有历史前途的呢？”

我不能同意这样解释我讲过的话。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我尽力给予回答。

毫无疑问，我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则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思想摆脱与其格格不入的和没有出路的“模式”后，是有历史前途的。

科斯秋琴科代表写道：“谁对华沙集团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负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您起了什么作用？”

问题提得直截了当，我也尽力直截了当地回答。

需要靠武力来支撑才不垮台的集团，过去不是，现在也不可能是严肃事业的可靠支柱。今后依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联盟，对我们自身的安全来说岂不更好吗！

我认为，我个人的职责是同相邻的盟国建立新的关系，使这种关系成为互利的、睦邻的、友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富有成果地合作和密切配合行动。

潘捷列耶夫和卡赞采夫代表要求指出我们今天的军事战略盟国有哪些。

我能猜出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瞧，过去是一些可靠的盟国，现在不是这样了。

同志们，前面发言的一些人说得对，1956年我们在匈牙利使用武力，1968年我们闯入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进入阿富汗，那时我们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战略盟国。同中国的争吵也不是发生在改革年代。波兰危机现象的出现也与改革无关，而是在改革之前很久就出现了。关于这一点，你们都清楚记得。

一些条子表示关切东欧国家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指责苏联外交部门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我明白，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国家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给他们带来很多苦难，有时造成个人悲剧。我对他们深表同情，患难与共。

如果问题发展到迫害地步，外交部门可能并将一定本着人权，并在各国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维也纳协议、人权总宣言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内，以高度的原则性提出所有国家对待共产党人的问题。

这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将注视这一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杰明代表问：我认为比如说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价值观有什么区别。

我想更具体地谈谈阶级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相互关系问题。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局部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说明，所有正常的人，不管他们存在什么差别，都同样关心和平、繁荣、进步，关心社会和人的健康状况，关心拯救文明免遭核威胁和生态威胁，关心解决发展问题。

一部分代表关注东欧一些国家破坏苏军纪念碑和基地的行为。

这确实是令人愤慨和十分恶劣的现象。我理解这些行为激起的感情。我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部对所有这类事件都作出了反应。它们提出了抗议，力争改变这种局面。官方当局一直说它们与这些行为无关，正式道歉，并保证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和惩治肇事者。由于德国问题特别敏感，我想指出，在解决德国问题的文件中，我们专门写进了单独的一条——统一后的德国将尊重苏联的纪念设施和我国士兵的墓地。

还有几个问题，这就是我上面说过的由于意识形态对抗而支付的巨额费用以及由于奉行新思维政策有可能得到的和平好处。

这些数字都是估算的。其中使用了其他部和主管部门的数字、科研机关的系统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公布的材料。外交部专门的计量经济部门作了总结性分析。这里用的只是最低的估算，并未考虑间接的经济损失。

至于谈到有可能得到的好处，那么许多东西都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已出现的实际可能性，如何合理地 and 内行地安排军工生产转产。别洛乌索夫同志昨天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

米罗什尼科夫代表问道，“我国所要进行的经济改革是不是在西方向我们提供有关援助问题上进行政治交易的对象？”

我们向市场过渡不是为了得到某个国家的援助。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比较容易地度过今后要经历的非常艰难而又充满矛盾的时期。

贷款协定和就其他问题，比如说德国问题或者削减军备问题进行的谈判，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说到这里，我要断然驳斥种种含沙射影的说法，说什么正在就德国问题进行某种“交易”，有人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送给了”波恩，以此决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里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有些同志提出了同东欧国家关系中的财政方面的问题，担心从那里撤出我们的军队是不是会造成损失。

第一点，盟国欠我们的债务总数是 67 亿卢布。截止今年年中，在贸易上我们欠了这些国家 53 亿卢布，到年底有可能达到 60 到 70 亿卢布。此外，由于用东欧国家贷款在苏联建设项目，我们还要欠 40 多亿卢布。

第二点，我们自己出资在东欧国家为苏军建筑的设施价值估计为几十亿卢布，但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有些同志所说的几百亿卢布。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各方对我国军队法律地位的解释有所不同。在估价资产及其技术状况以及应对污

染环境交付的赔偿费方面都存在严重分歧。这要求心平气和地剖析各种情况,通过谈判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军队的同志现在正同外交人员一起进行这种谈判。

有人问,苏军从盟国撤出要花费多大代价。

毫无疑问,是要花一定费用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项措施能每年节约几十亿卢布。

诺维科夫代表问:我在汇报中说我们的国防费用占国家预算的1/4,不知材料出自何处。

首先,我说的是过去的情况,是以前的事。其次,我们应当认真地弄清楚这个问题,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我国人民。许多造价昂贵的项目,比如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都是军事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也可能,我们需要花费的不是国家预算的1/4,而是1/2或1/3。那么我们应当让人们知道,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能按别的方式生活。

苏斯洛夫代表问:我能不能对今后两年、五年和十年欧洲和世界事态的发展从外交角度作出预测?

我可以告诉大家,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估计和计划司,并且一直在工作。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想法我已经谈过了。

我只想建议大家认真研究一下欧洲已经发生的那些进程,政治报告中已经谈到过这些进程,我的发言中也部分地谈到这些进程。

昨天在伦敦结束的北约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重大的决定。对这些决定还需要进行研究,可我还是想谈谈对这些决定的初步看法。

在伦敦通过的宣言证明,北约也开始转变了,已不再看重纯军事方面,正打算改变战略。



北约准备签署一个宣言,宣布两大联盟今后不再是敌人,将不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北约已表示愿意尽快结束目前在维也纳进行的常规武器谈判,开始进行裁减欧洲军队的谈判。同时还表示,应当对限制统一后的德国的兵力数目作出保证。

北约主张限制欧洲武装力量的进攻性潜力,开始削减战术核武器的谈判。

将修改“前沿防御”战略和“灵活反应”理论。声明,要对规定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理论作出改变。

北约和我们在使全欧进程制度化和建立安全结构方面的立场,在所有的主要方面实质上是吻合的。

由此可见,这都是重大步骤,迎合我们的步骤。是将为欧洲建立新的军事政治形势和两大联盟之间新关系的重大措施。我们认为,伦敦宣言是一项严肃而重大的政治举动。现在已有可能在加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稳定和信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想就此谈一点看法。有人转告我,说有些同志在小组会议上说,全欧大厦的主张是幻想,是无稽之谈。产生这种想法,说明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看不到既成事实以及在建设这个共同大厦和全欧地域方面已经开始的进程。

还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个难题。共产党员瓦西里·基里洛维奇·莫洛奇科递来一张条子,他问道:我现在怎样评价自己在过去的几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形成所出的力?这是什么动机,是阿谀奉承、向上爬还是别有所求?

我很高兴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在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都发过

言，对当时的总书记说过称赞的话。如果这位写条子的人想弄清楚我的立场和观点，那就请看一看我的发言的其他部分，看一看我在党中央几次全会上的发言，我在格鲁吉亚作过的报告和讲话。那个时期我们已开始进行反贪污、反受贿、反对任人唯亲的斗争，一场极其艰难的斗争。格鲁吉亚代表团可以证实这一点。也许同志们都还记得这一点吧！那个时期，有人到格鲁吉亚去过，想看看我们搞了些什么试验。在农业和工业，在城市和乡村，在交通运输业和服务行业都进行过试验。那时我们很艰苦，很困难。当时，有人指责我们走向了资本主义。那时，我们的“哲学家”把这称作是“精神革命”。我至今还记得，那时，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对这些进程表现出了多么大的兴趣。我感到自豪的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了这场艰难的，然而却又是神圣的斗争。

我那时不清楚上面，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些现在担任政治局委员的人当中，当时谁也不清楚国家处于什么境地。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总书记并没有干涉我们，相反在很多情况下支持了我们。我不能不讲这点。否则，从我这方面讲，就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诚实的。

要重提往事，就不能不注意到整整一代人的不幸命运。我和我的同龄人都经历过斯大林主义年代。那些年，我们是在另一种气氛中，按另一种精神受的教育。我推心置腹地对你们说，我有过一个过失，童年时代我写过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是颂扬斯大林的。那时我七岁。你们可以找找这首诗。它刊登在一本儿童杂志上。这将成为抨击现任外交部长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那时我们都很幼稚，相信了斯大林。后来又相信过赫鲁

晓夫。我也给赫鲁晓夫写过几封信。我对他不外乎称之为“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颂扬的话，同别人一起颂扬过“伟大的十年”。后来我得知，是他下令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开进第比利斯大街的。在驱赶游行示威者过程中有150名青年死亡。是的，这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勃列日涅夫在世时，也发生过其他的事。

代表同志们，你们还可能会指责我为什么生于1928年。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有什么权利在斯大林主义开始盛行以及集体化和工业化开始的那一年出世。那就把这一点也作为指责提出来吧。

（译自1990年7月11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9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想告诉大家，在作完工作汇报之后，我收到近百个问题。我打算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是把问题归纳起来回答。有些人要我谈谈有关卡卢金的事，因此，我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类问题。老实说，我也愿意回答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和某些政治经济问题。

涅波恰托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他问道，在多党制条件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共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一种性质。

沃罗诺夫同志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明天，将有许多政党，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有一个，您是否将向其他政党的领导通

报情况？”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在自己的问题中指出，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苏共党员比其他机关和企业多得多。而在委员会的领导中，百分之百是苏共党员。他进而问道，“您或许是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人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吧？”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同苏共的关系最近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是国家政权监督下的一个机关了。

我国的多党制正在成为现实，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在自己的工作中自然也会考虑这一点。在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打算同其他政党代表建立业务关系和接触，也将分别向他们通报情况。我们准备进行协作。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关和部队的干部中，共产党员确实占很大百分比。这是历史形成的，好像用不着多作解释了。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关心自己在关键部门的影响。不光我们是这样，随着社会上新的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成熟起来，不排除它们也将参加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是每个苏联公民的职责和义务。

一些代表要求我谈谈我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关和整个司法机关可能的非政治化的态度，以及我对在这些机关中可能取消党组织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的有扎伊采夫、穆罕默多夫、托马舍维奇、列夫科等同志。

关于非政治化，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已经谈到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党在所有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中，在生产领域中，以及在地区实体中进行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表决：“赞成”，还是“反对”。

国家安全机关按其宗旨来说，是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它们保卫政治中的主要东西：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宪法制度和苏维埃国家的政权。从它们的活动中间割掉政治实质，就等于把保安人员变成没有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手艺人了。我认为，现阶段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非政治化的提法，反映出一些人的政治观点，也反映出一些人的糊涂观念。

现在谈谈党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苏军军人都是享有充分权利的苏联公民。他们不能被剥夺参加社会团体，其中也包括参加党组织的宪法权利。

许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否必须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扎伊采夫、卡利宁、阿夫杜西、博尔特诺夫斯基等同志问）。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明文规定，担任主席职务就意味着他必然是政治局成员。只有党中央委员会有这种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几任领导人并没有都进入政治局。

很多问题涉及到族际关系问题，涉及到在防止和制止造成人员伤亡的尖锐民族冲突中国家安全机关的作用和参与问题。

许多代表对下列现象理所当然地表示了不安：民族敌视和分立主义情绪日益严重，在某些共和国中过去与法西斯占领者合作过的声名狼藉的组织复活了，成立了各种军事化组织，其活动具有完全非法性质。一些代表关心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预防族际冲突中起着什么作用（巴金、吉鲁季、帕夫洛夫、伊萨琴科等同志问）。

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族际关系方面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阴暗面暴露出来了。

某些政治化的社会组织中情绪激进的人开始直接煽动族际纠纷。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机关获得的有关正在酝酿的族际冲突的情报，照例都通报给苏维埃、党和司法机关。杜尚别事件，奥什州事件就是如此。

现在，正对一些刑事案件进行调查。正在追究杀人犯和其他暴行的策划者和参加者的责任。已经逮捕许多人。

事先提供的信息无济于事。我认为，这些机关的责任在于，没有表现应有的坚定性。主要的是，我们错过了在调节紧迫的冲突中采用政治方法可能产生效果的时机。

但是，同志们，我们逮捕人、给人判罪，今后怎么办呢？要知道，问题仍然存在。根源并未消除。这是我们斗争和共同关注的主要方面。

有一些问题涉及到影子经济问题和与有组织的犯罪进行斗争的问题。

有些人问：

——什么是影子经济，如何同它和黑手党进行斗争？（波洛戈夫和科佩伊金同志问）

——我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提出了产生影子经济和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原因问题？（舍夫佐夫同志问）

——为什么总的来讲国内犯罪活动一直在增加，在这方面是谁的责任？（苏赞斯基同志问）

——我们对影子经济领域的百万富翁们知道些什么？（杜宁、纳卡希泽、奥普雷什科同志问）

显然，看来，影子经济就是帐目不清的、没有规章制度的和非法的经济活动的大杂烩。

滋生影子经济的重要根源是生产中的虚报和盗窃。1989年检查和审计时发现，帐目中缺额、侵吞和虚报总额达4.68亿

卢布。最严重的表现是，这具有有组织犯罪的性质。

例如，在莫斯科一家工厂成立的合资企业的分支机构的掩护下，形成一个犯罪集团。这个集团以废料为名向外国公司非法出售金属和工业品。1989年11月，这个集团曾企图把预定输往国外的奇缺的铜制品弄成废料，以换取走私入境的价值1.02亿卢布的一大批录像设备。目前，正在调查这个集团的刑事案件。

现在谈谈合作社。我想对工作汇报中所谈的内容作点补充。截至1990年6月7日，国内共有大约20万个合作社，在其活动领域中就业的有450万人。这是官方统计。实际上在这些合作社中就业的人还要多些。合作社在发展，但目前还无助于稳定消费市场。非但如此，合作社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基金的增长使国内的通货膨胀过程更加尖锐化了。

请大家注意，4/5的合作社是在企业和单位下面建立的，它们租赁固定资产并获得大部分原料和材料。

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现在正在侦破与有组织的犯罪有关的大量案件。例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安全局处理的一桩案件中，逮捕了银行系统和合作社的六名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在财政业务中把非现金资金转换成现金资金并盗窃巨额现金。在这个案子里，缴获了以犯罪方式得到的总额达500多万卢布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我不提他们的名字，因为案件正在处理中。

在分配国产和进口计算设备方面，存在着大规模的欺诈行为。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影子经济同国家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近来发现，犯罪分子有走向国际市场的趋势，他们看到那里不仅能“洗干净”以不光彩的方式搞到的资本，而且可以把它投入流通。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材料，1989年大约3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参加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缴获并上交国家总额达1.7亿以上的非法所得财物。保安人员在这方面的工作大大扩大了。

从提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使苏联人感到十分不安的，是社会经济分化加剧，出现了一些拥有巨额秘密现金和贵重物品的人。

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机关处理的案件进行科学研究和专家鉴定的结果表明，按最保守的估计，在影子经济中周转的资金大约有1500亿卢布。报刊上提到的数额要比这个数目大一倍。但我们认为，这个数目更接近实际情况。根据这个数目以及根据现有的破案材料，可以估计出拥有百万财富的人数，这些财富主要是靠影子经济获得的。现有的监督制度不能掌握什么准确的统计数字，这也是业已形成的状况的危险的一面。

影子经济有其政治方面，因为它不断形成反社会势力，这些势力希望保持扭曲现象和捞取非劳动收入的条件。

在提出的问题当中，有些问题要求说明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工作人员卡卢金在舆论工具上发表的言论所造成的局面。代表们要求介绍卡卢金本人的情况及其所作所为的动机。对这个问题，我们已在报上谈了一些。再补充几点。

1952年，卡卢金在其父（1930至1955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70年代初，卡卢金开始得到晋升。1973年他是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并于不久之后获得将军军衔。卡卢金在官运亨通的时候，没有对国家安全机关和我们的政治制度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但是，当197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不得不作出



关于他不能在情报机构工作的决定时，他与集体之间形成了冲突局面。

同志们，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分支机构的活动，是不能在如此广泛的会议上详细谈论的。但既然舆论工具已谈及此事，我就应当谈一谈某些微妙的问题，同时当然要考虑到保守我们工作的秘密。

问题讨论得很认真，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严肃的理由的。由于他的轻率做法和公然违反纪律，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被搞掉了，这时，我们如常言所说，已忍无可忍。

我们在别的地方，在列宁格勒市地区机关给他提供了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但遗憾的是在这里他也表现不佳。在他工作的那个集体里又出现了不正常的局面，只好把他调回莫斯科，并在他满 55 岁时将他列入后备役。

卡卢金企图同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搞交易，更确切地说是搞讹诈，他威胁说要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了解这个人的特点。况且对他的一再申诉我们多次讨论过，并曾派出几个大型工作组前往列宁格勒核实情况。大部分事实都没有得到证实。

我们没有拿良心作交易，于是卡卢金很快就实行了自己的威胁。6月14日，在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里播放了他的长篇讲话。这样，他就又一次挑起了反对国家安全机关的运动。后来他又向苏联和外国舆论工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在集会上讲话，发表电视讲话。在这些谈话和讲话中，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说成是个无所不能的魔鬼、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政治特务组织，是国家发展改革和民主的主要障碍。据卡卢金说，今天大部分保安人员都是死硬的斯大林分子。为了侮辱他们，他不惜用最粗野的言词。这一切都是蓄意散布的

谎言！

我们不是头一次碰上这种谎言了。在西方，这种指责和捏造是司空见惯的。不过，卡卢金在某个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的宣传。

有一个问题问道：难道卡卢金的话里就没有一点真实成分吗？绝非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各个机构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工作中有令人不快的混乱现象，我们也有过挫折，甚至失败。总之，打仗就是打仗。在挑选干部方面也有严重错误，有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要在冒险的情况下行动，有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得住的。

11年来，我们发生了8起人员转向西方的事件，而不是卡卢金所说的20起。这是一个小小的纠正，但很重要，我请同志们对此思考一番。这些人员走上同特工机构合作的道路要略早一些。任何一起事件都没有隐瞒，全都得到深入和全面的调查，采取了措施，有罪的人受到了严惩。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作出了应有的结论。解除卡卢金反间谍机构领导人职务的原因之一是该机构在主要方面成果很差。

有人问：撤销卡卢金的将军军衔和各种奖励是不是过份严厉了？不是的，不过份。有时某一个行动会把以前的一切都勾销掉的。卡卢金是军官、将军，多年担任领导职务，曾作过不泄密的保证。他十分清楚，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具体方针是不应公开谈论的。在一次采访谈话中，卡卢金说，1973至1979年，苏联情报部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没有间谍。应当指出，在情报部门的工作实践中不应提供此类情况，什么地方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这在我们这里也是保密的。可是卡卢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不久前，美国逮捕了以沃尔克为首参与海军工作的一批人。美国报纸硬说这批人

是为苏联工作的。不知出于什么需要，卡卢金也硬说他与这批人有关系。对此我们没有提供过任何材料，也不打算提供材料。卡卢金已经胡说了许多东西，对这个情况要进行特别的调查研究。

如果说到我们对卡卢金行为的反应，那么要是在其他国家，这种反应会更加严厉得多。例如，在英国特工人员因在未被批准情况下接受采访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会立即被开除。一旦在公开演讲中暴露侦察和反侦察的职业活动手段，那就要负刑事责任。在美国，泄露有关特工工作的材料也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

简单谈一下卡卢金的政治面貌。他硬说，1968年他坚决反对我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我还未进入侦察部门，但是我了解了上述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可谁也不记得这个情况。看来，卡卢金可能是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发表了这种意见。

其次，卡卢金说，他过去反对，现在仍然反对党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服从于党并认为这是一种灾难。让我向你们引述一段卡卢金1987年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吧。声明中写道：“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首要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日常活动符合党的政治方针。这样做了吗？”下面我再从这个声明中引一段：“所有的人在被任命之前或在每一次被提升的时候都应接受审查，要把这种审查作为一条准则。”

请想一想，仅仅三年以前卡卢金坚持的是什么意见。要知道，这是1937年的声音。光是这种想法就够可怕的了。我们过去没这样干，今后也永远不这样干。

对此，我想说的是，现在有人在竭力证明，他一直是一个什么民主主义者，他对问题一直看得很清楚，一直很有预

见。好像他过去一直在谴责一切与扭曲、与破坏人权有关的东西，却忘记了他实际站在什么立场上。这类人一有机会就从党的航船上大跳起来，比谁的声音都大，高喊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什么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卡卢金就属于这类人之列。

同志们，请允许我谈点个人情况。在1986年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开始在党内担任高级职位，当时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此之前我在党内没有担任过重要职位。但是，我认为自己同在此之前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关系。我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我愿意和党，和大家一起努力去改正我们过去犯的错误。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可取的。

有许多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各个方面的工作。它反映了共产党员对我们工作的广泛兴趣。

还有一些老问题。例如：我“如何看待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收集有关社会运动及其领导人情报的问题？”（岑拜同志问）。这是用老观点看待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活动而产生的问题。

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不收集这种社会运动情报。我们同那些公开号召用暴力推翻或改变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某些公民和组织作斗争。换句话说，保安人员比如说不以“面上的事”（什么社会团体、联合会、运动）论事，而以具体违法行动的事实论事。

来自白俄罗斯共产党的大会代表（格拉兹同志、阿托尔琴科夫同志等）感兴趣的是：近几年来，外国特务机构的反苏活动是否真的加强了？

沃尔科夫同志问：被揭露出来的中央情报局特务波利亚科夫和托尔卡切夫怎么能够给我国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他

们怎么会得逞呢？

西方暂时还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间谍计划。我想，不应当由此酿成悲剧，要知道，信任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毫不掩饰地说，“美国需要间谍和反间谍行动，这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化时期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有关这些国家的计划、意图和潜力的情报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采取了一些揭露和制止外国特务机关破坏活动的措施。近五年来，从苏联公民当中揭发出了几十名外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顺便说一下，长时期以来，我们没有取得这样的成果了。在这些代理人中有国防科研院所和国防工厂的工程师和学者、苏联军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等。

为了揭露中央情报局代理人波利亚科夫和托尔卡切夫，国家保安人员做了许多工作。托尔卡切夫干了约7年特务工作，波利亚科夫干了25年。他们能隐藏这么久，其原因之一就是反间谍机关的工作存在着缺点。

我要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年都能制止不少起苏联公民向外国特务机构传递秘密情报的事件。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还逮捕了一个外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正在进行侦查，我们将把侦查结果通报给舆论界。

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的性质使我们确信，关于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在舆论工具上讲得还太少。没能经常准备一些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央和地区机关改革情况的通俗易懂的材料。简言之，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扩大自己工作的公开性，因为，由于在许多方面公开性不够，造成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机器中的地位

和作用的不理解。

(译自 1990 年 7 月 12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主席 阿·阿·尼佐夫采娃答与会者问

(1990 年 7 月 9 日)

同志们！我现在来回答一些问题。代表小组和个别代表提出来许多问题。对其中一部分问题我已经作了口头回答，某些问题则向代表本人作了书面答复。

现在我就来回答涉及检查委员会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有一类问题是：“您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没有让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参加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这就理所当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检查委员会需要这么多委员吗？”

我想告诉大家，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是代表大会确定的，共选举了 80 人。规定的原则是：保证各地区和大的党组织都有代表参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人数是合适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在检查工作中就不需要这么多委员了。按照经验，我认为，做检查工作大概有 40 人就够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让所有同志都参加工作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有 10 个人已经退休并且退出了委员会，有 5 个人在国外出差。有一些同志由于地方远很少参加中央的检查工作。但是我们努力做到使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工作，给同志们一些特别的事做，批评那些能够参加但却没有参加工作的人。

结论是：关于检查委员会成员人数的问题应该由代表大

会根据给这个机构提出的任务来决定。

还向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政治局委员，比如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克留奇科夫等同志以及其他兼任国家职务和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在何处领取工资。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都在党中央委员会领取工资，其中也包括政府、各部和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担任总统委员会委员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例外，他们将在总统委员会机关领取工资。

现在我来回答关于党的领导人的工资问题。政治局委员的工资为每月1200卢布，候补委员1100卢布，书记1000卢布。

一些代表，其中包括帕拉金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维持哥尔克村的列宁博物馆要用多少钱，是不是到了该注意这个问题的的时候了？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1989年从党的预算中拨出85万卢布用来维持莫斯科州列宁哥尔克村的“列宁哥尔克”国家历史保护区。每年来这个纪念地参观的有几十万人。同志们，我还要说的是，我们已委托地方检查委员会去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央博物馆分馆办得怎么样。结果产生了一些新想法，这些博物馆的工作方式应该改变。应当说服它们放弃这种死板的方式和博物馆衙门化。要在这些分馆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博物馆进行更加灵活、更有效的工作，更积极地捍卫列宁的思想，为此要建立捍卫列宁思想的中心。这就是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其他检查委员会的想法。

应当怎样看待由国家经费为代表们发放开会期间，比如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本职工作工资这件事。这是不是说明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交叉在一起，是不是应当由党自己

来负担这些开支？一个代表小组，包括奥钦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们都知道，根据政府规定的现行制度，参加完成社会任务和其他任务的工作人员在其完成上述任务所需时间内保留工资。我并不认为这是机构的交叉。但是，目前由于许多企业、机构向完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过渡，许多企业已不再支付这些费用，大概，这种趋势还会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各级党委就应该靠党的预算来支付参加党的活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以及脱产学习期间的平均工资。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有多少资金用在老党员的需要上？多数老党员退休以后情况非常困难。那么老党员的社会保障在财政工作中占什么地位？”

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拿到的材料。材料中有一些数字。在用作地方党组织经费的预算中规定把600万卢布用来向老党员提供物质帮助，即所谓救济基金。比如，1989年就从这笔资金中拿出了550万卢布。此外，拨出3%供基层党组织支配（去年为3900万卢布，今年大概也是这个数），可以用来对老党员提供物质帮助。

如果我们作出把50%的党费留给基层党组织的决定，那就也可以用这笔钱来帮助老党员。但是，同志们，我认为，代表提出问题是正确的。应当更有根据地和更明确地表示支持这一点，毫无疑问，党也应该关心自己的老同志。我想，在讨论今后一些年的预算的时候，就应当更明确地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定，形成相应的决议。

同时还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批准预算，这种做法对不对？同志们，这是不可取的。预算应当是每年确定一次。提前三四年，甚至五年确定党的预算是非常困难的。



预算取决于收入，而收入多少是难以预先定下来的。现在，当我们有大量复杂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在代表大会上形成和批准预算是不现实的。

但是，显然，在代表大会上确定党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比如说，在相应的时期应当考虑到有哪些开支，有哪些收入来源……也就是说，代表大会应该决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而预算则应当在全会上批准。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您对退休党员应该交多少党费有何看法？是不是该只从他们那儿收取纯象征性的党费——10到20戈比，而不是从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中拿光最后几个卢布？”

同志们，在《真理报》的《大家谈》专版，甚至可以说在各个基层组织，在各级均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很详细的讨论，也发表过各种不同意见。许多人，其中包括退休人员都自认为不交纳党费是不能容许的，而且请求不要让他们失去在物质上支持党的机会，哪怕是交纳最低限额的党费。

党的章程草案中原则上规定了最低限额：收入150卢布以下的交30戈比。但是，这要由代表大会最后决定。此外，同志们，中央检查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认为，关于退休人员的问题应当由基层党组织解决，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因此，如果基层党组织认为，某个退休人员可以免交党费，那就让它自己决定，这是党组织本身的事情。应当提供这种可能性。

同志们写了个条子，某些代表也在上面签了名，询问他们所写的关于以格德良为首的苏联检察院侦查小组非法行为和暴行的信件下落如何。这些信件的命运如何呢？

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信件都已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些问题的小组，送交瓦·安·梅德韦杰夫同志。如果同志们

能进一步说明具体指的是哪些信件，我将更加详细地向你们介绍情况。

这些就是已经提出的，可我尚未来得及回答的问题。

同志们，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们作为被邀请的来宾来这里出席了代表大会。他们请我向党的代表大会，向将要选出的机构，其中包括新的监察机关转达祝愿，祝它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我们还要祝愿你们，同志们，保持过去和现在在代表大会上所表现出的那种高度严格的相互要求，祝愿在今后的时期把它保持下去，直到新选出的机关汇报工作的时候。

还有一点。我们同意同志们刚刚在这里发表的意见：还是要希望我们大家都具备党内同志情谊和信任精神。如果某些党的组织不信任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某些中央委员不信任政治局委员，代表大会不信任各个委员会等等，那就难以工作了。看来，这是工作取得成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且，信任会产生巨大的责任感。

同志们，我们的任期已经结束。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和那些被选进新的机构里的人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В·Ф·亚岑科**（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苏联冶金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钢铁厂总轧钢师）：阿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请您向代表们回答您在您的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中未谈到的问题。您没有回答向您提出的一个问题：截至1990年1月1日党的预算结余为多少苏联卢布和外汇？我请求谈谈，1989年的收入是多少，它们用到哪些地方？

**阿·阿·尼佐夫采娃**：亚岑科同志，我不能回答您提出的关于结余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权限范围。

**尼·伊·雷日科夫**：让我们委托克鲁奇纳同志来回答这

个问题。

**阿·阿·尼佐夫采娃：**同志们，你们应当记住，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是遵循苏共章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的，有它自己既定的主管问题范围，以及委托它主办的问题范围，它对这些问题负有责任。但是，现金检查不是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权限范围。不管你们愿意与否，但是，没有这个权利和这些职能。现金检查作为中央检查委员会的职能，这方面的特别证书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在30年代那个时候），可是后来就停止使用了，现在也就没有这个职能了。如果要委托这样做，那么我们将欣然执行这个职能。但是，我可以对你们说，同志们，我们向你们提供了有关党的收入和支出的材料，那就对比一下这些收入和支出，拿1989年来说，收入超过支出大约4.2亿卢布。我之所以举出这个数字，是因为我们在分析收支时，同你们一块儿遇到了它。

至于外汇，同志们，党把全部挣来的外汇都按现行办法转交给有关的国家机关。因此，党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戈比外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检查委员会没有可能认为有外汇收入，因为全部外汇交给了国家，我们留下的是卢布。

**T·B·马什金娜**（赤塔州，外贝加尔铁路莫兹贡站第23中学教师）：向您提过一个有关哥尔克村博物馆的问题。因为，我认为您没有充分回答这个问题。参观过这个博物馆的代表们有一个疑问：是否有必要在1987年花400万卢布建造宫殿。在现今教育和文化贫困的状况下，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宫殿？

**尼·伊·雷日科夫：**好，您就这个问题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译自1990年7月12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尼·叶·克鲁奇纳答与会者问

(1990年7月9日)

尊敬的代表同志们！就有关苏共预算的报告向我提出了70多个问题。同志们在许多问题中请求对预算的某些条款作出解释和说明，详细通报各级党委用的汽油和润滑油数量和交通费用。有的代表请求通报（我们也这样做了）办公厅与之签订了在休息疗养机构服务协议的范围的情况。还请求提出在苏共中央办公厅所属的疗养所休息过的工人和农民的名单。当然，我今天就不打算说这件事了。如果经过调查，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提供这种材料了。

许多条子就编制预算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将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采纳。我们已经给同志们作了许多书面回答。我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留了下来，以便在代表大会上作出回答。

克留科夫代表同志请求宣读就举行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可能花费的开支进行逐条调查的情况。

答：代表大会工作期间代表们的工资为70多万卢布。交通费总额大约50万卢布。在饭店住宿和保留床位大约要80万卢布。出差费不到80万卢布。目前已确定的广播和电视转播费大约450—500万卢布。会场和电话线路的租金46万卢布。代表和来宾到莫斯科的往返路费45.9万卢布。公共事务费188万卢布。

由于向我们提出的和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全部开支，所以我们只能说，加上广播和电视的转播费（经我们批准的计划是

10天),预先确定的举行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总费用大约是1100万卢布。

代表大会的有些代表请求谈一谈关于我的报告中和尼佐夫采娃同志的报告中出现的矛盾,即关于苏共中央机关的经费开支不一致的问题。

问:您说这种费用是2200万卢布,而尼佐夫采娃同志说是3290万卢布。

答:我的回答可能就容易多了,因为你们手头有关于1990年预算收支情况的材料。你们所拿到的关于预算情况的材料中已标明苏共中央机关的费用是2230万卢布。直接用于机关经费的开支包括工资、国家社会保险的附加费、所谓行政费,以及办公费、电话费、城市之间电话费、出差费。这些费用的总和是2230万卢布,即占党的预算总支出的1.1%。我已提到过这个数字。

我们把保障苏共中央活动的总务费用在预算中作为一项单独的预算列出。因为这项预算不仅用于中央机关,而且也用于举办各种活动(我们的总务部门的工作面向全党),我们把这些开支作为单独一项列出。你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占的比例。如果把这两项开支加在一起,那么总数就是4000多万卢布。这就是所指出的数字中出现不一致的原因。而且阿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引用的是1989年的开支。

有些代表请求谈谈苏共中央机关的人数和平均工资的数额。包括中央书记在内,苏共中央机关的总人数为2352人。其中负责人员1322人,技术人员1020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以所得到的职务工资计算,为406卢布,负责人员的工资为533卢布,技术人员的工资为240卢布。

有人要求更加详细地公布用于资助苏共国际活动的开

支,通报一下外汇收入情况,包括党费收入情况,报告一下苏共中央在国外银行是否有存款,是否有财产。

苏共在国外银行没有任何存款,也没有财产。

苏共也没有同志们想象的那种能随意得到并随意花掉的外汇收入。有一种外汇收入来源,这就是在国外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党费,他们从工资的外汇部分中缴纳党费。这笔收入列入国家外汇收入。这些外汇按相应外汇的牌价折算成等值的卢布上交党的预算。最近四年来用这笔钱上交苏共预算的年均收入额为749.7万卢布。

党的机关需要的外汇,按为其他部委调拨外汇一样的办法拨给我们,我们方面再按相应外汇的现行牌价折算成同等价值的苏联卢布付给财政部。

在本五年计划中,年均外汇限额大约一年为3200万外汇卢布,准确一点说是3197.9万卢布。这些资金的一半以上用来为党的机构的出版社、印刷厂购买设备和材料,因为许多印刷设备国内工业部门不生产。而且按照经济互助委员会范围的专业化分工,许多印刷设备由加入该委员会的国家的企业制造。去年,我们为办自己的事使用了4406.5万外汇卢布,为印刷企业购买印刷设备和材料花费了3362.4万卢布。购买的大约80%的设备用来实现地方党的机构出版社生产基地的现代化。

今年,按计划应为我们拨出2963.9万卢布。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外汇,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掌握外汇。以上是我们的支出报告的数字。

至于谈到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国外出差的费用,包括中央书记、按中央系统派到国外出差的地方党的机构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费用,本五年计划中,为这些目的平均每

年花费 25 万卢布。

在今年的预算中(你们有这个材料)规定为苏共国际活动的拨款为 1045 万卢布。根据合作计划,为实现党与党之间的联系,从上述拨款中拿出 695 万卢布接待外国客人并为其服务。为出版《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我们按份额分摊的费用为 270 万卢布。由于停止出版这一杂志(同志们在这里完全正确地提到了这一点),将节省下用于这项开支的资金。

其他的费用(数额为 80 万卢布)用来帮助某些政党培养党的民族干部,为它们出版定期报刊提供经费。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有人提出了一些关于代表在参加代表大会工作期间保留平均工资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从党的预算中拨出这笔开支。我首先要说的是,劳动法典中载明了有关的条文,允许党组织、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举行这种活动时按工作单位和职务保留工作人员的平均月工资。

我们已经商定(已向党的机构宣布了这一点),决定由我们向应邀参加我们代表大会的干计件工作的工人支付平均工资。所有因此而需要的开支将由苏共中央办公厅支付。我说过,总额约为 70 万卢布。

还有一个我们目前不能用数字回答的复杂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应当支付企业党委会的经费。所指的不是工资,而是用房费、交通费等等。按现行法律,这些开支由企业和组织承担。苏共预算中没有计入这些开支。我们将根据由于实行新的党费标准、企业利润的新的征税办法以及提高社会保险数额而形成的党的预算的新形势和可能性,以完全不同的态度评价所有这些问题。在发给你们的材料中,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说明。

这就为政治局委员、高级领导同志提供服务一事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方面的许多问题是由传闻产生的，甚至传说某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外国银行中有存款，能不能没收这些钱并用于我们人民的福利。

同志们，我首先想说的是，不管我现在就这个问题说什么，同对其他问题一样，大厅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传闻和臆测。

同志们，不要把我们今天的政治领导人同过去的相提并论，不要怀疑最高领导中的每个人并把他们同以前的相比。作为一个为高级政治领导人服务的人，作为一个对此负责的人，我可以对你们说，所有这些传闻和臆测同任何一位政治领导成员都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少多了，许多东西被取消了，有些正处于取消阶段。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在为他服务时使我们感到有什么麻烦和不便。即使完全从人情来说，我也从未感到同他们交往时有什么困难。同志们，不能听信谣言。已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它将处理和分析一切情况。当然，特权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特权，有些人认为这不是特权。这里已经有人说：非法拥有的特权，这是犯罪。

同志们：在服务工作方面没有非法的特权。这是决议规定的，是法律和其他文件规定的。

一系列问题正是同这个问题有关。我说办公厅同党的预算拨给国家别墅的经费没有关系，这又引起一些同志再次提出问题。

我在你们面前是诚实的，我在你们面前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将成立委员会，一切由他们处理。无疑，新的领导将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解释。



从去年年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已不再使用国家别墅。只有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还保留有别墅。过去被占用的所有独家别墅已转交给当地的组织和机关使用。

除此以外，还取消了过去存在的交通、医务、疗养、总务服务。腾出的国家别墅已移交各部和主管部门，以便组建膳宿旅馆和保健机构，首先供儿童和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使用。已得到别墅的有：雅尔塔和基斯洛沃茨克人民代表苏维埃、国防部（为组织医疗康复中心用，接待经军医院治疗后的国际主义战士）、全苏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委员会、列宁儿童基金会、苏联卫生部。

至于苏共中央书记，他们现在也和苏共中央机关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有膳宿旅馆和休养所为他们服务。我们现在经营两个膳宿旅馆和五个休养所，全年开放，分别为636个和524个家庭服务。按莫斯科为这类机构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在1985年以前建成的。就其服务工作来说，这些机构同莫斯科市的其他组织和机关的休养场所没有什么区别。现在苏共中央不再有任何特殊供应、特殊商店、特殊小卖部。

我应该说，现在盛行的不分清红皂白对党的工作人员提出责难的运动带有普遍性和明确的目的。我们中央委员会不管做什么，都处于严密注视之下。我们首先放弃使用大型轿车。在中央，谁也不再使用“海鸥牌”轿车。然而，这个问题在继续被渲染，甚至今天在代表大会上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尊敬的杰米多夫同志，不能把一切归结为这个问题。为代表大会的5000代表服务，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有服务工作人员都有很多事情，并工作到很晚。即使有哪个领导人

乘小轿车出席代表大会，那也不是由于谁喜欢乘车，而是因为情况的需要。我们许多人都喜欢步行，但是没有时间。

同志们问到积蓄问题。苏共中央有积蓄。作为保险基金和保险费，我们在苏共中央帐户上有 49 亿卢布。

在新的条件下，这笔费用如何使用，这将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各级机关决定。

谈谈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使代表大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预算的关注成为基层党组织和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关心的事。没有牢固的物质基础，我想重复一遍报告中所说的话，没有牢固的物质基础，没有财产，我们就不能充分完成党提出的那些任务。

Ю·Ю·博尔德列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某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党组织)：我请您回答我两个问题，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第一个问题，您举出了外汇开支总额——2900 万卢布。用这 2900 万卢布能换取 4000 万美元还是 400 万美元？即苏共按什么牌价向国家购进外汇？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提出的材料中说：“从业务上保障苏共中央活动的开支，组织技术设备的管理费用”等等，是 1800 万卢布，“购买电子计算机和软件”是 1900 万卢布。“购进什物、组织技术设备、宣传和学习用技术器材”是 2300 万卢布。问题是，在这些费用中，哪一笔钱是用苏联货币购置稀缺的、进口的组织技术设备和器材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更确切地说是向主席提出的要求。问题在于，预算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在为时 10 天的代表大会上应该拨出两小时对它进行辩论。据我所知，递条子请求发言的人一共有三个，我是第二个。我甚至不要 10 分钟，有 5

分钟就够了，但是可能需要对这一材料作出某种分析。如果代表们同意，我要求哪怕是给5分钟。谢谢。

**尼·叶·克鲁奇纳**：我看过博尔德列夫同志提出的提纲。其中阐明了博尔德列夫同志对苏共财产问题，没收财产和移交财产问题所持的某种立场。这个问题很简单。

第二，关于2900万外汇卢布的问题。我们同各部委一样，按国家规定的牌价和手续获得外汇。我们从苏联财政部获得外汇。为了非贸易性兑换，我们不是像国家规定的为每一美元付出0.65卢布，而是几乎付出10倍的价钱。至于2900万卢布，这是今年的计划数字。实际上要花费多少，现在我还很难说。

至于计算机技术设备和您提出的那些开支，我们只用外汇购买少量的这些技术设备。我们计划用外汇购买的主要是印刷设备，而计算机技术设备我们买得很少，一些党委会还为此而批评我们。我们的原则立场是，寻求用苏联卢布购买技术设备的可能性。

**B·A·巴拉诺夫**（苏联化学和石油加工工业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橡胶用品厂辊压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党组织）：克鲁奇纳同志，我对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他开支”一项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占第二位。全面地看，“其他”一词具体说明了什么呢？

**尼·叶·克鲁奇纳**：现在我就来说明哪些开支归在“其他开支”项下。现在我们要向大会堂和旅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饭店、小卖部和其他一切在工作时间之后继续营业的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支付费用。还有我们无法计算的其他一些开支。例如，为代表大会服务的投票系统的经费和开支。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为这一系统要付出多少钱。可能还有其他一些

开支。例如，材料的装订和印刷。我们还不知道纸张的开支，印刷代表大会材料的费用。而这是很大一笔开支。

**В·И·捷利琴科**（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建筑学院党委书记、莫斯科党组织）：从阿·阿·尼佐夫采娃同志的发言中可以听到这样一种信息：中央检查委员会作为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并不监督党的钱柜。请问，党的哪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能够证明苏共中央办公厅的通报是正确的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是：在决议草案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在共产党员的参与下，按照苏共章程规定的程序，可以出售、转让、征用苏共的财产。苏共章程草案中是否有这种程序规定，是否有附录说明呢？发给我们的材料中没有这一点。怎样理解这一条款呢？

**尼·叶·克鲁奇纳**：我可以对你们说，能够证明党的资金开支是否正确的那个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关——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我在报告中对你们讲过这一点，而这些问题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至于财产和章程规定，现在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还不清楚章程的最后定稿。它即将完成。

**Н·И·克鲁格洛夫**（苏联汽车和农业机器制造部萨兰斯克岑特罗利特厂党委书记，莫尔多瓦党组织）：在通过关于苏共中央的预算与财产的决议之前，我想知道您本人的意见，我请求大会主席务必将以下问题提交表决，这个问题就是：将苏共中央的所有疗养院和休养所改名为党的疗养院和休养院。休养证的分配权必须交给基层党组织。用这一条来代替本决议第四条中的第二段。您的意见如何？

**尼·叶·克鲁奇纳**：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无须更改名称。至于分配问题，那么随便怎样分配都行，只要从积极利用这些休养基地角度去考虑问题。然而我国已有一套分配制度，工

会制定了非常好的分配制度，而我们使用的也是这套制度。每年年初，我们把休养证发到各州、边疆区、共和国。然而地方上并非总是能够考虑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来进行分配。我完全支持您的建议的第二部分。同志们，老实说，我们反正总是挨批评。建得不好，要挨批评，建得好了，又说：瞧瞧，搞得这么铺张……

**H·C·库克利诺夫**（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奥尔忠尼启则区委第一书记，车里亚宾斯克党组织）：去年中央全会通过了拨款5亿卢布用于提高最低水平的退休金的决定。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令共产党员们气愤的是：第一，没有与党商量就通过了这项决定。第二，决定中没有提到，这笔钱首先应该用来提高党员退休者的最低退休金。我提的问题是：是否能够改变这种做法？我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出问题和建议。同志们，我们必须在制定党章时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不应由任何一个机关，政治局或中央，来作出这样的决定，这种决定大概应由全体党员进行公决。谢谢。

**尼·叶·克鲁奇纳**：对此我能够说些什么呢？本应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同意这种说法。至于如何利用已拨出的款子，我们应该现实一些。您现在要求向代表大会说清楚。然而，您看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您看见过解决这些问题时的那种情景，看见过在那次大会上也谈到了党的威信问题，而这项决定正是在那样的条件下通过。顺便提一下，即使是在那样一种条件下，这项决定也通过了。我认为，在那种局势下，这项决定是正确的，它不是在某个小圈子里秘密通过的。而且在大量的信件中，我们没有看到共产党员有重大意见，谴责所通过的这项决定。

**A·B·萨韦利耶夫**（苏联汽车和农业机器制造部“卡马”

汽车联合公司压力一枢架厂党委书记，鞑靼党组织)，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在提问之前，需要具体提到几个数字。那就是说，来源于党费的预算进款为16亿卢布即占全部进款的约60%。全党的所有脱产干部的工资基金为5.68亿卢布，即占党费总额不到30%。在发给大会代表的您的哪个材料里，表示担心降低党费的百分比会使机关，首先是基层党组织维持不下去。然而，在1990年预算进款和开支之间还有计划余额5.87亿卢布，即多于党的全体脱产干部的年工资基金。因此，令人不解的是：您为什么认为党费的百分比不可能减少一半呢？

**尼·叶·克鲁奇纳：**我们发给你们的材料上有关于苏共预算的全部数字。一开头就写着：预算收入是根据现行的党费缴纳制度和现行的党费标准，以及按照我国企业利润纳税的现行立法和党费的国家社会保险提成额计算的。当我们在代表大会之后重新计算新的预算时，将不会有这种余额了。因为，由于各种资源不断涨价，我们将多开支4亿卢布。我们从党的出版社里所得的利润将减少3/4。从出版社的利润中，我们至少应交纳45%的税。社会保险费率从7%增长到37%，这又是3.5亿。据统计，预算收入将减少约10亿。

**B·B·阿列克谢耶夫**（苏联电子工业部列宁格勒“正电子”科学生产联合公司钳工兼电气安装工，列宁格勒党组织）：根据现行的苏共章程，由苏共中央确定党的资金的开支制度。在看苏共中央历次全会的材料时，我从未看到过在全会上批准党的预算，以及批准关于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因此，我的问题是：党的预算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在哪里得到批准？

**尼·叶·克鲁奇纳：**预算和报告都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

批准，这一点我在报告中已讲过。

**亚·弗·布兹加林**（马克思主义纲领派，莫斯科市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请问，中央委员会计算过没有，全党——从各企业的党委起，到政治局为止花了多少从国家预算和企业预算得来的钱？特别是您说过，政治局成员使用的是国家的别墅。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些价值数百万卢布的别墅不是靠党的经费，不是靠党的预算来维持的。不是政府人员的政治局成员凭什么使用这笔钱？党是否打算归还这笔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当我国的儿童医院和残疾人处于贫困状态时，政治局成员使用这样的别墅，即使是在过去，是否道德？

**尼·叶·克鲁奇纳**：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做过这种统计，因此我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别的答复。

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也回答过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实际做法上。我想，总的社会情况和气氛现在都大大地改变了。

**И·И·别格伊**（乌克兰共产党利沃夫市列宁区委书记，利沃夫市党组织）：尊敬的克鲁奇纳同志，我们州的党代表会议委托我们到苏共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每月拨出一定数额的党费给切尔诺贝尔利基金，分给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受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之害的居民。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建议的？

**尼·叶·克鲁奇纳**：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应当商量一下怎样做，谁来执行这一决定，并考虑一下实现这一决议的办法。

**В·М·叶利佐夫**（苏联无线电工业部进步机器制造厂操作手，阿斯特拉罕党组织）：我的问题是：在代表大会工作期

间，挂着代表大会标志的大轿车和小轿车把俄罗斯饭店围得水泄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当代表们工作时这些汽车整日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尼·叶·克鲁奇纳：**同志们，饭店周围的所有车辆只有大会代表和为你们服务的那些人可以使用。这些交通工具不应去于任何其他事情。

（译自 1990 年 7 月 12 日苏联《真理报》）



## 各专题小组的代表在苏共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党委书记  
И·И·梅利尼科夫代表“党的革新”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

代表同志们！党的革新议题吸引了近1200名代表的注意。在小组会上发言的有85人，而报名发言的共有250余人。代表们向工作小组递交了数百份书面建议。

在小组会上做工作汇报的有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鲍·卡·普戈同志和苏共中央书记尤·阿·马纳延科夫同志。

尽管起初对于小组这样的形式是否有好处有不少不一致的评价，但随着辩论的展开就看得越来越清楚，小组能够搞清楚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将在通过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时成为讨论的中心。同时，对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出现的态度也明朗化了。辩论的激烈程度再一次证明，党的革新问题是代表大会甚至全党和全社会讨论的各种政治问题的中心问题。

尽管评价和建议的角度不同，有时甚至相互抵触，但却具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以关心的态度致力于在根本革新苏共的道路上巩固苏共。代表们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改革的方针，拥护发展民主和公开性、维护党的团结的路线。

考虑到对章程草案、纲领性声明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的具体建议都已转交给代表大会建立的相应委员会，我们认为应集中谈一谈在讨论中代表们表现出最大兴趣的那些问题。

第一，实现普通党员权力的议题。许多建议涉及提高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全体党员大会作为领导机构的作用问题。特别是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这些会议才是领导机构，只有这些会议才有权通过必须执行的决议。为此有人建议赋予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常设机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央、州委、市委、地委、党委能不能通过使相应的党组织必须执行的决议呢？代表大会应当确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基层党组织在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方面是自主的，在纲领和章程的范围内通过最后决议。代表们认为，这是实现普通党员权力的出发点。

很多建议涉及党内通过决议的机制。强调指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制定关于进行各级党组织的党员投票条例。必须创造条件来弄清和考虑各种观点，特别是在已产生的各种纲领派的基础上出现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可存在派别的建议。

第二，党的组织结构。这方面辩论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看来似乎任何人都不否定必须执行所通过的决议、党的机构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又强调在章程中确认少数人的权利、对通过的决议提出批评的可能性、选举民主化、完全按党的选区进行直接选举等的重要性。

有些同志提议不用术语“民主集中制”，而用术语“民主一致”。发言者指出，不能在章程中不加解释地保留术语“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应是民主和纪律、自主和集中

的有机结合。

由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作用和自主性的提高，提出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和整个苏共应当成为什么样党的问题。这里基本上暴露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在进一步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自主性的情况下，现有的结构自然是合理的。另一种观点是苏共成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联盟。

至于谈到党的结构的地区生产原则，那时多数人主张保留这一原则。同时，许多发言者指出必须提高地区原则的意义，把重点日益转移到居住地的工作上去。

代表大会必须就苏共组织结构的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会议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例如，多数建议中谈到应当保留总书记职务，设副总书记职务，还要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还建议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治局、所有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真理报》总编辑。

与此同时，也有代表赞成你们已拿到的最初章程草案中包含的中央机构的那种结构。一种建议是要把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权限延长到通过苏共新纲领为止。有人建议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定条件下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权力。在许多发言中都提出在代表大会之后应当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的问题。代表们怀着关切的心情谈到现行的干部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他们提议委托中央制定《干部培训战略规划》，改革党校的工作。正如在小组会上发言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在提高苏维埃作用和向苏维埃转交实际权力的条件下，必须加强党员代表的协作，坚决维护选民的利益，贯彻党的路线。

在就章程草案中《苏联武装力量中的党组织》这个部分进行的发言和递来的条子中，大部分表示基本上赞成草案中这个部分的表述。具体的有关措词的建议，尤其是关于组成经

选举产生的军队党的机构和选举出席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代表程序的措词的具体建议，已转交章程编纂委员会。还有人提出从章程中删去整个这一部分和在服役期间停止党籍的建议。在小组会上有人提议在章程中规定党的预算中由党费构成的那一部分由下至上形成的原则，公布各级党组织预算收入和支出部分的全部情况。至于谈到党费的数量，则有1%到3%的各种建议。

不过，也有这样的建议：向一切脱产的党的工作者收3%的党费。发言者指出，必须使章程和纲领性声明中涉及党的改革的一些问题的条款相互一致。

代表同志们，尽管大家对具体问题很感兴趣，我们还是想提请你们注意在小组会上就原则性理论问题展开辩论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党的社会基础。党应当明确，党要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发言者对于苏共具有全民性质的论点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并且强调指出，党应当明确宣布，它首先维护工人阶级、农民、劳动者的利益。

不能不谈谈，在某些发言中提出放弃“共产党”的名称，从纲领性文件中取消“共产主义前景”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提法。这没有得到很大的支持。

在发言中强有力地显示出一种思想，即如果苏共内部不产生新的精神面貌，苏共的革新便是不可思议的。党是平等者的联盟，<sup>6</sup>是不仅在自己的权利而且在为祖国服务的共同义务方面平等者的联盟。在革新的党内占第一位的将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尊敬，不是等待指示，而是民主作风和信任，是个人的首创精神和每个共产党员实际参与制定和实现党的政策。我们暂时距此理想还很远。党内关系还很紧张，积累下来的

不信任情绪还很严重，这种不信任情绪在某些发言中也可以感觉得到。通向革新党的途径首先就是通向真正党的同志关系的途径。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总编辑伊·季·弗罗洛夫代表“意识形态工作”小组的发言

(1990 年 7 月 7 日)

尊敬的同志们！参加我们小组工作的有 350 多位代表，发言的有 48 人。

我应当说，小组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但我认为，辩论是以得体的、正当的形式、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进行的。

所提出的观点包罗万象，有时是针锋相对。各纲领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代表阐述了观点。对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批评。批评十分尖锐，但一般说来是有根据的。也出现了自我批评，对地方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的水平作了自我批评的评价。

认为改革时期完成的主要工作有：思想上发生了真正的革命，革新思想、改革构想和改革理论开始形成，尽管这一进程需要深化和加速。当然，也有其他一些相反的评价。

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界，都在就此进行紧张激烈的辩论。大家知道，对许多过去的认识进行批判性反思，放弃根深蒂固的旧框框，注入新鲜的、不熟悉的思想——所有这些难以为社会意识所掌握，相当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其中包括领导干部，接受起来不易，甚至很痛苦。

在小组发言中,对党内思想状况、意识形态危机和摆脱危机的途径的认识存在差别。

许多意识形态工作者、党委领导人认为,在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研究上出现了落后现象。发言者认为,迄今为止,诸如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与共产主义前景的联系及党在革新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战略性问题,与向市场经济过渡、改造我们联邦、整个社会关系体系实现真正的人道化的要求有关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某些发言的同志认为,理论改革根本就不存在,结果我们的理想在群众意识中得不到坚决的支持。

代表们指出,一些评价,其中包括对各种思潮和纲领的评价不明确,苏共纲领性声明草案中的一系列论点的理论根据不清楚。代表们在发言中还指出,由于报刊和党的宣传系统解释不够,对重要的理论结论常常理解不足。例如指出,如果对“社会主义”、“市场”、“社会民主化”等术语——可以说是基本术语——的实质理解不明确,如今就难以从事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

科学教育是小组的重要话题。我认为,有一条建议值得代表大会注意,即苏共应当发挥立法动议权,提议制定并通过科学法,并应为表现突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突出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设立奖学金专项基金。会上曾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防止“人才外流”,那对我们的文化、对国家的明天将会成为一场悲剧。

许多代表谈到了青年工作,谈到了教师的困境。他们建议在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中增添关于党在近期工作中以教育为重点的论点。作青年的工作应当成为苏共党员的重要义务。许多发言者强调了这一点。

小组尖锐地提出了社会科学在现代条件下的作用问题。社会科学正在逐渐摆脱外来支配。这是一个正常进程，但不会立刻奏效。精神领域在一两年内可以摧毁的东西，需要几十年来恢复，因此，需要作适当的、持续不断的、深思熟虑的工作，因为学者们对社会的客观认识、公正的结论，无论它们多么痛苦，对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小组会上强调指出，共产党员的整个政治教育体系，应当以此为方向。此外还需要相应培养党的干部，还要求对党的科研机构 and 学校进行认真改革。这就是小组讨论的结论。

代表们尖锐地提出了有关保护列宁和列宁主义免遭攻击的必要性问题，以及有关我们对待思想遗产的态度问题。发言者认为，必须使列宁的形象摆脱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旧的认识。代表们强调指出，武装力量、国家管理机构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

我们文化的困境是一个特殊议题。许多代表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对文化和教育的纯商业态度。

小组会上对舆论工具中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强调指出，如今苏共和新闻界的联系性质正在发生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过去那种党对新闻的官僚命令式的影响正在消失。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正如代表们所指出的，苏共的舆论工具的领导机制、舆论工具与党委之间的关系需要彻底革新。要对区报和市报提供紧急援助。新闻工作者代表热烈地谈到了这一点。强调指出，在建立多党制、政治立场分化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及其新闻机构都必须明确方向。这些问题显然应当反映在代表大会关于苏共舆论工具的决议之中。

小组会上对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提出了批评意见。代表们认为，委员会应当及时有效地帮助地方党的干部评价政治

局势和拟定中的党的倡议等。还指出，苏共中央必须向地方党组织、劳动者建立更密切的“反馈联系”。指出应当以新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选拔和安排。强调指出，鉴于党的作用和职能发生变化，意识形态现在应当摆在第一位。

鉴于党内思想状况的尖锐性和许多意识形态问题悬而未决，代表们建议近期就意识形态问题召开中央全会，在党内开展广泛的理论辩论。代表们希望加快制定新的苏共纲领工作，以便在1991年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上提出纲领草案。

同志们，在结束发言前，我想强调指出，大家都认为小组工作应当为革新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主要是克服人与劳动、文化、政权的疏远，把由于改革而摆脱了官僚极权主义束缚的伟大人民的力量用到创造和解决迫切问题上去。

要思考这一点并要这样去干。我们大家将在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共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在这个国家里，人的理智和人道主义将居优先地位。遗憾的是，我们离这一点还太遥远。

（译自1990年7月9日苏联《真理报》）

##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斯·伊·古连科代表“社会经济政策”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

同志们！参加我们小组工作的有879名代表和50名特邀代表。出席小组会议的还有我国政府成员，我们还听取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比留科娃同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



中央书记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回答了许多问题。在讨论工作汇报和进行辩论时上台发言的有38人，用设在会场里的扩音器发言的有22人。

支持苏共各种纲领派别关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问题的各种纲领和观点的人，在大家一致同意下也都有机会发了言。布兹加林、布尼奇、列布罗夫和谢尔盖耶夫等同志在小组里都发了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要对小组讨论作出概括的评价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作出一致的评价了。意见是十分广泛的，看法是相当矛盾的，有时则是直接对立的。然而有一个结论是没有争论的，讨论反映出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那种深刻不安和令人担心的状况以及今天千百万人感到不安的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

根据会议日程，我只想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发言者在重申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同时强调指出，为劳动者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创造美好的生活条件，依然是党的工作的目的。发言者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制订并积极推行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便迅速革新社会及社会生产力，确保在我们的生活中进行真正改革。举例来说，大会代表绍什金同志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任何一个不能提出为人民所理解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党，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没有这种为普通工作人员所理解的政策。我们代表大会完全有义务提出这一问题并委托中央和学者们制订出这样的政策，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将其主要论点在《真理报》上发表。几乎所有发言都提出了这种想法。

参加小组讨论的人在另一个方面也是一致的，即极其消极地评价了当前的情况。经济状况被认为是危机的。有些发

言者认为，我们还没有对这一领域事态的悲惨程度作出真正的评价。在令人特别不安的因素中发言者指出了以下几点：国民经济的失控程度在迅速增长，比例失调在发展，各部门和地区之间业已形成的联系已经中断，当然还有由于各种灾难引起的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

与此同时，讨论并没有只谈困难。对摆脱危机的途径进行了紧张的、困难的、真正集体的探索。这种探索有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却能更加明确地阐述和对比各种立场和观点。

在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时，参加小组讨论的人不同意回到更“完善的”行政命令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赞成前进。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前进就是向市场关系过渡。我要强调指出，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全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最大的意见分歧——从坚决不接受、否定，到全盘接受态度，我要说是欢欣鼓舞态度。我认为，大多数人更欣赏冷静的、谨慎的观点。例如，会上指出，发展市场机制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我们需要市场，它是克服以浪费和大手大脚态度对待经济任务的一种手段，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安排产销之间有效联系的条件，是加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威信，因为封闭的市场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一个大国所需要的。

发言者还关注我国有一股势力越来越积极地活动，企图通过市场经济把我们的社会拉向资本主义。结合这些看法，参加小组讨论的人确定了自己对政府提出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态度。

如果我说这是一种积极态度，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尖锐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占多数，但这种批评却是使人信服的，

基本上是建设性的。我想从一些意见中归纳出下列几点来谈谈。

第一，批评这个构想模糊不清、不够明确，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例如，安集延州建筑队长哈塔莫夫同志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只要工人和农民对这种新模式不理解，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会议结束时，这一思想概括为：应当使人民成为经济改革的同盟者。人们应当了解某种新做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全部实情。

在没有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在这方面进行泛泛的、司空见惯的夸夸其谈，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人们不再相信政府，他们以不信任的态度看待政府最近提出的所有倡议，这一点是最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不大恰当的方式提出的向市场关系过渡的主张，也没有得到人们的信任。

因此，会上提出的下述建议值得注意。一些发言者认为必须责成在政府、立法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最短时间内制订出明确的，我要强调指出能为大家所理解的实现向市场关系过渡的经济改革纲领。

第二，人应当是这个纲领的中心，这一点也应当为大家所理解，这就是说，这种纲领中必须规定清楚的、明确说明的人的社会保护机制，使其免受向市场关系过渡的经济改革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发言者建议把下述一条写入代表大会文件：苏共不支持不择手段地采取任何措施使经济摆脱危机，不支持可能引起诸如大量失业、降低广大居民阶层生活水平等后果的措施。

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一些发言者认为，必须组织关于向市场关系过渡纲领的目的、任务和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和道路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我想强调的是，参加小组讨论的许多人

认为，技术至上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根本经济改革的建议的基础。经济改革的阶段性应当考虑社会接受改革的准备程度。我们懂得，不会完全符合，但是把改革当作某种硬性模式提出来强加给社会，恕我直言，这就有点拿社会进行试验的味道了。不能允许这样做。

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提出和推行草率的和考虑不周的新做法的人的个人责任问题。发言者指出，这些新做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同自以为是、独断独行的思维，同不愿听取他人意见、几个人说了算的做法有关。建议要对包括可供选择的主张和纲领在内的各种主张和纲领进行分析和对比。

伏尔加汽车厂工作人员戈利亚斯同志在小组讨论时提出的所谓“双层”经济的思想引起了参加小组讨论的人的特别兴趣。提出这一思想的人认为，这种思想是向市场过渡的最佳方法，因为它考虑到了每一个人的利益。

除了为可预见的未来提出了许多重大任务外，小组还讨论了迫切需要克服当前那些迫在眉睫的困难。这些困难之中的任何一个困难，例如在收获庄稼时燃料短缺，都可能发展到危险的规模，而且不仅具有经济性质，还具有政治性质。

很难不同意在小组发言的大会代表明斯克州的马洛菲耶夫同志、阿塞拜疆的加萨诺夫同志以及特邀代表立陶宛共产党(苏共派)的彼得罗尼斯同志等人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实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所作出的决定，需要政治稳定，需要克服离心倾向和消除社会和民族紧张气氛。

当然，我既没能概述出小组讨论过的全部问题，也未能提到哪怕是1/10的发言者。打算在代表们同政府成员会晤时再把已经开始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使讨论具体化(已经达成

了这样的协议),并在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文件草案中考虑已经作出的结论。

我想用在这个会场上大家以不同形式反复提到的话来结束我的讲话,党的威望取决于党向人民提出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策。我们这次代表大会要做的,就是使这个政策是明确的、有效的、受人欢迎的。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图拉州列宁集体农庄育种场  
场长、苏联农民联盟主席  
瓦·A·斯塔罗杜布采夫代表  
“苏共农业政策”小组的发言**

(1990 年 7 月 7 日)

尊敬的同志们!参加农业小组会议的有 850 名大会代表和大约 100 名应邀的中央机构领导人。参加小组工作的有: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苏共中央书记叶戈尔·谢苗诺维奇·斯特罗耶夫以及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讨论过程中有 30 人发了言。谈话是直率的、批评性的和求实的。

来自国内各地的代表在会上对食品供应到处都一样贫乏表示了不满。代表们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一致断言,我们的土地可以使所有人丰衣足食,提出了应当怎样办的建设性建议,并且思考了党在农村当前情况下应如何行动的问题。

大多数同志表示坚信，农村党委会必须尽快放弃行政命令方法并改用政治方法。党如果放弃专横的长官派头并成为有威望的先锋队，那它就会增强自己在农民当中的影响。

发言者们在议论造成农业生产危机局势的原因时指出，它们的根源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始于对集体化的扭曲。清一色的社会化和财产归公导致了对财产无人负责的现象，实际上一切都无主，而农民则变成了雇工，从而产生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管理结构专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通常变成了一个不停转动的机器，把农民劳动的成果输送给其他领域和部门。

加速发展大型工业综合体和城市的政策在同样程度上也促进了农村的破产，因为农民变成了大工业和城市的主要劳动力。遗憾的是，这个对社会来说致命的进程现在仍在继续。老化的农村再加上工艺、技术和加工工业落后于现代化水平，缺乏科学方面的支持，长期缺少资源，因而没有能力正常地供养国家。

代表们还坦率地谈到了新的弊端。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89年）决议宣布了农民有权在土地上自由劳动和自行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承认各种经营形式的平等，为租赁以及报酬与最终成果挂钩的其他方法开辟了道路。

然而，不是各地都一律采取了这些措施，而主要的是贯彻这些措施不力。这是根深蒂固的刻板见解和保守主义造成的。

但是生活表明，主要的原因在于，新措施没有资源保障是不会奏效的。党和政府宣布的优先发展农村的方针并未落实。相反，形势甚至每况愈下。

在本五年计划中，供应给农业的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

机、饲料联合收割机、矿物肥料、建筑材料、备用零件和其他资源都减少了。燃料供应中断的情况层出不穷。产品储藏和加工基地的发展状况没有很快好转。用于食品部门的个别机器和设备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城市的优越性继续吸引着农村的居民，首先是年轻人。由于社会产品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城乡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保障的差别目前并未缩小。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家庭人均总收入比城市职工低近21%。农村居民的人均商品流转额和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数量比城市居民少一半。

按每千人口计算，农村的住房建设少于城市。就公用工程设施而言，农村也远不如城市。

耐用品的销售状况明显恶化。农村居民买不到电冰箱、电视机和其他工业品。羞于启齿的是，甚至连胶皮靴都难以买到。

大会代表在讨论过程中担忧地谈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状况，谈到了最近通过的农业问题的决议考虑不周到的情况。杜布科代表生动地谈到这些问题。对农业综合体的外行管理正在造成反常的现象。一会儿，我们企图拍卖落后的农庄，而不征求它们的主人的意见；一会儿，我们却因微不足道的成绩发给领导人和专家比工资多几十倍的奖金。

实践表明，应当可靠地保护农民不受市场敲诈的影响。在向合同关系过渡的时候，一些工业企业会随意地给自己的产品抬价，而且除了要付现金以外，还向农庄农场索取食品，甚至短缺的工业品。任何东西都需要的农村却无法抵制这种勒索。

发言者们一致认为，农村的社会改造是确保摆脱危机的关键办法。为了在一些地区，首先是在俄罗斯非黑土地带、咸

海地区和其他地区，最终不失去农民，我们请求代表大会，全体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民为农业振兴的第13个五年计划作出奉献。解决许多地区食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伏尔加格勒州的代表索罗金建议：为了振兴农村，不仅应当追加预算资金拨款，而且还应当规定住房、道路、加工设施建设的优惠条件。他认为，国家应当承担农村社会需要、土壤改良和煤气化的一切费用。这一意见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

一些同志十分担忧地指出，农业领域管理机构一再改组并且考虑欠周以及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人软弱无能（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机构）起了消极的作用。几乎所有谈到这个问题的人都建议恢复农业和食品部，建议向那里推荐内行的，了解工作和生活的领导人。

也不能避而不谈个别学者、创作界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的举动，他们要求取消社会生产并要求加快向农场主经济过渡。有人开始说过头的话，公开号召走向资本主义，动摇我们的制度。不能不指出这一点，也不能不反映这一点。

至于谈到农业发展，我们确信：它的前景不应当用大轰大嗡的运动方法来决定，应当由深明事理的、有经验的人来决定，而且必须同农民商量。

在对讨论进行总结时，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和尼·伊·雷日科夫同志作出了下述概括性结论：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农民当中的影响，应当用民主社会所特有的方法制定农村能够理解和能够接受的农业政策，最主要的是，不仅要宣布这一政策，而且要通过在苏维埃机构、经济机构、劳动集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来确保执行这一政策。各种经营形式（社会经营、租赁经营、个体经营）的平等和竞争应当在今后几年中成为农村的生活准则。为此，党应当建立同前不久成立的苏联



农民联盟相互协作的有效机制。我作为它的主席知道，农民联盟方面也将采取所有必要的配合步骤。

其次，最近将采取确保优先发展农工综合体的措施。这是指注销农庄农场的债务，完善价格机制，改进技术设备、化工产品、备用部件、建筑材料的供应等措施。关于减少石油产品的出口来为收割工作追加700万吨石油产品的决定是及时的。

最后我要指出，只有建设性力量团结起来，所有公民无一例外地进行诚实的劳动，才能使社会摆脱道德危机和物质不足。农民反对任何罢工、游行以及其他解决小团体利益的不得体方法，并不因为他们保守。不是的。人们懂得，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这种“革命”行动所带来的损失需要几年才能弥补。我们还呼吁自己的工人、矿工和其他专家同行要表现出理智。别尔哥罗德州的切尔内赫同志呼吁遵守纪律和秩序。他指出，几年来没有法律的生活已经使我们尝到了苦头，讨论非常热烈，并且达到了极端程度。他总结出这样的意见：农民请求所有的政党、各种纲领派和派别进行善意的协商，不要互相对抗。我们想向大会保证，农民将积极支持所有建设性的建议。

（译自1990年7月9日苏联《真理报》）

**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工作部部长  
瓦·亚·库普佐夫代表“党、苏维埃、  
社会政治组织与运动”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小组听取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

维奇·弗拉索夫同志和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还回答了许多问题。讨论时有 32 名代表发了言，他们当中有工人和学者，包括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在内的各级党委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妇女组织、退伍军人组织和共青团的代表。各种派别和各种纲领的代表都有机会在我们小组发言。例如，发言的有以自己的观点而闻名的索布恰克同志和斯坦凯维奇同志，民主纲领派代表戈杜诺夫，应邀出席会议的党组织俱乐部代表古谢夫。与会者注意的中心问题有：共产党员在人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工作，与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包括原有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社会民主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大家认为，小组工作富有成果，不仅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党组织的各种各样观点，而且也反映了一些情况，我们对这些情况的看法是一致的。

主要想法是党组织要同首先承认社会主义选择、主张保障人权、保证人们自由表达政治意愿、保证民族复兴、实现社会创造力量的政党与运动合作。

许多代表，其中包括卡利宁纳(列宁格勒)、米哈利丘克(卡卢加州)、克劳岑(立陶宛)强调指出，重要的是确定党对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立场，必须认真地分析它们的纲领性声明和目标以及实际活动并及时向党组织通报。

同时，代表们表示担忧的是，在一些新的社会运动和政党的活动中，除了对执政党进行有根据的和完全允许的批评外，还常常出现一种倾向，这就是污辱执行党，试图把个人迷信时期所犯罪行的责任强加在今天的共产党员的头上，把苏共说成是反民主和反民族的力量。

代表们坚决驳斥了这些谰言，强调指出，苏共真诚地承认

所犯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從自己的失敗和挫折中得出了結論。黨組織願意積極地為造福人民而工作，認為無端責備是政治鬥爭中的一種不中用的策略，在建立民主的法制國家的條件下這也是不能容許的。各種政治力量爭取權力和影響的鬥爭應當具有建設性，應當坦誠地公開地在法律基礎上進行。許多代表指出，共產黨員在各级蘇維埃中的工作是開展社會對話的一個主要方面。因此，蘇共對蘇維埃的態度是統一的。共產黨員應當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利用影響群眾的一切機會，爭取在蘇維埃中通過必要的法律和決議，促使我們的社會生活更新和民主化，而主要的是，要在工作中團結起來，一道貫徹執行這些法律和決議。

正如在小組會上發言的同志波利卡爾波夫（阿爾漢格爾斯克州）、格爾什卡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科薩列夫（切爾卡瑟州）所說，把自己的影響同蘇維埃的權力對立起來的主張，是同我們黨格格不入的。他們以及其他許多代表認為，在當今社會上蘇維埃和黨沒有什麼可分的，倒是有實行合作的極廣闊天地。然而，共產黨員要掌握參加選舉和參加新的議會工作的困難的學問，同時要從痛苦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代表們指出，現階段蘇維埃發展的根本特點是它進入了內部深刻改革的時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自治和劃分代表機關和執行機關的權力。圍繞黨委書記和蘇維埃主席兼職問題展開了熱烈爭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看法。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要由生活本身以及蘇維埃和黨委會的實際經驗作出了。但是，現在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黨組織的工作應當具有靈活性，不要對黨員代表的工作進行瑣碎干預，同時要使黨員代表在原則問題採取一致行動。

小組認為，蘇共新章程草案中提出的關於在蘇維埃中成

立的共产党党团的准则是非常及时的，它们应在相应党委会领导下工作。

苏维埃不是满足权力欲望的地方，而是实现民意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讲，党应当帮助苏维埃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通过立法动议反映各种利益，对重大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规划提出具体建议。

我们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同新的政党协作。许多发言者指出，尽管建立多党制已成为事实，但是多党制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尚未制定出来。通过苏联社会团体法是调整现实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根据这项法律，所有社会团体都有可能获准登记，并在稳定的法律基础上进行活动。

党在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中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同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组织的关系。参加讨论的人认为，必须进一步发展党同工会、工农运动、知识分子创作组织、妇女组织、退伍军人组织、共青团等组织卓有成效的联系。

特别指出，党应当认真地重新研究自己在工农中间的活动，大力支持劳动人民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条件下维护自己利益的愿望。

这样，作为小组建议提出来的有关党在苏维埃中的工作，有关党与社会政治组织、政党和运动的工作的基本方面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党的政策和策略应当以现实为依据，应当考虑前进过程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苏共和党组织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全部经验使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不要遭到公民的反抗和引起社会不满。

第二，党在同苏维埃关系中摒弃发号施令的方法，促进树立人民权力代表机关在社会政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三，在同苏维埃的关系中，党的机关应该依靠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只能完全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应当积极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施加指导性影响。根据立法提议权，党委会可以通过党员人民代表将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直接提交苏维埃审议，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主动在党的刊物上和党员大会上对各项法案进行群众性讨论，对解决某些问题的各种不同方案进行论证，要求举行公开听证会和讨论以及独立的鉴定会，提出质询，批评苏维埃工作中的缺点和疏漏。

第四，党、社会运动和组织的相互关系的基础应是独立的平等的政治力量的竞赛原则，应是法制，不把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相互尊重和光明正大，承认人民的选举是权力的唯一来源。

许多代表认为，党在苏维埃中的工作、党做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工作，在当前条件下对党来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他们支持在党中央委员会的结构中成立一个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部，并建议把同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相互关系纳入这个部的工作范围。在共和国、州、市党委也应成立相应的分支机构。还有人主张由苏共中央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计划、协调和实现同社会组织和运动的合作。一些代表认为，最好能在近期某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些问题。

一些代表主张改组党的科学研究中心和学校，建议大力加强党员的培训工作，以适应在多党制条件下的工作。

还提出许多建议，涉及到一般政治问题、党内生活问题，以及经济、社会、青年政策问题。对所有这些建议都进行了分析、归纳，并已提交给代表大会编纂委员会。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代表 “苏共民族政策”小组的发言

(1990年7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苏共民族政策”小组委托我向你们报告这个小组的讨论情况。参加我们小组的约有400名代表，39位代表发了言，其中不包括那些简短的插话，但是我要加以说明，这些简短的插话都是很有内容的。根据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小组会上听取了中央书记古·伊·乌斯曼诺夫和安·尼·吉连科的工作汇报，他们还回答了问题。对中央政治报告和中央书记工作汇报的讨论、所提出问题的内容和性质、代表们的发言都表明，族际关系问题使所有人都感到不安，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劳动集体、学校、部队的气氛，涉及到许多家庭。我向大会代表和小组代表保证，我绝不粉饰那些尖锐的问题，我要把真实的评价告诉大家。在许多地区实质上进行着不宣而战的内战。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打伤，在和平时期难民数量远远超过了50万。在许多地方，今天人们抱有的唯一希望仍然是军队和内卫部队。发言者当中有很多是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代表，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军人，他们都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和联盟机构在执行自己的决定中不坚决和动作迟缓，以及言行脱节。在谈到外高加索事态的悲惨发展，以及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升级时，代表们提到国家最高政治领导的责任。由于对报刊的破坏势力采取纵容态度，由于片面介绍冲突局势，由于党委会缺少及时和全面的信息，代表们对苏共中央书记亚·

尼·雅科夫列夫、瓦·安·梅德韦杰夫、安·尼·吉连科、古·伊·乌斯曼诺夫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我受委托向代表大会报告，许多代表直接呼吁国家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要以迫切的心情表现出形势所要求的坚定性和决心，要特别关注坚决和准确地执行已发布的总统命令。

整个小组会的气氛是非常激动的。坦率地说，我没能完全避免各种各样的过火行为。但发言还是负责任的，代表们倾听了来自北奥塞梯的演员和导演迈尔别克·鲍里索维奇·齐希耶夫的呼吁，他呼吁要作出慎重的评价，不要提出有破坏作用的批评，而要提建设性的批评，不要搞可能使族际关系复杂化的一切东西。

如果归纳一下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出讨论的一些主要方面。第一，围绕关于人权高于民族权利的公式和纲领性声明草案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代表认为，这一立场同过去党的民族问题文件相比前进了一步。这样的态度同我们建设公民社会、法制国家的意向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作家鲍里斯·奥列伊尼克、亚美尼亚代表达拉基扬提出要防止把这一公式绝对化，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公式有冲淡民族同一性的危险，超越民族同一性，国家、爱国主义、祖国这样一些概念就可能失去价值。

我想，应该倾听这些不同意见和批评，建议党的纲领性声明委员会考虑这样的提法：苏共承认社会生活的民族形式的自身价值，维护民族权利，与此同时把人权放到第一位。

今天，不论是在政策中，还是在党组织的实际活动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权放在首位是极为重要的，结合最近波罗的海沿岸和许多其他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一点尤为重

要。

第二,许多代表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党应该采取措施,使自己真正成为我国各族人民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消除过去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偏差,以实际行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党今天已经有了新的民族政策,但新的民族政策贯彻得很慢。为了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各种纲领和各种纲领性声明,需要开展具体工作,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民族文化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和恢复民族语言、文化、传统、风俗、礼节方面应取得成果,哪怕是不大的成果,但必须经常不断地取得成果。在这方面要很好地同苏维埃、同所有社会组织和运动共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表示关切的是,根据党的倡议曾通过一个著名声明,承认强迫人民迁移的行动是非法的和犯罪的行动,该声明还表示要保证各族人民的权利,这个声明曾引起人民的最积极反响,后来这一声明实质上并没有贯彻执行,其原因是在恢复各族人民的权利方面没有采取实际措施。特别是H·B·巴格罗夫代表就没有通过具体决议,尖锐地批评了国家恢复克里米亚鞑靼民族权利委员会。C·M·别科夫代表对印古什人问题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满意。还有人指出在解决苏联德意志人问题上动作迟缓。B·M·祖马库洛夫代表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了同样的情绪,他要求对贯彻声明的进程作出政治评价。

早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就通过了,后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了关于苏联政府建立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决议至今没有得到实施,我认为,一些代表对此表示困惑不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正是一个能够研究某一民族具体问题的机关,尤其是能够研究最尖锐的难民问题的机关。



第三，代表们一致认为，民族自决意识的增长是一个客观的积极因素。但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犯罪势力常常利用民族自决意识。代表们希望党代表大会号召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为了本民族的前途，为了社会正义理想，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主动进攻，并阐明我们的一个共同看法——分立政策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和毫无前途的。

我认为，我们有可能这样做，把相应的表述写进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

第四，讨论证明，自治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概念方面还是在实际立法方面都仍然是一个未获解决的尖锐问题。在这方面通过的法律文件不能使社会各界满意，因为民族国家实体和民族地区实体的多级体制被看作是不公平。正如发言者所指出，由于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主权宣言，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特别是鞑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M·И·沙伊米耶夫谈到，9月份将有許多自治共和国可能通过各自的主权宣言。我要指出，代表们都同意中央书记古·伊·乌斯曼诺夫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应当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第一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宣言，但从实际实施这个意义上说，对主权的构想要慎之又慎。考虑到这一点，建议苏共中央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制定相应的建议并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提出立法动议。

第五，讨论表明，今天引起特别关注的是起草和缔结新联盟条约的情况，也就是与革新联盟国家机构有关的一整套问题的情况。代表们从不同方面看待这一问题。绝大多数代表同意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草案中阐述的立场。

与此同时，使代表们不安的是中央机关行动迟缓和在这个问题上丧失主动权的现实危险。代表们还谈了这样的意见，苏联总统应该立即强有力地领导起谈判过程。还有一个共同的态度，这就是要呼吁报界从对一些共和国主权表示欣喜转向清醒地分析政治和经济后果。我无权不提一下阿尔克斯尼斯代表的立场。他提请注意，据他认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公式包含内部矛盾和蕴蓄着国家瓦解的危险。他的意见是，需要一种周密考虑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各共和国的主权不会把联盟的主权变为摆设。

最后一点，讨论的总的特点可以这样来表述。在我们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应当明确和毫不含混地声明，改革和民主化方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只有在全国出现和睦、秩序和纪律时，民主化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代表 “苏共国际活动”小组的发言

（1990 年 7 月 7 日）

尊敬的同志们！参加贡巴里泽领导的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工作的有 119 名代表、10 名特邀代表同志以及一些在对外政策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

32 人发了言。参加讨论的人的职业是相当广泛的，有工人、农民、党务工作者、苏维埃工作者、外交官、军人、学者。他们来自我国的各个地区。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普里马

科夫同志在小组里作了工作汇报。然后他又回答了许多问题。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亚佐夫同志参加了小组会议。

就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迫切问题、我国历史的主要问题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并展望了未来。分析了苏共中央向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党的实际工作反映出来的广泛的思想。提出了不少介于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问题，严格地说，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小组的讨论范围。还讨论了与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制定的新的政治思维构想有关的原则性问题。

指出了苏联对国际事务的新态度和使对外政策方针摆脱教条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考虑苏维埃国家实际条件的必要性。

讨论和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对内对外政策在现阶段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安全问题、东欧局势和德国问题。

发言的同志不怀疑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裁军方针以及从空谈和平转向积极寻找使各国人民摆脱战争威胁的实际道路的做法。他们承认，新的对外政策有助于世界局势的好转和使人类摆脱“冷战”。

在讨论过程中，发言者对执行党的对外政策方针的策略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们注意到，西方大国对放弃实力政策尚没有明确表示。对解决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任务阐述了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想法。看来，在这里反映了整个社会舆论状况所特有的某些特点，还表明党员对对外政策的具体问题，首先是对谈判的具体问题仍然缺乏了解。

在苏共中央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中，

代表们最关心的是裁军问题。指出合理足够程度构想应成为缔约各方的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强调指出，在这方面不应作出不合理的单方面让步。

某些军人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安全是否在削弱？在这个问题上，大会代表、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同志的发言是很有分量的。他指出，谈判的立场和谈判进程是在外交官、政治家、军事专家、科学家最紧密的协作下制定和进行的。我们不会作出没有补偿的让步，苏美在裁军问题上的关系严格保持在总的力量均衡上。

中欧和东欧当前的局势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领导者对事态的发展有多少了解，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同挑战相适应？提出了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

小组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原则的情况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从 1986 年起，戈尔巴乔夫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 103 次会晤，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举行了 147 次会晤。

然而，也不能不指出存在的一些不足。尤其是我们同这些国家包括防御在内的一些合作领域，事先没有足够的法律保障。

在讨论德国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了在关于外部条件的谈判中一定不能忽视献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国家的安全利益。

发言的同志指出，他们反映了居民、劳动集体、党组织对

当前国际生活中某些趋势的担忧。广大党员、广泛的社会阶层坚持苏联在西部和东部边界的不可破坏性，坚决反对任何人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和不考虑苏联合法权利的企图。

参加讨论的人反映了有利于党内生活民主化的情绪，指出在制定苏共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处理个别问题时，必须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观点。在发展边界联系、研究其他政党的实际经验和同各界接触时也应这样。

党和国家在共同的政治任务方面采取同步或平行的行动是正确的、合适的，共产党员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系列广泛的利益和责任，党应当更明确地表现自己的面貌。例如，这里指的是在党与党之间的合作中苏共同传统的伙伴的联系，同前不久建立关系的社会党发展接触。通过这些接触和联系，可以交换在多党制和活跃的议会生活条件下有益的工作经验。

代表们以同志式的担忧心情谈到了现在在一些国家因自己的观点而遭到公开迫害和压制的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的命运。

建议在苏共纲领性声明中反映出：

- 对东欧事件的评价；
- 通过专门决议或者在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中写进对党的前领导人关于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的政治评价；
- 制定提高地方组织、企业参加对外经济活动效益的综合措施；
- 继续改革包括国际部在内的中央机关的工作；
- 更广泛地吸收党的积极分子、学术积极分子参与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措施。

这个总结发言不能一一列举小组中提出的所有重要主张

和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考虑。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苏共各派代表在苏共第二十八 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鲍·尼·叶利钦的发言

(1990年7月6日)

同志们！党是带着一大堆严重问题召开代表大会的。严重的问题有许许多多，但也有特别重要的问题。改革初期采取守势的保守势力后来转入了进攻。它们开始了反对经济改革的斗争，尽管这种经济改革是小心翼翼的和不彻底的，却给党的权力造成了实际的威胁。这种情况发生在民主化进程展开的时候，这一进程在恢复各级苏维埃权力方面特别有力地显示出来。这种情况是在公开性开始迈出最初几步和原先的不容争辩的真理变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发生的。最近几年表明，未能制止保守势力在党内的行动。相反，却老是说什么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都站在街垒的同一边，都是同一队伍里的人，思想一致。这种说法败坏了那些真正一贯拥护变革的共产党员的名声，为苏共的保守势力建立了安全体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认为可以实行报复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就表明了这一点。

要弄清楚我们的代表大会可以解决并且应当解决什么问题，首先必须看清楚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政治局未同意使

用在改革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举代表的办法：用民主的方法从与党以前的结构无关的各个纲领派和集团中选出代表。如果凡是能有6000党员的组织都能直接选出一名代表的话，大会的组成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因此，在大会讨论时，有关国内改革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没有作为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将由人民在代表大会以外的地方解决，由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解决。这次代表大会面临的首先是苏共本身的命运问题。说得确切些，在这里只解决党的最高层机关的命运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尖锐。苏共机关是否能在自身找到敢于进行变革的力量呢？苏共是否会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提供给它的这次最后机会呢？也许能，也许不能。也许党的机关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下定决心进行党的根本性改革，也许会抱住必定失败的形式不放，成为人民和改革的反对派。

这样，党的机关的代表必将被排除在各级合法政权机关之外。这样的党既不能保持先锋党的作用，甚至也不能保持在各级苏维埃中拥有代表席位的党的作用。

有些人以为，在那些不想成为党机关的传动皮带和螺丝钉的一切异己分子离开党以后，苏共的全部财产和与之相关的权力就归党所有了，这些人的想法是乌托邦。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顺便说一下，保守派正促使发生这种情况），必将掀起一场使苏共财产完全国有化的全民斗争，苏共将破产，只好用自己的财产来赔偿欠下人民的债。留给党机关的就只是一个写着“苏共”的牌子了。

可以设想，将开始一场向法院控告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斗争，因为这些领导人本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失。我至少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案例，譬如说，由于开展反酗酒运动而造



成了损失。人民还会追究所有其他问题的责任：对外贸易和农业中的挫折，对民族政策、军队的政策等等应负的责任。国家应当知道苏共给国家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这就是机关权势党可能会面临的前途。凡是正在考虑其他某些方案的人，但愿能看看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遭遇。脱离了人民，不了解自己的作用，那就只有靠边站了。

是否就这么悲观呢？是否还有别的出路呢？有。不过，恰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做到这一点的机会却不多。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这些为党奉献了几十年的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到这里，说明苏共仍然是有出路的。尽管是艰难的，但总是一条出路。

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实行多党制。

我国在逐渐建立各种不同的政党。同时，苏共也必然要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使党现代化的进程怎样才能成为使人民没有痛苦的文明进程呢？

第一，必须将苏共内现有的各种纲领派从组织上固定下来，让每个共产党员有时间自己作出政治决定。我确信，大多数普通党员会把党的前途依托于民主派的。

第二，改变党的名称。应当叫民主社会主义党。

第三，在大会上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过早。只须通过一项改造苏共的总宣言。其次是要选出能够用大约半年或一年的时间筹备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新领导机构。

第四，党应当放弃一切国家职能。在军队、国家安全系统和国家机关中应当取消基层党组织。在生产单位，基层党组织的命运应当由劳动集体和党员自己决定。在新的党或联盟里，党员应当缴纳最低限额的党费。这样就会出现一个议会式的政党。只有这样的党在社会进行大力革新的情况下才

能成为一个起领导作用的党并代表某一个派别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其他政党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任何派别都可以加入国家民主力量联盟。人民承认这个联盟并跟着这个联盟走，尤其是这个联盟提出它的不是靠欺骗人民和增加人民负担的办法摆脱危机的经济纲领的话。联盟就是各民族联盟的联邦。它将有一个符合全国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的形式。

随着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改革的更加彻底，这个联盟可能在实际上成为社会的先锋队。这将保证社会革新的广泛社会基础，阻止保守派的进攻和保证改革的不可逆转。这是第二种抉择。总之，要么是保持机关式的苏共，这样它迟早要分裂并脱离国内各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要么是党实行革新并转变成民主力量联盟，继续起到积极参加改革的作用。

最后，我想再谈一点：事态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有些人幻想阻止事态进程的做法必然使党遭受历史性的彻底失败。只有超前发展，只有同我国社会一切进步力量一道迅速前进，才有希望使党不致自我消失，而是发展成为新的、先锋队式的民主力量联盟。

我们并不是在原先的社会里生活。社会再也不会像一支统一的队伍那样走向指定的目标了。国家再也不会任人摆布了。蛊惑不能麻痹国家，威胁也吓不倒它。人民可以抛弃任何政治力量，不管这种政治力量过去多么有影响。人民只支持每天都以实际行动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帮助人民和我们整个国家成为先进的、富有的和幸福的国家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号召向往不现实的共产主义远景的政治组织。

(译自1990年7月8日苏联《真理报》)

## 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 维·H·绍斯塔科夫斯基的发言

(1990年7月6日)

尊敬的大会代表和来宾们！我觉得，在我国总的形势下，我们对党的一切忧虑以及党内纷争都已成为次要的和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向何处去和如何走的问题。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前进——这还谈不上是对以上问题的回答。

我认为，我们今后的目标应该是：第一，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将以法律保障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存在的形式，将真正确认人权总宣言，不是由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观来垄断，而是实行信仰自由。

第二，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唯有法律至高无上。而且毫无疑问，要实现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护法机构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机关的非政治化。那些关于军队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谈论纯属狡辩，是对概念的歪曲。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政治的工具，的确如此，但它是国家政治的工具。只有我们这里是党的政治的工具。只要军队也和其他国家机构一样继续执行政治局以及苏共中央每次全会的决议，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法制国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谁发布了这项或那项命令，谁动用了军队。在军队和任何别的国家公务中应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都要把专业技能和认真办事的态度放在第一位，而不要看一个人在什么党派里效力。党派是公务之外的事。而且，从原则上讲，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党该管的问题，这是苏维埃政权的问题。

第三，建立以人的主动精神、创造潜力以及多种成份和市场为基础的繁荣经济。如何朝这个方向走呢？最紧迫的和最基本的就是解除对经济活动的意识形态制约。任何神圣的意识形态母牛，都既不能给我们提供牛奶，也不能给我们提供牛肉。

那些总想把经济赶进意识形态走廊的企图，都是毫无成效的，确切点说，都是犯罪的。这个走廊很可能再次变成没有出路的迷宫。

对我来讲，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和自由。而所有制形式是绝对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另一点，即如何利用这些所有制形式，如何使它们为人的利益，为人的社会自我感觉，为社会的繁荣服务。我们再也不要建造空中楼阁了，让我们来建筑实实在在的住房吧。

我深信，如果这片土地上现在活着的人不能过上起码的好日子，我们的后代是不会过上好日子的。为此我们要研究经过人类实践考验的那些经验。要结合我们的特点，结合各加盟共和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而不要再去发明什么自行车，那种所谓的“发明”会受到全人类嘲笑的，对此我毫不怀疑。

这一切是否能实现呢？许多人都谈了必须制定一个摆脱危机的纲领。可以制定和通过这样的纲领。然而首先让我们试着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生活总是不接受，总是推翻我们的一切计划呢？为什么那些计划的效益是如此之低呢？

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提到了必须吸取不讲真话的教训，还援引了列宁的话来论证这一主张：“我们的力量就在于讲真话。”

如果我们不牢牢地站在真理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我们确实不能前进。而在十月革命后的全部历史中，我们一直顽固地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搞清楚纲领性声明草案中所提到的那些扭曲、错误和罪行的原因，那么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仍可能一无所获。

我们需要讲真话，不管它是怎样地令人心酸。只有如此才能有信任和建设性行动的基础。这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指的是社会主义选择问题。不错，1917年人民拥护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七十三年以后，我们又一再重提这些口号：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权力归苏维埃，和平属于各国人民。但我们没能实现这些口号。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样一来，土地也就没有主人了。工厂属于部门，权力属于党，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则根本谈不上。我还想提一下十月革命的一个口号——“面包分给饥饿的人们”。这个口号今天具有某种新的、悲惨的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个问题要求我们作出诚实的、负责的回答。

有人说是因为社会主义大厦的建造者们干得不好。就算是这样。但是，原因仅在于此吗？设计本身是否有缺陷和失误呢？我们认为是有有的。首先是没有解决在新社会里劳动的动机问题。我们学说的奠基人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当它在生活中出现的时候，则用经济以外的强制办法和惩罚手段代替经济上的关心，不进行理论探讨就仓促地解决问题。

多年来，我们想花很大力气培养新人，培养出类拔萃的人，培养螺丝钉，但是，我们失败了。幸好，人的本性变得更强了。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人懒，敷衍塞责，好像天生就是贼，这完全是谎言。应当恢复正常的劳动动机，恢复经济利益，这将产生重大结果！每个人都靠劳动挣钱，他就会感受到并享有

这种利益。

今天我们应当老实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各族人民英勇劳动，包括战斗劳动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冲破了造成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体制和全面控制体制，这样的体制过去和现在都束缚我们各族人民的创造力和勤劳的精神，导致经营不善和生产的盲目性，并使人们精神涣散。

我们要坦率地告诉苏维埃国家的人们，党已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决不会不征求人民的意见就以人民的名义盛气凌人地宣告任何事情。

我同意波鲁特奇科夫代表的意见。他在这里说过，党员是个拖拉机手，勉强地开着一台破拖拉机，他没有任何过错，他对党的上层的罪行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一个党员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党作为一种体制是有过错的。按照“砍树不计较碎木片飞走”的原则，党作为一种体制把自己的思想强硬地灌输给社会机体的每个细胞。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必须忏悔。这种忏悔将成为道德净化的强有力的因素。

顺便说一下，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原则性错误，那就是对农民劳动深刻的创造性内涵，对农村的传统的意义以及农民对待土地的某种特殊的道德观念估计不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谈过“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尊重并珍视农民的劳动，同时还要遵循列宁的教诲，不对农民发号施令，这是首先应该做到的。说句公道话，在我们糟糕透顶的条件下任何诚实的劳动——教师的、艺术家的、科学家的，特别是工人的劳动都得不到重视。难怪当人们不断从这个讲坛向工人提出呼吁时，后者却以交出党证作为回答。

我们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假话。

当我们说党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时就是在讲假话。这是斯大林的提法，而这种提法对他来讲显然是有特殊意义的。

当我们说财富的悬殊是改革的产物，这是骗人的鬼话。

地下百万富翁科列伊科决不是作家空想的结果，而是本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塑造的文学形象。科列伊科倒没什么关系。苏联的资产者根本不是新兴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很快就被杀光了。苏联的资产者是掌握分配物质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部产品的庞大机器的人。这个强大的分配者阶层不就是破坏改革的根源吗？

至于谈到团结，这也是自欺欺人。什么时候，同谁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团结改革的力量，这是对的。可是，和那些拉我们开倒车，束缚一切进步创举的人能讲什么团结呢？

不错，我们需要，而且非常需要公民和睦。但是以什么为基础呢？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有人想要建立新斯大林主义党，请便。还有人主张建立反映领导阶层利益的官僚党。我们进行民意测验时，有 43 % 的人认为这样的党反映的正是这些人的利益。而我们则主张建立社会进步和民主的党，建立为了人的利益干实事的党。让人民作出评判，究竟拥护谁，信任谁，反对谁。

（译自 1990 年 7 月 8 日苏联《真理报》）

## 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亚·弗·布兹加林的发言

（1990 年 7 月 6 日）

同志们！我作为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代表发言，首

先我想对那些毕竟支持了我们的请求的代表们表示感谢，我们曾请求给予纲领派代表一次机会，至少能在代表大会第五天或第六天会议上在这个崇高讲台上发言。

我就从我们谈得很多的关于我们代表大会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这一点说起吧。那么，今天我们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对我们生活中一些关键问题给我们大家作出答案了吗？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在常说的“欧洲文明的传统价值”的差别（如果说有所差别的话）是什么？如果没有差别，那么这些咒骂又是为了什么？如何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盛行这一点呢？甚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表现出了官僚主义（无需我举什么例子了）。怎样做到使我和你们，也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到下面，到党组织中去的时候能够说：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把国家从泥潭中拖出来。我们有对这些问题答案吗？

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准备向你们提出可供选择的答案。我们向你们提供了文件，文件中提出了这些答案。现在我只能简短地、提纲挈领地谈谈要点。

我们这一派自诞生之日算起总共才三个月。而且我要强调指出，我们这个纲领派既不作为一个派别出现，也不作为一个特殊政党出现。我们不打算使苏共分裂。我们的任务是向共产党员们证明，只有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才是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的道路前进的保证。没有这种始终不渝的、坚决的民主化，就不会取得胜利，人民就不会再理睬我们。

应当严肃地回答时代的挑战。许多代表抱怨形势严重。确实，从代表大会讲台上，从小组会上不断发出埋怨声。但是，无论我们多么艰难，难道光埋怨行吗？依我看，重要的是我们



应当准确地、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我们社会的矛盾，分析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得出一致的看法：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极权官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靠暴力把不同的成分，即社会主义成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甚至半封建关系成分粘结在一起。那么，今天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今天这个制度正在腐烂。这种腐烂的臭味正在毒化仅仅几年前我们才开始呼吸的那种自由的新鲜空气。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向何处去？应做何种选择？有人说：够了，已经很难闻了，我们往回走吧！加把劲，不要出卖理想。多么诱人的口号，尤其对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才能和精力献给党的人。但是我们往回走会不会走进永远出不来的死胡同呢？

另外一些人说：不，让我们按另一种方法干吧！让我们走所谓的“文明国家”的道路，把它们的结构不加批判地搬进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来吧！这样我们的结果会怎样呢？弄好了变成印度，那里有火箭一核综合体和几亿个甚至按我们苏联的概念也是半个叫花子的人。而且还有变成皮诺切特专制独裁的危险，到那时，美国顾问弗里德曼式的人物将在新的血腥独裁者庇护下推行私营企业活动和自由市场思想。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第三条道路？有！而且这条路并非像我们党许多领导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超前方针。这就是已经在代表大会上讲过的：沿着走向 21 世纪的经济、政治、社会力量结构的道路前进。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济方面，关键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是谁当家作主的问题。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是没有定规的。也许是承租人，是股东，也许是私营企业主。而这种承租人或股东又是些什么人呢？不排除从前的“影子经济”生意人

和部分高级官僚们搞“财产换权力”的交易，他们将从一把交椅坐到另一把交椅上。而劳动集体仍将像从前一样被抛在一边。

除此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有。什么办法？我们认为，沿着财产非国有化和非官僚化的道路走，可以不通过把企业出售给私人的办法，而是朝着劳动集体自主和真正的自治，朝着中央、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朝着民主制定经济结构改革的长期专项纲要的方向发展。

这是通向复兴公有制，通向从经济上证明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大效率的道路。如能做到这点，我们就将取得胜利，如做不到这点，私营企业主将取得胜利。但那时，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带头人的我们将一文不值。

这是战略。今天，当我们来到劳动集体中时，我们每个人应当做什么？首先要善于从下面做到使共产党员们带头使工人、工程师、农民变成劳动集体的主人。

具体的办法是实行自治，使选举制度不是像今天那样成为一种游戏，而是真正选出下面支持的内行领导人。这才是党的干部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是我们自己这样做，要么是劳动集体把我们从企业里赶出去。活该赶出去，因为我们不会工作。如果我们能帮助安排好劳动集体的权力，那么不论哪一级的任何决定都不能把我们赶出企业。

经济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市场问题。这里已形成一种老框框：要么是行政分配制度，要么是我们的市场，而在这个市场里仍然不清楚谁将是主人，是过去的黑帮，还是原来的官僚。在这样的条件下该怎样行动呢？我认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联合公司也能成为市场上的主人。

除了我已谈过的劳动集体和它们的自主性外，再补充一点。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就是由消费者协会、消费合作社（苏联也有这种组织，但会场上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按照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官僚们或学究们的需要来调整价格和质量。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在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保护下形成有计划地重新培训干部的灵活体制，以此来解决工作中无事可干和企业外的失业问题。再一个经验，就是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把数百亿的钱交给社会保障机关的官僚们，而是由生活困难的人和他们的民主组织——退休人员、青年和残疾人的组织自己监督这些资金如何使用，用到哪里和干什么用。请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会被浪费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只有在我们保证劳动和消费尺度之间完全相符的情况下，我们的市场才不会成为黑帮投机的市场。这样就会有人说：您想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想干涉别人的隐私。可是，难道一个人心里的东西和口袋里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吗？不过，我们提出的完全是另一个东西。这就是货币改革，它将由统一的记名帐户、税单、收入和遗产累进税加以补充。这是基本的，甚至是带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措施，而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苏联完全实现这些措施。

最后，谈谈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立场。要多党制、多元论、民主吗？当然要。如果只有这点，当权的就将是一些职业政治家，而我们大家将变成电视观众，观看这些领袖人物在最高苏维埃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玩政治游戏。需要有一个每个劳动者都有份的真正政权。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有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办法，而且我们早就知道了。这就是过渡到拥有经济实权的苏维埃政权。那时，住房问题、卫生保健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将属于苏维埃监督和负责的范围。

那时，是苏维埃的人，而不是主管部门将使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他一来到这个苏维埃，苏维埃就能解决他将怎样生活，在哪里居住，为此将支付多少钱。那时这一切都将取决于苏维埃。为了使人们不再疏远苏维埃，需要使苏维埃依靠群众，依靠小区自治机构，依靠劳动集体委员会，依靠那些消费者俱乐部和生态运动。

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要么我们按居住地在这些组织中工作，以此来证明共产党员对他们需要的，共产党员是他们的带头人，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人们能够使自己的切身问题比没有共产党员解决得更好；要么我们被人从这些苏维埃赶出去。这是活该，不管谈到这点是多么痛苦。

现在简单谈谈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国内反共活动正在滋长。这是骇人听闻的，但同样骇人听闻的是，我们只是抱怨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们只是抱怨 1900 万人的先锋队不起作用呢？为什么我们只等待中央说话？就算中央不发话，不组织对这种反共宣传进行反击，那我们自己又在干什么呢？我们该做些什么，又是“抓住不放”吗？反共活动会转入地下，仍然会不断滋长。另外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自己能学得更有才干，更积极，办事更果敢。如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仍然难以取得胜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国家和党正处于危机形势中。

重要的一点是党的革新。我想强调注意的是，党内不能有将军和士兵之分。党内应有真正的平等。这种平等应从我们代表大会开始。我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冲过去说：如果与会者不作出满意还是不满意这样一个具体的评价，如果不能同与会者直接对话，哪怕是当面对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说上一句话，那么政治局成员的工作汇报就是走形式。这只是一个

例子。

我发言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所以想谈得简单一些。首先，我们应该保证基层党组织和地区党组织真正的自治权。做到这一点的基础是财产和钱。因此，党费的50%以上应留给它们，首先是基层组织。这将是第一步，是使它们成为真正自主的组织的首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点，我们应当使上级党委会，我想应是各级党委会，成为执行和协调机构。党内应该有纪律，而且必须有纪律，但这应当是执行集体决议的纪律，而不是执行党的机关指示的纪律。

第三点，我们应该保证各个纲领派的真正平等，以免以这样折磨人的方式去挤占报纸版面和代表大会讲台。这种平等能使每一派都占据一定的思想阵地。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使我们在自己信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妥协，什么情况下联合，什么情况下划清界限。否则将是利奥波德的公猫策略，“孩子们，让我们和和气气地生活吧。”除了发生冲突，从这种做法中我们得不到任何东西。还有一点。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员能够在任何一个群众性民主组织内工作，不仅在那些以社会主义选择为目标的组织内工作。我们已经错过了参与许多群众运动的机会，而其中许多运动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这是我们的不幸，应该纠正。怎么，难道是担心我们参加这个组织会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吗？我们应该引导这些运动，学会说服它们。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正在做劳动联合会的工作，这个组织总的来说是持反社会主义立场，但是，当向他们提出保护工人利益的具体口号时，他们支持。尽管有种种反党叫嚣，向劳动联合会代表大会提出的六个决议，还是通过了五个。依我看，我们应处处以这

种精神搞工作。否则我们将彻底被赶出民主运动。

最后谈谈党的问题。当我们这里将产生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领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反对“双料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双重政权——集体领导机构和党的领导人。

同志们，我们正处于发生全国性大火灾的前夕，我希望我们能了解这一点。问题是，要么我们以事实向人民证明，同我们一起比没有我们能更好地走出危机，要么是人民不再理睬共产党员。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做这件事。我们大家都应该记住伟大的无产阶级之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译自1990年7月8日苏联《真理报》）

## 什维尔尼克高等工会运动学校教研室 主任阿·A·谢尔盖耶夫的发言

（1990年7月6日）

共产党员同志们！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同志们！社会党人、左翼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及我们党的其他各位党员！

我受俄罗斯共产党人倡议代表大会组织局的委托，在这个讲坛上再次声明——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在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秋利金同志已经谈过一次，倡议代表大会和支持它的共产党员不提出任何与苏共世界观和战略相对立的特别纲领。我再次重申，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结果使我们相信，苏联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不仅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对于那些坚持捍卫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主张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消除任何看风使舵和庸俗的政客作风,既排除政治上的愚蠢和呆板的教条主义,也排除阶级背叛)不断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的人来说,对于这些苏共党员来说,今天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理由分裂。列宁的遗训对他们来讲是神圣的。列宁认为,共产党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那些自食其力的人的身上。

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有人说过,在座的几乎清一色是男性。因此,在座的都十分明白,当一个男人的裤子此处或那处磨破时,他仍然不会马上从身上脱下来,而是穿着它直到换新裤子为止。我们已经强行把过去的经济体制从我们的经济身上脱了下来,何时才有新衣,用什么替换从前的裤子,至今尚无人能详细说明。不知是苏格兰短裙,还是印度的纱丽,或者只是蝴蝶式领结。眼下经济正在崩溃。没有裤子,再加上政治气候如此恶劣,是干不出很多活的,可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其他选择。说得严重些,社会上、国内、党内都在进行几种选择的斗争:一种是保守的选择,另一种是激进的选择。

第一种观点是保守观点。可悲的是,其代表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政府。这种观点表现在改革头五年出现的体制中,这是使社会经济进程和结构从萎靡不振、摇摇欲坠转向经济不平衡的体制。在这种观点基础上正在形成“影子经济”的实际联盟。它是目前地下资本家同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唯意志论的官僚主义体制余孽的联盟。安特这个合作社与国家联营的吸血鬼的丑事便是活生生的例证。

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这是赤裸裸反动的、资产阶级激进观点。最令人奇怪的是,它被称作,而且是在党的最高层被称作左派的和民主的观点。他们真是左派吗?那些今天呼吁

使“影子经济”合法化的人是什么人呢？那些呼吁我们搞私有制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民主派吗？那些宽宏大量地同意不将普通党员提交法庭的人是什么人呢？我认为，这里所指的是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极右的极端亲资本主义的思潮。

这种思潮认为，有一条生路就是向私人，其中包括外国人出售全民企业、土地，分阶段把全国变成自由经济区，寄希望于不加限制地吸引外资，使“影子经济”合法化，坚持有意识地建立新型社会标兵——超富裕人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革新的构想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一词就要从改革的意识形态中取消。

依我们看，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都是行不通的。它们显然不会导致建立有效的经济。受益的只是所谓的一小部分人，主要是一些生财有道的骗子。但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是不会取得全民一致的。它们没有向老百姓作出任何良好允诺——无论是15个月后，还是15年后。一旦实际成为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会迅速从一个贫困者变成一个穷光蛋。我国人民将承受不了这种改革，党即共产党也将因此而崩溃瓦解，不复存在。

有人呼吁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形式有三种。有商品市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属于那些无论在停滞时期，还是在改革时期一贯拥护这种市场的经济学家。这种市场的全部范畴有：价值、价格、成本、利润、信贷、利息。我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专著、大量的学术文章中都论述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谈论此事，并非想讽刺总书记，而是希望他能更加注意一下自己的顾问和助手们的信息。事实上，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失实。



但除商品市场外，还有两种市场。有以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市场结合在一起，必然产生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把它称作可调节市场也行。此路是不通的。

谈到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前不久，《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民主联盟的经济纲领。读罢顿开茅塞，这项公然亲资本主义的纲领与政府目前所要求做的事何其相似。原来，这就是经济的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的真正涵义之所在。在这个由部分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和民主联盟成员巧妙布下的陷井中，稳稳端坐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难道至今没有看到，这个陷井中为您也准备好一个位置？我们确信，对制定社会经济方针唯一科学的态度是，依靠整个世界经济中客观发展的物质生产社会化进程。这一进程是不平坦的、矛盾重重的，有时是曲折的，但是，20世纪的全部世界经验，其中包括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止的。在这种条件下，采取所谓非国有化，实际上是原始的非社会化的方针，形象地说，就是意味着极力反对经济的必要性。要知道，他们硬是反对不可。但越是借助于右翼激进势力垄断的舆论工具向苏联大众意识灌输与其集体主义实质不相符的陈规旧律，就会使人民向类似于十月革命的那种选择的自然跃进具有越发尖锐的形式。集体主义实质不仅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要强调一下，而且是在许多世纪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要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些人，他们是代表人民的，这些人是无处迁居国外的。

我明白，跨地区议员团成员的经济纲领，因而也是苏共民

主纲领，可能比倡议代表大会的立场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更合乎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心意。顺便说一下，我认为，目前我们应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重新联合，我们对他们还能做些工作，他们将会完全符合标准。这样，党内的一致将会更多，因为我们并不想提出任何特殊的纲领。

所以，我仍然认为，能够拯救国家的不是阿尔捷马·塔拉索夫之流，不是安特的活动家们，甚至不是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之流。拯救国家的是诸如在座的下塔吉尔的冶金工人、乌兹别克的棉农、俄罗斯内地的世代农民、经历过阿富汗战火洗礼的军人这样的人。这些社会力量反对卢布极权主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是另外一种彻底的选择——经济苏维埃化。

遗憾的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过于顽固地剥夺了苏维埃的主要的经济职能。以发展中的物质生产进程社会化为基础的选样，不仅仅在半失宠的经济学家之中得到支持。一些苏联院士也在发展类似的构想。例如，已故列加索夫院士就发展过这些构想，斯特鲁明斯基院士、谢梅尼欣院士、莫伊谢耶夫院士、帕通院士都发展过这些构想，为何没有在改革进程中得到落实。有人会说，因为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事虽如此，但他们可确是院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在代表大会上曾向我们提到，耶稣曾将银钱兑换商赶出神殿。今天若能重演此举就好了！然而，当我翻开今年4月27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时，发现上面写道：“如果能有人向人展示：瞧，这是靠不诚实劳动赚的影子钱，那该多好。可是从何得知，在哪儿赚的钱，是什么钱？……最好是考虑一下，如何‘约束’这些钱，给它们找到出路。可以利用股金、向私人出售小商店和小工厂，租

赁土地”……读着读着我发现：银钱兑换商应邀正在“神殿里举行盛宴”，而邀请人正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曾在自己的报告中说，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如今正在失效。这是很自然的。生活正在前进。但是我认为，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某些论点，今天仍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值得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重提。我首先指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报告中的下列一段话：“如果开始出现私有制……倾向……那就表明，我们工作道路和方法的选择有不正确之处，需要改正。”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译自1990年7月8日苏联《真理报》）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1990年7月2日至13日)

7月2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于1990年7月2日上午10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宣布代表大会开幕。

代表们在交换意见后选出了代表大会领导机构——主席团、秘书处、编纂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大会讨论了代表团代表会议制定的议事日程,并根据补充意见,批准了下列议程:

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的工作汇报。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关于苏共预算和财产的报告。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苏共章程。

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声明和呼吁书。

随后，批准了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

会间休息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主持了会议。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就议程的第一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的晚间会议上，代表大会开始听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汇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苏共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和亚·尼·雅科夫列夫。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向弗·伊·列宁墓敬献了花圈。

（译自1990年7月3日苏联《真理报》）

### 7月3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3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伊·古连科主持了上午会议。

代表大会继续听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汇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苏共中央书记列·尼·扎伊科夫和叶·库·利加乔夫，苏联外交部长爱·阿·谢瓦尔德纳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尤·德·马斯柳科夫，前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谢·伊·沃罗特尼科夫。

随后，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秘书处领导人阿·尼·伊利英通报了秘书处的工作情况。

会间休息之后，会议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努·阿·纳扎尔巴耶夫主持下进行。

代表大会听取了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尤·阿·马纳延科夫作的该委员会的报告，并经短时间的讨论后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作工作汇报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格·彼·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

晚间会议由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叶·索科洛夫主持。

代表大会听取了阿·阿·尼佐夫采娃所作的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尼·叶·克鲁奇纳作了关于苏共预算和财产的报告。

晚间会议最后由米·谢·戈尔巴乔夫主持。

代表大会成立了党的各主要文件起草委员会。

(译自1990年7月4日苏联《真理报》)

## 7月4日

1990年7月4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库·波洛兹科夫主持了上午会议。

代表大会开始就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辩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伊·古连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克建筑托拉斯安装工作队队长阿·И·斯科里科夫，奔萨州泽梅奇诺区基里洛夫国营

农场场长阿·А·波鲁奇科夫，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罗斯托夫州罗斯托夫农业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Ю·А·佩斯科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兹别克共和国总统伊·阿·卡里莫夫，沃洛格达州切列波韦茨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冶金联合企业钳工队长Ю·В·阿尔希波夫，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鲍·韦·吉达斯波夫，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吉·格·贡巴里泽，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叶·索科洛夫，苏联国防工业部部长鲍·米·别洛乌索夫，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哈萨克共和国总统努·阿·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共和国杜尚别出租车公司司机奥·阿齐莫夫，苏共北奥塞梯州委第一书记、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哈·加拉佐夫，苏共莫斯科州加里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维·И·佩罗夫，利佩茨克州新利佩茨克尤·弗·安德罗波夫冶金联合企业党委书记亚·И·捷普列尼切夫，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尼·И·什利亚加。

会间休息之后，会议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兹别克共和国总统伊·阿·卡里莫夫主持下进行。在就报告进行辩论时发言的有，苏共别尔哥罗德州委第一书记、州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阿·菲·波诺马廖夫，苏共基洛夫州苏维埃区委第二书记А·В·舒特列娃，苏共达吉斯坦州委第一书记М·Г·阿利耶夫，图拉州新莫斯科夫斯克区列宁农庄育种场场长、新莫斯科夫斯克农工联合公司经理瓦·А·斯塔罗杜布采夫，苏共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孙塔尔区委第一书记А·А·波波夫，立陶宛共产党（苏共派）中央第一书记米·马·布罗基亚维丘斯，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主席根·阿·亚戈金，“青年共产党人”小组协调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程师

范学院副教授Б·П·古谢列托夫，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尼·穆塔利博夫，摩尔曼斯克州诺里尔斯克镍矿康采恩佩琴加镍矿采矿冶炼联合企业党委书记Н·Н·西多尔金，立陶宛共产党(苏共派)中央第二书记弗·Н·施韦德，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列·伊·阿巴尔金。

在晚间会议上，代表大会完成了成立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与会者决定，7月5日各小组继续就苏共活动的基本方针进行讨论。

(译自1990年7月5日苏联《真理报》)

### 7月5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5日继续举行。

在代表大会上次会议上成立的各个小组，就党的组织政治革新问题，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党与苏维埃、社会政治组织和运动的协作问题进行了讨论。

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慎重地讨论了苏共在现阶段的民族政策问题。

对党在改革时期社会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对苏共旨在发展和加强它与外国进步政党和进步运动联系的国际活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

代表们提出的各种建议将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予以审议。

(译自1990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



7月6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吉·戈·贡巴里泽主持了上午的全体会议。

代表大会继续就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辩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基·卢钦斯基，斯摩棱斯克州作家E·B·马克西莫夫，顿涅茨克州亚速机器制造生产联合公司电焊工B·A·盖沃龙斯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彼·鲁比克斯，哈卡斯自治州国立阿巴坎师范学院教研室主任M·T·卡别利科娃，作家、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达·尼·库古利季诺夫，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马·马萨利耶夫，阿尔泰边疆区承租博罗沃伊国营农场的女养蜂员Л·Л·扎科夫里亚希娜，塔吉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塔吉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马赫卡莫夫，俄罗斯联邦戏剧家协会理事会主席、莫斯科市国家瓦赫坦戈夫模范剧院艺术指导米·亚·乌里扬诺夫，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米·莫夫西相，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萨·阿·尼亚佐夫，克麦罗沃州西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冶金联合企业总经理鲍·A·库斯托夫，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弗·M·久津，苏共伊尔库茨克州委第一书记、州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弗·伊·波塔波夫，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代表、莫斯科市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亚·弗·布兹加林。

晚间会议由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基·卢钦斯基主持。

参加辩论的有：苏共民主纲领派的代表、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维·H·绍斯塔科夫斯基，俄罗斯共产党人倡议代表大会的代表、什维尔尼克高等工会运动学校教研室主任阿·A·谢尔盖耶夫。

随后，代表大会秘书处领导人阿·尼·伊利英通报了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收到的来信和呼吁书的性质。

针对提出的有关舆论工具不够广泛，有时甚至带有倾向性报道代表大会工作的批评意见，新闻联络小组领导人列·彼·克拉夫琴科作了说明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接着，辩论继续进行。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根·伊·亚纳耶夫，吉尔吉斯共和国作家、《外国文学》杂志主编钦·艾特马托夫，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埃-阿·奥·西拉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库·波洛兹科夫，伊尔库茨克州布拉茨克市建筑设计联合公司动力机械化局电工Г·A·佩尔申，塞米巴拉金斯克市水泥厂工作队队长B·C·别洛乌索夫，加里宁州加里宁化学纤维生产联合公司检验员П·П·罗季奥诺娃。

(译自1990年7月7日苏联《真理报》)

## 7月7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萨·阿·尼亚佐夫主持了上午会议。

戈梅利州霍伊尼基第二中学校长B·П·尤尔琴科娃在

大会上发了言。

随后,听取了代表大会各小组代表的报告。

作报告的有:

代表“党的革新”小组的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党委书记И·И·梅利尼科夫;

代表“意识形态工作”小组的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总编辑伊·季·弗罗洛夫;

代表“社会经济政策”小组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伊·古连科;

代表“苏共农业政策”小组的图拉州列宁农庄育种场场长、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А·斯塔罗杜布采夫;

代表“党、苏维埃、社会政治组织和运动”小组的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工作部部长瓦·亚·库普佐夫;

代表“苏共民族政策”小组的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

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

报告作完之后,代表大会通过了停止辩论的决定。

接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苏共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和亚·尼·雅科夫列夫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会间休息之后,会议在米·谢·戈尔巴乔夫主持下进行。

代表大会继续听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在大会上发言的有:苏共中央书记叶·库·利加乔夫、苏联外交部长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根据一些代表团的建议,听取回答到此结束。

接着,编纂委员会领导人弗·安·伊瓦什科向代表大会

报告了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情况，并宣读了决议草案。

在初步交换意见后，代表大会委托编纂委员会根据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这个文件进行定稿并把它提交大会代表。

（译自 1990 年 7 月 8 日苏联《真理报》）

### 7 月 8 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8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全体会议。

米·谢·戈尔巴乔夫和尼·伊·雷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会见了出席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

会见过程就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苏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族际关系、社会秩序和纪律状况热烈地交换了意见。米·谢·戈尔巴乔夫和尼·伊·雷日科夫认真地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

受代表大会的委托，编纂委员会继续进行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

（译自 1990 年 7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

### 7 月 9 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9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主持了上午的全体会议。

代表们认为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基本可用。

接着，会议就当前某些问题和程序问题交换了意见。

随后，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主席阿·阿·尼佐夫采娃和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回答了提问。

代表大会批准了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会间休息之后，代表大会听取了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尤·阿·马纳延科夫根据提出的质询对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结果作的汇报。

代表们全面审议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的下列决议：

《关于现阶段党的军事政策基本方针的决议》；

《维护民主权利、反对迫害共产党员的决议》。

随后，苏共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发言，他否认了在代表大会上私下传播的有关他同代表小组的一次会见的消息，称这些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臆造。

授权根据这一声明的事实进行调查。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回答了问题。

在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的晚间会议上，代表们开始审议苏共章程草案。

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通报了与会者提出的修改意见和补充意见。代表大会认为党章草案基本可用，随后对修正案和意见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译自1990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

## 7月10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10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伊·古连科主持了上午

会议。

米·谢·戈尔巴乔夫就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讨论结果作了发言。

随后，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

会间休息之后，代表大会开始推选，并审议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

经过对所提出的候选人的审议，最后列入无记名投票名单的是泰·格·阿瓦利阿尼和米·谢·戈尔巴乔夫。

代表大会成立了选举计票委员会。

在晚间会议上，代表们听取了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瓦·安·梅德韦杰夫所作的报告。

随后对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了表决。

表决之后，与会者继续讨论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声明草案。

晚间会议结束时，计票委员会主席宣布了表决结果。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表们核准了计票委员会的记录。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向与会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译自 1990 年 7 月 11 日苏联《真理报》)

## 7 月 11 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11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阿·

尼·穆塔利博夫主持了上午会议。

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各决议草案。

会间休息之后，会议由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主持。

代表们讨论了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候选人的提名。列入无记名投票名单的有阿·С·杜德列夫、弗·安·伊瓦什科和叶·库·利加乔夫。

接着，代表们审议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提名，列入名单进行表决的有B·A·普罗霍罗夫和鲍·卡·普戈。

在晚间会议上，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建议全体共产党员、各级党组织和党的机关在新的苏共纲领通过之前遵循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决定成立新的苏共纲领起草委员会。

会议最后由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会议就选举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进行了表决。

(译自1990年7月12日苏联《真理报》)

## 7月12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1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了上午会议。代表们听取了计票委员会关于无记名投票选举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结果的报告。

弗·安·伊瓦什科以多数票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苏共中央委员，鲍·卡·普戈以多数票当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代表大会核准了计票委员会的记录。

随后,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发言,对代表大会早些时候通过被作为基础的苏共章程草案的修正案和补充意见作了分析。

代表们继续就草案进行讨论。在认真而有原则地交换意见之后,讨论宣告结束。代表们所提建议转交给委员会以供参考。

会议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向与会者通报了7月11日矿工罢工情况。代表大会听取了这一报告。

晚间会议开始时,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苏共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政策的决议》。接着,会议在米·谢·戈尔巴乔夫主持下进行。

代表大会开始推举和讨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候选人。

(译自1990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

## 7月13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继续举行。

上午会议开始之前,就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进行了表决。

11时,米·谢·戈尔巴乔夫宣布全体会议开始。代表们同意他提出的关于将代表大会比原定期限延长一天,于7月13日结束的建议。

接着,会议由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

代表们详细地审议了党章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苏共章程草案修正案。在对文件个别条款的提法作最后修正之后,代表



大会整个批准了苏联共产党章程。

随后，代表大会批准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专门决定，要求全体代表积极参加宣传和具体实施代表大会的思想和各项决议。

接着，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共舆论工具的决议》。

会间休息之后，会议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伊·古连科主持。

经过全面、建设性地讨论，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共青年政策的决议》、《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消除事故后果工作情况的政治评价的决议》、《关于民主的民族政策是通向自愿联盟、各族人民之间和睦与和谐的途径的决议》。

代表大会听取了委员会关于证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否认私下传播的歪曲他同代表小组谈话的速记记录是有充分根据的结论，并存档备查。

晚间会议在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下进行。

根据代表大会秘书处的建议，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收到的劳动人民来信的决定》。

随后，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尤·阿·马纳延科夫在大会上发了言。他通报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定：鉴于鲍·尼·叶利钦声明退出苏共，委员会认为他的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已经无效。

会间休息之后，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起草新的苏共纲领的决定》，并成立了起草党的这一主要文件的委员会。

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听取了计票委员会关于无记名投票选举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结果的报告。

代表大会核准了计票委员会的记录，确定苏共中央委员

为 412 人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为 165 人。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到此结束。

(译自 1990 年 7 月 14 日苏联《真理报》)

## 附 录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会新闻公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90年7月13日和14日举行。

中央全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由下列人员组成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米·谢·戈尔巴乔夫、米·马·布罗基亚维丘斯、吉·格·贡巴里泽、斯·伊·古连科、亚·谢·扎索霍夫、弗·安·伊瓦什科、伊·阿·卡里莫夫、彼·基·卢钦斯基、阿·马·马萨利耶夫、卡·马赫卡莫夫、弗·米·莫夫西相、阿·尼·穆塔利博夫、努·阿·纳扎尔巴耶夫、萨·阿·尼亚佐夫、伊·库·波洛兹科夫、尤·阿·普罗科菲耶夫、阿·彼·鲁比克斯、加·弗·谢苗诺娃、埃·阿·奥·西拉里、叶·叶·索科洛夫、叶·谢·斯特罗耶夫、伊·季·弗罗洛夫、奥·谢·舍宁、根·伊·亚纳耶夫。

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的有：奥·德·巴克拉诺夫、鲍·韦·吉达斯波夫、安·尼·吉连科、亚·谢·扎索霍夫、瓦·亚·库普佐夫、尤·阿·马纳延科夫、加·弗·谢苗诺娃、叶·谢·斯特罗耶夫、瓦·米·法林、奥·谢·舍宁、根·伊·亚纳耶夫。

当选为书记处成员的有：B·B·阿尼斯金、B·A·盖沃龙斯基、И·И·梅利尼科夫、亚·И·捷普列尼切夫、Г·

**图尔古诺娃。**

**全会选举伊·季·弗罗洛夫为《真理报》总编辑。**

**(译自 1990 年 7 月 15 日苏联《真理报》)**

(内部发行)

ISBN 7-01-000887-6/D·289 定价 6.80 元